

# 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K926.57/1

# 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韩振华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0425



中华书局

1981年·北京

820425

内 部 发 行

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

韩 振 华 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前门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7<sup>1</sup>/<sub>2</sub>。印张·171千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册

统一书号, 11018·948 定价, 0.85元



## 前 言

包括今天的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在内的我国南海诸岛,其见于中外历史记载者,大都比较零碎和混杂。当前,在着手整理历代南海诸岛资料的时候,探讨和澄清南海诸岛历史地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一件有着重要意义的工作。

这本《论集》共收文章十篇,都是选自参加1979年11月在福建厦门举行的“南海诸岛问题科学讨论会”的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部分论文。其中有些文章,彼此看法还不一致。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它们辑在一起,以供进一步研究、探讨。

编者 1980年8月

# 目 录

## 前言

七洲洋考(谭其骧).....	1
附:夏鼐致谭其骧函(节录).....	7
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考(谭其骧).....	9
附:夏鼐与谭其骧通讯四函(节录).....	12
七州洋考(韩振华).....	21
宋端宗与七洲洋(韩振华).....	63
元代“四海测验”中的中国疆宇之南海(韩振华).....	87
石塘长沙资料辑录考释(林金枝).....	118
石塘长沙考(文焕然 钮仲勋).....	149
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记载上有关西沙群岛归属中国的几条资 料考订(韩振华).....	161
附:干豆考.....	167
古“帕拉塞尔”考(其一).....	173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记载上的帕拉塞尔不 是我国的西沙群岛(韩振华)	
古“帕拉塞尔”考(其二).....	206
---十六、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地图上的帕拉 塞尔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韩振华)	
附图: 1. 我国南海诸岛图	
2. 约翰·沙利《航海记》(1613)中地图	

# 七洲洋考

谭其骧

认为我国旧籍中的七洲洋就是今之西沙群岛，这个说法据我所知，始于一九〇五年法人夏之时所著《中国坤輿详志》；七十多年来，影响很大。外国汉学家如伯希和、藤田丰八等，我国治西域南海史地学者如冯承钧、向达<sup>①</sup>等，以至解放前后所有涉及南海诸岛历史的报刊文章，都沿袭了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时至今日，认真整理南海诸岛的历史已为我历史学界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容许错误的说法再广为传播下去了。因此，写这篇短文澄清一下这个问题看来是十分必要的。

## (一)

宋元明记载中，七洲洋皆指今七洲列岛附近海面。

七洲洋始见于南宋人著作《梦粱录》，宋代只此一条<sup>②</sup>。在元代文献中凡三见：《元史·史弼传》、《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载及七洲洋的则有《星槎胜览》。今将这些早期记载摘录如下：

吴自牧《梦粱录》：“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迤迤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

《元史·史弼传》：“至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弼以五千入，合诸军，发泉州，……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入混沌大洋，……”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

汪大渊《岛夷志略》：“昆仑山，……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船贩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谚云：上有七州，下有昆仑，计（针）迷舵失，（人）舟就（孰）存。”

费信《星槎胜览》：“昆仑山，其山节然瀛海之中，……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

上引五条记载中的七洲洋，很清楚指的都是今海南岛文昌县东七洲列岛附近的海面，不可能指西沙群岛的海面，更不可能指西沙群岛。试论证如左：

一、七洲洋水深七十余丈，约为二百余公尺，与今地图七洲列岛附近海深线在五十至二百公尺之间大致相符。西沙群岛附近洋面深度为一千公尺左右，与“七十余丈”不符。若岛屿附近水浅处，则有撞礁之险，非海舟停泊处。

二、史弼用兵爪哇，先经万里石塘，然后历交趾占城界，可见此万里石塘应指今西沙群岛；叙七洲洋又在万里石塘之前，可见应指今海南岛东侧海面。若七洲洋即万里石塘之海面，则史文无需复出万里石塘四字。

三、周达观行程历闽广诸港口以后，过七洲洋，在经交趾洋到占城之前。按：占城在今越南中部，交趾洋指自海南岛西南至占城海面；则七洲洋自应指交趾洋北之海南岛东侧，不可能反指在交趾洋东南的西沙群岛海面。

四、《梦粱录》、《岛夷志略》、《星槎胜览》三书中七洲皆与昆仑对举，昆仑洋指昆仑山下即昆仑岛下的洋面，则七洲洋自应指七洲

山即七洲列岛下之洋面。宋元以来，皆称西沙群岛为石塘、长沙，千里或万里石塘、千里或万里长沙，无称七洲者，可见七洲洋应指七洲附近的洋面，不可能指石塘或长沙的洋面。

西沙群岛由三十多个岛、礁、滩、沙组成，其中较显著的亦达十五个，决不止七数。惟整个群岛又可分成东西两部分：永乐群岛在西，较显著者八岛，俗称下八岛或西八岛；宣德群岛在东，较显著者七岛，俗称上七岛或东七岛，渔民也有称之为七洲的。《中国坤輿详志》之所以以西沙群岛当古籍中的七洲洋，当由于此。但宣德群岛可以叫七洲，整个西沙群岛不能叫七洲；且宣德有七洲之称不见于古籍，古籍中七洲皆明指文昌县东的七洲列岛。夏之时显然是犯了以偏概全，混淆古今的错误。

五、诸书屡及七洲、昆仑，这是由于此二处为当时往返闽粤与南海诸国间航道所必经。既为航道所必经而又有险，故有去怕，回怕，上怕，下怕之谚。若万里石塘则“避之则吉，遇之则凶”（《岛夷志略》），岂得为航道所经？至七洲洋之所以可怕，则端在舟过此处时若掌握南针“少差”，便会碰上万里石塘，“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昆仑洋之可怕，亦当在航线若偏东，即有触及南沙群岛的危险。

七洲、昆仑都是有相当高度的岩岛，“节然瀛海之中”，因而得与明清针经中的乌猪、独猪、外罗、占笔罗等山并列，成为指引海道航向的指标。至于西沙、南沙诸岛，都是些海拔很低而礁盘很大的珊瑚洲，远处看不见，等到船至近处看得见了，便有触礁之险，怎得成为大海中的航标？

郑和下西洋以后，正统六年（一四四一年）行人吴惠奉命出使占城册封嗣王，是明朝官员航行南海的又一大事。传世明代著作如慎懋赏《海国广记》、王鏊《守溪长语》、《震泽纪闻》、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黄佐《广东通志》等，皆载及此事。诸书所载吴惠的航程都是发东莞县，次日过乌猪洋（今下川岛附近），又次日过七洲洋，



铜鼓山,又次日瞭见大周山(二山都在海南岛东岸),又次日至交趾洋。可见所谓七洲洋只能是指海南岛东北的七洲列岛附近。

明代中晚期有三部讲海道交通的专书,都提到了七洲洋:《海语》、《顺风相送》、《东西洋考》。

《顺风相送》共八次提到七洲洋,有地望可指者凡五处:(一)“定潮水消长时候”条说:船过七洲洋,贪东七更见万里石塘。可见七洲洋不等于万里石塘的洋面,后者在前者之东七更路程,后者即今西沙群岛,则前者无疑指七洲列岛附近洋面。(二)“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条系七洲山七洲洋于乌猪山之下,独猪山之上。(三)“浯屿往大泥、吉兰丹”;(四)“太武往彭场针路”;(五)“广东往磨六甲针”。三条都说七洲洋在乌猪山西南,又西南为独猪山。可见七洲洋专指七洲山附近,西南不超过今万宁县的独猪山即大周山或大洲头。

张燮《东西洋考》中载及七洲洋一段最为详晰:

“乌猪山”:注云“用单申针十三更,取七洲山”。

“七洲山、七洲洋”:注引《琼州志》:“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又注曰:“俗传古是七洲,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

这里和上引《顺风相送》“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条都将七洲洋系于七洲山之下,可见七洲洋自应指七洲山下的洋面。这里虽未引“去怕七洲”这一古语,但很具体地说到了“舟过此极险”,险在于“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舟犯石塘希脱者”,这是对“去怕七洲”的很好的解释。由此可见七洲之可怕不在于七洲洋本身,而在于掌握针向偏东时便有撞到万里石塘即西沙群岛上去的危险。再者,这里又明确指出万里石塘所在的海面名为石塘海,它是在万州之东,而七洲洋则在万州之北。

《顺风相送》载七洲洋“一百二十托水”。《东西洋考》载七洲洋“打水一百三十托”。每托约合五尺，一百二三十托，与《梦梁录》所载七洲洋水深约七十余丈基本符合。

明代记南海三书中，惟独黄衷《海语》在暹罗条下有云：“自东莞之南亭门放洋，南至乌猪、独猪、七洲”，原注：“三洋名”。七洲洋既列于万州独猪洋之后，似应在独猪洋之南，接近西沙群岛。但从明代其他诸书全都列七洲洋于独猪山之前看来，《海语》此条显然是颠倒了次序。我们当然不能认为其他多数记载都错了，反而这条七洲在独猪之南的孤证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足证明以前文献记载中的七洲洋，指的都是仅限于今海南岛东侧七洲列岛附近的洋面。

## (二)

清代图籍中的七洲洋，有广狭二义：狭义沿袭明以前旧义；广义则范围极广，包括西沙群岛海面在内，但亦不专指西沙群岛海面。

狭义的如约成书于十八世纪初的针经《指南正法》，书中凡十一处提到七洲洋。其中有些条文内容基本上与《顺风相送》相同，不赘叙。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另有一条自宁登洋（即广州伶仃洋）往高州的航线，一条自大担（即金门大担岛）往交趾（指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航线，一条自宁波往东京（指越南河内）的航线，这三者都经过七洲洋。试问七洲洋若指西沙群岛洋面，这三条航线怎么可能绕道经过这个洋面？当然只能是指七洲列岛附近才能解释得通。

又如《泉州府志》、《同安县志》中关于十八世纪初广东水师副将吴升巡视琼州府海域的记载，都说是“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铜鼓山七洲洋在海南岛东侧，四更沙在

海南岛西昌化县境，这条巡视路线显然是从琼州府治附近出发顺时针方向，自北而南，自东而西，又自南而北，自西而东，绕岛一周，与三千里之数基本符合。若说是南下巡视到了西沙群岛，再折而西北绕经四更沙东返琼州，那就不止三千里了。何况这条记载的目的是在宣扬吴升不畏艰险，躬自巡视，若果真到了西沙群岛海面，岂有不提远处的石塘或长沙，只提近处的铜鼓山、四更沙之理？

又如记录十八世纪后期航海经历的谢清高《海录》有云：“自万山始，既出口，西南行过七洲洋，有七洲浮海面故名，又行经陵水，……”这个七洲洋也很清楚指的是陵水以北七洲列岛附近海面。

舆图中如嘉庆二十二年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明清档案馆藏），也把七洲洋注在海南岛以东，万里长沙以北。直到宣统元年的《广东舆地全图》，七洲洋也注在七洲之南，铜鼓嘴之北。

广义的七洲洋始见于十八世纪初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此书在“南洋记”一节中，说七洲洋在“大洲头而外”，又说自北而南，过了“琼之大洲头”才过七洲洋，可见它所指的七洲洋，已确从明以前的旧义指大洲头以北，改为移而指大洲头以南。但是不是指的就是西沙群岛的海面呢？也不是。同书在“南澳气”一节中又说万里长沙（西沙、中沙二群岛）之南为七洲洋，更南为千里石塘（南沙群岛）；在“昆仑”一节中又说七洲洋南境直抵大小昆仑山。可见此书所谓七洲洋，范围极广，北起海南岛东南隅大洲头，南抵越南东南北纬八度多的昆仑山，都包括在内。这个“七洲洋”是包括西沙群岛海面在内的，但并不专指西沙群岛海面。

这种广义的用法，又见于道光壬寅刻本《海录》卷首的地图中，七洲洋三字拉长注于海南岛与昆仑山之间，长沙、石塘皆在其东。这幅图为一丛书本《海录》所无，疑非《海录》所原有，而系道光壬寅刻本刻书者录自他书，故七洲洋的含义与《海录》书中用法不同。

又见于十九世纪中叶徐继畲《瀛环志略》的《南洋滨海各国图》和《南洋各岛图》中，七洲洋三字注于琼州昆仑之间，长沙、石塘之西南。又见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郭嵩焘《使西纪程》，中有云：“……在赤道北一十三度，过瓦蕾拉山，安南东南境也，海名七洲洋”，在北纬十三度瓦列刺岬以外的海面还叫七洲洋，可见这个七洲洋是伸展到西沙群岛以南的洋面的，与《海国闻见录》相同。

如上所述，则七洲洋的广狭二义，在有清一代都是长期通用的。

总之，不论是明以前的七洲洋旧义也好，清代的七洲洋广狭二义也好，七洲洋都不指或不专指西沙群岛洋面，更不等于就是西沙群岛。西沙群岛在旧籍中只作石塘、长沙或万里千里石塘长沙等，从来没有被称为七洲；西沙群岛海面的专称只有见于《东西洋考》的石塘海，从没有被称为七洲洋。

#### 注释：

① 伯希和《真腊风土记》注；森田半八《岛夷志略》注；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译丛》；向达《两种海道针经》。

② 《宋史·二王本纪》载元将刘深追宋端宗至七洲洋，《宋史纪事本末》作七里洋。两个“七”字都是“九”字之误。“里”字则系“星”字之误。九星洋一名九洲洋，在今珠海县九澳岛稍北。另有考。

#### 附：夏鼐致谭其骧函（节录）

季龙同志：

在京时承蒙见告有大作一篇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最近抽空拜读一过，引证渊博，立论谨严，敬佩，敬佩！宋、元、明记载中之七洲洋皆指今七洲列岛附近海面，可作为定论。大作应在公开刊物中发表，以纠正一些人的错误。

惟文中谓“这个说法（指以七洲洋为西沙群岛）据我所知，始于1905年法人夏之时所著《中国坤舆详志》”。实则此说提出之时间

更早。文中又以为伯希和“沿袭了这种说法”，引伯氏《真腊风土记笺注》为证。伯氏此书有冯承钧译本，原发表于1902年之《法国远东学校校刊》第二期，岂能以1902年之文沿袭1905年之著作中所提之说法？实则据伯氏自云，在伯氏之前，迈厄斯(Mayers)于《中国评论》(China Review)第三期(1874年)中，格伦末德(W. P. Groeneveldt)于《关于印度支那论文集》第二辑第一册151页中，夏德(F. Hirth)于1894年《通报》第五卷(388页)中，均曾误以七洲洋指西沙群岛(Paracels)。

又伯氏此本《笺注》，有增订本，在其死后作为遗著于1951年出版，增订本已改正错误，已改以七洲洋为七洲列岛(Taya Is.)附近海面，据云：1904年即已发现此误(86—94页)，伯氏所引之史料，与大作中所列者，有同有不同，而结论则完全一致，真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大作注语中谓“《宋史·二王本纪》载元将刘深追宋端宗至七洲洋，《宋史纪事本末》作七里洋。两个‘七’字都是‘九’字之误，‘里’字则系‘星’字之误。九星洋一名九洲洋，在今珠海县九澳岛稍北，另有考。”不知此考已杀青否？亟欲先睹为快。里为星之误，似无疑问，但二“七”字是否都是九字之误，尚可商榷。查《元文类》卷四十一引《经世大典》亦谓俞如珪被执处在七洲洋，岂此“七”字亦为“九”字之误？《正德琼台志》卷五，谓“七洲洋山在〔文昌〕县东大海中，……一名七星山”。若然，则由七洲山得名之七洲洋亦可称七星洋。此次海战之处，史文未明言距秀山、井澳之远近，既可在九洲洋，亦可在七洲洋。增改文字解经，经师所忌，质之高明，以为如何？

顺颂

著安！

夏鼐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 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考

谭其骧

《宋史·二王本纪》载景炎元年(一二七六)十一月乙巳端宗自福州入海,自此假息闽粤海上,屡移驻所;至次年“十二月丙子,昞(端宗)至井澳。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旬余,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十四五。丁丑,刘深追昞至七州洋,执俞如珪以归。”

按井澳在珠江口西侧澳门之南横琴山下<sup>①</sup>,一般宋元明记载如《梦粱录》、《真腊风土记》中之七洲洋,皆指海南岛文昌县东七洲列岛附近洋面<sup>②</sup>。《顺风相送》广东往磨六甲针:“南亭门放洋,用坤未针五更船取乌猪山,用单坤十三更取七洲洋。”南亭门位于珠江口万山群岛间,与井澳相近。一更合六十里,十八更合一千另八十里,与今图所载海道里程大致相符。七洲洋去井澳既有千里之遥,宋端宗以十二月丙子(廿二日)方至井澳,焉得次日丁丑已在千里外之七洲洋<sup>③</sup>?此一可疑也。此前端宗自福州奔泉州,移潮州,次惠州之甲子门,次广州之浅湾<sup>④</sup>,又走秀山<sup>⑤</sup>,再移井澳,每次移躔,皆不甚远,何以独此次不在珠江口西至雷州湾千里海疆上觅一驻所,遽尔远走海南?此二可疑也。《宋史纪事本末》记此事作:“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飓风大作,舟败几溺。帝惊悸成疾。旬余,诸兵士稍集,死者过半。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峽,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七里洋”应即《二王本纪》之七州洋。谢女峽当为自井澳趋大陆之道,故下文曰“复入海至七里洋”,则此洋当在大陆海岸附近处。若自井澳趋海南岛东北之七洲洋,则两处俱在海上,何需登陆“复入海”耶?此三可疑也。有此三可疑,故

知宋端宗亡命所至之七洲洋 应去井澳不远,必不得为见于《梦粱录》、《真腊风土记》等记载中之七洲洋。

今按《方輿纪要》广州府香山县下有九星洋,“在县西(当作东)南,建(当作景)炎二年元将刘深袭井澳,帝至谢女峡,复入海至九星洋,欲往占城不果。”香山县之九星洋,《清一统志》广州府山川望门山条下作“九星大洋”,《纪要》广东海、《清一统志》广州府海皆作九星洋,同治《广东图》亦作九星洋,光绪《广东舆地全图》作九洲洋。《纪要》引《一统志》:“海中有九曜山,罗列如九星,洋因以名。”《清一统志》:“九星洲山九峰分峙,有水甘美,曰天塘水,海舶往来所汲。”据图,九星洲及九洲洋位于香山县(今中山县)东南吉大汛东,距岸不足十里,西南去澳门十余里,南距横琴岛东之九澳岛二十余里<sup>⑥</sup>,自井澳至此,渡海登陆,复自陆入海,相去不过四五十里,一日可达。然则史载宋端宗亡命海上所经之“七洲洋”,应即指此。此洋本作九星洋或九洲洋,史文二“七”字皆“九”字之误,“里”字则“星”字之误也。

以上是我在五六年前所写的一条读史札记(附注系近日所增补)。一九七七年写《七洲洋考》时,考虑到这个宋端宗流亡时到过的“七洲洋”既然是九洲洋之误,便不应作为七洲洋的宋代资料写入正文,只能在注中交代一下;但札记全文太长,因而仅将结论入注,缀以“另有考”三字。顷承夏鼐同志移书商榷,指出《元文类》卷四十一引《经世大典》亦谓俞如珪被执处在七洲洋,所以他认为史载残宋与元军海战处作七洲洋或七里洋,“里”为“星”之误似无疑问,二“七”字则未必为“九”字之误。也就是说,这个战场既可在香山县之九洲洋,亦可在文昌县之七洲洋。从信里的语气看来,夏鼐同志是倾向于认为应在七洲洋的。接信后赶紧把《元文类》找出来一看,所引《经世大典》记载此事的原文是:“十二月二十三日,

……追昞、昞、世杰等至广州七洲洋及之，战海洋中，夺船二百艘，获昞母舅俞如珪等”。一看使我不胜欣喜，这决不是一条否决我的看法的资料，相反倒是一条很好的证实我的看法的资料。因为今海南岛文昌县东的七洲洋，在宋代应属琼州，去广州甚远，中隔雷、化、高、南恩诸州海面，断不得悬属于广州；而在广州境内有所谓“七洲洋”，便只能是指今之九洲洋。

至于《东西洋考》七州山、七州洋条引《琼州志》：“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这是不足信据的。这显然是因《经世大典》、《宋史》等史籍都说元军追宋端宗及于“七洲洋”，而七洲洋实在琼州海域，修地方志的便不问情实，硬把这一故事拉到了琼州海域上来。

琼州的地方志认为宋端宗到过的是琼州的七州洋，而广州的地方志则认为宋端宗到过的是广州香山县的九洲洋或九星洋。核以史实，端宗十二月丙子尚在井澳，丁丑不可能远走至琼州七洲洋，所以广州的地方志应该是可信的。问题是：《经世大典》、《宋史》、《宋史纪事本末》中的“七州洋”，“七”字是不是错字？我查了道光《香山县志》，作者认为端宗所到的“七州洋即今所称九州洋”（卷八事略）。这是说，文献记载作七州洋并没有错，而是古今地名发生了变化。这是可能的。很可能在宋明之间，这一海域的海底在上升，原来的七洲变成了九洲，人们也就改称洲为九星洲，洋为九洲洋或九星洋。不过“七”字是“九”字之错这种可能性似乎也还不能完全排除。文献记载往往辗转传抄，一种错了几种跟着错，这并不可怪。上文引《方輿纪要》香山县九星洋条，中有“复入海至九星洋”一语，这条记载不像出自顾祖禹自撰，像是从宋元记载上引录下来的。若然，则宋元记载中洋名首字也有作“九”的，不一定作“七”。

总之，宋端宗流亡海上所到过的“七州洋”，只能是珠江口内澳



门东北今之九洲洋，不可能是海南岛东北七洲列岛下的七洲洋。今人又或误以西沙群岛为古七洲洋，从而又有宋端宗避元兵曾驻蹕西沙群岛之说，那就更是齐东野人之语了。《宋史纪事本末》载：端宗以舟师发福州入海之初，“时军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人”；帝昺驻厓山，“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及厓山败亡，“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扈从端宗的是一支十余万乃至数十万人的队伍，所以辗转海上，所有驻蹕之所，都是在大陆海滨港澳里或近岸岛屿上，这样才可以依靠大陆近处资粮，以供给养。西沙群岛是几个无粮的珊瑚洲，远离大陆近则三四日程，远至七八日程，残宋大军跑到这里来电驻，那岂不是自投绝地？此事理所必无者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

### 注释：

① 见《方輿纪要》广州府香山县井澳条、《清一统志》广州府山川横琴山条、《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山川深井山条。清图作深井，今图亦作深井，西濒海湾曰深井湾。

② 见拙撰《七洲洋考》。

③ 端宗以丙子日至井澳遇飓风，《宋史》及《宋史纪事本末》、《厓山集》、嘉靖《广东通志》所载皆同。《厓山集》引《填海录》、《图书集成》引《香山县志》作丙寅（十二日），不可从。盖由史文丙子下有旬余云云，遂疑丙子为丙寅之误而擅改之耳，非别有所本。

④ 《二王本纪》见至元十四年九月戊申至十一月庚寅端宗驻蹕浅湾，《宋史纪事本末》作是年九月戊申“帝舟次广之浅湾”。

⑤ 即今东莞县西南虎门西岸大小虎山，见《方輿纪要》东莞县虎头山、《清一统志》广州府山川秀山。

⑥ 一九六三年广东省测绘管理局出版的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亦作九洲洋，在珠海县（香洲）东南，澳门东北。

## 附：夏鼐与谭其骧通信四函（节录）

### 一、夏鼐致谭其骧函

季龙同志：

《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考》提纲，已拜读一过，足见读书细

心,敬佩,敬佩!但尊说可备一说,尚不能如前文<sup>①</sup>之以“十八世纪以前华籍中之七洲洋皆非西沙群岛”可作定论。

大作所举理由四条,兹略加论述,以求指教:

一、《经世大典》作追至“广州七洲洋”,故此洋必在广州境内。此条理由最为坚强。但《经世大典》此处并非如正史各地理志之列举各州及其所属城镇洋面等,乃一般叙述一件史事。刘深追宋端宗由广州出发,则叙及七洲洋时,有意或无意中称之为“广州七洲洋”,亦非不可能。刘深追至七洲洋,在井澳战役之后,见《二王本纪》。《陈宜中传》谓井澳之败,陈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则端宗败后遁逃可以至琼州七洲洋。

二、琼州、广州二说并存,此为乡土观念之作出。吾国方志中关于名人籍贯、名人陵墓以及重要史事之发生地点,皆有此种现象,有时不止于二说。大作以为“核以史实,广州志之说可信”,不知所谓“史实”者,除上述第一条外,尚有其他史实可作证欤?第一条尚难作为定论。

三、道光《香山县志》之编纂者,恐亦不能完全脱去乡土观念。其以《经世大典》及《宋史》之七州洋即今所谓九洲洋,可信亦可不信。正由于明清以来香山县境但有九洲洋,别无七州洋,故欲上溯明清以前之“九洲洋”,只能认宋元时代之“七州洋”为祖宗,而不管宋元时代之七州洋在香山县境抑在琼州。

四、此条乃先肯定结论,然后作解释。(一)自然地理方面是否此处有海底上升,明清增添二州,现无实证,只能等待今后研究。但若在琼州,则宋之七州,明清亦七州,不必再作假设。(二)史文“七”字可能系“九”字之误,此种可能虽不能否定,亦不能肯定。校订史文,须有证据,否则当以不改为胜。证据包括理证,而此条校改之理由,并不充分。

敬抒己见,质之高明,诸希教正,而勿以泥执谬见相哂也。

敬礼！并祝新年快乐！

夏鼐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 二、谭其骧致夏鼐函

作铭同志：

去岁岁末奉到论七州洋第二函，适因参加地理学会代表大会，有广州之行，未遑作复。三日前归来，又为杂务所羁，今日始得就大函对拙作《宋端宗到过的“七州洋”考》所提质疑四点，谨以鄙见奉答如下，仍希进而教之。

一、《经世大典》记元兵追宋端宗“至广州七州洋及之”一语之前，所叙端宗行踪，皆在广州境内，依行文惯例，则此处“七州洋”前，本无需再着“广州”二字，故此二字最足以说明此七州洋必在广州境内。盖作者知琼州亦有七州洋，因而有意加此“广州”二字以免混淆也。《陈宜中传》谓井澳败后，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二王本纪》则谓景炎二年十一月端宗自浅湾走秀山时，陈“宜中入占城，遂不反”。至次年三月又谓“是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驻碙州”。纪、传记事时间有出入，姑置勿论。要之，宜中之如占城，实未尝挟端宗同行，宜中如占城可过琼州之七州洋，然与端宗无涉。史但称端宗“欲往居占城，不果”，未尝谓已成行而又折回也。

二、尊论地方志于名人籍贯、陵墓及重要史事发生地点，往往二说或数说并存，皆由于乡土观念作祟一节，至为精到。然亦不得遽谓二说或数说中遂无一说可信。愚见之所以以广州志之说为可信者，一则证以琼州七州洋广州九洲洋距井澳之远近。盖史载端宗自井澳出奔过七州洋仅一日程，故知此“七州洋”只能为广州之九洲洋，决非远在千里外琼州之七洲洋。二则证以史载自井澳至七州洋途程中有“复入海”一语，以海陆形势度之，正当为香山近岸

之九洲洋，不应为远离大陆之文昌七洲洋。果不仅以《经世大典》于“七州洋”前明著“广州”二字一事为据也。此三证分别言之，或可视为不够坚强，若合为观之，窃以为足够坚强矣。

三、大函谓道光《香山县志》以《宋史》“七州洋”为“即今所称九洲洋”，其说“可信亦不可信”，自属深合于逻辑推理之论。若单凭《县志》此一语，自不敢谓其说必可信。愚之所以认为可信，当然是由于此说正好符合于我自己的推论之故。

四、九洲洋海底宋明间是否曾上升，因而增添二洲，诚如大函所指出，“现无实证，只能等待今后研究”。但愚见亦非纯属无根据的假说，实由于据到过西沙群岛之友人见告，西沙群岛一带原在海面下（暗礁），确在不断出水成岛并继续上升中，故设想宋明间九洲洋海面宜亦有此可能。史文“七”字可能系“九”字之误，尊见亦以为不能否定有此可能，惟径行校改则理由尚不充分。前函所摘拙文提纲殆未及《方輿纪要》九星洋一条。有此一条后，理由岂不是更充分一些了吗？

欲求学术繁荣，非百家争鸣不可，更非破除禁区不可，这番咱俩就这个小问题不惮烦地争鸣了数千言，虽然截至日前为止看来还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已充分享受了嚶鸣之乐，对历史真象的探索也至少较前推进了一步。

专此敬颂

撰祺

其骥手上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 三、夏肅致譚其襄函

季龙同志：

尚有几点余义，敢再质之高明，仍望勿吝指教。

一、《经世大典》中“至广州七州洋及之”一语中之“广州”二字，诚如尊函所云，最足以说明此七州洋必在广州境内。（我只看到毕沅《续资治通鉴》中《考异》所引之《经世大典》，仅有“七州洋”三字，其前无“广州”二字，可能为引用时删去。尊引不知根据何种辑佚本？）

二、陈宜中之如占城，实未尝挟端宗同行，此为公认之史实，自无问题。但尊函以为史称端宗“欲往居占城，不果”，未尝谓已成行而又折回也，则尚可商榷。史明言端宗至七州洋后欲往居占城，则可能于追兵退后，虽已行至文昌七州洋，仍可折回也。

三、自井澳出奔过七州洋仅一日程，史载由井澳复入海，刘深追至七洲洋（或七星洋）。颇疑香山近岸为九州山（一名九曜山）及九州洋（即九星洋），“复入海”后则何处为九洲洋与七洲洋之分界处，史无明文。七州山在文昌县境，远离井澳，但七州洋可能北伸数百里，《东西洋考》谓广州与厓州之间顺风约五日程，则广州至文昌七州山顺风可三日程，如七州洋北伸数百里，则由广州井澳至此亦可为一日程。“千里江陵一日还”虽为诗人夸大之辞，但“顺风相送”，海船可于一日内由井澳至七洲洋之北部洋面。

四、尊函谓得《方輿纪要》一条，弥觉理由充分。按《方輿纪要》广州“九星洋”一条，显然由《经世大典》中“广州七州洋”一条而来。颇疑由于顾氏知广州有九星山（九曜山）及九星洋而无七州洋，故改七为九，并非宋元时为七岛而明末清初增为九岛也。明末清初一般学者所能见及之元初史料，已限于《宋史》、《经世大典》等数种，估计顾氏不会另有秘籍为其此条之根据也。

五、尊函以为七岛成为九岛，或有其事，引西沙群岛为证。按西沙群岛为珊瑚礁，珊瑚遗骸逐年增高，继续上升为正常现象，文昌之七州山及广州九星山（即九曜山），据闻皆为火成岩而非珊瑚礁，尤其是问题所在之广州九星山（九曜山），除非地壳上升，或海

水下降，则逐年经侵蚀变低，不会上升，窃以为不能引西沙群岛为证也。

考据之事，其证据坚强达十分者，则不抱成见或别有用意者，皆将首肯。有仅达六、七或八、九者，则或以为不够坚强，或以为足够坚强，可以有不同看法，至于如何评分，亦各人标准不同，不能强求划一。未知尊意以为如何？

大作《七州洋考》鄙意以为可视为定论。《宋端宗所到过的七州洋考》则已达九分，尊函以为已够坚强，鄙意以为可以如此说。

至少我们可以说《经世大典》之编写者，已认为此为“广州七洲洋”。但他书皆仅作“七洲洋”，此广州二字为编者所臆测增入或另有所本？是否有万一可能为编者知广州亦有七洲洋，并认为广州七洲洋之可能性较大，故径增入此二字？故鄙意以为“已是九分，但尚未达一间”者，为此故也。至于《方輿纪要》之文，则不足为强证。

此复，顺颂

研安

夏鼐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 四、谭其骧致夏鼐函

作铭同志：

兹就兄所提出的待商数点，辄以鄙见奉答如下：

一、我所引用的《经世大典》，见《四部丛刊》景印元刊本《国朝文类》卷四十一，原文是：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沿海经略使行征南左副都元帅府兵追昞、曷、世杰等至广州七洲洋，及之，战海洋中，夺船二百艘，获昞母舅俞如珪等。”《续资治通鉴》本文作“追至七里洋”，《考异》云，“《经世大典》作七州洋，今从《宋史》。”今

按《宋史》实作“七州洋”，作“七里洋”者乃《宋史纪事本末》，可见《考异》之疏舛。

二、关于宋端宗“欲往占城，不果。”《宋史纪事本末》系此语于景炎二年十二月“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后，您大概是以此为据，所以说“史明言端宗至七州洋后欲往居占城，则可能于追兵退后，虽已行至文昌七州洋，仍可折回也。”但《宋史·二王本纪》记此事与《纪事本末》异。本纪于至元十四年（景炎二年）十二月只说“丁丑，刘深追昷至七州洋，执俞如珪以归”，不言欲往占城。直至十五年三月，才说“昷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驻硃州。”证以上引《经世大典》一节，及《宋史·张世杰传》所载“移王居井澳，深复来攻井澳，世杰战却之”一节，可知刘深袭井澳，端宗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七州洋，为深所追及，战船二百艘被夺，母舅俞如珪被执，幸而终于为张世杰所战却，端宗因而得以保全，乃景炎二年十二月丁丑（二十三日）一日内之事，当时战况危急，宋君臣但求击退追兵，保全性命及残余部队，焉得议及此后行动大计？是日元兵既却，宋君臣当复返井澳，故欲往占城一议，自应出于喘息稍定之后即次年春间，《本纪》宜较《纪事本末》为可信。至是端宗已决定离开井澳，初议往占城，此议不果，乃改计移驻硃洲，至四月遂殁于硃洲。我是根据这样看法，所以认为端宗占城之行既未成行，即不可能到过文昌的七洲洋。前函中没有阐明立说的根据，当然难免要引起您的责难了。

三、尊见认为九洲洋与七洲洋分界处史无明文，七洲洋北界可能起自去井澳一日程处，故端宗自井澳出奔，一日内有可能至于七洲洋的北部。窃以为不然。九洲洋在珠江口内，与远在珠江口西南七八百里外的七洲洋，不可能相接。《东西洋考》，《顺风相送》，《指南正法》皆谓南亭门（珠江口）西南五更至乌猪山（上川岛东南），乌猪山又西南十三更（或作十五更）方至七洲洋，则七洲洋

一名,仅得起自七洲山附近,不得用以指乌猪山以东去井澳一日程之洋面甚明。故端宗自井澳出奔,一日之内,只可能至九洲洋,不可能至七洲洋之任何部份。

四、《方輿纪要》广州九星洋一条,手教谓显系本于《经世大典》广州七州洋一条,又以广州有九星洋而无七洲洋,乃擅改七州为九星。愚见以为不然。《纪要》此条作“元将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九星洋 欲往占城不果”。与《经世大典》文字迥不相同,而与《宋史纪事本末》除一作“七里”一作“九星”外全无差别,足见与《经世大典》无涉,应与《纪事本末》同出一源,顾氏去陈邦瞻时代不远,陈所见书,顾氏宜亦得见之;二人同采一书,惟陈误九星为七里,而顾氏不误。二氏所本为何书,今日虽已不可得而考定,设想在《宋史》与《经世大典》外,当时另有一种元人记载,则似不能排除有此可能。否则“帝奔谢女峡,复入海”二语,岂得谓为出于陈顾二人凭空虚构乎?愚以为顾氏所见书一般虽不超出今日见在诸书,然亦不能断谓绝无,因为毕竟时代相去已三百年了。

五、尊函指出西沙群岛系珊瑚礁而九洲洋中之九星山(九洲)系火成岩,不能以西沙之逐步增高作为九星亦可能在上升之证,此点完全正确。惟鄙意仍以为端宗所到之七州洋即明清之九洲洋,至同一洋面而宋元称七洲明清称九洲,则有两种可能:一为由于海面下降,宋元本为七洲,明清又有二洲露出海面;二为七洲者指涨潮时而言,九洲者指退潮时而言。此事自有待于实地勘察方可得出正确结论,非专凭文献记载常理推论所可臆断者也。

大札结尾又谓考证之事,除证据坚强达十分者外,其仅能达六七分或八九分者,如何评分,各人可有不同标准,不能强求一律,自属通人之论。又谓弟所主宋端宗所到七州洋即九洲洋一说“已达九分”,则未免过誉,弟自问或可达七八分耳,断断乎不至于狂妄到自封为定论也。



专此，即颂  
撰祺

弟谭其骧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八日

注释：

① 指谭其骧：《七洲洋考》一文。

# 七州洋考

韩振华

## 一、七州洋与广州七州洋

(一)过七州洋的海道

(二)七州洋的一些特点

(三)七洲洋、七洲洋山与七里洋、七里山以及七星洋、七星山

(四)七州洋名称的由来

## 二、文昌七洲洋

## 三、广东外七洲洋

## 一、七州洋与广州七州洋

### (一)过七州洋的海道

七州洋既是海域又是海道。过七州洋的海道有好几条，风极顺利历时六、七日乃得渡过<sup>①</sup>。七州洋亦称七州大洋<sup>②</sup>。时或简称“大洋”<sup>③</sup>或“洋”<sup>④</sup>。大体上，七州洋是介乎万里石塘与大陆之间，七州洋海道就是斜行穿过万里石塘与大陆之间的一条海道，一般水深七十余丈<sup>⑤</sup>，即200米余的深海。万里石塘起自广东潮州<sup>⑥</sup>或台湾(琉球)<sup>⑦</sup>，迄于南海龙牙山<sup>⑧</sup>，迤邐如长蛇，横亘于海中<sup>⑨</sup>，七州洋这条深海航线的海道，几乎与万里石塘平行，自东北向西南伸延，所谓“迤邐过七州洋”即“旁行连延”或“斜行连延”以过七州

洋<sup>⑧</sup>，这是很形象化地指出七州洋这条海道，正是航行在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斜角线上。用单坤针，西南行五十更，自潮州府南澳岛东面的南澳兄弟岛，一直斜行连延至占城的外罗山。如今，自南澳东面兄弟岛，西南斜行一直到外罗山，基本上是沿着水深 200 米余的深海海域斜行而下，只要勤打水托探测水深，并经常保持在水深 200 米的海中航行，也可以保证不偏离西南向的斜行，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在长期航海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

自泉州放洋，必经七州洋，而后泛海往外国；自广州放洋，亦然。只有经由浅海海域（200 米以内至 100 米以内，甚至 50 米以内）的航线，才不必经过七州洋。由于明清以来的《海道针经》，较为详细保留了经由浅海航线前往外国的记载<sup>⑨</sup>，但也零星残存了一些经由七州洋深海航线到外国去的记载；同时，宋元记载，过深海航线的七州洋，仍有所见。兹将历史记载上，过七州洋的几条海道，略述如下：

#### （1）自泉州放洋迤邐过七州洋，二十余程至占城的海道

宋吴自牧《梦粱录》说：自泉州放洋，“迤邐过七洲洋”，即七州洋<sup>⑩</sup>，便可泛海往外国做买卖。并说七州洋水深七十余丈<sup>⑪</sup>，约 200 米余。这是一条深海航线的海道。元史弼率领水军，由泉州放洋，“过七州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sup>⑫</sup>。过七洲洋需要什么方向的罗盘针位和船行多少更，这里都没有讲到。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说：自南澳至独漈之山为四十更，自独漈之山至通草之屿、外罗山，为十更<sup>⑬</sup>。针盘方位，仍旧没讲。这里的南澳，指南澳岛东面的兄弟岛，在今东经 117°42′，北纬 23°32′<sup>⑭</sup>。据《海道针经》说：在七州洋上，其正路是“上不离艮（45°），下不离坤（225°）”<sup>⑮</sup>，在罗盘方位上，艮坤都是和子午线构成 45°角，亦即在七州洋上，其正路是采用艮、坤对座的针位。由此可知，自泉州放洋，用单坤针七更，至南澳东面兄弟岛<sup>⑯</sup>。自南澳东面兄弟岛，坤针四十更，

至独漈之山；自独漈之山，用坤针十更，至通草之屿<sup>⑩</sup>、外罗山，总计自泉州放洋，用单坤针五十七更，可至外罗山<sup>⑪</sup>。

宋赵汝适《诸蕃志》说：自泉州顺风二十余程至占城<sup>⑫</sup>。三程为一日夜<sup>⑬</sup>，或五百里<sup>⑭</sup>，二十程多一点，即将近七日夜，为3,420里；以更计算，或五十七更（一更六十里计算）。可见宋时自泉州放洋，用单坤针二十程余或五十七更，“迤迳过七洲洋”，便可泛海到外国的占城。

下面，把各地相距的更数，一更以六十里计算<sup>⑮</sup>，并依照直角三角形勾股弦定理的公式<sup>⑯</sup>，求得船行某针某更，折合经、纬度多少度，所至何处，当今经、纬度几度，一一列表如下，互相比较，凡误差在经、纬度一度以内，都是在当时航海技术水平所许可之下的<sup>⑰</sup>。

表一：自泉州用单坤针过七洲洋所至各处经纬度推算表

《诸蕃志》	泉州 顺风二十余程 (3420 里) → 至占城						
《梦粱录》	泉州 放洋 → “迤迳过七洲洋”(即“斜行连延”或 45° 角艮/坤对座) → 到占城						
《西洋朝贡典录》	泉州港 (南口) →	1.68 日 单坤 七更 → 420 里 2.5 程	南 澳 →	9.6 日 单坤四 十更 → 2400 里 14.4 程	独 漈 之 山 →	2.4 日 单坤 十更 → 600 里 3.6 程	通草之屿 外罗山
所在地 经纬度 (推算)	118°47'E 24°46'N	1°10'E 1°10'N	117°37'E 23°36'N	6°43'E 6°43'N	110°54'E 16°53'N	1°41'E 1°41'N	109°13'E 15°12'N
拟 订 今 地			今南澳东 面兄弟岛 117°42'E 23°32'N		今西沙群 岛北礁岛 111°30'E 17°07'N		今越南 理山岛 109°07'E 15°22'N
			误差 +0°05'E -0°04'N		误差 +0°31'E +0°18'N		误差 -0°08'E +0°10'N

## (2) 过七州洋或广州七洲洋, 至占城的海道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说:“占城国在海西南, 自广州发舶至诸蕃, 惟占城为近, 顺风八日可达。”<sup>②7</sup> 明暹罗馆通事握文源言:“由广东香山县登舟, 用北风下, 指南针正午, 行出大海, 名七洲洋, 十日可抵安南海次, 有一山名外罗; 八日可抵占城海次。”<sup>②8</sup> 这是两条航线: 第一条航线八日至占城, 是自香山县的万山西山, 正午一日, 至七州洋, 亦即经过“广州七洲洋”<sup>②9</sup>, 七日至占城海次, 共八日。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说, 过“七州大洋, 大洲头而外”的七州洋, “风极顺利, 六七日可渡”, 乃见占毕罗、外罗山<sup>③0</sup>, 正是指此而言。一般上, 在七州洋上, 其正路仍是“上不离艮, 下不离坤”<sup>③1</sup>, 自香山县万山群岛西山<sup>③2</sup>, 正午一日至七州洋, 坤针七日至占城海次占毕罗山, 共八日。第二条航线十日至安南海次, 是自香山县正午一日至万山群岛西山, 又正午一日至七州洋, 坤针七日, 至安南的占城海次(占毕罗), 转南<sup>③3</sup>正午一日, 至外罗山, 共十日。

《海道针经》说:“若遇七州洋, 见流界七条, 乃近南亭门。”<sup>③4</sup> 或说:“过七洲洋; 七洲洋流界七条, 乃是近南亭门。”<sup>③5</sup> 如自广东港口万山群岛的南亭门正午一日至七洲洋, 正是上述近南亭门并有流界七条的七洲洋。这里所说的近南亭门的七洲洋, 亦称广州七州洋, 或七州洋“大洋”, 风极顺利, 亦需六、七日始能渡过, 而见越南的占毕罗、外罗山<sup>③6</sup>。

表二: 由香山县登舟过七洲洋所至各处经纬度推算表

	香山县正午一日
香山县万山(西山) 113°36'E ↓ 21°59'N	香山县万山(西山) 113°36'E ↓ 21°59'N
正午一日 0°00'E ↓ 1°00'N	正午一日 0°00'E ↓ 1°00'N

续表

近南亭门的流界七条的七洲洋 七州洋(广州七州洋) 113°36'E ↓ 20°59'N	七洲洋(广州七州洋) 113°36'E ↓ 20°59'N
单坤七日 4°56'E ↓ 4°56'N	单坤七日 4°56'E ↓ 4°56'N
占城海次占毕罗 108°40'E ↓ 16°03'N	七洲洋转南落去处 108°40'E ↓ 16°03'N
今占婆岛 108°30'E 15°55'N	单午一日 0°00'E 1°00'N
误差 -0°10'E -0°08'N	↓
	外罗山(内过) 108°40'E 15°03'N
	今理山岛 109°07'E 15°22'N
	误差 +0°27'E ÷0°19'N

表三：自广州过广州七州洋十日至占城罗盘针位、行程日数比较表

贾耽《广州通海夷道》：

屯门——九州石——○——象石——占不劳  
西二日 南行二日(西南四日) 西南三日

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 20：

屯门——○——○——九乳螺洲——占不劳  
(西一日)(南二日)(西南四日) 西南三日

《宋史》卷 489 占城传：

西南七日 西南三日  
广州——占城  
顺风半月程 (即十日)

明暹罗通事握文源之言：

广东港口——→七洲洋——→占城  
 万山群岛 正午一日——→(西南七日)——→(占毕罗)

《粤海关志》卷 21.引:

香山县 正午(一日)——→<sup>共八日</sup>正午(一日)——→占毕罗——→外罗  
 万山 七洲洋 西南七日 (正南一日)  
 共十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20 海外诸蕃入贡互市条:

屯门——→九州石——→○——→象石——→占不劳  
 西二日 南行二日 (西南四日) 西南三日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 100 广东(一)海:

屯门——→九州石——→○——→象石——→占不劳  
 西一日 南行二日 (西南四日) 西南三日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20:

屯门——→○——→○——→九乳螺州——→占不劳  
 西南七日 (西一日)(南二日)(西南四日) 西南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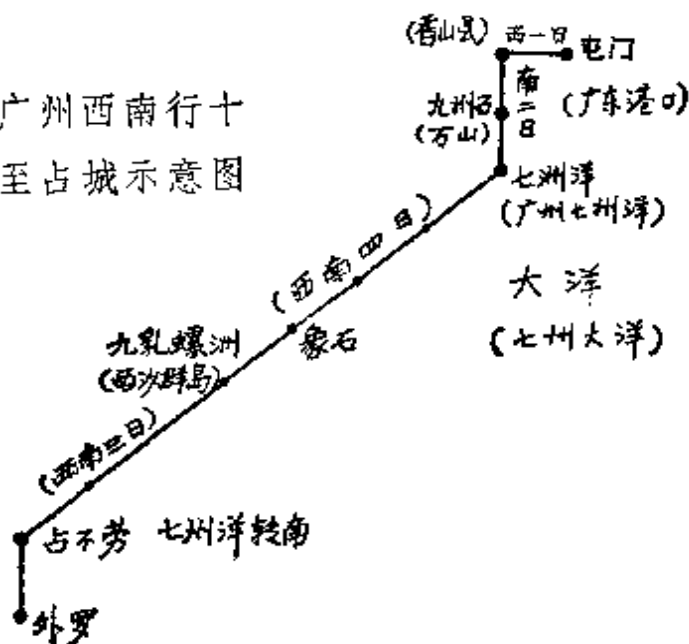
温汝能《方輿类纂》卷二十五广东省:

屯门——→九州石——→○——→○象石——→占不劳  
 西南七日 西南三日  
 西行一日 南行二日 (西南四日) 九乳螺洲

严如煜《洋防辑要》卷 8:

屯门——→九州石——→○——→○象石——→占不劳  
 西南七日 西南三日  
 西行一日 南行二日 (西南四日) 九乳螺洲

图一: 自广州西南行十日至占城示意图



### (3) 过乌猪洋、七洲洋至占城的海道

宋吴自牧《梦粱录》有提到过乌猪洋和过七洲洋<sup>②</sup>；明谢杰《虔台倭纂》有提到自乌猪三昼夜（三十更）<sup>③</sup>至七洲洋；《海道针经》说：自乌猪“单未七更”至七洲洋<sup>④</sup>，《海道针经》又说：“若船七州洋落去，贪东七更，船见万里石塘，似船帆样，近看似二、三个船帆样，可妨。牵船使（驶）一日，见外罗山，千万记心耳。”<sup>⑤</sup>

《海录》万山条注云：由广东海口万山出，“东：往南澳、闽海；东南：出长沙门；直南：穿万里长沙、中港；西南：出七洲洋；西：至琼雷廉海”<sup>⑥</sup>。《海录》又说：“万山在广东海口外，海舶必由此出，若西南行过七洲洋，四、五日过越南界，见其外之咕啞啰山，又南行二、三日，到新州”。<sup>⑦</sup>由万山出，西南行所至，是七洲洋，即万州东南、大洲头而外的七洲洋，过此七洲洋，四、五日乃可渡过，而见越南界的咕啞啰山，由此转南，至新州（平定）、昆仑岛等处。《海录》噶喇吧条说：“由广东往者，出万山，西南过七洲洋，转南过昆仑、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sup>⑧</sup>一般刊本的《海录》如《海外番夷录》本，对此稍微不同，曰：“海舶由广东往者，走内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仑，又南行约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出万山以后，西南行，所经过者，一作七洲洋，一作琼州，安南。这里的七洲洋，包括琼州至安南之间，即大洲头而外，万州东南的七洲洋，四、五日乃过。至于由“七洲洋转南”至昆仑岛，仅见郑光祖的辑本：“七洲洋转南”之处，即《海道针经》所说的“七洲洋落去”处，牵船驶一日见外罗。落去即下去，北上南下，下去亦即南去，或转南而去，下距外罗牵船驶一日。用单未针由广东港口南亭门（万山）、乌猪，过七洲洋至外罗山，（或由七洲洋落去一日至外罗山），仍按上述公式求得海道所经过各处的经纬度。（见表四）

### (4) 过乌猪、独猪、七洲三洋，至占城的海道

明黄衷《海语》说：“暹罗国（今泰国）在南海中，自东莞之南亭



表四：由乌猪过七洲洋

		乌猪(岛)→	单未三十更→ (三昼夜 或六日)		
		112°54'E 21°59'N	3°00'E 5°11'N		
南亭门→ (万山)	单未五更→ (或一口)	乌猪(洋)→	单未三十更→ (三昼夜 或六日)		
113°36'E 21°59'N		113°06'E 21°07'N	3°00'E 5°11'N		
		乌猪(岛)→	单未七更→	七洲洋→	单未→ 二十三更
		112°54'E 21°36'N	0°42'E 1°28'N	112°12'E 20°08'N	2°18'E 3°43'N
南亭门→ (万山)	单未五更→	乌猪(洋)→	单未七更→	七洲洋→	单未→ 二十三更
113°36'E 21°59'N	0°30'E 0°52'N	113°06'E 21°07'N	0°42'E 1°28'N	112°24'E 19°39'N	2°18'E 3°43'N
		乌猪(岛)→	单未三十更→ (三昼夜)		
		112°54'E 21°36'N	3°00'E 5°11'N		
南亭门→ (万山)	单未五更→	乌猪(洋)→	单未三十更→ (三昼夜)		
113°36'E 21°59'N	0°30'E 0°52'N	113°06'E 21°07'N	3°00'E 5°11'N		

所经各处经纬度推算表

七洲洋→	单未五更 → (或一日)	外罗山	今理山岛 (亦称广东群岛)	误差
109°54'E 16°25'N	0°30'E 0°52'N	109°24'E 15°36'N	109°07'E 15°22'N	-0°17'E -0°12'N
七洲洋→	单未五更 → (或一日)	外罗山	今理山岛	误差
110°06'E 15°56'N	0°30'E 0°52'N	109°36'E 15°04'N	109°07'E 15°22'N	-0°29'E +0°18'N
七洲洋→ 转南	单午五更 →	外罗山 外过	今理山岛	误差
109°54'E 16°25'N	0°00'E 1°00'N	109°54'E 15°25'N	109°07'E 15°22'N	-0°47'E -0°03'N
七洲洋→ 转南	单午五更 →	外罗山 外过	今理山岛	误差
110°06'E 15°56'N	0°00'E 1°00'N	110°06'E 14°56'N	109°07'E 15°22'N	-0°59'E +0°26'N
七洲洋落去→	贪东七更 → 牵船驶一日 (五更)	万里石塘 111°18'E 16°25'N	今华光礁 111°32'-50'E 16°09'-17'N	误差 +0°14'E -0°08'N
109°54'E 16°25'N	0°00'E 1°00'N	外罗山 109°54'E 15°25'N	今理山岛 109°07'E 15°22'N	-0°47'E -0°03'N
七洲洋落去→	贪东七更 → 牵船驶一日 (五更)	万里石塘 111°30'E 15°56'N	今华光礁 111°32'-50'E 16°09'-17'N	误差 +0°02'E +0°13'N
110°06'E 15°56'N	0°00'E 1°00'N	外罗山外过 110°06'E 14°56'N	今理山岛 109°07'E 15°22'N	-0°59'E +0°26'N

门(今万山群岛)放洋,南至乌猪、独猪、七洲三洋,星盘坤未针,至外罗;坤申针四十五更<sup>④</sup>至占城旧港(占毕罗,今占婆岛)。”<sup>⑤</sup>自万山用坤未针一日至乌猪洋,乌猪洋坤未针三日至独猪洋、七洲洋,七洲洋坤未四日至占城旧港(占毕罗)或坤未四点二日(21更)至外罗山(今理山岛)。如果用另一种航线,则自南亭门(万山)至独猪洋为25更,独猪洋(中间经历交趾洋)至占城旧港(占婆岛)为20更,共45更,亦可自东莞之南亭门至占城旧港。这是一条浅海航线的海道,不必经过水深七十余丈或200米余的七洲洋(参阅本文第三节)。

表五: 过乌猪、独猪、七洲三洋所至各处经纬度推算表

南亭门→ (万山)	坤未五更→	乌猪洋→	坤未十五更→	独猪洋·七洲洋 →
113°36'E 21°59'N	0°36'E 1°07'N	113°00'E 20°52'N	1°49'E 2°22'N	111°11'E 18°30'N
坤未二十更 →	占毕罗	(今占婆岛)	误差	
2°26'E 3°10'N	108°45'E 15°20'N	108°30'E 15°55'N	-0°15'E +0°35'N	
坤未二十更 →	外罗(内过)	(今理山岛)	误差	
2°33'E 3°20'N	108°38'E 15°10'N	109°07'E 15°22'N	+0°29'E +0°12'N	

### (5) 清代地图上的万州东南七洲洋

七洲洋是在海南岛万州东南与万里石塘(西沙群岛危险区)之间,海道是由二者之间通过,而七洲洋又是在海道的东面。有关七洲洋的位置,在明代地图上,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据弘治年间刻本《厓山集》卷首《图象》图三,在广东新会厓门之南大海中,有“七洲洋”标注<sup>⑥</sup>,仅此尚未足以十分确定七洲洋的位置。清代地图,可以肯定七洲洋是指万州东南、大洲头而外的西沙群岛七洲洋,见于下列各图:《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sup>⑦</sup>,把七洲洋置于海南岛东

南、海道航线之东。《乾隆五十五年七省沿海图》<sup>⑧</sup>、《咸朝七省详图》<sup>⑨</sup>、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圆图<sup>⑩</sup>，都把七洲洋置于海南岛东南与石塘（西沙群岛危险区的暗礁）之间，《古今地舆全图》<sup>⑪</sup>把七洲洋（即七洲洋）的岛屿，置于大洲头与万里石塘之间<sup>⑫</sup>。

## （二）七州洋的一些特点

### （1）七州洋是一条深海（水深 200 米）航线的海道

宋吴自牧《梦粱录》说：宋代的海船，“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sup>⑬</sup>，如今，自泉州湾出土宋代古船<sup>⑭</sup>亦可得到证实。千料以上的大船或中等船，其航线大都远离海岸，因为“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二洋。“若欲船泛往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迤邐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约 200 米余）”；昆仑洋“亦深五十余丈（约 150 米以上）”，“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等州）买卖，未尝过七洲、昆仑等大洋”<sup>⑮</sup>。

七州洋水深七十余丈（200 米余），是深海（水深 200 米）航线的一条海道，同时，也是航行在“茫无畔岸”的海洋中，毫无山形水势可作准绳，“全凭南针”而行，故亦称七州大洋。自泉州“出洋，迤邐过七洲洋”。（“迤邐”或作“迤迳”<sup>⑯</sup>）迤邐即“邪行连延”<sup>⑰</sup>，邪行即斜行，亦即用  $45^\circ$  角航行，便可“迤邐”（斜行）以过七州洋了。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说：“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邐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sup>⑱</sup>。七州洋是和万里石塘各沿  $45^\circ$  度斜角相平行的一条海道，所以七州洋海道（水深七十余丈）和万里石塘一样，都是“迤邐”（斜行连延）有如长蛇，横亘海中。《海道针经》里面所说的，航行在七洲洋上，针位是“上不离艮，下不离坤”<sup>⑲</sup>，艮是  $45^\circ$ ，坤是  $225^\circ$ ，在罗盘

方位上,和在采用直角三角形的航海图上,都是  $45^\circ$  角的航线。

表六: 各洋水深比较表

航 线	水 深 地 名	水 深			出 处
		托	丈	米	
浅	南亭门 (近南亭门 七州洋)	47 托	23.5 丈	(50/100) 71 米	张燮《东西洋考》卷九 《西洋针路》
	乌猪洋	80 托	40 丈	(100/150) 125 米	同 上
	乌猪山 (岛)	/	/	(50 米以内)	现代地图
海	七洲山 (七洲列岛)	22 托	11 丈	(50 米以内) 18 米	见 China Sea Pilot, (1937) Vol. 1, p.385
	七洲洋 (文昌七洲)	11 至 24 托	5.5 至 12 丈	(50 米以内) 18.2至19.1米	见 Horsburgh's In- dian Direction (1841), p.253
航	独猪洋	65 托 60 托	32.5 丈	100 米差一点	见张燮同上书;《顺风 相送》第 33 页第 117 页
	七州洋	120 托	60 余丈	近 200 米	
线	交趾洋	70 托 45 托	35 丈 22.5 丈	100 米多一点 70 米左右	见张燮同上书;《顺风 相送》第 33 页
	占卑罗 (尖笔罗)	70 托 50 托	35 丈 25 丈	100 米多一点 不到 80 米	《顺风相送》第 33 页
	外西面罗过	45 托	22.5 丈	70 米左右	同上
深 海 航 线	七州洋 (七州大洋)	140 余计算 120 托 150 托	70 余丈	200 余米	见吴自牧《梦梁录》卷 十二, 张燮同上书, 《顺风相送》第 33 页。 《指南正法》第 117 页
	昆仑洋		50 余丈	(150 米至 200 米以内)	

(上表的水深或以托,或以丈,今皆换算为米,兹将三种单位全都列出,以供比较。)

## (2) 七州洋没有山形标识可作准绳

宋吴自牧《梦粱录》说：“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sup>70</sup>可见宋时不是采用近岸的浅海航道可以有山形标识可作准绳，而是采用“茫无畔岸”的深海航道才没有见到山形标识可作准绳。

七州洋是浩浩荡荡，茫无涯岸，可为准绳，明邢宥《琼台杂兴》诗，说：“聊乐不劳方外去，七洲烟月浩无涯。”<sup>71</sup>不劳即占不劳，今越南占婆岛；方外是指中国本土方域以外，意即占不劳是在中国本土方域以外。诗中的“七洲”，应指海南岛大洲头而外的七洲洋，才有“浩无涯”可感慨比兴，如指文昌七洲列岛的七洲洋，则隔“洋”十余里，对面便是海南岛东北岸，其间陆地与岛屿，历历皆是，不能有“浩无涯”的感慨。

清佚名《七洲洋放歌》<sup>72</sup>曰：“七洲濛濛走宇外，两日不见山一陬，挂帆直可拂日月，击楫或恐惊蛟蛇。”“频年外域肆蜃鳄，越南瘴雾山海愁。”可见前往越南，在七洲洋这一段海城，也是茫无畔涯，才会在七洲洋中，“两日不见山一陬”。对于固有山形标识可作准绳的琼岛大洲头而外的七洲洋，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讲得较清楚。

陈伦炯说：“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州洋，取广南外之咕哔啰山，而至广南。”“七州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中国洋艘，不比西洋（欧洲）呷板，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某处，心尚怀疑，又应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若干，驼底带蜡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知确准。独于七州大洋，大洲头而外（七州洋），浩浩荡荡，固有山形标识。风极顺利，对针，亦六、七日始能

渡过,而见广南咕啞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则恐溜入广南湾,无西风不能外出。”<sup>②</sup>这段记载,主要在阐述一般航行于沿岸不远的近海海中,有山形可分别,可标识,唯独航行于七洲大洋与大洲头而外七洲洋,乃是“罔有山形标识”可作准绳。大洲头而外七洲洋这条海道也是水深七十余丈(200 米余),要不断辛勤探水,以知深浅,同时,配合驼底粘出海底沙泥来判断海道确准与否。除了在大洲头而外的七洲洋中,“罔有山形标识”可作准绳之外,还要担心不要使船只在船行七州洋中的针位有出现偏东、偏西的倾向,因为偏东则犯万里长沙(清代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sup>③</sup>)。在琼州之大洲头而外的七洲洋上,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当指俗名万里长沙,即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sup>④</sup>;偏西则恐溜入广南湾,今北部湾南部,无西风不能出。

斜过七州洋这一条水深 200 米海道,既然是“罔有山形标识”可作准绳,那么只有象宋吴自牧所说的,在七州洋中,“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自古舟人云,去怕七州,回怕昆仑”<sup>⑤</sup>，“针迷舵失,入船莫存”<sup>⑥</sup>。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出在没有山形标识可作准绳的七州洋中,只有全凭罗盘针驶船,全船生命,依系指针,否则,就会碰上石塘以致船破人亡。正象元汪大渊在讲到万里石塘时说:“故子午针,人之命脉所系,苟非舟子之精明,鲜不覆且溺矣。”<sup>⑦</sup>

### (3)七州洋风浪大,飓风作,覆舟多

宋吴自牧《梦粱录》说:过七州洋,“风浪掀天,可畏尤甚。”<sup>⑧</sup>

在经由七州洋至越南的海道上,有时候是“风涛奋发,云霾滚滚”<sup>⑨</sup>,有时候却“播荡于七州洋波中者半月”,“飘蓬既久,奇怪叠见,睇望大越,杳无踪影,南风大作,人人面如土色”<sup>⑩</sup>。七州洋不但风浪大,风信变化大,而且时常会遇着飓风。

明王鏊《守溪长语》说:“吴惠以正统六年(1441 年)七月奉命

出使占城，十二月出发，往占城。”明年（1442年）“五月六日回洋，舟至七州洋，大风，几复舟，舟人大恐，惠为文以祭……五月十五日，遥见广海南门，以通广东”<sup>②</sup>。王鏊《震泽纪闻》说：吴惠“使占城，还，至七州洋，大风，舟几覆”<sup>③</sup>。明黄佐《广东通志》说：吴惠“奉命使占城，还，至七洲洋，大风，舟几覆，正使给事舒某，泣不知所为，惠为文以祭祝融与天妃之神，俄而开霁，还”<sup>④</sup>。

关于在七洲洋遇飓风的其他记载，如《同安县志》说：“林起凤，八岁丧父，遭海氛”，“尝远游经商，舟至七洲洋，飓风大作，溺舟甚多。”<sup>⑤</sup>陈衍《福建通志》说：林起凤“尝泛海至七洲洋，飓风作，他舟皆覆，起凤独无患。”<sup>⑥</sup>又斌椿《乘槎笔记》说：“（自八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连日过七洲洋，风大，舟甚簸。”<sup>⑦</sup>

综上所述，可见七州洋历来则以风大，浪大，风信变化无常，时遭飓风，舟覆人溺，而为航海者和海行人之所担心和忧虑，从而引起鬼神迷信。这种危险可怕情况，也只有发生在琼岛大洲头而外的七州洋，才与实际情况一致。

#### （4）七州洋贪东有万里石塘危险区

明张燮《东西洋考》引明《琼州志》说：七州洋，“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sup>⑧</sup>海南岛万州东南为万里石塘，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也是这样说的，即琼岛大洲头而外的七州洋海道（水深200米余），由七州洋海道航行下去，贪东便会碰上万里石塘，是个危险区，我们根据《海道针经》的记载，认为上述的万里石塘，它就是在我国西沙群岛最大暗礁的华光礁<sup>⑨</sup>。

明清时代的海道针经，都有详细记载：“船到七州洋及外罗等处，可算此数目流水紧慢，水涨水退，亦要审看风汛，东西南北，可以仔细斟酌，可称无误。船身不可偏西，则无水扯过东。船身若贪东，则海水黑青，并鸭头鸟多。船身若贪西，则海水澄清，有朽木漂



流,多见拜风鱼。船行正路,见鸟尾带箭是正路,船若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如是看见,船身便是低了,若见石头,可防。若船七州洋落去,贪东七更船,见万里石塘,似船帆样,近看二、三个船帆样,可防,牵船驶一日,见外罗山,千万记心耳。”<sup>⑧</sup>

上文所说的七州洋,应指琼岛大洲头而外的七州洋以及至近外罗山的七州洋下限,在这一段的海道中,除了要注意水流紧慢,水涨,水退,风汛,方向等等之外,特别要注意不可以使航线偏西、偏东。偏西则入广南湾(今北部湾),“海水澄清”,无西风不能出。偏东则入七州洋外的黑水洋“海水黑青”(水深应在千米以上至三、四千米),即“水黑如淀”的七州大洋。若船由七州洋落去处(在东经 $109^{\circ}1/2$ ,北纬 $16^{\circ}1/4$ ),贪东七更船(经距 $1^{\circ}41'$ ,纬距 $0^{\circ}00'$ ),见船帆样的万里石塘,推算后,万里石塘的经纬度应在东经 $111^{\circ}11'$ ,北纬 $16^{\circ}15'$ ,当指今西沙群岛最大的暗礁——华光礁(东经 $111^{\circ}32'—50'$ ,北纬 $16^{\circ}09'—17'$ ),经度误差 $0^{\circ}21'$ ,纬度无误。“若船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内有红石屿不高”的万里石塘,外罗山在今东经 $109^{\circ}07'$ ,北纬 $15^{\circ}22'$ ,对开贪东七更船,(经距 $1^{\circ}41'$ ,纬距 $0^{\circ}00'$ ),推算后的“内有红石屿”的万里石塘,应在东经 $110^{\circ}48'$ ,北纬 $15^{\circ}22'$ ,这是古帕拉塞尔航海危险区的头部。明清之际,尤其是清朝以来由于“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于是古帕拉塞尔亦称万里长沙,在外国人所绘的地图上,是用一只脚形来表示它,在中国人所绘的地图上,则用竖立形的绘法来表示它,以区别于横卧形的万里长沙(今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sup>⑨</sup>。船在七州洋中行驶,千万不要贪东,以防碰上西沙群岛的华光礁等暗礁、船到了外罗山的分水,“以域华、夷”海界的“分水”<sup>⑩</sup>,便是七州洋下限,中国之境的七州洋,至此为止。由外罗山以下,便是广东外七州洋的开始,亦即外罗山贪东七更船(东经 $110^{\circ}48'$ ,北纬

15°22′)的“内有红石屿”的万里石塘，或一只脚形万里长沙的头部，或(古)帕拉塞尔头部。

另据 1613 年 12 月约翰·沙利船长的实测，得出广东群岛(外罗山)是在帕拉塞尔岩石的西面，距离 20 里格(约 110 公里，或经度距离为 1°)<sup>⑧</sup>，然则由广东群岛反求帕拉塞尔岩石的经纬度，应在东经 110°07′，北纬 15°22′，这个数字，与我们推算“内有红石屿不高”的万里石塘在东经 110°48′，北纬 15°22′，经度相差 0°41′，纬度相同，无差。由于(古)帕拉塞尔航海危险区原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传闻上的危险区，航行至此，敬而远之，因此，对于中外有关(古)帕拉塞尔头部的真实位置，只能知道大体上被认为在外罗山之东，经度距离为 1°或 1°余，其余则无法核实。

#### (5)七州洋所见到的鸭头鸟、箭鸟、白鸟

在七州洋海道中，如果贪东，就会遇见鸭头鸟(*Anas Crecca Linnaeus*)，这是西沙群岛一带海面所常见到的一种鸟。在中国海境的七州洋与外国占城国旧境的外罗(今越南的理山群岛)等处的海面，据明代《海道针经》说：如果“船身若贪东，则海水黑青，并鸭头鸟多。”<sup>⑨</sup>《东西洋考》说：“船到七州洋及外罗”，“贪东，则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漂)流，及鸭鸟声。”<sup>⑩</sup>又《指南正法》说：“凡船到七州洋及外罗”，“贪东则水色黑青，鸭头鸟成队，”<sup>⑪</sup>此外，阮元《广东通志》、邓淳《岭南丛述》、明谊《琼州府志》、周凯《厦门志》，所载大同小异，兹不一一赘引。

或说：“这些古籍所称的‘鸭头鸟’和‘鸭鸟’，其实就是指今水鸭。”<sup>⑫</sup>事实上，七州洋航路贪东所见的鸭头鸟或鸭鸟，其学名曰 *Anas Crecca Linnaeus*，中名曰绿翅鸭，嘴部很明显就是鸭嘴，至今在西沙群岛的海面上，还可以捕捉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就有它的标本<sup>⑬</sup>。

如果航行于七州洋中而不贪东的话，亦即在七州洋中“船行正

路”，就会遇到箭鸟。这是一种海岸鸟<sup>⑧</sup>。据明代《海道针经》说：“船到七州洋及外罗等处”，“船行正路，见鸟，尾带箭，是正路。”又说：“若见白鸟，尾带箭，便是正路。”<sup>⑨</sup>《东西洋考》说：“船到七州洋及外罗”，“如见白鸟，尾带箭，此系正针，是近外罗。”<sup>⑩</sup>《海外纪事》说：七州洋的水面“每凌晨，有箭鸟从波中起，绕船一匝，向前飞去，舟人曰：此神鸟，乃护和尚，而道所往之不差者也。”<sup>⑪</sup>

《海外纪事》又说：船不得风，“播荡于七州洋波中者半月，见诸怪异，每有大箭鸭飞绕橈上，尾羽若带矢状。又浪上竖小令旗，或红或黑，乍浮乍现，一枝过去，一枝复来，续有十数枝，相顾骇异，莫敢言。”《述异记》说：“海船至七州洋中，见诸怪异，每有大箭鸭，飞绕橈上，尾羽若带矢状。又浪上竖小令旗，或红或黑，乍沉乍浮，一枝过去，一枝复来，续有数十枝，舟中相顾骇异，莫敢言。”<sup>⑫</sup>

《指南正法》说：“凡船到七州洋及外罗”，“惟箭鸟是正路”。<sup>⑬</sup>《海国闻见录》说：“七州洋中有种神鸟，状似海雁而小，喙尖而红，脚短而绿，尾带一箭，长二尺许，名曰箭鸟，船到洋中，飞而来示，与人为难，呼是则飞而去；间在疑似，再呼细看决疑，仍飞而来，献纸谢神，则翱翔不知其所之，相传王三宝下西洋，呼鸟插箭，命在洋中为记”<sup>⑭</sup>。《皇朝续文献通考》说：“七州洋中，有神鸟，状如海雁。”<sup>⑮</sup>以上所说的，在七州洋所见的箭鸟，即今西沙群岛海面上所见到的鸚科鸟类，它的尾巴特别长，箭鸟之名，由此而来。

至于“白鸟”，即西沙群岛所常见的鲣鸟，全身羽毛雪白，所以，七洲洋正路所遇见的“白鸟”，应即西沙群岛所常见到的鲣鸟。

### （三）七洲洋、七洲洋山与七里洋、七里山 以及七星洋、七星山

宋代记载，对海南岛文昌县陆地上的七星岭与文昌县近海滨的七星山（今七洲列岛）以及大海中的七星山（西沙群岛），早有区

别。宋王象之《輿地纪胜》说：“七星岭：在文昌县，近海岸，其势如连珠。”又说：“七星山：在琼山县东，(在)文昌县界海滨，状如七星。”⑦《元一统志》亦说“七星岭：在文昌县，近海岸，其势如连珠”⑧，所云与王象之同。《大明一统志》说：“七星山：在文昌县东滨海。山有七峰，状如七星连珠，亦名七州洋山。”⑨ 区别七星岭、七星山与七州洋山，有：

(1)七星岭在文昌县北一百五十里的近岸高山；七星山在琼山县东一百里的近海中；大海中七星山，名七州洋山，在文昌“东海”(西沙群岛)大海中，以上三者，地理方位，全不相同。

(2)大海中的七星山(今西沙群岛)曾经发生过这件事，即宋末海上行朝宋帝昺的母舅俞如珪被执于此，一作被执于七星洋或七州洋⑩。文昌陆地上的七星岭和近海的七州山(今七洲列岛)都没有发生过俞如珪被执这件事。

(3)七星岭是个海拔几百公尺的高山，尽管山上有树木，山上有淡水井，海船却不一定非在此登上山去汲水采樵不可，记载上从来没有这样记载过。事实上，至今来往的帆船，也都没有必登七星岭汲水采樵。七星山或七洲列岛是光秃秃的不毛岩石小岛，⑪从未有过“林木茂密”；至于甘冽可食的淡泉，也非七洲列岛之所能有，整个七洲列岛只有平岛的岩石隙间有滴水，渔民挖一个小石窟承贮滴水，以供洗涤用水，不能食用⑫。只有七洲洋山(今西沙群岛)才有“林木茂密”“下出淡泉”的这种地貌。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又名巴岛，意即林岛，葡萄牙人东来之初，亦依照中国的叫法，音译为 Paxo (即“巴屿”)⑬ 意译为 Boiças 岛(即“林岛”)⑭。后来，英国人东来，亦称它为伍第(Woody)岛，其意仍曰林岛。盖因岛上的麻枫桐树林密茂。同样地，东岛也是麻枫桐树林密茂的一个岛。在西沙群岛的许多岛屿上，挖地几尺，就有淡水，有的还可以挖掘为淡水井，大多能够供饮食用，有“海中淡泉”的七州洋山，当即指

此<sup>⑥</sup>，盖于茫茫大海之中，在此能够获得淡水，采集樵薪，海船过此，必然会上去汲取淡水，采伐樵薪。至于讲它“树林森茂，巢诸鸟鹞”，这是由于西沙群岛有许多鹞鸟栖集巢宿于麻枫桐的树林上，当鹞鸟栖集树上，整个树林几乎象是披一件洁白的羽毛毯。反观七星山(七洲列岛)，既光秃秃，又无树木，哪里会有“巢诸鸟鹞”呢。如为七星岭，则一般陆地上的山岭，有树林、有鸟鹞，这是正常，一般可见，不值特书。对此，也只有茫茫大海中的西沙群岛的七洲洋山，突见树林茂密，巢诸鸟鹞之类，才值得特别注意。

(4)七洲洋山，“二洲相对，曰南寺北寺”，“与铜鼓山(角)相属，俱有石门”<sup>⑦</sup>。西沙群岛上七岛(宣德群岛)，由二组岛群所组成，北面的群岛是由赵述岛、西沙洲、北岛、中岛、南岛等五个小岛所组成的，南面的群岛，由永兴岛、石岛所组成的<sup>⑧</sup>。后来，把东岛亦算在“上七岛”之列。所谓南寺〔寺即峙、屿〕、北寺，即南峙、北峙，亦即合共永兴岛、石岛与赵述等五个岛，共七个岛，分成二个岛群(“二洲”)。所谓“二洲相对”，当指上、下峙这两个岛群是相对。七星岭在陆地上，根本没有“二洲相对，曰南寺北寺”的问题。七洲列岛虽也可以说是由二个岛群所组成的，也算是可以适合上述记载，但对其他的记述——树林密茂，巢诸鸟鹞(白鸟)，下有淡泉等等地貌，又全都不能适合，所以不能孤立、片面突出它由二个岛群所组成这一点，从而强调它即七洲列岛。

(5)与铜鼓山(角)相属或相连的是七洲洋山。铜鼓山在这里不是指文昌县陆地上的铜鼓岭，在这里是指在大海中的铜鼓岭或铜鼓角，是一个航海危险区，海船至此，常有沉溺之事发生<sup>⑨</sup>，所谓“石门”，就是指暗礁，常有沉船之患。文昌县陆地上的铜鼓岭下面，还有保陵港，可以泊船，没有多大危险，不能说是船舶至此，望之即溺。铜鼓山或铜鼓角是指西沙群岛下八岛(永乐群岛)，包括那些大暗礁(如华光礁等)，它们一直是航海者所担心碰上的危险

区——石塘。铜鼓山或铜鼓角是指永乐群岛的金银岛等九个小岛屿，它们是同在一个巨大礁盘上的环形岛屿，形如铜鼓，故名铜鼓山(山即岛屿)。铜鼓角是指永乐群岛的暗礁，同在这一巨大礁盘上的。“石门”口有浪花礁，其下(南)有华光礁等有名大暗礁，这些都是危险区，都包括在铜鼓角或石塘之范围内。然则，如谓西沙群岛上七岛(宣德群岛)的七洲洋山，与下八岛(永乐群岛)的铜鼓岭(石塘屿)相属或相连，这样才是合乎事实。如果说在海南岛陆地上的七星岭与西沙群岛下八岛的铜鼓山(铜鼓角)相属或相连；抑或说，海南岛近海的七洲列岛与西沙群岛下八岛的“望之即溺”的铜鼓山相属或相连，那都是不合乎事实。

以上五点区别海南文昌陆地上的七星岭、近海的七星山，与大海中的七星山的主要依据。大海中的七星山，即七洲洋山，指今西沙群岛，它在大海中，上有茂林，下有淡泉，海舶经过，必樵汲于此，其地形是“二洲相对”(两个岛群所组成)，又与航海危险区的铜鼓角(西沙群岛的大暗礁，如：华光礁等暗礁)相连属，海舶“望之即溺”。从七洲洋山和七星山的地形地貌来说，一一皆与西沙群岛上七岛相符合，反而与陆地上的七星岭、近海的七洲列岛不相符合。

七星岭不但与七洲洋山混淆，而且也与七星洋的七星山混淆。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说：“七星山：在(文昌)县北百五十里。(又一在)大海中，有七峰相连，一名七洲洋山，林木茂密，下出淡泉，航海者必取汲于此。山之东，又有七里泉，虽旱不涸。”<sup>⑧</sup>《权制》卷一《军地制》说：“琼州七里山：在文昌县北一百五十里。(又一在)海中七峰相连，曰七洲洋山，林木茂密，下出淡泉，航海者必取汲于此。山之东，有七里泉，虽旱不涸。粤海有警，此亦伏兵之所也。”<sup>⑨</sup>

在文昌县北一百五十里的七里山，即县北一百五十里的七星岭，它在海南岛陆地上，不在海中，它是陆地上的高山，而不是“在海中七峰相连”。这里的七里山，乃七星岭之讹。另一个七里

山，即“在大海中七峰相连，一名七洲洋山”。在大海中的七洲洋即“大海七洲洋”<sup>⑩</sup>。七洲洋洋中的山（岛屿）叫做七洲洋山，同样地，在七里洋大海中的山，也叫做七里山。由于七里山只见于七里洋，别的地方又没有七里山（误七星岭为七里山除外），那就不必叫它为七里洋山。它不象七洲洋山那样，为了避免与文昌七洲的七洲山有所区别，不再纠缠不清，乃对在七洲洋大海中的山，不叫它为七洲山，而称之为曰七洲洋山，原因在此。尽管七洲山与七洲洋山，早有区别，但在日后，仍然还会发生误会。七洲洋或七里洋，即今西沙群岛及其海域；七洲洋山或七里山，即今西沙群岛的上七岛（宣德群岛）。宋端宗于景炎三年一月自谢女峡复入海至七洲洋或七里洋欲至占城不果。<sup>⑪</sup>这里的七洲洋或七里洋，即西沙群岛及其海域。宋端宗在七洲洋或七里洋的“沙洲”上，驻蹕二个月左右，到了三月才自七里洋还驻广东化州的碇洲（碇洲）。七洲洋或七里洋上的“沙洲”，即七洲洋山或七里山，亦即“林木茂密、下出淡泉”的西沙群岛上七岛（宣德群岛）。七里山的“山之东有七里泉，虽旱不涸”，乃指宣德群岛最东面的东岛，至今东岛上的淡水井和淡泉之泉水，仍然甘冽可食，为诸岛之冠，七里泉当即指此。七星岭有七星泉，一名龙潜潭<sup>⑫</sup>，是潭水，不是泉水；七洲列岛根本没有泉水可说，因此，七里泉或七星泉，只能求诸于西沙群岛的淡水泉。

又从上引《权制·军地制》所载，在明、清之际，七洲洋山或七里山（上七岛）已经是“粤海有警，此亦伏兵之所”，足见它早就是中国在南海的边防重地之一。

#### （四）七州洋名称的由来

明张燮《东西洋考》说七州洋“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七州洋名称，就由此而来。日后清大油厂翁过七州洋的海道时，也曾提

到“此间七州曾陆沉”的传说<sup>⑩</sup>。

据日本源君美《采览异言》说：万里石塘“礁，在琼州南海之中，东西二、三百里，南北七、八百里，盖古之时，此处有国，大地既陷，唯今见其山岳冈峦之顶耳。正德甲午（1714年）春，（源君）美得此说于和兰加比丹（即荷兰的甲必丹）。"<sup>⑪</sup>可见七州陆沉成海——七州洋——之说，不但中国有之，甚至此说亦传至外国的荷兰人和日本人那里去了，只不过中国人是从七州沉海而成七州洋的海洋这方面来说，而荷兰人和日本人是从陆沉遗留的山顶（即西沙群岛的岛屿与礁石即万里石塘礁）来说，由此可见，七州陆沉的七州洋的海域，是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万里石塘礁<sup>⑫</sup>，或万里石塘屿<sup>⑬</sup>，或万里石塘山<sup>⑭</sup>的这些岛屿都在其内的。

现代的科学考察，在西沙群岛的礁盘底下的深海里，见到有不适合在深海生长的珊瑚礁，由此证明这是地壳下沉，使原来生长于浅海里的珊瑚，下沉到更深一些的深海海底下去<sup>⑮</sup>。由此看来，七州陆沉之说，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

七州洋或七洲洋，由于州与洲，可以相通<sup>⑯</sup>，后人使用时，不大区别它，以致这两个名称，时有混淆。为此，本文对古为七州、陆沉为海的七州洋一律写成七州洋，对由七个小岛屿所组成的文昌七洲及其海面以及西沙群岛上七岛及其海面一律写成七洲洋，至于引用原文，均仍照旧，不去变动、更改。

由于有了七州陆沉成海的传说，才使后人过七州洋时，出现了祭献海厉、祈求平安的种种迷信活动。明张燮《东西洋考》说：

“七州洋：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sup>⑰</sup>或说在七州洋上，“鸟大如箕不敢指，云是祝融使海回，不然大洋之中焉有此。此间七洲曾陆沉，冤魂至今凭海底，时至水面弄兵仗，白日与人相角抵。”<sup>⑱</sup>由于



对七州洋上的风浪巨大，以及对贪东会误入万里石塘的危险没有正确认识，才产生了七州洋上的一些鬼魂神怪的神话，并迷信这些冤魂之所以凭海底都是因为七州陆沉，方使其然。为了使七州洋的冤魂不来作祟，舟人迷信“祭献”于七州洋，就可消灾弭难，于是船过七州洋，就要对七州陆沉的那些冤魂，来个“祭孤魂”<sup>⑤</sup>。《海槎余录》说：“又有鬼哭滩，极怪异，舟至，则没头、只手、独足、短秃鬼百十，争互为群，来赶舟，人以米饭频频投之，即止，未闻有害人者。”<sup>⑥</sup>这里所说的，也是指那些在七州洋上的“祭孤魂”这一类的迷信行为。

1442年，吴惠随同出使占城，回国，“还至七洲洋，大风，舟几覆”<sup>⑦</sup>。正使给事中舒某，“泣不知所为，惠为文以祭祝融与天妃之神，俄而开霁，还”<sup>⑧</sup>。有些记载，还把这一次在七州洋上所遇大风，说是“鬼神出没”之故<sup>⑨</sup>。以上这些怪异之谈，都是缘由于七州陆沉成海而演化出来的。

至于西沙群岛及其洋面的七洲洋，其名当为出自上七岛（宣德群岛），因其岛屿有七，故名。为了和其他的七洲洋岛屿有所区别，乃称曰七洲洋山。万州东南的西沙群岛七洲洋，一名七里洋。里即俚或黎<sup>⑩</sup>，海南岛之人以称山巅也<sup>⑪</sup>，七里洋即露出水面七个山巅的海洋，七里山即露出水面七个山巅所构成的岛屿，七里洋、七里山此名当与七州陆沉成海同一个意思，同时亦与由七个岛屿所组成的七洲洋有相同的含义。七星洋、七星山，如从西沙、上七岛地理位置的分布来看，状如七星排列，故名；其含义与七洲洋、七洲洋山接近。或说七洲洋有流界七条乃是<sup>⑫</sup>，这是把七洲洋作为七舟（七块、七条）来解释，甚至干脆把七洲洋写成七舟洋<sup>⑬</sup>，亦曾见于记载。

“广州七州洋”<sup>⑭</sup>是指这一段的七州洋属广州所管辖。宋元以后，广州七州洋之名不见，乃因七州洋这段洋面，明清时代是属万

州所管辖，自然没有再存在广州七州洋这种称谓了。

## 二、文昌七洲洋

文昌七洲，以“七洲浮海面故名”<sup>⑧</sup>，此名最早见于《郑和航海图》<sup>⑨</sup>。明代《海道针经》所谓“七州山，山有七个，东上三个，一个大，西下四个，平大”（意即一样大）<sup>⑩</sup>。清代《指南正法》所谓“七洲洋有屿仔，东有三个，西有四个”<sup>⑪</sup>。据明代的《琼州志》说：七州山、七州洋，“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sup>⑫</sup>。文昌七洲列岛，至今尚分为南北两个岛群，东北面的岛群，有四个岛屿，其中以北士最大，高197.5米，它是整个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距离海南岛抱虎角之东，约32公里，西南面的岛群，以南士较大，高84米。七洲列岛可以泊碇，在北士西南约1.6公里，水深20呎（36.6米），泥底。七洲列岛各岛之间，都可通航，船只很容易驶进去，全部岛屿都是光秃秃的不毛之地，距离海南岛的东北角，有20公里宽，并构成一条航道<sup>⑬</sup>，水深50米以内，这就是现在地图上所见到的七洲洋。文昌七洲是由北士、丁士、赤土仔、南士、双帆与平士等六个小岛所组成的<sup>⑭</sup>，平士是一个小岛，中有一个大洞，把一个山劈开为二，所以算它为二个屿，土名亦称宰丸岛<sup>⑮</sup>。在中国地图上，也有反映文昌七洲洋航道，不过时间较晚，见于宣统元年（1908年）《广东舆地全图》，图中的七洲洋，位于文昌铜鼓嘴之北、七洲列岛之南。

明代《海道针经》里面，对文昌七洲山、七洲洋（水深50米以内）与文昌七洲以东的七洲洋（水深100米左右），都较为详细地记载上述这两条水深不同的海道。经过文昌七洲以东和以西的这两条海道，前者是以经过各处近岸山屿为主，包括乌猪山、七洲山、独猪山然后渡过交趾洋（今北部湾口），至（占城）外罗山；后者是经过

乌猪洋、七洲洋、独猪洋<sup>⑩</sup>，然后，径航至外罗山。前者所经洋面，水深基本上在 50 米以内或 50 米里至 100 米之间，包括渡过交趾洋也是没有航行离开水深 100 米以外的洋面。后者经过三洋，都是航行在水深 100 米上下的海道上，只有渡过北部湾口的交趾洋，才是沿着水深 200 米左右的海道而航行的。

由于编纂《海道针经》的某些文人，不顾上述二条海道的不同，为了片面追求航行更数的一致，不顾星盘针位之不同，乃修改上述二条海道的航行更数，为了使它们自东莞南亭门至外罗山都是航行四十五更，乃把乌猪至七洲洋单未七更<sup>⑪</sup>，改为十三更，以求一致，却由此造成了混乱。实际上，由东莞南亭门经乌猪山、七洲山（或七洲山以西的七洲洋）、独猪山、交趾洋至外罗山，全程四十五更，或四十五更以上；而经三洋的航线是，自东莞至南亭门一日（五更），自南亭门经乌猪洋、七洲洋（在七洲山以东）、独猪洋三洋，全程八日（四十更），后者比前者，航程短了一日（五更），或一日余。

下面，我们把明清时代的《海道针经》有关经过文昌七洲山、七洲洋与经过乌猪洋、七洲洋、独猪洋三洋的星盘针位及其舟行更数，列表说明如下（参阅表七）。大体上，由乌猪用坤针十三更（或十五更）所至的七洲，那是指文昌七洲，或文昌的七洲洋航道（水深 50 米）。由乌猪用未针或坤未针七更至七洲洋，那是指大海七洲洋（水深 200 米）。由于明清《海道针经》的编纂者，有一些文人，插手参加修改，不但使七洲山、七洲洋与大海七洲洋，混为一谈，甚至把七洲山以东的七洲山洋与西沙群岛的七洲洋也混为一谈，更是增加混乱，下表仅说明经过文昌七洲山以西七洲洋（水深 50 米以内）航道，以及经过文昌七洲以东的七洲洋（水深 100 米）的航道（参见表七），舟行所经各地的水程更数，并用股勾弦定理，求得各地相当于今天的经纬度。有关文昌七洲以东、以西的七洲洋，或七洲山、七洲洋，那是和水深 200 米（七十余丈）的深海航线

的大海七州洋海道是没有关系的,和古为七州,沉而为海的七州洋以及在这个七州洋上的七州洋山,都是没有关系的。

### 三、广东外七洲洋

弗兰塞西哥·罗得利格 (Francisco Rodrigues) 的《中国地图版》(约成于 1512—1514 年),在东京湾(即北部湾)之外,自海南岛至昆仑岛之间,绘有七洲洋,意即七屿之洋<sup>⑭</sup>。明黄衷《海语》说:“昆侖山,山在大佛灵山南,凡七屿七港,是谓七门,其旁洲屿,皆翼然环列,适诸国者,此其标也。”<sup>⑮</sup>大佛灵山即今华里拉岬,在东经 109°27'、北纬 12°53',所谓大佛灵山以南的七屿洋的海面,即七洲洋的海面,这是日后所谓外大洋的七洲洋。十六世纪葡萄牙人东来后的早期地图,在今越南中部海岸对面附近海中,绘有六、七个岛屿形状的(古)帕拉塞尔群岛<sup>⑯</sup>,正是由北而南排列,位于海南岛以南至昆仑岛以北的中间。清郭嵩焘《使西纪程》说:“在赤道北一十三度,过瓦蕾拉(华里拉岬)山,安南东南境也,海名七洲洋。”以上这些记载,都说明在华里拉岬以南至昆仑岛以北有一七洲洋,其海洋由七屿而得名。这里的七屿之海或七洲洋,即日后所谓广东外七洲洋,以与中国之境的广州七洲洋或万州东南七洲洋,有所区别。

清代走外沟航线所经过的七洲洋(亦称七洲大洋、外大洋、或广东外七洲洋),有一张地图绘得比较足以说明它的东西南北四至,那就是见于清俞昌会《防海辑要·海国图》<sup>⑰</sup>。据该图所载,七洲洋是一个大洋,它的东面是小吕宋(今菲律宾群岛),它的南面是尖笔阑(今淡美兰群岛),它的西面是长沙(古帕拉塞尔群岛),长沙尾部是草鞋石(今 Pulo Sapate),它的西北面是红毛浅(殆指中沙群岛)<sup>⑱</sup>,它的正北面是万山(今广东省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它的

表七：由广东至占城沿浅海航线（50米水深与

占 地 书 名	今 地 名		水深 50 米以内 今 乌 猪 岛 112°54'E 21°36'N
《东西洋考》卷九， 舟师考	东姜山，弓鞋山→ 南亭门	单坤五更 → 0°42'E 0°42'N	乌猪山 → 112°54'E 21°36'N
《两种海道针经》 第 54 页	东姜山→	单坤五更 → 0°42'E 0°42'N	乌猪山 → 112°54'E 21°36'N
《两种海道针经》 第 55、170 页	东姜并南亭门→	坤未五更 → 0°36'E 0°47'N	乌猪山 → 112°54'E 21°36'N
《两种海道针经》 第 49 页	东姜→	坤未五更 → 0°36'E 0°47'N	乌猪山 → 112°54'E 21°36'N
《海国广记》 安南条	东姜山→	坤未五更 → 0°36'E 0°47'N	乌猪山 → 112°54'E 21°36'N
《两种海道针经》 第 190 页	东姜→	坤未五更* → 0°36'E 0°47'N	乌猪 → 112°54'E 21°36'N
黄衷《海语》卷一 暹罗国条	南亭门→ 113°36'E 21°59'N	(单坤五更) → 0°42'E 0°42'N	乌猪山 → 112°54'E 21°17'N

50 米/100 米水深) 的海道所至各处经纬度推算表

	水深 50 米以内 今七洲列岛 111°11'~15'E 19°55'—59'N		水深 50 米 今铜鼓嘴 111°01'E 19°38'N	
单坤十三更→ 1°49'E 1°43'N	七 州 山→ 111°05'E 19°47'N	坤 末 三 更→ 0°21'E 0°28'N	铜 鼓 山→ 110°50'E 19°25'N	坤 末 四 更 0°16'E 0°38'N
单坤十五更→ 2°06'E 2°06'N	七 州 洋→ 110°48'E 19°30'N	单 坤 七 更→ 0°59'E 0°59'N	独 猪 山	
单坤十三更→ 1°49'E 1°49'N	七 州 洋→ 111°05'E 19°47'N	坤 末 七 更→ 0°50'E 1°05'N	独 猪 山	
单坤十三更→ 1°49'E 1°49'N	七 州 山→ 111°05'E 19°47'N	单 坤 七 更→ 0°59'E 0°59'N	今海南黎母山 即青南头 110°06'E 18°48'N	
单坤十五更→ 2°06'E 2°06'N	七 洲 111°48'E 19°30'N			
单坤十三更→ 1°49'E 1°49'N	七 州 111°05'E 19°47'N	单 坤 二 更→ 0°20'E 0°12'N	铜 鼓 110°45'E 19°35'N	
单坤十三更→ 1°49'E 1°49'N	七 洲 山→ 111°05'E 19°28'N	坤 末 三 更→ 0°21'E 0°28'N	铜 鼓 110°44'E 19°00'N 0°38'N	坤 末 四 更 0°16'E 0°38'N

古地名 书名	今地名	水深 50 米以内 今大洲岛 110°30'E 18°40'N		水深 100 米 今北部湾口 (近中线)
《东西洋考》卷九， 舟师考	→	独猪山 → 110°34'E 18°47'N	坤未十更 → 1°13'E 1°36'N	交趾洋 → 109°21'E 17°11'N
《两种海道针经》 第 54 页	→	独猪山 → 109°49'E 18°31'N	坤未(及午)* → 二十更 (坤未十更) 1°13'E 1°36'N	(交趾洋) → 108°36'E 16°55'N
《两种海道针经》 第 55、170 页	→	独猪山 → 109°45'E 18°42'N	单未(及午) 二十更 → (单未十更) 1°00'E 1°43'N	(交趾洋) → 108°45'E 16°59'N
《两种海道针经》 第 49 页				
《海国广记》 安南条				
《两种海道针经》 第 190 页				
黄衷《海语》卷一 暹罗国条	→	独猪 → 111°28'E 18°32'N	坤申二十更 → 3°10'E 2°26'N	

续表

	今占婆岛 108°30'E 15°55'N	今理山群岛 瑁山岛 109°07'E 15°22'N	误差	注
坤未(七更)* → 0°50'E 1°05'N	尖笔罗 108°21'E 16°06'N		+0°09'E -0°11'N	*原无更数 今补正之
*(午)十一更 → 0°00'E 2°12'N		外罗山 108°51'E 15°07'N	+0°16'E +0°15'N	*原作坤未 二十更今改 为坤未及午 二十更
*(午)十更 → 0°00'E 2°00'N		外罗山 108°45'E 14°59'N	+0°22'E +0°23'N	*同上
				*原作七更, 误,今改五 更。
	占城旧港 (占毕罗) 108°18'E 16°06'N	今占婆岛 108°30'E 15°55'N	误差 +0°12'E -0°11'N	原文仅作坤 未四十五程 (程为更之 误),今补上 各处之间更 数。



东北面是澎湖(今台湾省澎湖群岛),在这个范围内的大洋,就是七洲洋。属于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四海总图》园图系统的诸图,其中七洲洋的四至,同上<sup>⑩</sup>。在中国记载上,对上述走外沟航线的七洲洋及其四至,也还是有所记载的,如:七洲洋之东为吕宋,据徐继畲《瀛环志略》说:七洲洋东面是吕宋的马尼拉<sup>⑪</sup>。

七洲洋之东北为台湾海峡:据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说:“西洋呷板,从昆仑七洲洋东,万里长沙外,过沙马崎头门,而到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sup>⑫</sup>这里的海洋是指昆仑洋、七州洋以东及其东北的外大洋。据清颜斯综《南洋蠡测》说:“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sup>⑬</sup>这里的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是指今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沙洲,中国书上,历来都是把它们看成断断续续连延起来的。可见记载上说,由外大洋或七洲洋东,及其东北,可航往台湾,是正确的。七洲洋之西,为(古)帕拉塞尔或越南中部华里拉岬以南和昆仑岛以北。

七洲洋之南为千里石塘(南沙群岛):据清谢清高《海录》说:“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万石林立,洪涛怒激,船若误经,立见破碎”<sup>⑭</sup>,又上引颜斯综《南洋蠡测》说:“石塘之北,为七洲洋,夷人知七洲(洋)多暗石,虽小船亦不乐走。”<sup>⑮</sup>这里的石塘,应即他书所说的千里石塘,今我国南沙群岛。走外沟航线,要经过七洲洋,但不能从“七洲洋正南,(正南)则为千里石塘(今南沙群岛)”,“万石林立,洪涛怒激,船若误经,立见破碎,故内沟外沟,亦必沿(七洲洋)西南,从无向(七洲洋)正南行者。”<sup>⑯</sup>

不但七洲洋之南有万石林立的千里石塘,为航海者所担心,而且七洲洋本身亦多暗石,外国船由于担心七洲洋暗石,虽小船亦不愿走。这是担心七洲洋的西面有(古)帕拉塞尔危险区,即一只脚形

的万里长沙，七洲洋南面有千里石塘（南沙群岛危险区），外国船才不愿走这条航线，而选择由七洲洋东、万里长沙外的外大洋，向我国台湾方面前进，抑或由外大洋转北，入粤，至万山群岛，由虎门至广州<sup>④</sup>。

七洲洋南面的千里石塘，历来就是“粤海天堑”，也就是说，历来就是我国广东粤海的天然险阻的海界，据清徐家干《洋防说略》说：“又有千里石塘，自万州迤南，直至七洲洋，粤海天堑，最称险阻。”<sup>⑤</sup>

上述的外大洋或七洲洋，就是下面诸书所说的七洲大洋。

据清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说：“万里长沙尾草鞋石，东南为七洲大洋，全是大石，其中不知几千里。”<sup>⑥</sup>这是讲七洲大洋的千里石塘，所谓“全是大石，其中不知几千里。”正指千里石塘而言。

七洲洋之北为万山群岛：《皇朝文献通考》说：“港口国，在西南海中”，自其国“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口”。又说：“柬埔寨”，“粤人之归也，舟必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计程七千二百里，距厦门水程一百七十更”，又说：“柔佛，在西南海中，背山，而国前临大海，历海洋九千里，达广东界，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口。……浙闽人亦间有往者，及夏秋乃归，必经七洲大洋，并鲁万山，由虎门入口。达广东界，计程九千里。”<sup>⑦</sup>《皇朝通典》说：“港口，在西南海中，安南暹罗附近国也。”“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由虎门入口。达广东界，计程七千二百里；距厦门水程，一百六十更。”又说：“柬埔寨”冬春往，“及夏秋乃归，粤人之归也，舟必经七洲大洋，到鲁万山，入虎门。计程七千三百里。距厦门水程一百七十更。”<sup>⑧</sup>清王之春《各国通商始末记》说：“雍正七年，西南洋诸国来互市……柬埔寨即旧真腊”，“由粤虎门，经七洲洋，七千二百里”至其地<sup>⑨</sup>。这里的七洲洋，应指七洲大洋。可见清末，对于七洲大洋，常用七洲洋此名以称之，不但王之春是这样，比他

更早一些时候的徐继畲、陈伦炯等人也是这样的。徐继畲《瀛环志略》说：小吕宋马尼刺，“其地为七洲洋之东岸，转舵北行，即入长沙门，抵粤东，诸番倚为东道之逆旅，薪水糗粮，皆取办于此。”<sup>⑩</sup>这里的七洲洋，应指七洲大洋，才会说其洋东岸为吕宋岛的马尼拉。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又说：“由粤东虎门，到鲁万山，经七洲洋，至旧柔佛，用未针，计水程九千里。”<sup>⑪</sup>这里的七洲洋，也是与七洲大洋混为一谈，应指七洲大洋。据重纂《福建通志》说：柔佛及其属国丁机奴，“往其国者，必经七洲大洋。”<sup>⑫</sup>可见，由厦门至柔佛，必经七洲大洋，计程九千里。把七洲大洋称为七洲洋，易致混淆。这种混淆七洲大洋于七洲洋，在清末的著作中，颇常见之。如：黄懋材《游历刍言》说：“旧时，泰西诸国之商船，来中国者，必绕阿非利加之南，经好望角，由巽他峡，以入七洲洋。”<sup>⑬</sup>很显然地，进入爪哇岛与苏门答刺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以后的七洲洋，应指南中国海的七洲大洋。

总之，对七洲大洋或七洲洋讲得最明晰的，见于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说：“江浙闽省往东南洋者，从台湾沙马崎头门过，而至吕宋诸国，西洋呷板，从昆仑七州洋东，万里长沙外，过沙马倚头门，而至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国往南洋者，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皆从（万里长沙）沙内粤洋而至七州洋，此亦山川地脉连续之气，而于汪洋之中，以限海国也。”<sup>⑭</sup>自昆仑岛（Pulo Condore），过七州洋，即广东外七洲洋，向东航行于万里长沙（亦即“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即今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亦即清代地图上作横卧形的万里长沙或长沙）之外，向北过沙马倚头门，进入台湾海峡，因此，陈伦炯在这里所说的七洲洋，以及陈伦炯《四海总图》中的七州洋，都是指七州大洋，即广东外七洲洋。它的东面是吕宋（今菲律宾），它的北面是万里长沙（今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它的西面是印度支那半岛东岸，它的南面是石塘（即千里石

塘,今南沙群岛)。清代七州大洋,或上述的七州洋,显然是在万里长沙以外,它仍然是属广东,故有“广东外七洲洋”,以与“沙内粤洋”的广东内七洲洋(北面靠近万山群岛的广州七州洋)有所区别。

王大海《海岛逸志》说:“噶喇吧在中国西南洋中,从厦岛扬帆,西过广东外七洲洋,至安南港口,转南,经昆仑、茶盘”,“而至其地。”<sup>①</sup>噶喇吧(Kalapa)即椰城,今印尼的首府雅加达。厦岛即厦门。由厦门往印尼雅加达的航程,西南行大海中,出唐(离开中国),西过广东外七洲洋至安南(今越南中部)的海港,转南沿着越南中部海岸而下,经今昆仑岛(P. Condore)、茶盘岛(P. Tioman)最后才到达印尼椰城(噶喇吧),即今雅加达。

广东外七洲洋,后来又称“琼州七洲洋”,因它属于海南岛琼州管有,故名。琼州七洲洋有千里石塘(今南沙群岛)、万里长沙(今西沙、中沙群岛),并以万里长沙的东北部作为与中国北洋交接的界限,以千里石塘的南部作为与中国南洋所止的界限<sup>②</sup>。所以,徐家干《防海说略》说,万里长沙、千里石塘,是“粤海天堑”,是广东海面的天然险阻。基本上,到了清朝末年,已经把今天中国的海域,以千里石塘(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作为南面界限,以万里长沙(中沙、西沙群岛)及其海面作为东、西两面的界限,所以《广东全省海图总说》说:广东濒海,这个海,东至吕宋,西至越南,南至婆罗洲,“皆(广东)省境。”<sup>③</sup>也就是说,广东内、外七洲洋都是广东省境。今天,在中国地图上,在南海所画的国境线,包括南海诸岛的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四个群岛在内,在清代早已形成这种客观事实了。

### 注释:

①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道光刻本)

②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条(《学海类编》本)曾说过七州、昆仑等大洋

③ 参阅《元史》卷132《哈剌伯传》说:“从攻张世杰于大洋,获其军资器械,不可

胜计”。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0《征伐类》引《经世大典》谓哈刺解追“世杰等至广州七洲洋，及战海洋中，夺船二百艘”。（光绪己丑江苏书局本：可见广州七州洋，亦称大洋。明嘉靖《广东通志》卷首广东省全图，南面则作“大洋”。此处大洋，即广州七州洋。

④ 乾隆丁亥（1767年）黄千人绘《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图》，有的刊本作“七洲洋”，有的刊本仅作“洋”。可见七州大洋或广州七州洋，可简称为“大洋”（参上注②），七洲洋亦可简称为“洋”。

⑤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条。

⑥ 参阅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知服斋丛书》本）

⑦ 明章潢《古今图书编》卷59《古南海夷考略·暹罗》（明天启年间刊本）。明罗日黉《咸宾录》卷6《南夷·暹罗》条（《豫章丛书》本）。

⑧ 同注⑦。

⑨ 同注⑥。

⑩ 参阅读⑤。

⑪ 参阅本文第三节。

⑫ 七州洋、七洲洋，其名称由来不同，参阅本文第一节第四项。

⑬ 同注③。

⑭ 《元史》卷162《史弼传》（开明板《二十五史》）。

⑮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占城条（《指海》本）。

⑯ 参阅英国《海图》第1760号（1956年第11版）。

⑰ 《两种海道针经》第21页，第107页。（1961年中华书局本）。

⑱ 自泉州港南口（东经118°47′、东纬24°46′）单坤七更（1°10′E、1°10′N）可至南澳东面的兄弟岛（东经117°42′、北纬23°32′），误差只有+0°05′E、-0°04′N。七州洋海道是与万里石塘相平行，都是“迤邐”（斜行连延）而下。一说万里石塘起自潮州，则七州洋海道当始自潮州南澳岛东面的兄弟岛；一说万里石塘起自琉球（台湾省），则七州洋海道当始自台湾海峡西面的泉州。二者均用单坤针，一直斜行至外国占城（今越南中部）。

⑲ 通草屿即理山群岛（广东群岛）的圃拜岛，在外罗山（理山岛）北面。越南语“拜”（Bai）有草坪之意，殆与通草屿有关。

⑳ 参阅读⑮。

㉑ 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占城条（《函海》本）。

㉒ 宋代航海，有以日计程，一日（一日夜）即三程，例如：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闾婆条说：“闾婆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同书渤泥条说：“（渤泥）去闾婆四十五程”，一则计日，一则计程，由此可见一日（一日夜）三程。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81页注2说，上文一作十五日，一作四十五日程“两者必有一误”。事实上，是计算单位不同，两者均无误。又如《宋史》卷489占城传，说：“占城在中国之西南……北至广州，便风半月程”。（开明版《二十五史》第5714页）。便风十五日程（半月程），即顺风十日（五日夜），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20说：自广州屯门，西南行七日，又西南行三日（共十日）至占城占不劳。这也是三程即一日（一日夜）的另一旁证。

㉓ 海行计里，一日夜十更，每更五十里，一日变为五百里，或作每更六十里，一日夜为六百里。

㉔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上占城条，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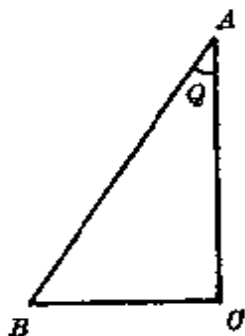
㉕ 求所在地的经纬度公式： $AB$  = 航行里数， $AC$  = 纬度距离， $BC$  = 经度距离， $Q$  = 罗盘针位。

$$\sin Q = \frac{BC}{AB}$$

$$BC = \sin Q \times \frac{AB}{250 \text{ 里}}$$

$$\cos Q = \frac{AC}{AB}$$

$$AC = \cos Q \times \frac{AB}{250 \text{ 里}}$$



(250里 = 1°, 参阅《明史·天文志》)

㉖ 天文航海，测量北极星高度以定船只所在处的位置，其纬度至今有时尚会误差 1°，参阅《航海认星》第 76 页说：“我们已经知道北极星的高度约等于测者所在的纬度，因此只须将推算纬度当作高度就可以了。这样做有时可能有 1° 多的误差。”（1977 年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㉗ 宋陈元靓《重编群书事林广记》卷 8《岛夷杂志》（广船官本）占城国条（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 年）据元泰定乙丑（1325 年）本增补版）

㉘ 万历六年（1578 年）提督少卿萧某呈，引据文源言（引自清梁廷村《粤海关志》卷 21 贡舶（一）第 6—7 页（道光刊本））。

㉙ 广州七洲洋，见《元经世大典》平宋条，文载元苏天得《元文类》卷 41《征伐类》。

㉚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第 10 页下（道光年间刻本）。

㉛ 《两种海道针经》第 21 页、第 107 页。

㉜ 同上书第 137 页。

㉝ 清郑光祖辑《舟车所至》本的《海录》，有记载自七洲洋“转南”而下，直至昆仑岛等处。

㉞ 清郑光祖辑《舟车所至》本的《海录》，谓万山东山属东莞，万山西山属香山。

㉟ 同上书第 28 页。

㊱ 同上注 27。

㊲ 参阅宋吴自牧《梦粱录》卷 12 江海船舰条。

㊳ 明谢杰《虔台倭纂》卷上《万里海防图》。

㊴ 《两种海道针经》第 117 页。

㊵ 同上书，第 27 页、第 108 页。

㊶ 清郑光祖辑《舟车所至》摘录杨炳南笔述《海录》。

㊷ 同上注④。

㊸ 同上注⑩。

㊹ 原文作四十五程，应为四十五更之误，今改正之。

④⑤ 明黄衷《海语》卷上暹罗国条，《岭南遗书》本，没有原注“三洋名”，《宝颜堂秘笈》本则有原注。又明黄佐《广东通志》卷66〈外志三〉夷情下，番夷，海寇，第71页（嘉靖三十七年木刻本）则作“乌瀛、独瀛、七洲三洋”，“三洋”二字不作注文，今以黄佐《广东通志》所引原文为正。

④⑥ 《匡山集》卷首图。见《涵芬楼秘笈》第四集，景印天一阁藏刻本。

④⑦ 此图系依据乾隆三十二年黄证孙刻本放大，兰色套印，共分三排，每排八幅。

④⑧ 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七省沿海图》，墨绘一幅，卷首，圆图。

④⑨ 1798年《咸朝七省详图》卷首，圆图，色绘本，原题嘉庆戊午重校图本。

④⑩ 1881年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20《沿海形势略》圆图。

④⑪ 光绪乙未重修、京都大顺堂藏板《古今地輿全图》，该图把大洲头误刊为大头洲，七洲洋误刊七洲泽。

④⑫ 清代另一些有关七洲洋的地图，是把七洲洋置于海南岛的西南，靠近越南中部海岸，这是指七屿洋的七洲洋，详见本文第三节。

④⑬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条。

④⑭ 关于泉州湾发掘宋代古船，参考《文物》1975年第10期，《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

④⑮ 同上注④⑬。

④⑯ 《笔记小说大观》本的《梦粱录》作迤邐。邐字不见字书所载，当为“邐”之俗写。

④⑰ 《尔雅》释训：“迤邐，旁行也”。《集韵》说：“迤邐，旁行连延也”。《说文》：“邐，邪行也。”即斜行、旁行。

④⑱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

④⑲ 《两种海道针经》第21页、第107页。

④⑳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条。

④㉑ 明邢宥《琼台杂兴》（《泖丘集》卷二，诗，《海南丛书》本）。

④㉒ 清佚名《七洲洋放歌》（木刻本）。

④㉓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道光五刻本）。

④㉔ 清颜斯综《南洋蠡测》。

④㉕ 参阅上文第二节第一项。

④㉖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条。

④㉗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明费信《星槎胜览》，同）。

④㉘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雪堂丛刻本，第93页）。

④㉙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条。

④㉚ 清大汕厂翁《海外纪事》卷二甲戌三月十三日条。

④㉛ 同上注④⑱。

④㉜ 明王鏊《长溪守语》，见明高鸣凤《今献汇言》六，《长溪守语》第26页（涵芬楼影印本）。

④㉝ 明王鏊《震泽纪闻》卷上吴惠条（借月山房汇钞本）。

- (74) 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 66 外志三。
- (75) 《同安县志》卷 33《孝友录》清林起凤。
- (76) 陈衍《福建通志》总卷四十二《孝义传》，分卷十六。
- (77) (1866) 斌椿《乘槎笔记》第 51 页(下)。
- (78)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 9《舟师考》西洋针路七州洋条。
- (79) 参阅上文第二节第一项。
- (80) 明代《海道针经》第 27—28 页。清代《指南正法》第 108 页，文字稍有不同。
- (81) 参阅拙作《古“帕拉赛尔”考》(其一)、(其二)。
- (82) 明黄衷《海语》卷 3，分水条。
- (83) Voyage du Capitaine John Saris à la Mer Rouge aux Molugues fau Japan, en 1611, en L'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Tome II, p.172, (Paris, 1746.)
- (84) 明代《海道针经》第 27 页。
- (85)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 9《舟师考》水星水醒条。
- (86) 清《指南正法》第 108 页。
- (87)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组:《我国古籍有关南海诸岛动物的记载》，文载《动物学报》第 22 卷第一期，1976 年 3 月。
- (88) 以上材料是作者于 1976 年参观北京自然博物馆时由该馆介绍所得到的，特此致谢。
- (89) 参阅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 4, Pt 2
- (90) 明代《海道针经》第 27 页。
- (91)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 9，舟师考，水星水醒条。
- (92) 清大汕广翁《海外纪事》卷一。
- (93) 清东轩主人辑《述异记》，文载王文濡《古今说部丛书》第一集。
- (94) 清《指南正法》第 108 页。
- (95)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
- (96) 《皇朝续文献通考》。
- (97) 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卷 124 广南西路琼州景物下(文选楼景宋钞本，惧盈斋刻本)。
- (98) 《元一统志》卷 10 琼州路山川第 772 页(中华书局本)。
- (99) 《大明一统志》卷 82 琼州府山川第 18 页下(明刻，万寿堂刊本)。
- (100) 参阅拙作《宋端宗与七洲洋》一文。
- (101) 见 China Sea Pilot, Vol. I, p.88 (1st ed. 1937)。
- (102) 作者于 1977 年在海南岛文昌县访问老渔民蒙全洲等的笔记。
- (103) 参阅 A. Kammerer 的文章(见下文注 143)。
- (104) 见 1571 年费尔南·瓦兹·杜拉多《地图》刊于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III, p.4 285 (Lisboa, 1960)。



⑸ 见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4《水语》海中淡泉条。

⑹ 《文昌县志》卷1山川第29页下。

⑺ China Sea Pilot, Vol. I, p.88 (1st ed. 1937)。

⑻ 参阅《琼州府志》卷4舆地志(六)山川文昌县第27页下(道光辛丑重修本)。  
《文昌县志》卷1山川第29页下(民国七年重修木刻本)。

⑼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5琼州府文昌县,第4326页(中华书局本)。

⑽ 《权制》卷1《军地制》。(木刻本)。现藏广州中山图书馆。

⑾ “大海七洲洋”之名,见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

⑿ 参阅拙作《宋端宗与七洲洋》一文。

Ⓚ 《琼州府志》卷4上舆地山川,文昌“七星泉,在七星岭东,土名龙潜潭,深无底”。

⑑ 清大汕厂翁《海外纪事》。

⑒ 日本源君美《采览异言》(日本抄本)。

⑓ 礁即山巔,比喻在海中露出水面的岛屿,乃是山巔焦石之顶,未沉没于海。参阅:宋徐兢《奉使高丽图经》卷34海道(一)说:“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曰洲、曰岛、曰屿、曰舌、“而其质纯石,则曰焦”。礁,《广韵》山巔曰礁。在这里,以礁比喻露出海中的岛屿为山巔焦石。

⑔ 万里石塘屿,见《郑和航海图》。图载明茅元仪《武备志》卷240有“万生石塘屿”,如果不是万里石塘屿之误,就是万州石塘屿之误(万生石塘屿,据《心略》地利的《郑和航海图》,作万主石塘屿,主为州的侧置之误,90°转移,主即州)。

⑕ 明章潢《古今图书编》卷59古南海夷考略,暹罗国条说:“东海有山,名万里石塘,起自东海琉球国,直至南海龙牙山,潮至则没,潮退乃现”。山即岛屿,这是航海者之习惯称谓(可参阅明、清《海道针经》)。故万里石塘山,即万里石塘屿或万里石塘礁。从上文所说的万里石塘山的起迄,可以知道其范围很广,包括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南海诸岛都在内。

⑖ 参阅“The Kuroshio”, Symposium on the Japan Current. (ed.) by J.C. Marr. 1970。

⑗ 《诗经·周南》:“在河之洲”,他本或作州。《说文》洲,本作州。

⑘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西洋针路七州洋条。

⑙ 清大汕厂翁《海外纪事》卷一(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

⑚ 明代《海道针经》第33页;清代《指南正法》第117页。

⑛ 明顾玠《海槎余录》(文载《纪录汇编》卷161)。并见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70,杂事(下)琼州府。

⑜ 明王鏊《震泽纪闻》卷上,吴惠余(借月山房汇抄本)。

⑝ 明黄佐《(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三)夷情(上)番夷、海寇。

⑞ 同上注⑝。

⑟ 俚人(《隋书·地理志》)即蛮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后汉时,有“徼外蛮里张游”,被“封为归汉里君”。或说俚人即黎人。

⑮ 黎,山巔也,见《琼州府志》。

⑯ 《两种海道针经》第 28 页、第 137 页。

⑰ 陈衍《福建通志》总卷 42《孝义传》,分卷 16,清泉州府同安县第 21 页。

⑱ “广州七州洋”之名,见《元经世大典》平宋条。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元至元十四年条(考异)作广州七州洋,今本《元文类》引《元经世大典》作“广州七洲洋”(中华书局本)。“广州七州洋”指这一段的七州洋洋面是属广州所管辖;“广州七洲洋”指西沙群岛的七洲洋是属广州管辖。本来七州洋与七洲洋是有区别的,但后来由于书写关系相混在一起,也就不那么样区分它了。

⑲ 清谢清高《海录》卷上第 1 页(冯承钧注本)。

⑳ 《郑和航海图》,原载明茅元仪《武备志》卷 240,图上作七个岛屿之状,旁注“七洲”,即七洲山,位置在琼州海峡东口之外,当指文昌七洲,今海南岛人尚称为七洲。向达说《郑和航海图》之“七洲,他书又作七州、七州洋,因有七峰崛起海上,故名。在广东上、下川岛与海南岛之间。又西沙群岛亦名七洲洋,与此同名异地”。见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第 7 页(中华书局 1961 年版)。七洲即今地图上的七洲列岛,由北土岛、南土岛二个岛群(合计共有六七个岛屿)所组成的,在海南岛与七洲列岛中间是七洲洋(即七洲),见《广东省地图》,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印刷,1975 年 6 月第一版。

㉑ 《两种海道针经》第 33 页(向达校注本)。

㉒ 同上,第 117 页。

㉓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西洋针路。关于执俞如珪一事,究系发生在何处的七洲洋,另有专文述及。

㉔ 参阅 China Sea Pilot, Vol. I p.388 (1st ed. 1937), 并参阅 1842 年版 Indian Sailing Direction, p.352--353。

㉕ 海南行政区编印《海南岛地图》(1972 年出版)。

㉖ 1976 年 6 月作者在海南岛琼海县潭门公社水产工作队向邓业树同志作调查时所得资料。

㉗ 计有明慎懋赏《海国广记》占城条、暹罗条、爪哇条、安南条(文载《玄览堂丛书续集》第 14 册、第 15 册,不分页次)、明谢杰《虔台倭纂·万里海图》(文载《玄览堂丛书续集》)、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西洋针路(《国学基本丛书》本)、明《吴惠日记》,见明王鏊《守溪长语》(文载(明)王鸣凤《今献汇言》六第 26 页。涵芬楼影印本)、明王鏊《寰洋纪闻》卷上,吴惠条(借月山房汇钞本)、《两种海道针经》第 49 页、54 页、170 页、169 页、190 页。

㉘ 《两种海道针经》第 117 页。

㉙ 参阅 Albert Kammerer: La Dé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sup>e</sup> ème Siè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 en T'oung Pao, 1944, Supplement au Vol. XXXIX, p.197-198。

㉚ 明黄衷《海语》卷 3 昆崙山条(《岭南遗书》本)。

㉛ 参阅 1535 年葡佚名《世界地图》,见 Portugaliac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Lisboa, 1960) Vol. 1, Pl.38。该图自北纬 10°至 17°,每相隔 1°,约有一个危

险区,即其他葡萄牙地图上的普拉塞尔(Pracel)群岛。

- ⑭ 清俞昌会《防海辑要》卷首《海国图》。
- ⑮ 红毛浅、草鞋石,见《海录》噶喇叭条。
- ⑯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四海总图》。
- ⑰ 清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二南洋各国,吕宋。
- ⑱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澳气》。
- ⑲ 颜斯综《南洋蠡测》(见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
- ⑳ 清谢清高《海录》卷中噶喇叭条。
- ㉑ 同注⑥。
- ㉒ 同注⑦。
- ㉓ 参阅下文《皇朝文献通考》等书。
- ㉔ 清徐家干《洋防说略》卷上,广东海道(道光十三年刻本)。
- ㉕ 清汪文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清抄本,现藏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资料室)。
- ㉖ 《皇朝文献通考》卷297四裔考(五)。
- ㉗ 《皇朝通典》卷98边防(二)港口,柬埔寨。
- ㉘ 王之春《各国通商始末记》卷4雍正(朝)下。
- ㉙ 徐继畲《瀛环志略》卷2南洋各国。
- ㉚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附编卷1瀛海各国统考。
- ㉛ 《重纂福建通志》卷270南洋(道光十五年刻本)。
- ㉜ 黄懋材《游历台言》(见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并见同康庐《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卷126)。
- ㉝ 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澳气,卷下《四海总图》。
- ㉞ 清王大海《海岛逸志》(《舟车所至》本)。
- ㉟ 清姚文枬《江防海防策》(文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 ㊱ 清廖廷相、杨士骥《广东全省海图总说》。

一九七九年九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第二次稿

# 宋端宗与七洲洋

韩振华

- (一)宋端宗(赵昞)海上行朝简介
- (二)张世杰与卫王昺奔至东莞的碇州
- (三)刘深执俞如珪于七州洋或七星洋
- (四)陈宜中奉帝昞欲往占城至七里洋(七洲洋)遂驻蹕沙洲
- (五)关于帝昞至九星洋
- (六)小结

## (一)宋端宗(赵昞)海上行朝简介

南宋二王海上行朝之事，元人编纂《宋史》时，已经以为“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sup>①</sup>。但从现存史料，也可以约略得出宋端宗(帝昞)海上行朝的大略。

景炎元年(1276年)十一月，元军入闽，帝昞等由福州走入海上<sup>②</sup>，经过泉州，蒲寿庚拒不接纳<sup>③</sup>。

十二月，“帝舟次于(广东)惠州之甲子门”。

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帝舟次于广之梅蔚”；“四月，帝舟次于广之官富场”，“六月，帝舟次于广之古塔。”<sup>④</sup>

七月，张世杰自率舟师围攻泉州，打了九十日，不下，乃去之<sup>⑤</sup>，回广之浅湾<sup>⑥</sup>。

九月，帝舟次于广之浅湾<sup>⑦</sup>。

十一月初，元将“刘深以舟师攻昞于浅湾”<sup>⑧</sup>。“世杰兵败”<sup>⑨</sup>，

帝昫“走秀山”<sup>⑩</sup>，寻至井澳，住巨富马南宝之家<sup>⑪</sup>，南宝献粟千石助军<sup>⑫</sup>。

十一月，元军主帅塔出围广州<sup>⑬</sup>。丞相陈宜中于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奔至广州<sup>⑭</sup>，加强广州防守战。

十二月，帝昫至广州，以州治为行宫<sup>⑮</sup>。十二月初九日，广州城将陷，陈宜中自广州遁<sup>⑯</sup>。

十二月十二日（丙寅），宋将张镇孙以广州降<sup>⑰</sup>，宜中寻与帝昫、卫王昺、张世杰、苏刘义等，走香山<sup>⑱</sup>。走香山之前，“宜中众尚数千人，船八百艘，比至虎头山（秀山）中流，为风坏船，众皆<sup>⑲</sup>溺死，宜中以身免”<sup>⑳</sup>。丙寅（十二日）这一次飓风，陈宜中损失最大。接着，下面这件秘密降元事件，被发现了，亦即元将唆都遣人持书谕世杰<sup>㉑</sup>，世杰、广王昺遣倪宙奉降表至唆都军门（在十二月初十甲子，广州城陷之前的二天）<sup>㉒</sup>。奉表投降这件事暴露后，景炎帝（昫）“等惊溃，不知所之”<sup>㉓</sup>。景炎帝年幼（当时只有十岁），除了刚被罢“主管殿前司公事”<sup>㉔</sup>苏刘义私下还有控制一些原属禁军船只之外<sup>㉕</sup>，兼枢密使的陈宜中则因遭风损失惨重，仅以身免，没有一点儿实力。此时又获得世杰与昺奉表请降，景炎帝等惊溃不知所之，当然包括奉帝走亡的陈宜中在内，所以陈宜中亦被说成“不知所之”。直至十八日香山海战时和二十二日井澳飓风后，元军仍对景炎帝和陈宜中等“不知所之。”<sup>㉖</sup>。

十二月十八日，元军塔出、哈刺剌等仍向宋军追攻，不顾世杰、广王昺已经奉表请降，宋元舟师就在香山县的海岛附近发生海战，开始是由刘深攻打井澳<sup>㉗</sup>（一名仙澳），世杰却之<sup>㉘</sup>，于是有“仙澳得利”之说<sup>㉙</sup>，继而元军大至<sup>㉚</sup>，元将哈刺剌、梁雄飞、王大禄，“将兵追袭之，与世杰等，遇于香山，夺战舰、符印，俘其将吏”<sup>㉛</sup>。十八日“香山岛败绩，将士被执甚众”<sup>㉜</sup>，于是乃有“井澳之败”之说<sup>㉝</sup>。要之，十八日香山岛海战，张世杰是先胜后败<sup>㉞</sup>。二十二日，元将哈刺剌

等又追世杰、昺等至广州七州洋，战于“大洋”<sup>③</sup>中，“及之战（广州七州洋）海洋中，夺船二百艘”<sup>④</sup>。于是世杰、昺等，“望南止碇州，碇州属广之东莞县”<sup>⑤</sup>。直至明年三月二十二日，“世杰挟广王昺奔至（化之）碇洲”<sup>⑥</sup>。

当十八日香山岛海战，元将刘深攻袭井澳，被世杰打退后，当日元军大至，反败为胜。到了二十三日，刘深追至七州洋（一作七星洋）执俞如珪以归。（刘深原以为是在追帝昺，其实不是，他误俞为帝昺母舅<sup>⑦</sup>，其实他所追获的，是广王昺的母舅，即昺生母俞修容的兄弟<sup>⑧</sup>。）

十二月十八日井澳之败以后，陈宜中乃决定欲奉景炎帝奔占城<sup>⑩</sup>。十二月二十二（丙子）景炎帝“昺至井澳，飓风坏舟，几溺死，遂成疾”<sup>⑪</sup>。于是，在丙子这一天帝昺迁舟于谢女峡<sup>⑫</sup>。

景炎三年一月，景炎帝在谢女峡<sup>⑬</sup>。一月初四、五左右，即在丙子井澳飓风之后的十余日，“诸兵士始稍稍来集，死者十（之）四、五”<sup>⑭</sup>。于是，景炎帝自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sup>⑮</sup>（一作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sup>⑯</sup>。乃驻蹕于七里洋的沙洲<sup>⑰</sup>。当陈宜中欲奉帝走占城时，原主管殿前司苏刘义等不以为然，他追赶陈宜中，不及，乃返<sup>⑱</sup>回仙女湾，忽“天火”焚舟，“延烧众舟几尽”<sup>⑲</sup>。仙女湾即仙女澳，亦即谢女峡<sup>⑳</sup>。

二月，决定“景炎帝（昺）由海道再回广”<sup>㉑</sup>，三月，“帝自七里洋还，遂驻（化之）碇洲”<sup>㉒</sup>，亦即三年三月，帝“昺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驻碇洲”<sup>㉓</sup>。三月二十二日，“世杰挟广王昺奔（化之）碇洲”<sup>㉔</sup>，是时，“御舟次碇洲，众舟皆来会，惟宜中自南蕃洋，转舵往占城”<sup>㉕</sup>，自此不返<sup>㉖</sup>。

“四月戊辰（十五日）帝崩于碇洲，年十一。辛巳（二十七日）上尊号曰端宗皇帝”<sup>㉗</sup>。“时，群臣皆欲散去，独陆秀夫不可”，“庚申（庚午之误）<sup>㉘</sup>，乃与张世杰等立卫王（昺）为皇帝，年八岁”<sup>㉙</sup>。

## (二)张世杰与卫王昺奔至东莞的碙州

香山岛井澳(仙澳)海战,张世杰先胜后败<sup>⑮</sup>,宋人记载,只言其胜,不谈其败,于是,才有张世杰井澳却敌即“仙澳得利”之说。宋陈仲微《二王首末》说:“次仙澳,与战得利,寻望南去,止碙州。碙州属广之东莞县,与州治相对,但隔一水。”<sup>⑯</sup>

张世杰不是在打胜仗之后,才走碙州,而是在打败仗后,才走碙州。景炎二年十二月十八日香山岛海战先胜后败,之后,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在广州七州洋(或“大洋”)发生海战,张世杰又失去战船二百艘<sup>⑰</sup>,此后,才往碙州。碙州属广州之东莞县<sup>⑱</sup>,即元吴莱所说的大奚山,一名碙州山<sup>⑲</sup>。日本伊东忠太说大奚山是指急水门与佛堂门中间的今之香港,因此,碙州或碙州山,应指香港<sup>⑳</sup>。许地山认为大奚山即香港九龙的大濠岛,因此,碙州或碙州山应指大濠岛<sup>㉑</sup>。过去,一般上都认为碙州即化州之碙洲(碙洲),帝昺死在这里<sup>㉒</sup>。后来帝昺又升碙州为翔龙县,也是指元化州或明高州之碙洲<sup>㉓</sup>。事实上,张世杰与卫王昺“望南止碙州”,与帝昺死于碙洲,以及升冈州为翔龙县,原为三个地方,不能囫囵互混在一起。

张世杰与卫王昺,望南止碙州,宋陈仲微在上引文已明确指出是属广州东莞县的碙州。碙字不见于字书,显然是一个俗字。碙州在香港,或在九龙大濠岛,这主要决定于大奚山究竟在那里,由于大奚山西南为老万山(今万山群岛),又是介乎急水门与佛堂门的中间<sup>㉔</sup>,应指香港为宜,因此,碙州为香港的古称。世杰、卫王昺等,自景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广州七州洋的“海洋”(或“大洋”)败绩之后,就住在“属广之东莞县”的碙州(香港),明年一月,张世杰派兵攻打雷州,不克<sup>㉕</sup>。一直到了三月,帝昺自七里洋还,驻化州之碙洲(碙洲),三月二十二日世杰与卫王昺才离开东莞县之碙州,走向化州之碙洲<sup>㉖</sup>,与帝昺相会。在上述这段时间内,张

世杰与卫王昺都住在东莞县之碭州，没有跟帝昞一起到七里洋。

“帝(昞)自七里洋还，驻碭洲，旋崩”<sup>⑬</sup>。碭洲，或作碭州<sup>⑭</sup>，乃碭洲<sup>⑮</sup>之误。碭音饶<sup>⑯</sup>。“碭”字虽不见于字书，但一般读为“冈”<sup>⑰</sup>。只因碭之字形与碭(字书亦无此字)相近，乃误以碭为碭，又误碭字的“岡”旁为“冈”字简写，于是写成碭洲。自从元黄潘《陆秀夫传后序》认为帝昞死于化州之碭洲，以后多从其说<sup>⑱</sup>，因此，就把这两个不同书写的碭洲与碭州，混淆在一起。后来，升(新会)冈州为翔龙县<sup>⑲</sup>，这里的冈州亦误为碭洲，也被认为是指化州之碭洲。事实上，化州之碭州(碭洲)，东莞之碭州，与新会之冈州，三者不同。

南宋海上行朝，一开始张世杰就与陈宜中“议论不合”，彼此不协，文天祥对此，早有意见<sup>⑳</sup>。张世杰又因陆秀夫之谪，“让陈宜中曰：台谏论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还行朝”，为“同金书枢密院事”，时于景炎二年冬十月<sup>㉑</sup>，下距张世杰、卫王昺奔遁东莞县之碭州，仅二月。同时，下距陈宜中欲奉帝(昞)走占城，亦仅二月。又况陈、张二人，虽在十二月遭受严重损失，战败之余，彼此仍然不协。尤其是，对世杰挟卫王昺奉表请降，宜中更是恐惧、不安<sup>㉒</sup>。于是，陈宜中在一败涂地、仅以身免的可悲情况下，只能走上“欲奉帝(昞)走占城”这条路。当然，这也是很秘密地进行，不能让张世杰知道。同样地，元军从俘获张世杰将吏兵卒那里，也不能知道。因此，帝昞等才被认为“惊溃不知所之”，包括陈宜中亦被认为“不知所之”<sup>㉓</sup>。日后《宋史》说“陈宜中往占城，与世杰不协，屡召不至”<sup>㉔</sup>，是有道理的。人们批评张世杰：“闽之再造，实赖其力，然无远志，拥重兵厚资，惟务远遁，卒以败”<sup>㉕</sup>，也是有道理的。

张世杰奉卫王昺逃遁东莞之碭州，这与他的“拥重兵厚资，惟务远遁”的战略思想，是一致的。尽管十二月二十三日又败于广州的海洋中，即败于广州七州洋或七州大洋，损失海船 200 艘，较诸



陈宜中在虎头山中流，损失士兵数千人、船 800 艘<sup>⑧</sup>，几乎全军覆没，仅以身免，在保存兵力方面，世杰较胜一筹。

### (三)刘深执俞如珪于七州洋或七星洋

《宋史》记载“刘深追昱至七州洋”，<sup>⑨</sup>这是元朝军队在当时对帝“昱等惊溃不知所之”的情况下，以为被迫的对象是帝昱，被抓到的卫王昺母舅俞如珪，也被误认当做是帝昱母舅俞如珪。《厓山集》说“刘深追至七星洋，卫王提举官俞如珪为所执”<sup>⑩</sup>，黄淳《崖山志》也说“刘深追至七星洋”<sup>⑪</sup>，他们都把《宋史》所说“刘深追昱至七州洋”，认为只是“追至七星洋”，而不是追昱至七州洋。因此，不能引用《宋史》这段史料，来证明帝昱曾被追至七州洋，此其一。执俞如珪于七州洋或七星洋的时间，在景炎二年十二月丁丑(二十三日)，宋端宗至七里洋的时间，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井澳飓风以后的旬余日，即明年一月初，二者发生的时间不同，相差约有十多日，此其二。

刘深执俞如珪这件事，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刘深袭井澳，被张世杰在井澳打退了，接着，当天元军大至，世杰败绩，遂有“井澳之败”。五天后，刘深以为还是在追帝昱，其实不是，他所追的，是卫王昺的母舅俞如珪，却也被误会为帝昱母舅俞如珪，因为井澳之战，开始时刘深不利，所以他一心一意要立下追擒帝昱的“大功”，故被抓到的，都认为是帝昱的亲近<sup>⑫</sup>。

刘深执俞如珪之处，《元经世大典》谓在广州七州洋，《宋史》本纪作七州洋，这是因为这一段的七州洋是属广州巡海所管辖的范围内，故称广州七州洋。《宋会要稿》说占城二日至广州<sup>⑬</sup>，就是指广州七州洋，才能自占城界二日可达。如果说，执俞如珪于七州洋或广州七州洋，是指琼州文昌的七洲列岛及其附近的海面，则宋元之际、琼州属广南西路，不属广南东路的广州，显然与记载上所说

的,执俞于广州七州洋,不相符合。如果说,执俞于广州七州洋,“七”字乃“九”字之误,则诸书皆谓执俞于七州洋,绝无任何记载说是执俞于九州洋。改七州洋为九州洋,不可。

一说刘深执俞如珪于七星洋。七星洋即七洲洋,据明黄淳《崖山志》说:“七星洋,在文昌东海中,与吴川相对,一名七洲(洋)”<sup>⑫</sup>。“文昌东海”即今西沙群岛,日后文昌渔民所保存下来的《更路簿》,仍称西沙群岛为东海<sup>⑬</sup>。又明代记载,亦称:过七洲洋,遇西风飘入东海中,要谨慎提防,千万别碰上万里石塘<sup>⑭</sup>。

刘深自十二月十八日井澳之战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追至七州洋执俞如珪,前后有五天<sup>⑮</sup>。十二月正是东北风盛吹时候,自香山县井澳(今横琴岛)追至七州洋(西沙群岛),为时五天,不是不可能的。刘深在七州洋执俞如珪,又趁东北季候风,向西北行,返回雷州半岛(当时在元军占领下),这也不是不可能的<sup>⑯</sup>。如谓执俞如珪发生在广州七州洋<sup>⑰</sup>是指香山县之东的九洲洋或九星洋,如许地山<sup>⑱</sup>、潘蔚<sup>⑲</sup>、谭其骧先生<sup>⑳</sup>等所主张,则九星洋在香山县井澳的东北,在冬季东北风盛吹季节,不好顶着逆风由井澳向东北走四、五十里而又需航行五日这样久才至香山九星洋。至于执俞如珪于七州洋或七星洋,“七”字又非“九”字之误。对此,历来记载,无可获证“七”字为“九”字之误。不能把文昌东海(西沙群岛)的七星洋或七州洋,移到香山县之东的九星洋去。

#### (四)陈宣中奉帝昀欲往占城至七里洋

##### (七洲洋)遂驻暎沙洲

有关帝昀至七里洋或七洲洋的史实,见于下列诸书:

《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立》,景炎二年十二月丙子,“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三年二月,帝舟还广州”。三月“帝迁驻颍州”。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 104 吴川县：“宋景炎二年（应为三年刊误），帝自七里洋还，驻硃洲，旋崩”。（严如煜《洋防辑要》卷 8 广东高州府化州条“景炎二年（应作三年）帝自七里洋还，驻硃洲”。）

《纲鉴易知录》卷 90 南宋纪端宗皇帝景炎二年十二月，“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陈宜中逃之占城”。“帝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 183 元纪（一）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刘深攻井澳。宋主奔谢女峡，复入海。深追至七里洋，击败之，获宋主之舅俞如珪。宋主欲往占城，不果”。

《宋史》卷 47 《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至元十五年三月“是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驻硃州”。

《新元史》云：“井澳风大作，（帝）舟败几溺，复入海，至七洲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驻硃洲”。

《填海录》云：“先是，陈宜中辞相位，而以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御舟次硃洲，众舟皆来会，惟宜中自南蕃洋，转舵往占城”。<sup>⑩</sup>

关于刘深袭井澳这件事，《宋史》说“刘深袭井澳，世杰却之”<sup>⑪</sup>，香山县井澳海战，先胜后败<sup>⑫</sup>，时间在景炎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此据《元经世大典》可知。《厓山集》说十二月丙子（二十二日）“刘深袭井澳，张世杰战，却之，陈宜中如占城。”刘深袭井澳，张世杰战，却之，这是一件事，发生在十二月十八日（壬申）<sup>⑬</sup>，不是发生在丙子（二十二日），发生在丙子这一天的事件，是指“陈宜中如占城”之决定，始于此。其所以在前面，冠以刘深袭井澳，世杰得利这件事，用意殆在责备陈宜中于井澳得利之下，还要走占城，是不可宽恕的。

有些记载对帝昺至七里洋（七洲洋）欲往占城这件事，有所回

避、隐讳，只讲帝昺在十二月至谢女峡，自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的这件事就回避、隐讳过去了，接着在帝昺至谢女峡之后，就讲到帝昺于明年三月还驻化州之硃洲，甚至从七里洋还，才还驻硃洲都不愿提起。例如：

陈仲微《二王首末》说：丁丑（景炎二年）“十二月，景炎帝舟迁于谢女峡”，二月“景炎帝由海道再回广”。

《厓山集》说：景炎二年十二月丙子（二十二日）“帝舟次于谢女峡”，三年二月“帝舟还广州”，三月“帝舟次于化之硃洲”。

黄淳《崖山志·帝纪》说：“丁丑景炎二年十二月”，“帝迁舟于谢女峡”，“戊寅景炎三年春正月，帝在谢女峡”，三月“帝舟迁于硃洲”。袁了凡、王凤洲《纲鉴合编》卷37《南宋纪》丁丑景炎二年十二月“元刘深来袭井澳，执俞如珪以去。帝迁舟于井澳”。周静轩评云：“帝居秀山、井澳，刘深又袭之，奔于谢女峡矣，自是而迁硃州”。

上面已讲到刘深袭井澳，在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刘深追至七州洋，执俞如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帝昺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至井澳遇风，坠水几死，于是，帝昺迁舟谢女峡，一直到了明年一月，亦即井澳飓风后的旬余日，在谢女峡收集遭风后失散的士卒，已死去十之四、五。明年一月，帝昺自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所以，刘深袭井澳并追至七州洋，执俞如珪以归的上述这件事，与帝昺在井澳遭风后，奔至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原为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件事，不能合在一块来谈。

七里洋有七里山。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5 广东（六）琼州府文昌县条，七里山在“大海中，有七峰相连，一名七洲洋山，林木茂密，下出淡泉，航海者必取汲于此，山（七里山）之东，又有七里泉，虽旱不涸。”《权制》卷1《军地制》，七里山在“海中七峰相连，曰七洲洋山，林木茂密，下出淡泉，航海者必取汲于此，山之东，有七

里泉，虽旱不涸，粤海有警，此亦伏兵之所也”。

下面，对帝昞自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这件事，有关谢女峡、七里洋在今何地，略述如下：

谢女峡即仙女澳<sup>⑩</sup>。井澳即深井<sup>⑪</sup>，又称仙澳<sup>⑫</sup>，因井澳有“北骑仙”的传说<sup>⑬</sup>，故名。仙女澳即谢女峡<sup>⑭</sup>，亦称女湾<sup>⑮</sup>。井澳或仙澳，在横琴岛下<sup>⑯</sup>，即今大横琴岛。谢女峡“在井澳南”<sup>⑰</sup>，一名仙女澳或女湾，今小横琴岛，下有双女峡，即谢女峡<sup>⑱</sup>。井澳、谢女峡，即深井、仙女澳<sup>⑲</sup>，今大、小横琴岛是也。

七里洋的七里山或七洲洋的七洲洋山，原属琼州文昌县，因此，它常与琼州文昌县北面陆地上的七星岭混为一谈，又常与文昌县东北近海中的七星、七洲即今七洲列岛，亦混为一谈。讲七里山在文昌县北“百五十里”，这是误以文昌县北一百五十里的七星岭作为七里山，七星岭在陆地上，不在海中，又况陆上的七星岭高山，未闻船舶必须跑上山去汲水、采樵。而且七星岭上的七星潭，又不是常旱不涸，也不是良好的淡水。此乃误以七里山作七星岭。讲七洲洋山在文昌县东百里，这是指文昌县东北百里的近海之七洲山或七星山（今七洲列岛），《琼州府志》、《文昌县志》常把七洲洋山混同于七洲山或七星山（今七洲列岛）<sup>⑳</sup>。虽然，七洲山或七星山亦在海中，但其地形、地貌，又不合乎七洲洋山的状况。七洲列岛百年来都是光秃秃的岩石岛<sup>㉑</sup>，至今仍然如此<sup>㉒</sup>，那来的“林木茂密”呢。七洲列岛全无淡水井，只有在平岛的岩石下，渔民们挖一个小石窟以贮石隙的滴水，但只能作为洗涤用，不能作为饮食用的淡水。七洲列岛靠近海南岛，航海者如需汲取淡水或采砍樵薪，可以把船驶到海南岛去获取补给，何必一定要在既没有林木又没有淡水的七洲列岛去汲水采薪呢。其所以出现上述这些不合情理的记述，全都在于混同大海中的七里山或七洲洋山作为海南岛陆地上的七星岭和靠近海南岛的七星山即七洲列岛。总之，执俞如珪

是在文昌县“东海”(西沙群岛)的七星洋或七洲洋,亦即那个在海中七峰相连,林木茂密,下出淡泉,航海者必取汲于此的七里山或七洲洋山及其洋面,即今西沙群岛及其海面。

在七洲洋或七里洋海中之“七峰(岛屿)相连”的七洲洋山或七里山,即今西沙群岛的上七岛(宣德群岛)。西沙群岛的上七岛,尤其是永兴岛和东岛,麻枫桐林茂密,永兴岛昔称“林岛”,亦称“巴岛”(海南岛人,称树林曰“巴”,)意即林岛<sup>⑩</sup>,葡萄牙人东来初期,仍案照中国人的叫法,称它曰 Pulo Boiça,意即林岛<sup>⑪</sup>,后来英国人亦称它为伍第(Woody)岛,意即树林岛。西沙群岛上七岛,即七里山,在大海中,以林木茂密著称,正是合乎上七岛尤其是永兴岛、东岛的地貌。如需要登岛采薪,也有树林可供烧火之用。

西沙群岛虽在大海中,尽是一片平坦、弹丸小岛,却有不少的岛屿,有淡水井,可供饮食用水。西沙群岛的七里山,尤其是今之东岛,素有淡泉著称,航海者在茫茫大海中,经过长途航行,凡抵此处,必取汲于此,这也是合乎事实。由于过去琼州地方志,常把西沙群岛的七里山、七洲洋山、七星山混同于文昌七洲列岛的七洲山(即七洲),甚至混同于海南岛陆上的七星岭,以致有关七里山即一名七洲洋山的记载,与七洲列岛和七星岭纠缠不清。

陈宜中“欲奉帝昀往占城”以及帝昀“复入海至七里洋”,并住在七里洋的七里山,即今西沙群岛上七岛。或以为西沙群岛全都是弹丸小岛,最大的永兴岛,亦不过 1.49 平方公里,怎能容纳得了南宋行朝那么多的军队——开始时有四十八万人,崖山败亡有二十几万人。谭其骧先生就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来,<sup>⑫</sup>认为七洲洋不能在西沙群岛,怕它容纳不下。

首先,南宋行朝是否一直保持军、民四十八万人至二十余万人这个队伍呢?当帝昀开始海上行朝之时,景炎元年自福州南下入海,“时正军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有奇,内淮兵一万”<sup>⑬</sup>,如果复入

海至七里洋之时，还有四十几万的军队，确实是西沙群岛容纳不了的。但是，海上行朝经过将近二年的打仗，宋军在陆上和海上接二连三吃了败仗，直到景炎三年三月“众舟皆来会”于化州之硃洲，是时宋军水陆之师，不过“止万”耳<sup>②</sup>。又况张世杰的淮军一万人，二年来不能一点也没有损失，但在世杰专务远遁的战略思想下，估计损失并非惨重，总会保存一些实力，帝昺即位硃洲，主要就是依靠张世杰的兵力，当时，宋军“止万”人，世杰是占一大部分。可是，世杰奉卫王昺奔东莞之硃州，直至景炎三年三月才在“众舟皆来会”之时，才来化州之硃洲，与帝昺相会，他虽占“止万”人的宋军之中的大部分军队，却又没有跟帝昺奔至七里洋。因此，帝昺至七里洋的军队，扣除张世杰没有去七里洋，以及散逃沿海等处的“众舟”也没有去七里洋，剩下来的，估计约有几百人而已。

从陈宜中所拥有的兵力来看，他在“欲奉帝走占城”之时，几乎只有随身人员而已。十二月十二日（丙寅）大风发作时，陈宜中原有的数千人、船八百艘，全军覆没，宜中“仅以身免”<sup>③</sup>。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井澳飓风，帝昺御前禁军又损失了“十之四、五”<sup>④</sup>，剩下这一半的御前禁军，当走占城时，又被四个月前刚被宜中罢免主管（禁军）殿前司的苏刘义<sup>⑤</sup>截留了一些船只，为数颇众<sup>⑥</sup>，看来，陈宜中欲奉帝昺往占城，复入海至七里洋，所能带走的士卒和船只，为数更不多了。充其量，估计只有帝昺的殿前指挥使所率领士卒五百人的二分之一人数，约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而已<sup>⑦</sup>，象这样二、三百人的人数，西沙群岛是容纳得下的。

或认为西沙群岛缺乏淡水，不够宋军饮食之用。事实上，西沙群岛可供饮食用的淡水井，还是有的<sup>⑧</sup>。如果宋军不是拥有一支四十八万至二十余万的军队，而仅仅是陈宜中欲奉帝昺走占城复入海至七里洋所带去的士卒几百人，那么西沙群岛可供饮食用的淡水，还是够用，绰绰有余。何况帝昺等驻跸七里洋的“沙洲”，为

时不久,仅有二个月而已,淡水供应,除了海船水仓原有贮藏一定数量淡水<sup>⑧</sup>之外,西沙群岛又有淡水井和淡泉,淡水供应更不是克服不了的大问题。

关于帝昶驻蹕于七里洋的“沙洲”,据陆秀夫《景炎皇帝遗诏》说:“海桴浮避,澳岸栖存。虽国步之如斯,意时机之有待。乃季冬之月,忽大雾以风,舟楫为之一摧,神明拔于既溺,事而至此,夫复何言。矧惊魂之未安,奄北哨其已及。赖师之武,荷天之灵,连滨于危,以相所往,沙洲何所,垂阅十旬,气候不齐,积成今疾。念众心之巩固,忍万古以违离,药非不良,数不可道。惟此一发千钧之托,幸哉连枝同气之依。卫王某聪明夙成,仁孝天赋,相从险阻久系,可于枢前即皇帝位,传玺绶。”<sup>⑨</sup>帝昶在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至井澳遭飓风坠海得疾,接着,帝昶奔谢女峡,至明年一月,自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自一月至七里洋至二月决定再由海道回广、三月遂驻化州之硃洲以前,帝昶是停留在七里洋,为时约有二个月,具体说来,他是停留在七里洋的“沙洲”,受不了七里洋沙洲上的“气候不齐”(寒暑异常)的影响,使帝昶这个不到十周岁小孩子的病情,日益加重,所以在陆秀夫笔下,才有“沙洲何所”这种哀鸣。这里的“沙洲”,是指七里洋的七里山的沙洲,用“沙洲”这个名字,来称呼西沙群岛,也是恰切,西沙群岛那些坦平的、低矮的、并由珊瑚礁和沙所组成的小小岛屿,用“沙洲”名之,更见名符其实。又陆秀夫所说的“沙洲何所,垂阅十旬”,这是指上自十二月二十二日井澳遇风帝昶得疾算起,中间包括住在七里洋的沙洲(约二个月),下至明年四月十五日死在化州之硃洲,共约十旬(百天)。如果沙洲是指别的什么地方,例如广东沿海的什么地方,抑或文昌七洲列岛,那就不能说是至七里洋,住在“沙洲”上养病之时,受到“气候不齐”的影响。在七里洋上“气候不齐”的“沙洲”,只有西沙群岛的七里洋、七里山,才有这种“气候不齐”的



气候。

### (五)关于帝昞至九星洋

有一说,帝昞自谢女峽复入海至九星洋,而不是复入海至七里洋或七洲洋。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 101 广东二香山县条引明《香山县志》云:“九星洋,在(香山)县西南,宋景炎二年,元将刘深袭井澳,帝至谢女峽,复入海,至九星洋,欲往占城不果。”明《一统志》云:“海中有九曜山,罗列如九星,洋因以名”。

宋时,称西沙群岛曰九乳螺洲<sup>⑧</sup>或九星山<sup>⑨</sup>,它是宋时通往外国的一条主要海道,外国商舶经常取道九星山到广州,中国海军为了保护海道安全,亦经常巡海到这里——九乳螺洲。直至清朝,仍有见到称它为万州九洲洋<sup>⑩</sup>。

谭其骧《七洲洋考》说:“《宋史·二王本纪》载元将刘深追宋端宗至七洲洋,《宋史纪事本末》作七里洋。两个‘七’字都是‘九’字之误,‘里’字则系‘星’字之误。九星洋一名九洲洋,在今珠海县九澳岛稍北”<sup>⑪</sup>。许地山与潘蔚在四十年代亦都曾经主张七洲洋为香山县东面的九洲洋,均以“七”字为“九”字之误<sup>⑫</sup>。

刘深追至七洲洋执俞如珪,地点是在文昌东海七洲(今西沙群岛上七岛),宋端宗自谢女峽复入海至七里洋或九星洋(今西沙群岛下八岛),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前后两件事,但发生的地点却是相同的,都在今西沙群岛。不能把史籍上所载的七里洋或七洲洋,一讲它都是九星洋或九洲洋之误。改字说经,并不太好。

香山县东面或九澳岛北面的九星洋或九洲洋,不同于香山县西南海中的九星洋或九洲洋,二者方位不同,应是同名异地。不能任意把香山县西南的九星洋改为香山县之东或九澳岛之北的九星洋。诚如是,这里又要改字了,要改西南为东北、或正东。这样,到处改字,也是不好的。

香山县东面的九星洋或九洲洋,历来都是这样写法,从未见到它有讹写为七星洋或七洲洋<sup>⑧</sup>。同时,香山县志等地方志,亦从来没有记载在香山县东的九星洋或九洲洋有抓到俞如珪这件事。反之,执俞如珪,在七星洋或七州洋,从未见到有错写为是发生在九洲洋,而且明清以来的《琼州府志》、《文昌县志》等地方志都说在文昌东海七洲洋抓到俞如珪,总不能一口咬定这些都是错误,反而以不见历史记载的抓俞如珪于香山东面的九洲洋才是不误。

香山县东面的九洲洋或九星洋,不是香山县西南的九星洋。香山县西南的九星洋,即帝昺自谢女峡复入海所至的九星洋,指今西沙群岛的下八岛。下八岛即今永乐群岛,由金银岛、甘泉岛、珊瑚岛、全富岛、森屏滩、金沙岛、晋卿岛、琛航岛和广金岛等九个同在一个巨大弧形礁盘上的岛屿所组成的。此外,另加中建岛和北礁(北砂岛)等岛礁,数目不限于八个岛。九乳螺洲、九星山、九星洋和万州九洲洋,是指同在这个巨大礁盘上的上述金银岛等九个岛屿。

无论宋端宗(帝昺)是自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上七岛)或至九星洋(下八岛),都是至西沙群岛的。

## (六)小 结

刘深追至七州洋,执俞如珪以归。这里的七州洋,一作广州七州洋,一作七星洋。或说,在七州山或七星山,执俞如珪。俞如珪被执于七州洋或七星洋,抑或执于七州山或七星山,都是指海南岛文昌东海(西沙群岛)的七星洋或七州洋。帝昺自谢女峡复入海至七洲洋或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遂驻蹕于沙洲,到了景炎三年才还自七里洋,遂驻化州之碇洲。这里的七洲洋或七里洋,也是指今西沙群岛,尤其是,指上七岛(今宣德群岛)。或说帝昺复入海至九星洋,这是指下八岛(今永乐群岛)尤其是指同在一个巨大礁盘

上的金银岛等九个岛屿。无论帝昶复入海至七里洋或至九星洋，都是说明帝昶复入海至西沙群岛的上七岛或下八岛。尽管帝昶驻蹕于西沙群岛的“沙洲”上，时间不长，只有二个月左右，但他毕竟曾经走到我国西沙群岛去了。

### 注释：

① 《宋史》卷451附《刘鼎孙传》云：“翰林学士刘鼎孙……鼎孙字伯镇，江陵人，进士也。方（陆）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光荐曰：君后死，幸传之。其后厓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焉。”

② 佚名《厓山集》，《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立》。关于宋端宗离开福州以后的兵力估计，另有专节叙述。（参阅本书第73—74页）

③ 参阅：《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景炎元年十一月条。并参阅《八闽通志》（卷86），何乔远《闽书》（卷152）。

④ 见《行朝录》、《厓山集》。并见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1、卷103。

⑤ 《宋史纪事本末》，卷101《二王之立》，与《厓山集》第12页上（涵芬楼景印明天一阁本）

⑥ 一说浅湾在潮州，见《通鉴辑览》、《香山县志·马南宝传》。但潮州有钱澳，惠州有浅澳（见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图），均不见有浅湾。又况帝昶至浅湾之前，已经到过梅蔚、官富、古塔，这些地方都在广州珠江海口的东岸，不可能再从上述之地，倒转回头，返回潮州。又《元经世大典》平宋条说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一月，宋方“舟师至港口，为广州官军杀退，回在海内，有一山，名秀山”。他书记载，均谓浅湾败后，帝昶至秀山，因此浅湾之败，是在广州的海境上的港口，《崖山志》卷3《形胜志》说“浅湾在广州海之四冲，去广及官富场各一日”。

⑦ 见《厓山集》，涵芬楼景印明天一阁本。

⑧ 《宋史》卷47《二王本纪》，作十月庚寅。景炎二年十月，没有庚寅，十一月才有庚寅（初五日）。明佚名《厓山集》，明钱士升《南宋书》卷6《端宗纪》，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立》，《纲鉴易知录》卷90《南宋纪》景炎皇帝二年条，均作十一月。应以十一月为是，《宋史》作十月，误。

⑨ 《宋史》卷451《张世杰传》。《宋史》把浅湾之败，系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误，应作至元十四年（1277年）。

⑩ 《宋史》卷47《二王本纪》。

⑪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香山县志》卷7《马南宝传》。

⑫ 《香山县志》卷7《马南宝传》，《崖山志》卷六《续志·马南宝传》。

⑬ 关于塔出围广州的时日，《宋史》卷47《二王本纪》作“十月”，应为“十一月”之误，因前面已另有一个“十月”。

⑭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⑮ 《匡山集》第11页下，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至广州，经略使刘应龙、转运使姚良臣迎入州治，作行宫”。《崖山志》卷1帝纪，“丁丑景炎二年春正月”“帝至广州”，“时经略使导帝至广州港口，转运使姚良臣作行宫，迎帝入州治，元兵守港者拒之，不果入”。景炎元年十二月，帝是在惠州，景炎二年上半年才至珠江口的东岸一带，因此，元年十二月在广州，应为二年十二月之误。

⑯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⑰ 《宋史》卷47《二王本纪》以“张镇孙以(广州)城降”，系于“十月”(十一月之误)，事实上，张镇孙以广州城降，在十二月十二日，见《元经世大典》(文载元苏天爵《元文类》卷41《征伐》类平宋条)。

⑱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⑲ 《新元史》作众皆溺死，《宋史》作众溺死。

⑳ 同上。

㉑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㉒ 见《元史》卷129《百家奴传》。关于卫王昺遣倪宙奉表投降，他书或系于景炎元年十二月，作为帝昺在甲子门所发生之事，如：《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3广东(四)惠州海丰县甲子门条，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3元纪(一)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条，《新元史》卷9《世祖本纪》(三)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条。甚至把卫王昺遣使奉表请降，改为“益王昺遣倪宙奉表，诣军门降”(《新元史》卷180《百家奴传》)。其实，这件事，是在至元十四年(景炎二年)“冬十二月，宋二王(指卫王昺)遣倪宙奉表诣军门降。”(《元史》卷129《百家奴传》)。《元史》卷10《世祖本纪》说至元十五年三月“乙未(十二日)，宋广王昺遣倪坚(一作倪宙)以表来上，令俟命大都”；《宋史纪事本末》卷108说，景炎三年(至元十五年)三月“倪宙至燕”，前者未言及奉表年月，只讲抵达的时日；后者误把遣使奉表置于景炎元年十二月，抵达北京时日置于隔一年又三个月之后的景炎三年三月。景炎三年三月无误，误在奉表此事置于景炎元年十二月。又上引《元史·百家奴传》的宋二王，即上引《元史·世祖本纪》的广王昺，《元史》里面，以宋二王仅指广王昺，不止见于上述一事。《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九月“庚寅(初十日)，昭信达鲁花赤李海刺孙言，愿同张弘略取宋二王。调汉军水军，俾将之。”至元十五年九月，帝昺已死，只有广王昺即位，是为帝昺(祥兴皇帝)，上述的宋二王，显然是指帝昺，而不是二位宋王——益王昺、广王昺。

㉓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㉔ 《匡山集》第9页上，景炎元年五月“乙未朔益王即皇帝位于福州”，以“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番禺客语》：“卫王袭位，拜(苏)刘义开府仪同三司殿前都指挥使”。《填海录》：“景炎新造之初……(苏)刘义为检校少保节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兼诸路经制镇抚大使，广东西筑应大使”，“明年七月(苏)刘义罢经制等使，免兼殿司”，诸臣“皆未尝法官，惟(苏)刘义以闲官，累加开府”。《崖山志》卷2《苏刘义传》：“丁丑七月”“罢诸使，免兼殿司。”《宋史》卷187兵志，有“殿前司诸班殿前指挥使”，又说“其禁军将校，则有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各一人”。可见行朝禁军，原由苏刘义

主管。

⑳ 参阅下文注㉑。

㉒ 参《元经世大典》平宋条，与元姜大成《二王入闽大略》。

㉓ 帝昶所至的井澳，是包括上、下二岛所组成，亦即“上有深井，下有仙澳，渔舟不往御舟到，风吹御舟力排舛”（明黄瑜《悲井澳》诗，见《香山县志》卷8《艺文志》）。井澳的上面是深井或深井山，在澳门东南的海岛（深井之名并见明谢杰《虔台倭纂》卷上《万里海图》第3页，并见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沿海全图》第55页，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官守篇》，天启元年（1621年）有水兵“分成”“深井”等处。）即今横琴岛。深井或深井山，即仙澳。《香山县志》卷8《艺文志》，有：文天祥《集杜句》诗，说（帝昶）“移次仙澳”。诗前有序，序有注，说：“仙澳即深井山”。仙澳之名，殆与“井澳空传北骑仙”的“仙”有关。（明黄佐《石岐夜泊》诗：“井澳空传北骑仙，乌岩多见南枝鸟。鸟飞仙去杳难寻，木自成乔水自深”。）

㉔ 《宋史》卷451《张世杰传》：“（至元十三年）“（刘）深复来攻井澳，世杰战，却之。”十三年应为十四年（1278年）之误。《庄山集》：景炎二年（1278年）“刘深复袭井澳，张世杰战，却之。”《崖山志》卷6《续志·马南宝传》，二年十二月“元将刘深复袭井澳，世杰力战，却之”。

㉕ 陈仲微《二王首末》：丁丑岁（1277年）十一月“广州城陷，张慎孙死之。大军至，次仙澳，与战得利。”广州城陷在十二月十二日，香山仙澳（井澳）海战，在十二月十八日，《二王首末》系于十一月，误。又《香山县志》卷8《艺文志》诗，文天祥：《集杜句》有序“丁丑（1277年）冬，敌舟来，移次仙澳，与战得利”，原注：“仙澳即深井山。”《香山县志》卷1山川，深井山条：“尝一却元兵于比。”钱士升《南宋书》卷6端宗纪：“井澳”注曰：在“广东香山县南海中横琴山下。”《崖山志》卷3形胜志：“井澳”：“在香山南二百五十里海中，横琴山下，为井澳。”

㉖ 姜大成《二王入闽大略》，见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㉗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㉘ 《崖山志》卷六《续志·马南宝传》。

㉙ 《宋史》卷418《陈宜中传》。

㉚ 姜大成《二王入闽大略》。

㉛ 《元经世大典》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沿海经略使行征南左副都元帅府兵，追昶、桷、世杰等，至广州七洲洋。及之战海洋中，夺船二百艘。获昶母舅俞如珪等”。这是在广州七洲洋海洋中，夺取船只等胜利品。亦简称于“大洋”取胜，《元史》卷132《哈刺解传》：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从攻张世杰于大洋，获其军资器械，不可胜计。”至于在七洲洋获俞如珪，那是刘深追至七洲洋所俘获的（见《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元经世大典》是把上述这两件事合起来叙述的。《新元史》卷161《哈刺解传》：至元十四年“哈刺解复追世杰于七洲洋，获宋主昶之母舅俞如珪。”这句话，有四个错误。第一，刘深以为追昶至七洲洋，不是哈刺解追世杰至七洲洋。第二，七洲洋，《宋史》本纪作七州洋。第三，昶之母舅，应为桷之母舅。第四，俞如珪应为俞如珪。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哈刺解追世杰”。

③⑥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③⑦ 陈仲微《二王首末》。

③⑧ 《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三月乙巳(二十二日)条。广王昺即卫王昺。

③⑨ 参阅《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景炎二年十二月丁丑条。

④⑩ 《宋史》卷243《杨淑妃传》：“卫王昺，俞修容所生也”。

④⑪ 《宋史》卷418《陈宜中传》。

④⑫ 《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关于井澳飓风，亦见载于《宋史》卷418陆秀夫传：“属井澳风”。一般记载，均以十二月丙子(二十二日)井澳飓风，《填海录》却系于十二月丙寅(十二日)(见《崖山集》第13页(上)注)，这是误以十二月十二日陈宜中至虎头山(秀山)中流遇风，作为丙子井澳飓风。

④⑬ 陈仲微《二王首末》丁丑岁十二月条。《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立》二年十二月丙子条。《崖山集》第13页(上)十二月丙子条。《崖山志》卷1帝纪十二月条；卷2《张世杰传》戴璟《(嘉靖)广东通志》卷3行次，景炎二年十二月丙子条。《纲鉴易知录》卷90《南宋纪》，端宗皇帝景炎二年。袁了凡、王凤洲《纲鉴合编》卷37《南宋纪》，丁丑景炎二年十二月。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3《元纪》(一)至元十四年十二月。

④⑭ 《崖山志》卷1《帝纪》。

④⑮ 《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原文系于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丙子，丙子是井澳飓风发作，句余散兵稍稍来集，当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以后的句余日，因此，句余的日期，估计约在明年一月初四或初五左右。

④⑯ “《填海录》云：井澳风大作，舟败，儿溺，复入海，至七州洋(涵芬楼本，误为十州洋，今改正之)，欲往占城，不果，遂驻颶洲。”(见《崖山集》第13页下注引)。

④⑰ 见《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立》；《纲鉴易知录》卷90《南宋纪》，端宗皇帝景炎二年十二月。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3《元纪》，至元十四年十二月。毕沅以执俞如珪于七里洋。

④⑱ 关于景炎帝在沙洲之事，参阅陆秀夫《景炎皇帝遗诏》，文载《崖山集》第3页(上)；并见《崖山志》卷2诏敕与《陆右丞集》。

④⑲ 《崖山志》卷2《苏刘义传》：“陈宜中如占城，刘义不以为是，追之不及而返，夜泊湾头，俄天火正集其舟，延烧甚众。”同书卷3《形胜志》大忠祠：“陈宜中奔占城，刘义不以为是，摆舟追之，不及而返。”

④⑳ 元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陆秀夫传后序》：“宜中之去，(苏)刘义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湾，俄有天火，飞集其舟，延烧众舟几尽。”

⑤①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1广东香山县：“谢女峡，一名仙女澳，亦在县境。”《崖山集》，第13页(上)注：“谢女峡，未详其地，然以井澳视之，则亦海中山也。”《崖山志》卷3《形胜志》：谢女峡“一名仙女澳”。由于《崖山志》把“井澳、谢女峡”合在一块解说，因而容易使人误会。“横琴山下为井澳”，“一名仙女澳”也是指井澳，其实，它是既解析井澳在横琴山下，又解析谢女峡一名仙女澳。仙女澳即上述黄潜《后序》的

仙女湾、井澳的下面，是仙女澳，传说昔有女子六人，“相与飞至”，“人号其处为仙女澳”，（《香山县志》卷10 仙释部，卷1 山川部深井山、井澳条。）仙女澳之名，明清屡有记载，顾祖禹说仙女澳即帝昺舟次所至的谢女峡。

① 陈仲微《二王首末》。

②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4 广东吴川县，罗州废县条。

③ 《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

④ 《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⑤ 《填海录》（见《匡山集》，第13页下注引）。

⑥ 参阅《宋史》卷418 陈宜中传。

⑦ 《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

⑧ 原作庚申，误，兹据《宋史·二王本纪》改之。

⑨ 《匡山集》第14页（上）。

⑩ 姜大成《二王入闽大略》说，香山海战，先胜后败。

⑪ 陈仲微《二王首末》。

⑫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说，张世杰败于广州七州洋，被夺海船200艘。《（道光）香山县志》卷8《事略》认为这里“七州洋即今所称（香山县东）九州洋”。但据（明）暹罗馆通事汪文源所说的，七州洋是在香山县正南（见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1 贡舶（一）第6—7页（道光年间刊本）。）可见《香山县志》认为七州洋即九州洋，除了不应改“七”为“九”之外，尚有方位不合的错误。

⑬ 今《指海》本《粤雅堂》本陈仲微《二王首末》作礪川，但据文天祥《集杜句》诗序，则作礪州（并见《香山县志》卷8《艺文志》诗）。礪川为礪州之刊误。

⑭ 元吴莱《南海人物古迹记》：“大奚山在东莞南大海中，一曰礪州山，有三十六屿……”。《大清一统志》说：“大奚山在新安县南，一名大渔山。《輿地纪胜》：在东莞县海中，有三十六屿，居民以鱼盐为生。《旧志》：大奚山在新安县南百余里，周二百余里，为急水、佛堂二门之障。又有老方山，在大奚山西南大洋中，其周广过于大奚”。

⑮ （日本）《史学杂志》第24卷第9号（大正二年九月号）。

⑯ 许地山《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文载《广东文物》卷六第95—96页。

⑰ 元黄潜《陆秀夫传后序》说：帝昺死于“化之礪洲”，日后诸书，大多据此。由于礪字误为礪字的简写，日后诸书，多作帝昺死在礪洲。礪洲即礪洲之别写，不是礪洲的简写。

⑱ 明曹学佺《天下名胜志·广东名胜志》卷8 高州、吴川县：“升礪州为翔龙县。”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4 高州府吴川县：“翔龙废县，在县南百四十里礪洲上……且王昺立，升礪洲为翔龙县，即此。”

⑲ 参阅上文注⑱。

⑳ 《匡山集》第13页（上）：景炎三年（1278年）正月“张世杰遣将王用取雷州，（王）用败绩。”

㉑ 《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三月乙巳条。

㉒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4 高州府吴川县罗州废县条，时间误为宋景炎二

年,应作三年。

⑦④ 明版之书, 碇洲作碇州。例如: 明曹学佺《天下名胜志·广东名胜志》卷之八, 高州: “碇州, 在(吴川)县南一百四十里, 屹立海中, 当南北道, 乃雷化犬牙之处。宋景炎三年, 端宗避元, 舟次于此而崩, 陆秀夫与张世杰复立帝昺。《填海录》云……因改元祥兴, 升碇州为翔龙县”。(明刊本)。清代刊本, 也有作碇洲, 如《崖山志》卷二《形胜志》碇洲。由于《宋史》、《元史》都刊作碇洲, 诸书皆从而作碇洲。

⑦⑤ 张之洞《广东海图说》碇洲条说: 碇洲“属高州府吴川县阳江碇州营管辖……案: 宋景炎三年, 宋兵屯于碇洲(原注: 即碇洲)。”中华书局本《纲鉴易知录》卷90第2481页, 校者注: “碇洲在今广东吴川县南海中, 今名碇州”。碇州应为碇洲之误。

⑦⑥ 碇: 《玉篇》女交切, 《集韵》尼交切, 从音饶。

⑦⑦ 《纲鉴易知录》卷90《南宋纪》端宗皇帝戊寅三年(1278年)三月: “帝迁碇洲”, 原注: “儼音冈。”

⑦⑧ 见同上注⑦⑥。

⑦⑨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4高州吴川县翔龙废县条。

⑦⑩ 陈仲微《二王首末》: 丙子年(1276年)“文天祥至自行都, 除右丞相。时国方草创, 陈宜中专制, 于张世杰议论不合, 遂不肯拜。”并见《崖山集》第9页下本注。

⑦⑪ 《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立》景炎二年冬十月。

⑦⑫ 参阅上文注⑦⑩, 注⑦⑪, 注⑦⑫。

⑦⑬ 参阅同上注⑦⑫。并参阅《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姜大成《二王入闽大略》。

⑦⑭ 《宋史》卷451《陆秀夫传》。

⑦⑮ 《崖山志》卷五题咏诗赋, 《文天祥诗注》。

⑦⑯ 本文第四节。

⑦⑰ 《宋史》卷47《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丁丑条。

⑦⑱ 《崖山集》第13页上。

⑦⑲ 《崖山志》卷1帝纪景炎二年十二月。

⑦⑳ 以上参阅下文第四节

㉑ 《宋会要稿》蕃夷部占城国条。

㉒ 黄淳《崖山志》卷3《形胜志》七星洋。

㉓ 参阅海南岛渔民苏德柳抄本《更路簿》(一作《水路簿》)。

㉔ 参阅明章演《古今图书编》卷59《古南海夷考略》暹罗国条。并参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1《贡舶》第6—7页。

㉕ 参阅本文第一节。或说刘深袭井澳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 第二天(丁丑)刘深就迫至七州洋执俞如珪。这是对《宋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发生误解。《本末》说景炎二年“十二月丙子, 帝至井澳, 飓风大作, 舟败几溺, 帝惊悸成疾。旬余, 诸兵士稍集, 死者过半”云云, 这是根据《宋史》本纪所载, 没有错; 《本末》接着又提到“元刘深袭井澳, 帝奔谢女峡”云云, 这是指刘深袭井澳以后, 帝又遇风坠水几溺, 帝是才至谢女峡, 所以“帝奔谢女峡”是在丙子飓风后的同一天, 而不是“刘深袭井澳”, 也在丙子。丙子既然是飓风大作, 宋元双方的船只, 各自奔避飓风唯恐不及, 他们是不会在飓风大作的日子里



而展开海战的。《崖山集》对这段事，是这样说的，“丙子，飓风大作，舟败几溺……。刘深复袭井澳，张世杰战，却之，陈宜中如占城，帝舟次于谢女峡”。张世杰井澳却敌是在十二月十八日（见《元经世大典》平宋条，《宋史》张世杰传）。可是陈宜中在井澳却敌之后，还是要奉帝往占城，于是“帝舟次于谢女峡”，时于丙子（二十二日）井澳飓风之后的同一天。《本末》把《崖山集》所说的张世杰井澳却敌这件事和陈宜中欲往占城这件事都删掉，成为丙子“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乍见之下，似乎刘深袭井澳与帝奔谢女峡，都发生在井澳飓风发作的同一天。其实，这是发生在不同日日的两件事。对比之下，这件事还是《崖山集》所载，被删削之处是较少一些。

④ 景炎三年一月，张世杰派兵攻雷州，败绩（见《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立》）。可见一月以前，景炎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后，雷州半岛是在元军控制之下。

⑤ 或据《元经世大典》，说在广州七州洋执俞如珪。但《大典》所说的，不完全可以确定是在广州七州洋执俞以归。因为它是把哈刺剌的左都副元帅府兵在广州七州洋夺囚、世杰等的船二百艘，以及刘深所率领的左都副元帅府兵追至七州洋执俞以归，合在一块儿叙述，都系于左都副元帅府兵所获战功之下，在广州七州洋的战功是由哈刺剌所取得的，在七州洋擒俞如珪以归的战功是由刘深所取得的，二者不同，不可混一。又况，如讲在广州七州洋执俞如珪，显然也是孤证，诸书皆说在“广州七州洋”或“大洋”，打败张世杰，俘获海船200艘，这是一回事；诸书皆说执俞于七州洋或七州山，这又是另一回事；从未见到明确记载于广州七州洋执俞以归。

⑥ 许地山《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文载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中国文化协进会刊行《广东文物》卷6第95页。

⑦ 潘蔚《论九洲石与七洲洋长沙石塘》，文载《文风学报》1948年6月，第2、3期合刊本。

⑧ 谭其骧《七洲洋考》。

⑨ 以上引自《崖山集》第13页下，注。

⑩ 《宋史》卷451《张世杰传》。

⑪ 元姜大成《二王入闽大略》。

⑫ 参阅《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⑬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香山县井澳条。并参阅下文注⑭。

⑭ 参阅上文注⑬。

⑮ 参阅上文注⑬。

⑯ 明黄佐《石岐夜泊》诗：“井澳空传北骑仙，乌岩多见南枝鸟”。（《香山县志》卷8《艺文志》诗）。

⑰ 明黄淳《崖山志》卷3《形胜志》谢女峡：“一名仙女澳。”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二广州府香山县井澳条说：“谢女峡，一名仙女澳，亦在（香山）县境。”《崖山志》原把“井澳、谢女峡”放在一块儿来记述，意思是“井澳、谢女峡（皆）在香山南二百五十里海中。横琴山下为井澳。（谢女峡）一名仙女澳”。《香山县志》、阮元《广东通志》均说深井即井澳；又合并澳与仙女澳为一，误。

⑱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沿海全图》第55页下（道光年间木刻本）。

⑩ 明黄淳《崖山志》卷3《形胜志》井澳：“横琴山下为井澳。”

⑪ 《纲鉴易知录》卷90《南宋纪》端宗皇帝景炎二年十二月“帝奔谢女峡”。1960年中华书局校注本，校注曰：谢女峡“在井澳南”。

⑫ 见同上注91。又《香山县志》卷1《山川》：“小横琴山，下有双女坑。”

⑬ 明黄瑜《思井澳》诗：“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渔舟不往御舟到，风吹御舟力排翥。”（《香山县志》卷8《艺文志》诗。）

⑭ 关于文昌七洲列岛的七洲、七星、七洲山、七星山、七州洋、七星洋，混同于西沙群岛的七洲洋山、七洲洋、七里山、七里洋，另有专文（参阅拙作《七洲洋考》）。

⑮ Jame Horsburgh: Indian Sailing Direction, London, 1841.

⑯ 作者于1977年在海南岛文昌县向渔民们调查，都说七洲都是光秃秃，没有树木的小岛屿。

⑰ 沈鹏飞《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1928年）第66—67页，说：“林岛与石岛。该岛原名，据山琼东籍潮港来（西沙群岛）之渔人所称，林岛为巴岛，石岛为小巴岛。考其‘巴’意，即林之意也。与西名之Woody（意即‘林’——引者）同。”

⑱ 1556年葡萄牙文的黎·铁斯托地图。见A.甘马儿《红海、阿拉伯海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三卷第pl. XXXI图。（引自A.甘马儿《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发现中国和绘制罗盘航海地图》一文，第260页附表，《通报》1944年增刊。）

⑲ 谭其骧《宋端宗到过的七洲洋考》。

⑳ 《厓山集》第11页上。

㉑ 《元经世大典》平宋条。

㉒ 同上注⑳。

㉓ 《宋史》卷471《瀛国公本纪》附《二王本纪》。并参阅上文第一节。

㉔ 《厓山集》第9页（下）景炎帝（昀）即位，以“苏刘义（为）殿前指挥使”。景炎二年七月“苏刘义罢诸路经制镇抚广东广西策应等使，免兼殿司”。《填海录》所载同。

㉕ 《崖山志》卷四，引元黄潘《陆秀夫传后序》云：“宜中之去，刘义追之，不能及，夜泊仙女湾，俄有天火，正集其舟，延烧众舟几尽”。可见有“众舟”没有跟陈宜中奉帝走占城，才被延烧几尽。

㉖ 《宋史》卷187《兵志》禁军上有“殿前司”“殿前指挥使”的记载，并说“指挥各以五百人为率”。苏刘义原任“殿前指挥使”（《厓山集》第9页下），景炎二年七月罢免之。谁继任殿前指挥使，未详。十二月二十二日（丙子）帝昀至井澳遇飓风，旬余口后，收集散兵，死亡十之四、五（《宋史》卷47《二王本纪》）。估计殿前指挥使亦率五百人，则遭遇飓风死亡十之四、五，损失二百人至二百五十人，剩下二百五十人至三百人，就是帝昀等由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所能带走的士卒。

㉗ 现在西沙群岛有水井的岛屿，计有：永兴岛，有井十余口，可作洗涤用，不能作饮食用水；西沙洲，挖沙为穴，可得淡水，以供食用；石岛，有水井一口，不能食用；东岛，有水井数口，水量充足，可供食用，又有一个淡水泉，可供食用。金银岛，有淡水，可食用；甘泉岛，有水井两口，淡水水质良好；珊瑚岛，有淡水井一口，水质也不坏；深航岛，有水井一口，不能食；广金岛，也有水井一口；中建岛，挖沙二、三尺深，可得淡水，以供

食用。

⑭ 例如泉州出土宋代古船，其第三舱，是个相当大的贮水仓，所以船舶在海中，也不是一下子就缺淡水。

⑮ 《匡山集》第3页下《诏敕》类《景炎皇帝遗诏》；黄淳《崖山志》卷2《诏敕》条《景炎皇帝遗诏》。《陆右丞集》，所载同。

⑯ 九乳螺洲，名见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30“从屯门山，用东（北）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九乳螺洲即今西沙群岛，见《人民日报》1980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乳螺，其背凸出，有如乳钉。九乳螺洲，即九个凸出于海面上有如乳钉那样凸出的小岛。

⑰ 《宋史》卷449《注辇传》，三文行程。

⑱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十一月初二日《总督广东广西等处杨应琚题本》：“题报没来由（Melayu，即马来亚）等国船只被风飘至万州九洲洋面依例外国船只被风飘至内地者资遣回罔由”。（抄件）。

⑲ 见同上注⑱。

⑳ 见同上注⑱，注⑳。

㉑ 历代记载香山县之东的九洲洋或九星洋，从未见到曾与七洲洋或七星洋互混，例如：唐贾耽《广州通海夷道》的“九州石”（见《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宋《历代地理指掌图·唐十道图》的“九州石”；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3《海防考》的“九星洋”；明谢杰《虔台倭纂·万里海防图》的“九洲”，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沿海全图》的“九州洋”；《乾隆五十五年七省沿海图》的九洲洋，印光任《澳门纪略》卷上《形势篇》引薛颺《澳门记》的“东望则九洲洋”；梁廷枏《粤海关志》卷28夷商三的“九洲洋”，都没见过有出现讹“九”为“七”的写法。此外，阮元《广东通志》、《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同治元年《广东图》、光绪二十三年《广东舆地全图》，在这些地图上，均在香山之东，绘有九星洋。清庚子年陈寿彭译《新译中国沿海险要图志》，在香山县之东、澳门之东北，绘有“九星洋”。不但未曾有过误九星洋为七星洋，而且都把九星洋位于香山县之东、澳门之东北，它不同于香山县西南之九星洋，显而易见。

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第二稿

## 元代“四海测验”中的中国疆宇之南海

韩振华

元朝自从至元十三年(1276)打入南宋首都杭州后,全国统一局面已成,就有意于从事一项改历工作,并设立太史局,后来改为太史院,主持改历之事。历法首先注重实测,要在全国南北各地测验晷景,取得数据,才能给修改历法有所依据和资助。至元十六年(1279年)春,南宋赵昀败亡崖山<sup>①</sup>。消息传来之后,元世祖乃敕令郭守敬“抵南海测验晷景”<sup>②</sup>,其余各处观测点的监候官,亦皆分道面出<sup>③</sup>。由于南海是这一次南北立表远地观测的“四海测验”的起点,又是以大都为中心的南北子午线<sup>④</sup>的我国疆宇之所在处,元世祖乃敕令郭守敬亲自“抵南海”主持实测。尽管任务重、时间迫,郭守敬还是胜利地完成这项任务,以后又负责編集其他各地送来的测验晷景的资料,终于在元至十七年冬至,完成改历工作,编出新历法的《授时历》,明年,颁行于全国。

郭守敬所“抵南海”是在南海东部,今黄岩岛(东经 $117^{\circ}45'$ 、北纬 $15^{\circ}08'$ )及其海面;当时太史院另一派的守旧者之流,他们心目中的南海还是沿袭前朝认为它是在“南逾朱崖”(海南岛)以南的北纬 $15^{\circ}$ 左右,这是指南海西部当时占城外罗山(东经 $109^{\circ}07'$ 、北纬 $15^{\circ}22'$ )及其海面作为“以域华夏”的“分水”洋,作为南海,自宋元以来,以至明清,历来如此<sup>⑤</sup>。

本文旨在阐明元代我国疆宇的南海,通过实测,证明它的东部是在今中沙群岛东之黄岩岛——东经 $117^{\circ}45'$ 、北纬 $15^{\circ}08'$ ,它的西部是在与外罗山(东经 $109^{\circ}07'$ 、北纬 $15^{\circ}22'$ )交界于海上的分

水洋,所谓“南逾朱崖”的南海,就是指此而言。我国疆宇的南海,其东、西二部的起迄点,就是以今黄岩岛和外罗山附近的海面作为分水洋,自从元代在全国举行“四海测验”以后,一直被以后的明、清两朝沿用下来。

### (一)元代在全国疆宇内举行“四海测验”

至元八年(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大元,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sup>⑤</sup>。刘秉忠生前(死于1274年)曾建议修改《大明历》<sup>⑥</sup>。十三年(1276年),元兵攻破南宋首都杭州,统一局面,呈现眼前,所谓“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刘秉忠之言),修改《大明历》,乃于“是岁(1276年)立局,改治新历。”<sup>⑦</sup>十五年(1278年)“始立太史院,秩正三品,掌天文、历数之事”,“院置太史令等官一员。”<sup>⑧</sup>自设局到改院,都是由忠宣张文谦、枢密张易,“为之主领裁奏于上。左丞许衡,参预其事”,而郭守敬“与赞善王公(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于下”<sup>⑨</sup>,王“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许)衡领之,乃以(许)衡为集贤(殿)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sup>⑩</sup>。在改历过程中,出现了“王恂总算”“郭守敬推测,司徒(许)衡明历理”<sup>⑪</sup>的局面。负责实际工作的郭守敬等,经常受到这一批只知什么义理、历理的许衡之流的挑剔和非难。简单举个例子,郭守敬注重测验夏至,而许衡偏又主张注重测验冬至<sup>⑫</sup>。自从至元十三年设局以来,都是以冬至作为测验之主<sup>⑬</sup>。因为许衡“领太史院”,总要听他的。当然,测验冬至,也未始不可,不过在实测过程中,冬至昼长最短,会造成实测中的一些不方便。最为食古不化,莫如在实测地点的地名上,偏要采用不是当代地名,而是专门用了古代地名,如铁勒,以及既偏且怪又易误会的地名,如衡岳和岳台。更主要的,郭守敬主张在实测中,“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sup>⑭</sup>,简言之,在各

实测地点一定要掌握和得出上述这三项的数据。可是,许衡之流,却在“四海测验”中,只强调得出北极出地这一项的数据,其余二项,全都撇开。因此,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朝“四海测验”,就有很明显地分为二类。第一类是“先测”(优先测得)的七个选点,即自南海至北海的六个选点和大都这一个选点,包括北极出地的高低、夏至晷景长短、和夏至昼夜长短的时刻这三项数据。第二类是“继又测得”自上都至琼州等二十个观测点,只有得出北极出地高低不同这一项目的数据,其余二项,概付阙如。综合第一、第二类,全国当时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sup>⑭</sup>。于是乎许衡之流,洋洋得意,溢于言词之中,至于为何没有按照元世祖批准的郭守敬在远方测验所欲求得三项数据的原议,在此避而不谈。如果按照郭守敬的原议,“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sup>⑮</sup>。也就是在夏至这一天,取天顶与黄道垂直的一条直线,并在这一条垂直线上的南、北,共选六个观测点,各立表测景。结果,选择六个观测点——自南海至北海这六个点,就足够代表其余了。这就是郭守敬亲自主持并亲抵南海的远方立表测验<sup>⑯</sup>。

## (二)经、纬度的推算与南海的经、纬度

夏至这一天是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太阳刚好在北回归线上(北纬 $23^{\circ}27'$ )的天顶上。如果在夏至这一天,在与黄道垂直的直线上,或者在与赤道构成 $66^{\circ}33'$ 角分的交角,并沿着这一条交角线上,在各不同纬度的地方,或按照二地相距各一十度(北极出地的度数),并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由南到北的几个选点,这样,就构成了元朝远方测验的六个选点(由南而北)。先选定当时中国的南海,在北极出地一十五度。然后按照各距北极出地一十度,再在上述这一条交角线上,选择南海以上的各个选点,一直到北海为

止——它在北极出地六十五度。在实测工作中，要如何在夏至这一天的地面上，沿着与赤道构成  $66^{\circ}33'$  这一条交角线去选择各个选点<sup>⑩</sup>，这项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由于当时已经有了地球仪，可借助于地球仪来帮助选择这一条交角线（与黄道垂直的交角线）。利用夏至晷景求得北极出地高度，这不是郭守敬的功绩，在他以前的千、百年，中国人早已利用它了<sup>⑪</sup>。不过，他在测量仪器的圭表，改用了放大五倍的圭表，从原来的八尺表，改为四丈表，使误差也减少了五分之一<sup>⑫</sup>。他又用“景符”窥测日中（日的中心），而不象过去只窥测日的边缘<sup>⑬</sup>，这样一来，有了大型圭表与精密景符，使测量晷景的精密度，又提高了一步<sup>⑭</sup>，对比起来，郭守敬对沿着与赤道构成  $66^{\circ}33'$  交角线上的各地，亦即在同一子午圈夏至由日出至日中的相差时刻，找出相当于二地的里差<sup>⑮</sup>（或相当于今天的经度）<sup>⑯</sup>，这才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

下面，我们把郭守敬亲自主持并亲自躬身参加到南海去测验晷景，并依照他所得的数据，折换相当于今天的经、纬度，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次元朝举行在全国南北立表的远方实测，其精密度相当高，经度误差，在一度内外至二、三度，纬度误差，多在一度以内。比起五百年后的清朝有西洋人参加的全国实测，其经度误差有时候在一度左右，对比之下，那是毫无逊色。

元朝“四海测验”，“先测”七个选点，记录下来各观测点的三种数据，即：北极出地高度，夏至晷景长短，夏至昼夜长短的时刻多少，如今都可以由此推算相当于今天经、纬度是多少度。下面诸表，可以作为各观测点所在处相当于今天经、纬度的参考。

### 1. 经度的推算

关于经度，早在郭守敬以前，耶律楚材就解决了有关经度这一个问题，并由道士长春真人在蒙古克鲁伦河一带对 1221 年那一次

日蚀和该年夏至晷影尺寸长短作了实地测验<sup>⑧</sup>。这就大大促进了通过对日、月蚀在各不同经度之处的实测，就有先后时间的不同，这也叫做“里差”<sup>⑨</sup>。此外，阿拉伯人所传入的地球仪<sup>⑩</sup>，也更加丰富了中国人对东西经度的认识<sup>⑪</sup>。在上述郭守敬主持的“四海测验”当中，他要求注意三种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各监候所在测验时要注意“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利用各地所见日、月蚀的时间迟早，测出各地的经度位置不同。但日蚀的日期和出现在地面上某一个固定范围，以当时的条件和水平是较难预先十分确定的，但月蚀就较容易在地面上看到，大约每一沙罗周期（18年又11月）有月蚀29次<sup>⑫</sup>，平均每一年有一次多的月蚀。日后，在中国多有利用月蚀来测定当地的经度，据阮元《广东通志》和《琼州府志》说：“欲定东西偏度（即今经度），必于两地同测一月食，较其时刻，若早六十分时之二，则为偏西一度，迟六十分时之二，则为偏东一度”<sup>⑬</sup>。亦即东西360°的经度，时间相隔4分（60分一小时，24小时一天）便是经度一度。由于利用量天尺<sup>⑭</sup>来测量北辰星高度，只要不是昏晦之夜，可以随时随地测出该处北极出地多少度，再折算纬度；利用月蚀测出该处东西距离的经度有多少度，就不是那么便利，显然要受到月蚀次数的限制。所谓“南北经度（指今纬度）易测，东西纬度（指今经度）难知”<sup>⑮</sup>，正此之谓。现在《元史》所保存的“四海测验”的二十七个观测所所记下的资料，就没有记下日、月蚀的资料可供推算经度，日蚀不易见到，这是可以理解的，月蚀资料也没保存下来，看来利用各地所见月蚀迟早，来计算各地相距的经度，这项工作郭守敬是注意到，但未被派出去的各监候官的坚决支持与执行，因此“四海测验”有关月蚀可推算经度的资料，就没有保存下来。但郭守敬却很注意测验各地在夏至这一天的日出、日没的时间长短。由此，可以比较二地日出至日中的时间迟早，从而推算二地的“里差”多少刻，由此可以折换今天经度多少度。我们



今天能够利用元代“四海测验”所保留下来有关昼长夜短的几个数据并较为准确地推算南海等处的经度位置，这些都与郭守敬在天文、地理方面的伟大贡献和功绩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地球自转，产生昼夜，还有绕太阳的公转，产生四季的变化。自转轴与公转轨道面并不是垂直的，它有 66 度 33 分的交角。这样一来，在一年中太阳相对地球的位置也在不断变化，夏季太阳走到北半球，夏至这一天是在北回归线上，即在北纬  $23^{\circ}27'$ ，冬至则反之，在南回归线上，即在南纬  $23^{\circ}27'$ ，而春分、秋分，太阳恰好在赤道的顶上。如果在夏至这一天，选择了与赤道构成  $66^{\circ}33'$  交角线上的六个点，每点之间各为互相距离北极出地一十度的话（即各距  $9.8562^{\circ}$ ）<sup>⑧</sup>，由于这六个点都在同一个子午圈上，它们同时看到日出，可是，由于地球自转，把它们转到同一个子午圈中心，所经过的时间，就有迟、速或长、短之不同，北纬的纬度越高，跑的时间就要较迟或较长，反之，北纬的纬度越低，跑的时间就是较速或较短。如今在“四海测验”中，记录了自南海至北海这六个点的夏至昼长时刻，半之，则为各点自日出至同一子午圈中心的时刻。比较前后二点自日出至同一子午圈中心的时间差，再按照历时 4 分为经度 1 度来计算，就可以得出上述这六个点各自的经度。夏至昼长的资料，来自（1）元代实测夏至昼长的数字；（2）由夏至晷景推算夏至昼长；和（3）由北极出地高度推算夏至昼长<sup>⑨</sup>，下面表一、表二、表三（见页 93—94），就是依照上述来自三种夏至昼长的资料来推算它的经度。

## 2. 纬度的推算

有关“四海测验”纬度的推算，可分为三类，一为由北极出地高度以每一度折合  $360^{\circ}$  制的  $0.9856^{\circ}$  去计算其纬度。次为由夏至晷景长短，按照公式（1）和公式（2）去计算其纬度<sup>⑩</sup>。三为由大约在同一子午线上的南北距离每一度以 351.266 里计算，并由夏至立

表一：由夏至实测昼长推算南海等六个先测选点的经度表

元代地名	元代实测夏至昼长	同一子午圈前后二地日出时间差	推算相当于今天的经度	拟定今地		误差
				地名	经度	
南海	五十四刻	○	117.75°	黄岩岛	117.75°	○
衡岳	五十六刻	1刻	114.15°	广东古衡州 (今英德大罗山)	113.1°	-1.05°
岳台	六十刻	2刻	106.95°	陕西岳山	107.5°	+0.45°
和林	六十四刻	2刻	99.75°	和林山 昔刺·斡儿朵	101°	+1.25°
铁勒	七十刻	3刻	88.95°	古高车今新 库兹涅茨克	87°	-2°+
北海	八十二刻或 (八十八刻)	6刻 (9刻)	67.35° (56.55°)	乌拉尔山 人民峰	60°	+3°半

表二：由夏至晷景推算南海等六个先测选点的昼长和经度表

元代地名	夏至晷景	推算昼长	前后二地在同一子午圈日出至日中相差时间	推算经度	拟定今地		误差
					地名	经度	
南海	一尺一寸六分	54.1刻	○	117.75°	黄岩岛	117.75°	○
衡岳	表端无影	56.5刻	1.20刻	113.43°	广东古衡州 今英(德大罗山)	113.1°	-0.33°
岳台	一尺四寸八分	60.0刻	1.75刻	107.13°	陕西岳山	107.5°	+0.37°
和林	三尺二寸四分	65.4刻	2.70刻	97.41°	和林山 昔刺·斡儿朵	101°	+3.19°
铁勒	五尺一分	73.1刻	3.85刻	83.55°	古高车 今新库兹涅茨克)	87°	+3°上
北海	六尺七寸八分	87.4刻	7.15刻	57.81°	乌拉尔山 人民峰	60°	+2.19°

表三：由北极出地推算南海等六个先测选点的夏至昼长和经度表

元代地名	北极出地	推算夏至昼长	同一子午线口出和差时间	推算相当今天的经度	拟定今地		误差
					地名	经度	
南海	一十五度	54 刻	○刻	117.75°	黄岩岛	117.75°	○
衡岳	二十五度	56.8 刻	1.4 刻	112.71°	广东古衡州 (今英德大罗山)	113.1°	+0.4°
岳台	三十五度	60.1 刻	1.85 刻	106.05°	陕西岳山	107.5°	+0.45°
和林	四十五度	64.5 刻	2.2 刻	98.13°	和林山 昔剌·斡儿朵	101°	+2.87°
铁勒	五十五度	71.4 刻	3.45 刻	85.71°	吉离车 (今新库兹涅茨克)	87°	+1.3°
北海	六十五度	87.3 刻	7.95 刻	57.09°	乌拉尔山 人民峰	60°	+2.91°

八尺表其晷景 4 寸为一千里，去计算它的北极出地高度或相当于今天的纬度。下面表四、表五、表六（见页 95—97），就是推算出来各观测地的纬度及其误差，一般误差，都在 1° 以内。

### 3. 由大都—南海这一条子午线推算南海的经纬度

至元十四年三月庚戌，元世祖“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历河南府，抵南海，测验晷景”。为了实现远方测验，他由上都、大都、历河南府路，终于抵达南海。原来地中子午线，是以地中的河南府阳城为地中，如今全国统一，应以元朝大都（北京）为中心，另选一条以北京为中心的子午线。这样就有二条由北而南的子午线，亦即以今东经 116 度余的元朝大都（今北京）作为南北子午线，这是一条新的子午线，原来的子午线是以地中的河南府的阳城作为中心，它在今东经 113°。新的子午线北自大都，南止南海，相隔纬度将近二十五度，距离将近三千公里，而其误差，仅为经度 1° 余（1.3°）。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等到公元十八世纪清朝有西洋人参加的全国实测，其经度误差，仍在一度左右，亦即在郭守敬以后

表四：由北极出地推算南海等地的纬度表

元代地名	北极出地	推算纬度	拟定今地		纬度误差
			地名	纬度	
南海	一十五度	14°48' (14.784°)	中沙群岛 黄岩岛	15°08'	+21'
衡岳	二十五度	24°38' (24.64°)	广东占衡州 (今英德大罗山)	23°54'	-34'
岳台	三十五度	34°30' (34.496°)	陕西岳山	34°	-30'
和林	四十五度	44°21' (44.352°)	和林山 昔刺·斡儿朵	46°	+1°39'
铁勒	五十五度	54°13' (54.208°)	古高车 (今新疆兹温茨克)	53°30'	0°43'
北海	六十五度	64°04' (64.064°)	乌拉尔山 人民峰	65°	+56'
大都	四十度太强	40°15'	北京	39°54'	-21'
上都	四十三度少	42.6288° (42°37')	内蒙多伦西北	42°10'	-28'
北京	四十二度强	42.504° (42°30')	辽宁宁城	41°45'	-15'
益都	三十七度少	36.7136° (36°43')	山东益都	36°40'	-3'
登州	三十八度少	37.6992° (37°42')	山东蓬莱	37°50'	+8'
高丽	三十八度少	37.6992° (37°42')	朝鲜开城	38°	+18'
西京	四十度少	39.6704° (39°40')	山西大同	40°06'	+26'
太原	三十八度少	37.6992° (37°42')	山西太原	37°50'	+8'
西安府	三十四度半强	34.1264° (34°07')	陕西西安	34°14'	+7'
兴元	三十三度半强	33.1408° (33°08')	陕西汉中	33°05'	-3'

续表

元代地名	北极出地	推算纬度	拟定今地		纬度误差
			地名	纬度	
成都	三十一度半强	31.1696° (31°10')	四川成都	30°40'	-30'
西凉州	四十度强	39.5472° (39°32')	甘肃武威	38°	-1°32'
东平	三十五度太	35.2352° (35°13')	山东东平	33°55'	-1°18'
大名	三十六度	35.4816° (35°28')	河北大名之南	36°20'	+52'
南京	三十四度太强	34.3728° (34°22')	河南开封	34°48'	+26'
河南府阳城	三十四度太弱	34.1264° (34°07')	河南登封告成镇	34°24'	-17'
扬州	三十三度	32.5248° (32°31')	江苏扬州	32°25'	-6'
鄂州	三十一度半	31.0464° (31°03')	湖北武昌	30°30'	-33'
吉州	二十六度半	25.9744° (25°58')	江西吉安	27°06'	+58'
雷州	二十度太	20.4512° (20°27')	广东海康	20°54'	+27'
琼州	一十九度太	19.4656° (19°28')	广东琼山	20°	+32'

附注：度以下的名称及其数值：

弱=0.125 度       $365\frac{1}{4}$  度制 1 度=100 分

半=0.5 度      或 1 度=360° 制 0.985626283°

少=0.25 度

强=0.125 度      360° 制  $1^\circ=365\frac{1}{4}$  制 1.014583 度

少强=0.3125 度

半弱=0.375 度

半强=0.625 度

太=0.75 度

太强=0.875度  
 太弱=0.625度  
 小弱=0.1875度

表五：由夏至立八尺表晷景推算南海等六个先测选点的纬度

元代地名	夏至晷景长度	推算纬度	拟定今地名	纬度	纬度误差
南海	一尺一寸六分 (景在表南)	15°02′	中沙群岛黄岩岛	15°08′	+6′
衡岳	表端无景	23°49′	广东古衡州 (今英德大罗山)	23°54′	+5′
岳台	一尺四寸八分	34°18′	陕西岳山	34°	-18′
和林	三尺三寸四分	45°52′	和林山 青刺·斡儿朵	46°	-83′上
铁勒	五尺一分	55°53′	(古)高车 (今新库兹涅茨克)	53°30′+	-2°23′
北海	六尺七寸八分	64°07′	乌拉尔山人民峰	65°	+53′

表六：由夏至立八尺表晷景千里四寸推算南海、衡岳的纬度

元代地名	夏至晷景	南北二地相距里数与天文纬度	已知该地纬度	求得北极山地高度或纬度	拟定今地名纬度	纬度误差
大都	二尺四寸七分 (景在表北)	9100里	39°54′			
南海	一尺一寸六分 (景在表南)	或25.90度		14.969度 或14°45′	中沙群岛 黄岩岛 15°08′	+33
地中 (阳城)	一尺五寸 (景在表北)	3700里	34°10′			
衡岳	表端无景	或10.675度		24度 或23°39′	广东英德 大罗山 23°54′	+15′

的五百年间，对经度的测验，还停留在郭守敬时代的水平。可见，元朝“四海测验”的大都-南海这一条子午线，对当代和以后五百年来说是具有多么不平凡的高水平。

旧的子午线以河南府阳城为地中的南北子午线的中心，新的

子午线以大都(北京)为中心,如今利用已知夏至晷景千里四寸以及已知南北相距 365.266 里为天文缠度一度(折合 360°制为 0.9856°),可以计算与大都(北京)大约同在一条子午线上的南海的纬度,同样地,也可以计算与地中的阳城与它大约同在一条子午线上的衡岳的纬度(见表六)。

推算结果,南海在北纬 14°15',与所拟定南海今地在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即北纬 15°48',纬度误差+33',也是在误差一度为允许范围之内。由于把大都-南海视为同在一条子午线上,因此,大都的经度,也就是南海的经度。大都(北京)在今东经 116°24',南海拟定今地为黄岩岛在今东经 117°45',经度误差为-1°21',不算太大的误差。

### (三)地名考释

#### 1. 南海:

元代南海,有指广东面对的大海—南海,即以前的涨海<sup>⑳</sup>;有指面对南海的最主要都市—南海,即今广州<sup>㉑</sup>。元代“四海测验”中的南海,不是指广东的广州。讲它是广州,那是错误的<sup>㉒</sup>。它是指我国的南海,其海域自北极出地一十五度(将近现在北纬 15°)以上,就是我国的南海海域,自元代至明清,历来如此。自从元郭守敬实测南海的地理位置之后,中外咸以一十五度以上为中国的南海<sup>㉓</sup>,尤其是常把日后“东西洋”的西洋航道的我国南海,定为北纬 15°左右,至于南海东面所至之处,究止何处,这就比较少见提到。

相当于将近今天北纬 15°以上的南海,其东、西海域,颇为辽阔,是否可以获知其东面起自何处?答案是可以获悉的。郭守敬亲自到远方测验的南海,它的相当于今天纬度是很清楚的,除了直接观测南海这一个观测点的北极出地高度之外,还可以从它在夏

至晷景的尺寸以及夏至昼长的时刻，来推算南海的纬度。至于相当于今天的经度，也能够从郭守敬所实测的南海昼长时刻来推算它的经度。同时，从南海的北极出地高度与夏至晷景尺寸也可以推算南海的纬度，再由夏至纬度推算它的经度。推算的结果，南海这个观测点，应在今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它的推算后的经、纬度是东经  $117.75^{\circ}$ 、北纬  $15.13^{\circ}$ （参阅上文诸表）。

至于南海西面所止之处，据《元史·天文志·总序》，所谓“南逾朱崖”（南面超过海南岛），是指“四海测验”中的南海西面即“南逾朱崖”的南海，这里应指中国与占城（今越南中部）“以域华夷”的分界——“分水”洋，在北纬  $15^{\circ}$  余、东经  $109^{\circ}$  左右的外罗山附近，也就是北极出地一十五度的南海之西部<sup>④</sup>。

郭守敬亲自“抵南海”，是取道日后东西洋的东洋航线，才能抵达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南海东面，并以它作为我国南海的东面界限的起点。他又以东洋航线的南海——黄岩岛，作为北与大都（今北京）的南北子午线的南面起点（这一条子午线，误差约为现今东经一度二十一分）。郭守敬对耶律楚材所提的东、西“里差”<sup>⑤</sup>，作了一次远距离大规模的实测，自此以后，并把大都（北京）时间<sup>⑥</sup>，固定作为全国统一时间。<sup>⑦</sup>从此，可以按照与大都的时间差，求得各地“里差”，“东则加之，西则减之”，但其相当于今天的经度，却从郭守敬的实测夏至昼长时间完全可以推算出来了。它不必利用大都作为时间差的依据<sup>⑧</sup>，这是郭守敬的一件伟大功绩，应加倍重视之、发扬之。为什么郭守敬不辞千里迢迢，亲身抵达南海，求得夏至晷景与夏至昼长的实测资料，原因亦在于此。

至于“南逾朱崖”（海南岛）去测验南海的北极出地高度，中国历来就注意这方面的测验，唐一行、南宫说的南北立表测验，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一<sup>⑨</sup>。

《元史》“四海测验”的南海，为北极出地一十五度，但《元史》又



说“极浅十五，林邑界也”<sup>④</sup>，南海西面，正如上文所说的，历来传统，是以与林邑或占城为界的北纬 15° 左右作为中·外的海界，在北纬 15° 余、东经 109° 余的外罗山（今越南广东列岛）附近一带的海面，直至明代还是作为“以域华夷”的“分水”洋<sup>⑤</sup>。元代“四海测验”中的南海西面，亦即《元史》所说的“南逾朱崖”（海南岛）的南海，就是在外罗山附近的分水洋。由于西洋航线早为中国人之所熟悉和见用，有关西洋航线的南海，亦即“南逾朱崖”（海南岛）的南海，郭守敬就没有亲自去那里的必要了，他把重点放在黄岩岛的南海，是很有道理的。

自从元朝把中国疆宇的南疆，亦即南海，把其东部定于相当今天北纬 15°08'、东经 117°45' 的黄岩岛，之后，一直到了十六、十七世纪西洋人东来以后，仍旧把黄岩岛作为中国的南海，据十八世纪初两张描绘西洋人所制的亚洲地图的中文地图<sup>⑥</sup>，图中，在相当于黄岩岛的位置上，有一个中文译音的地名，曰：猫士知马升禺洛或猫士知马升愚洛，此名即葡文 Mar Sud, Masinaru 或 Mar S.de Masinaru，意即“南海，大中国”或“大中国的南海”。当葡人初来中国之时，中国常被称为 Sin 或 Masin<sup>⑦</sup>，于是，在早期葡萄牙的世界地图，便出现 Sinaru（升禺洛）此名，以称中国。<sup>⑧</sup>，-aru 是语末变化，语极是 Sin 或 Masin。当然，也可以用 Masinaru（马升禺洛），以称大中国。葡文 Mar，意曰海，可译为猫，闽南人译语，常用猫字作外文 Ma(r) 的对音<sup>⑨</sup>，-r 音末，中文译音，亦常省略<sup>⑩</sup>。葡文 Sud，亦可简写作 S. 其意均曰南，中文译音可作“士知”或“士”（“知”可作 Sud 的-d 的对音，亦可作为葡文转接词 de 的对音），“知”字闽南方音读如 de。这张地图是泉州人施世驃译制或由他请人译制，中文译音地名，多用闽南方音，自不足怪。此外，在上述地图中，尚有猫士知无呢老，此名应为葡文 Mar Sud, Bolinao 或 Mar S.de Bolinao 的中文译音<sup>⑪</sup>，意曰“南海无呢

萼”(在吕宋岛西北部,今译博利瑙)或“无呢萼的南海”,应指今博利瑙岬及其附近的海面,是属于博利瑙的南海,有如猫士知马升禺洛(“大中国的南海”),是属于大中国的南海那样的。猫士知无呢萼在北纬 $15^{\circ}25'$ 、东经 $120^{\circ}$ 左右的博利瑙岬及其附近的海面,位于猫士知无呢萼的西南不远的猫士知马升禺洛,即“大中国的南海”或“南海,大中国”,这里的南海,如拟为位于博利瑙西南不远的北纬 $15^{\circ}08'$ 、东经 $117^{\circ}45'$ 的我国南海诸岛中的黄岩岛,方位正合。元代郭守敬亲自到南海,即亲自去实测夏至晷景与昼长的南海,就是在今黄岩岛。我们已从郭守敬所得出的有关数据(参阅上文诸表),推算、折换相当于今天的经纬度,一一皆与今天黄岩岛的经纬度,可以符合。可见自元代“四海测验”以后的南海,亦即其东面以黄岩岛作为起点的南海,已经受到中·外舆图之所承认,“南海,大中国”或“大中国的南海”(“猫士知马升禺洛”),可为其证。

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外名斯加布罗滩,亦名马罗俄那(Maroon),1648年9月12日夜里,斯加布罗号的船,触沉于此,故名。它是一个危险的石礁,位于马恰力士非尔特滩(Macclesfield Bank即中沙群岛)至吕宋岛海岸之间的中途站。由该滩的北端至其中部,大约东、西约有九英里半,南端全部都是陡礁,近礁石之处,均未探测水深,有几块礁石是露出水面上,并分布于该滩之各部。1800年4月由马尼拉的西班牙海军上将派遣一只帆船巡洋舰到那里去调查,发现它的南北有 $8\frac{3}{4}$ 英里,在东经 $15^{\circ}04'$ 、北纬 $15^{\circ}12\frac{3}{4}'$ ,它的东部是在马尼拉之西 $3^{\circ}6'\frac{3}{4}'$ ,它的西部是在马尼拉之西 $3^{\circ}16'\frac{1}{4}'$ ,这是由计时器测量出来的;由卡庞士角(Point Capones)与它的最近距离是131海里。由此,获悉它的中心点是在东经 $117^{\circ}48\frac{1}{2}'$ ,而卡庞士角是在东经 $120^{\circ}03'$ 。同一年10月20日,施连西士特尔号(Cirencester)的T·罗伯逊船长(Capt. T. Robertson)经过该滩,用计时器测量,它距离普洛·斯

巴株(Pulo Sapata 即草鞋石)岛之东  $8^{\circ}47'$ , 即东经  $117^{\circ}49.5'$ <sup>⑤</sup>。如今, 它是在东经  $117^{\circ}45'$ 、北纬  $15^{\circ}08'$ , 位于中沙群岛之东约 160 海里, 它“是一个近似三角形的环礁, 长 10 海里。边缘峻峭, 浅湖水色清绿。在礁盘上有巨大珊瑚礁分布, 呈大石柱状, 远远可见, 最高者称为‘南石’, 高出海面一点八米, 位于环礁的东南面。南面的北侧附近有入口, 宽约 360 米, 平均水深 9 至 11 米。南面北侧的通道上有礁头分布。在礁头处水深只有二点七米。黄岩岛四周是深海区, 水深在 3500 米以上, 黄岩岛似一巨大的珊瑚礁岩柱, 由 3500 至 4000 米水深的海盆底直伸到海面。”<sup>⑥</sup>

## 2. 衡岳

衡岳: 一般上, 湖南的南岳衡山, 是众所周知的名山大岳, 元代“四海测验”中的衡岳, 是否即为湖南衡山? 我认为“衡岳”不是湖南的衡山, 从其纬度来看, 湖南衡山在今北纬  $27^{\circ}$  余, 而衡岳的纬度, 只有  $23^{\circ}$  余或  $24^{\circ}$  余, 相差  $3^{\circ}$  余至  $4^{\circ}$  左右。综观元代“四海测验”二十七所观测地点的北极出地高度, 其相当于今天的纬度, 误差均在  $1^{\circ}$  以内, 如今其误差突然在  $3^{\circ}$  余至  $4^{\circ}$  左右, 显然考订今地有误, 衡岳非今湖南衡山, 于兹可见。

古代地名的衡州, 除了在湖南的衡州, 有衡山之外, 广东的衡州, 也有衡岳之称。昔时, 在广东以衡州为名者, 有: 南衡州的韶关, 东衡州的始兴, 以及衡州的英德<sup>⑦</sup>。广东的衡州, 也可以因其“山高而尊曰岳”(《尔雅》), 故称衡岳, 据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说: 广东, “北据五岭, 其名山则有罗浮”山, 又引《名山记》说: “罗浮山有洞, 周五里, 道书以为朱明洞天。十大洞天之一也。潜通勾曲, 上有分水屿, 谓之泉源福地。山经五岭, 拥从衡岳如君, 而罗浮杰出, 为之佐命”<sup>⑧</sup>。过去, 总认为广东的罗浮山脉, 是经过粤北一带的五岭绵延南下, 直至博罗、增城附近, 中间经过昔时所谓的衡州一带<sup>⑨</sup>。所谓罗浮山脉的衡岳, 就是指昔时衡州一带的“山高而尊曰岳”的

衡岳。昔时衡州的英德有尧山,据晋王韶之《始兴记》说:尧山相传乃是“尧南巡登此”<sup>⑩</sup>,又据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说:“尧山盘纒数百里”<sup>⑪</sup>,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说:尧山“山高四千丈”,比起罗浮山“其山袤直五百里”,高三千六百丈<sup>⑫</sup>,是高了四百丈。这是道家者流,有意夸张,由于历来把广东的衡岳(即在广东古衡州的尧山),当为罗浮山脉最高的山峰,于是把衡岳当做君王那样高高在上的帝尧之山来看待,在专解洞天福地的道家之流看来,衡岳或尧山就是堪輿家们心目中在广东最为高大、至尊的山狱,于是乎“衡岳如君”之言,或尧山“山高四千丈”之言,乃见乎纸上,把衡岳背后一大群山岭的五岭,说成是一群“拥从”者,把比衡岳稍为低一点所谓山高三千六百丈(这也是夸大之词)的罗浮山,说成有如一批为君王佐命的杰出的豪杰。元代“四海测验”时,在太史院掌大权的,不是科学家郭守敬,而是那批专讲历理、义理的许衡和尊崇和尚秘术的大官僚张易之流<sup>⑬</sup>,才会赏识堪輿家的这样一派胡言,而使用这种只见于道家者之流所见用的地名,所谓“衡岳如君”的衡岳,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尧山在英德西南<sup>⑭</sup>,即今大罗山,它的高度只有 900 余公尺,比今罗浮山主峰的 1282 公尺,是低了 300 多公尺,但它在堪輿家的心目中,却是广东古衡州最高至尊如君王的山峰衡岳(亦即所谓“山高四千丈”的尧山)。衡岳或尧山,即今大罗山,在今东经 113.1°、北纬 23.9°。我们从上文诸表所载有关衡岳的经、纬度之换算,皆与大罗山的经、纬度,颇为接近。

### 3. 岳台

唐时曾于开封之南的岳台观测晷景<sup>⑮</sup>,《元史》的岳台,与此无关。岳字本为公称,上述《尔雅》所谓“山高而尊曰岳”,可为其证。但以岳作为某山之专称,例如岳山,在昔时较为著名者,有汉时五岳之一的岳山,一说在陕西的岳山,位于今陇县西南<sup>⑯</sup>,约为北纬

34.8°、东经 106.8°。一说在今宝鸡东南面<sup>⑳</sup>，约为北纬 34°、东经 107.5°。岳台应指北纬 34°、东经 107.5°的古代五岳之一的岳山，由于它在太白山(山高 3666 公尺)的西边不远，相对之下，显得卑下，有如臣仆，故称为台，台有卑下，臣仆之意。元人还称奴婢的奴婢曰重台<sup>㉑</sup>。岳山虽底下，仍为一方之尊，但与其邻近的太白山对比，却有如卑下的臣仆，故称岳台。这也是专讲洞天福地的道家们之所喜闻乐道的那一套术语。

#### 4. 和林

和林范围颇大，原为“乃蛮(Naiman 人)故地，太祖(成吉思汗)灭乃蛮，建四大斡儿朵(Ordu，行宫也)于其地”<sup>㉒</sup>。十四年(1219 年)他将远征，“以皇弟斡赤斤，留守和林”<sup>㉓</sup>。1219 年成吉思汗曾从这里(乃满国兀里朵<sup>㉔</sup>)，派刘仲禄南下，迎接长春真人北上。“二十年(1235 年)，分封诸子，以哈刺和林(Karakorum)之地，与少子拖雷。太宗(窝阔台)始定都于此”<sup>㉕</sup>。元太宗七年(1235 年)始建和林城在此。以前，和林还是范围相当广大的乃蛮故地即元太祖的四大斡儿朵。蒙古原为游牧人所建立的国家，在游牧人的心目中，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定居都城或皇帝固定住在首都、京城的概念。随着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各有他们的行宫或宫帐(即兀里朵、斡耳朵、窝里朵、斡儿朵，皆为 Ordu 的译音)<sup>㉖</sup>。成吉思汗在和林有四个窝里朵，他的许多皇后，妃子，分别各住一个窝里朵<sup>㉗</sup>。日后，把四大斡儿朵的第一斡儿朵，称为“大窝里朵”，又称和林<sup>㉘</sup>，但是这种说法，稍有未是，只能说成吉思汗在和林的四大窝里朵之一的大窝里朵，应指怯绿连河上游一带<sup>㉙</sup>，而和林是包括四个斡儿朵都在内的总称。

窝阔台的和林城及其“四时临幸”的四大窝里朵：窝阔台即位在和林，亦居怯绿连河一带<sup>㉚</sup>。1235 年春，才开始建“城和林，作万安宫”，明年(1236 年)春正月，和林城的“万安宫落成”<sup>㉛</sup>。和林城，

原名窝里朵·八里,意即窝里朵城或行宫城、行帐城<sup>④</sup>。自后,才有和林城这个名称。1246年,僧侣拍兰诺嘉宾尼访问过和林城及其西面的昔刺·斡儿朵,据他说这二地相距半日程。又说昔刺·斡儿朵是窝阔台的夏宫或夏都<sup>⑤</sup>。张德辉于1248年亦曾抵达和林川、和林城<sup>⑥</sup>。1253年,僧侣鲁卜鲁克所到过的和林城,城内只有二条街道而已<sup>⑦</sup>。当时的外国人,都按照蒙古语称和林城曰喀刺科鲁木,意曰“黑营”<sup>⑧</sup>,亦即“黑色的行营”,或谓其所以称为喀刺科鲁木,此乃民众对它的俗称,而原名应作窝里朵·八里(Ordu-balik)意曰行宫城、行帐城<sup>⑨</sup>。蒙古人一年四季的营宿处所,是各不相同的,因此,蒙古可汗,其行宫或宫帐(即窝里朵),也随着牧民们营宿处所的转变而轮换。这样一来,蒙古人对其皇帝所居住的首都——和林,其概念是一年四时轮转的和林,而不是整个年头固定住处的和林城。《新元史》说元太宗七年(乙未1235年)春,“始建都于和林。国语:喀刺科鲁木。春:帝居万安宫,一月;居揭揭察哈殿,二月。夏:避暑于昔刺·斡儿朵。秋:居于阔阔脑儿行宫。冬:大猎于汪吉河,四时临幸,率以为常”<sup>⑩</sup>。

仅是在和林的春季行宫,就有和林城城内的万安宫,又有距和林城城“北七十余里”的迦坚茶寒殿<sup>⑪</sup>,即揭揭察哈殿。此外,又有距和林城半日程的夏季行宫或夏都——昔刺·斡儿朵<sup>⑫</sup>。和林一带有不少古迹,元耶律铸《双溪醉隐集》说:“和林城,唐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1235年),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东北七十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732年)御制御书阙特勤碑。”<sup>⑬</sup>所以,上述“四时临幸”的和林这个首都,很难用封建社会的帝王固定居住的都城来比拟之。假如一定要这样比拟的话,结果变成把一年当中只居住在和林城城内万安宫的一个月,作为蒙古可汗一年到头所居住的首都就是和林城,其不恰当,自不待言。和林的范围是大大超过于和林城,也可以

说,一年四季各逐水草而居并游猎共间的和林,比起只有二条街的和林城,其大小实在是不堪一比的。和林城是由于其地有和林河而得名,“和林以西,有哈刺和林河,因以名城”<sup>⑧</sup>。可见和林城是在和林河即濒今鄂尔坤河的东岸的额尔德尼昭,约在今北纬 $47^{\circ}$ 、东经 $107^{\circ}40'$ <sup>⑨</sup>,而昔日的四大斡儿朵的和林,其在和林城以西者,西止于和林山<sup>⑩</sup>,其在和林城以东者,东至怯绿连河上游的大窝里朵,在这个范围内,都可以称之为和林。

和林山西南的和林夏都:波斯史家拉施特·哀丁《史记》说:合喇阔噜木城(即和林城——引者),“合喇阔噜木,山名也,城因山以名”。可见和林以及和林城的城名,是出自和林山。和林河源于和林山,而位置在和林河东岸的和林城,无论是城因河得名,或因山得名,其源本自和林山也。和林山是蒙古历代的名山(古之乌德鞬山)<sup>⑪</sup>,据《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说:“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唐使与相地者(堪舆家),至其国,曰:和林之盛强,以有此山(和林山)也。”<sup>⑫</sup>秃忽刺水,今土刺水或今土刺河,薛灵哥水,今色楞格河,这二条河发源地的和林山,应指今杭爱山东部。

又据《水道提纲》说:“杭爱山,尾甚高大,(在北京偏)西十四度三分,(北极出地)四十七度,塔米尔河南源,发其北;鄂尔昆河,发其东;……山西南,水皆会为推河。”<sup>⑬</sup>和林山就是在上述这几条河流的发源地之间的杭爱山东部,其经、纬度,大约在今北京(东经 $116.4^{\circ}$ )偏西 $14.3^{\circ}$ ,即东经 $102.1^{\circ}$ ,纬度在北纬 $47^{\circ}$ 左右。

和林山的西南,为推河的发源地,而推河一带,据清龚之钥《后出塞录》说:“推河(Tui),昔为元氏苑囿,……每岁收获颇丰。”作为元朝苑囿的推河,应指元朝建立以前蒙古的窝阔台(元太宗)的夏宫——昔刺·窝里朵,上引波斯史家拉施特·哀丁称之为 Syra Ordo,依据上述柏兰诺·嘉宾尼行记所说的, Sira-Ordo 意曰黄色

的行宫或行帐<sup>②③</sup>。位于和林山(北纬47°、东经102.1°)西南的推河发源地一带的昔刺·窝里朵,也是属于和林范围内的四大窝里朵之一,它的位置,在今北纬46°左右,东经110°左右<sup>②④</sup>,恰好是在和林山的西南。

元代“四海测验”的和林,应指和林山,尤其是和林山西南的昔刺·窝里朵,它是和林所包括的四大窝里朵之一,也是窝阔台每年夏季避暑所在处的夏都。元代“四海测验”所要测验的夏至这一天的晷景与昼长,也只能在蒙古首都和林所在处的和林夏都——昔刺·窝里朵,才能遇到夏至,至于蒙古首都和林的三个窝里朵的所在处,亦即春季和秋季、冬季的蒙古首都和林,都不能合乎夏至实测的要求。因此,和林这个观测点,应在和林的夏都——昔刺·斡儿朵,约在今北纬46°、东经101°之处。

## 5. 铁勒

汉时北方有丁灵(亦作丁零、丁令),俗多乘高轮车,北魏时亦称高车,以后又称狄历、敕勒、铁勒<sup>②⑤</sup>。元代的康里,据波斯史家拉拖特·哀丁《史记》说:突厥人谓轮车曰康里(Kanklis),因其人多乘轮车迁徙,故以康里(轮车)称之<sup>②⑥</sup>。此与中国记载雷同。《魏书·高车传》说:其人多乘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sup>②⑦</sup>,故曰高车。《元史·不忽木传》说:“康里即汉高车国也”<sup>②⑧</sup>。康里、高车,亦即隋唐的铁勒。康里,金吾古孙仲端《北使记》作航里,但《金史》、《元史》作康里<sup>②⑨</sup>。

《元朝秘史》说:太祖“再命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邻等十一部落”<sup>②⑩</sup>,康邻即康里之异译。当元太祖尚未征服康里,康里的住地,在札牙黑(Jaik)河以东(即今乌拉尔河以东),花刺子模湖(Khorazm)以北(即今咸海以北)一大片大平原上,西邻钦察国,东境至亦息渴儿湖(Issigol)(即今伊塞克湖)、楚(Chu)河、塔刺思(Talash)河一带<sup>②⑪</sup>。元代的康里,即昔之高车或铁勒,是由蒙古通



往西北方面钦察一带的交通要道之一。1246年僧侣柏兰诺·嘉宾尼东来,就是由钦察经过康里到达蒙古和林<sup>⑧</sup>;僧侣鲁卜鲁克于1253年九月十六日离开伏尔加河,东行经过康里,到了十一月一日,才过完康里之境<sup>⑨</sup>,而前往蒙古和林。

《元史·天文志》仰仪铭辞曰:“深五十奇,铁勒塞也。”<sup>⑩</sup>这是说,北极出地五十度余,是铁勒之塞。又《元史·天文志》元代“四海测验”中的铁勒,即古高车,亦即当代的康里,其所以不用当代地名康里,反而使用铁勒这个古称,这是出自那一批食古不化、专讲历理、义理并把持太史局的上奏权的领导者(例如张易、许衡等)所搞出来的,如果不仔细阅看,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铁勒(亦即“四海测验”中的铁勒),乃指元代康里,从其测验后所留下来的几个有关的数字,可以获悉铁勒或康里这个观测所的所在处,约在距今鄂毕河东支上游发源地不远的新库兹涅茨克(旧称斯大林斯克),其经纬度,在东经 $87^{\circ}$ 、北纬 $53^{\circ}$ 半左右。上述这个经、纬度,正是包括在元代康里(即铁勒)所居住的活动范围之内。

## 6. 北海

铁勒十五部,最北为骨利干。《新唐书》说:“骨利干,处瀚海(大沙漠)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渡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之处也。”<sup>⑪</sup>唐代突厥《阙特勤碑》及《毗伽可汗碑》有 Kourikan, 即骨利干之对音<sup>⑫</sup>。

唐代骨利干,即元代的钦察。元耶律楚材《西游录》说:“印度西北行,有可弗叉国(即钦察)。”“此国昼长夜短。(日入,煮)羊胛,熟,日已复出,正符《唐史》所载骨利干国事,但国名不同,岂非岁时久远,语音讹舛。导思干(今中亚撒马尔干)去中原几二万里,印度去寻思干又等,可弗叉去印度又等。虽萦迂曲折,不为不远,不知几万里也”<sup>⑬</sup>。《元史》说:“钦察,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sup>⑭</sup>。这是对近北极圈一带在夏季的昼极长、夜极

短的纪实。《旧唐书》也说铁勒之一部的结骨(Kirgiz, 今译吉尔吉斯)“其北骨利干,为玄阙州”<sup>⑩</sup>。玄即黑,阙即地,玄阙州即黑(暗)地之州,指那些在近北极圈一带的鄂毕河入海处的喀拉海,冬季夜极长昼极短,甚至整天都是黑暗,见不到太阳。

如果从冬季来讲,则北极圈一带,多数日子,都是昏昏黑黑的夜里。《马可波罗游记》有记载北方黑暗之地,说:“冬季月份,大部分是没有出太阳,天气阴暗,当你刚刚看到晨旦,立刻便又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了。”<sup>⑪</sup>

另据阿剌伯人的记载,也说到“商人乘船,自不里可儿(Bolghar)之外,溯(伏尔加)河而上,并从所到达的那一点,通过余尔曼(Julma 省,殆指在今加马〔Kama〕河与维沃塔卡〔Viotka〕之境),商人从后者此地,进入玉格拉(Yughra),此乃地之极北。过此,仅有一巨塔,为亚历山大所建,亦无人迹。再过此处,什么东西也看不到,有的只是一片黑暗。”故事叙述者讲到这里时,就提出他的看法说:“这个地方,尽是沙漠大山,霜雪终年不停,也终年不见太阳的阳光,既无植物生长,亦无动物生存。那些大山的边界,就是黑暗之海,一年到头,似霉雨天那样,阴雾不开,永远看不到太阳的阳光,地面上也终年积雪不消。”<sup>⑫</sup>〔此外,伊宾拔都塔也有黑暗之地的记载,兹不赘引<sup>⑬</sup>〕。阿拉伯人所说的黑暗之海(在北极圈内),殆指今北冰洋的喀拉海,意曰黑(暗)之海。

综观中外记载,有关北极圈附近的地方;夏天白昼极长、黑夜极短,抑或冬天白昼极短、黑夜极长,中外所说的,是相当可靠。马可波罗曾提到“北海洋”,距离蒙古政治中心的和林,约四十日程<sup>⑭</sup>。北海即北海洋的北海,元代已有见到这样的叫法。据元朝“四海测验”中所提供有关北海实测晷景与昼长的资料得知其相当于今天经、纬度,应在今北纬 $65^{\circ}$ 、东经 $60^{\circ}$ 。元代“四海测验”最北面的观测所,就在这里,约在今鄂毕河入海处西部一带的乌拉尔山

的主峰,今人民峰,高 1894 公尺,它的北面,就是喀拉海,即黑(暗)之海。其地在元代是属可弗叉(即钦察汗国)<sup>⑩</sup>,它是元朝极北的疆宇。

《元史·天文志·总序》说:“当时四海测景之所,凡二十有七,东极高丽,西至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sup>⑪</sup>在这里,不写北尽北海,却以铁勒代之,这是由于隋唐时代的铁勒十五部,最北一部为骨利干,即玄闾州(黑暗地之州),在那些喜用古地名的食古不化的天文官笔下,以及修《元史》的明宋濂等的编修史官笔下,便有出现以古之铁勒,代替当代的北海。其实,元朝“四海测验”,既有北海,又有铁勒,如今欲因铁勒包括北海并欲因此以代替北海,就会出现误会,应该以北海与铁勒,二名分开,有如郭守敬在“四海测验”中之所云。北海即元代的可弗叉(钦察),在今乌拉尔山主峰人民峰及其以北的喀拉海,即鄂毕河入海处。

### 注释:

① 《宋史》卷四七《二王本纪》,至元十六年正月壬戌条与二月戊寅条。开明版第 4589 页。

② 《元史》卷七,《世祖本纪》,至元十六年三月庚戌条,开明版第 6154 页。

③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开明版第 6513 页。

④ 参阅本文第二节第二项。

⑤ 参阅本文第三节第一项。

⑥ 《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八年十一月乙亥条,开明版第 6145 页,与《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开明版第 6497 页。

⑦ 参阅《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开明版第 6513 页。与《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开明版第 6497 页。

⑧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开明版第 6513 页。

⑨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开明版第 6355 页。

⑩ 见同注⑧。

⑪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13 元姚枢《领太史院事杨公(泰)神道碑》，文载苏天爵《元文类》卷六十，神道碑(姜)，商务本第868页。

14 见同注⑩。

15 元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守敬)行状》，文载苏天爵《元文类》卷五十，行状(类)，商务本，第718页。《元史·郭守敬传》，基本上取材于行状。

16 见同注⑧。

17 《元史》卷四八《天文志·总序》，开明版第6237页。

18 见同注⑧。

19 《元史》卷十《世祖本纪》(七)开明版第6154页，至元十六年三月庚戌条，即三月二十七日，亦即新历4月20日，“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历河南府，抵南海，测验晷景”。后来郭守敬所编集“四海测验”第一类“先测”的资料，即对该年夏至(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即1279年5月12日)测验晷景和昼夜长短的实测记录资料，都可以证明十六年夏至，在全国所选的各个观测点，同时进行实测，一点儿也证明不了郭守敬是有反抗上述元世祖所下达的这项“抵南海”测验晷景的敕令。由于敕令郭守敬所要抵达的目的地是南海，而不是由此动身启行的出发点的上都、大都，也不是中间要经历的河南府，因此没有理由怀疑郭守敬反抗敕令而不去南海测验晷景，何况在该年举行全国这样大规模的测验晷景还是由郭守敬提出来的，才受到元世祖的批准而敕令原提议者郭守敬亲自执行，这样看来，郭守敬实测夏至晷景的计划，由拟议到实现，正在目前；他自己更没有理由去破坏他自己多年来所想要做的，在全国南北举行一次对夏至晷景的实测。郭守敬认为旧的大明历的某部分，“皆私意牵就，未尝实测其数”，而他一贯主张，“并依实测，不以私意牵就”(见《元文类》卷五十，商务版第719页)。由此更加没有理由怀疑郭守敬对南海夏至晷景的测验，不是来自实测，而是来自外推法以推求之，象有人怀疑唐一行所举行的另一次大规模晷景测验有用外推法(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本第三卷第293页)，由此而怀疑郭守敬也用外推法而不是用实测来推求南海夏至晷景，这是不对的。同时也是不明白元代杰出科学家郭守敬平素一贯主张“实测，不以私意牵就”。在事实面前，我们不能顽固地怀疑一切。

如果说：郭守敬执行敕令“抵南海”测验晷景存在什么困难，那么最大困难，在于时间太过紧迫，自奉敕之日(三月二十七日)，即日启行，赶赴南海，一定要争取在夏至(四月十九日)以前，抵达南海，前后只有二十二日时间。正由于任务紧、时间迫，郭守敬才亲自挑起这个重担，奉敕亲“抵南海”。

20 《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西域仪象，说：“昔来亦阿儿，汉言地理志(即地理仪一一引者)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计幅圆之广袤，道理之远近”。这种小方井，就是地球仪上的经纬线。这是1267年札鲁马丁带来北京的地球仪，地球仪上的网格(即小方井)，就是经纬线(见同下文注⑭，李约瑟之书第556页)。

2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说：“当希腊人用晷景和夏至冬至的日景长短来确定纬度之时，古代的中国人也已经完全获悉二至的景长在南北向的线上的不同点是各不相同的”(Joseph Needham: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I, p. 542,

Cambridge, 1959)。

㉑ 从《元史·天文志》所载“四海测验”有关夏至晷景的实测数字，都是使用八尺表，只有“大都”才是采用四丈高的圭表，也许由于远方测验，巨大的四丈高的圭表，携带不方便，竖立圭表也不方便，因此虽然知道四丈表比八尺表测量出来的误差，会减少五分之一，但在实际应用上，却一时不能全面普及。

㉒ 《元史·天文志》说：夏至在衡岳测验晷景，结果是“表端无影”，可见还是窥测日的上边，而不是日的中心，尽管已知使用景符可窥测日中，却尚未被太史院掌领大权的领导者之所采用，顽固、保守势力，不是一下子就能全部打倒。

㉓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与卷四八《天文志》，都说放大五倍的圭表与景符，是郭守敬所创造、发明的。可是，当时作为郭守敬顶头上司的领太史院事的杨恭懿，却把这些创造发明，掠为己有。据元姚燧《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说：“（至元）十七年《授时历》成”，奏曰：“臣今治历”，“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进退其晷，使不失于甚忽”（见《元文类》卷六十，神道碑（类），商务本第869页。）这种官大则长，一切功绩都归功于正职的大官，甚至掠人之美，在所不惜，真是厚颜寡耻。

㉔ 关于里差，可参阅《元史》卷五二《历志》（一）说：“中书令耶律楚材”，“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远，创为里差，以增损之，虽东西万里，不复差忒。”开明版第6250页。

㉕ 有人不信中国人在古代有经度的概念（见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第118页（商务版，1960年）。有人却认为“在经度方面，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比希腊人差，一直到了十八世纪发明航海時計（Marine chronometer）以后，才有可能精确地测量经度”（见 Joseph Needham: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I, p. 543, Cambridge 1959）。元代已有经度概念，这是可以肯定的。并参阅：厉国青、裔培荣、李勃田《元朝的纬度测量和经度概念》一文。（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天津纬度站，1976年打印本）

㉖ 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说：1221年，在陆局河南岸“五月朔，亭午，日有食之”。又自陆局河弯处，“又行十日，夏至，量日影三尺六、七寸”。伟烈亚力由此推算，该地应在北纬 $47^{\circ}21'$ 。（参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五册，第90页，注十四。中华书局本）

㉗ 见同上㉖。

㉘ 《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西域仪象条说：“苦来亦阿儿，汉言地理志也。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开明版第6238/3页。此即地球仪。

㉙ 有人怀疑中国人在郭守敬时代“还不知道经度。”见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75页，三联1958年版。我认为这种怀疑当时元初中国人不知道经度，是不对的，上述耶律楚材所创立的东西“里差”制，以及由西域传入的地球仪足够证明中国人已经懂得经度的概念了。

㉚ 关于沙罗周期，参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本）第四卷，第一册，第598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㉛ 道光辛丑（1841年）重修《琼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二）星野，第4页下。

⑧ 参阅拙作《我国航海用的量天尺》，载《文物集刊》1980年第二集。

⑨ 见注⑧。

⑩ 元代，一周天为  $365\frac{1}{4}$  度，折为  $360^\circ$  制，一度为  $0.98562^\circ$ 。

⑪ 有关由夏至晷景推算夏至昼长的数字，以及有关由北极出地高度推算夏至昼长的数字，均采用厉国青等同志所推算的数字，见厉国青、高培荣、李勃田《元朝的纬度测量和经度概念》一文，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天津纬度站，1976年打印本。

⑫ 北海夏至昼长八十二刻，似为八十八刻之误，如今，把二种昼长时刻，均折换为相当于今天纬度，但纬度误差，则以与八十八刻计算。

⑬ 有关由夏至晷景推算纬度，见厉国青等同志同上引文。其公式为：

$$\text{公式(1): } \tan \theta = \frac{l}{h}$$

( $l$  = 晷景尺寸  $h$  = 表高八尺  $\theta$  = 太阳中心的天顶距)

$$\text{公式(2): } \Sigma = 23^\circ 33'$$

$\theta$  = 观测所在处的纬度  $e$  = 修正量  $\theta = \Sigma + \theta + e$

太阳在天顶南为加(+),在天顶北为减(-)

$\Sigma$  原为  $23^\circ 27'$ ，由于郭守敬推算黄道在二十三度九十分（元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说：“黄赤道内外度，据累年实测，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圆方直矢接勾股为法，求每日去极，与所测相符。”《元文类》商务版第720页）。此数折合今度为  $23^\circ 33'$ ，因此  $\Sigma$  采用元代所用的  $23^\circ 33'$ ，而不是采用  $23^\circ 27'$ 。

⑭ 元朱思本《舆图》自序，说：“若夫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云云，见明罗洪先《广舆图》卷首，引朱思本《自序》。这里的“涨海”，李约瑟把它译为“南海”（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译本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145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

⑮ 元代广州的地方志，尚称《南海志》，今北京图书馆尚存残卷，所以把广州称为南海，并不单纯由于广州是由南海、番禺二县所组成的。

⑯ 1974年12月31日《天津日报》第二版慕华《郭守敬》一文。

李约瑟也把《元史》所载郭守敬所测验的南海，看成为广东（广州），见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III, p.297, (Cambridge, 1959)

⑰ 参阅拙作《我国历史上南海的海域及其界限》一文。

⑱ 参阅明黄衷《海语》卷三，畏途，分水（洋）条。

⑲ 参阅《元史》卷五二《历志》（二），开明版第6250页。

⑳ 元齐履谦《知太史院郭公行状》说：“日出入昼夜刻：《大明历》日出入昼夜刻，皆据汴京（开封）为准，其刻度与大都（北京）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极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术推求，每日日出入昼夜刻，得夏至极长，日出寅正三刻，日入戌初二刻，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最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为定式”。（见元苏天爵《元文类》卷五十，行状类，商务版第719页）

㉑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丛书集成本）

㉒ 由于郭守敬“抵南海”实测晷景之时，全国尚无统一以大都时间“永为定式”，

所以还不能由各地与大都的时间差，求出其经度。当时，各地各自计算夏至这一天由日出至日入的时刻。（一天以百刻来计算之），不必以北京时间或大都时间为据，也可以得出夏至昼夜各为多少刻。

④⑦ 《旧唐书·天文志》。

④⑧ 《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仰仪，铭辞，开明版第 6238 页。

④⑨ 明黄衷《海语》卷三，长途，分水（洋）条。

④⑩ 清觉罗满保《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与清施世驥《东洋南洋海道图》。

④⑪ 波斯史家，称中国曰 *Máchin*，意即大中国；1490 年意大利的著作中，作 *Masin*。总之，葡人东来之前，欧洲人称中国曰 *Cini* 或 *Chin* 以及 *Macini* 或 *Machin*，此则见于巴尔巴罗 (*Barbaro*) 与尼基丁 (*Nikitin*) 的著作中（以上参阅玉耳与高弟亚《契丹及通往其国的大道》第一卷第 9 页，第 121 页、151 页注，第 179 页和第三卷第 115 页注 2，伦敦，1915 年版），外国著作家又曾以 *al-Sin* 统称越南半岛、马来半岛、南海群岛，而称中国本部，曰 *Masin*，参阅 BEFEO (1924) p.577。（《远东法国学校校刊，1924 年，第 577 页，鄂卢梭所撰的论文）

④⑫ *Sinaru* 之名，见 1529 年地亚哥·利伯罗《世界地图》，图中有“中国海”即作 *Mare Sinaru*，参阅《葡萄牙海外活动地图集》第一卷、第 39 图（里斯本，1960 年）。*Sin* 即中国，*Masin* 即大中国见上文注④⑩，因此，*Masinaru* 与 *Sinaru*，即“大中国”或“中国”。

④⑬ 例如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 *Pérez Dasmarinas*，在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条，译为“敝里系（丝）勝是猫吝爷氏”（商务《国学基本丛书》本第 58 页），把 *Ma-* 作为“猫”字的对音，这是闽南方音的译语。

④⑭ 例如 *Marco Polo*，译为马可波罗，音末的 *-r*，省略不译，*Mar* 译马，就是其例。

④⑮ 闽南方音，常把 *B-*、*M-* 相混，“无”字可读为牟，亦读如 *Bo*，例如无有之无；又 *N-* 与 *L-* 亦相混，如马尼刺 (*Manila*)，闽南方音作岷里拉或蛮里刺，则为其例。因此，*Bolinao* 作无呢老，也是闽南方音的译语。

④⑯ 见 *Horsburgh's Sailing Direction*, (London 1841) p.361。

④⑰ 《我国海南诸岛》第二册《地理概述》第 22 页。（广州，1976 年）

④⑱ 参阅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〇二广东（三）第 4235 页，第 4239 页（中华书局本）。

④⑲ 见同上注④⑱，第 4155 页。

④⑳ 例如一直到三十年代，由东方舆地学社所发行的《最新中华形势一览表》第二十三图广东省图幅，还是把罗浮山脉作为起自粤北五岭，中经曲江、英德（昔之衡州），南止增城、博罗的罗浮山主峰，一概都绘成为罗浮山脉。其实，这中间还隔有滑石山的山脉，但却把它连起来，都看成为罗浮山脉，那是沿袭过去错误的看法。

㉑ 见同上注④⑱引书，第 4240 页。

㉒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九沅水条。（商务《国学基本丛书》第六册第 95 页）

6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广南东路。

64 《新元史》卷十《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二月乙亥,“中书右丞张易言:高和尚有秘术,能役鬼为兵。”开明版第 6619 页。

65 明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〇二,广东英德县“尧山,在县西四十里。”(中华版第 4240 页)县西应指县西南,今大罗山,在英德县西南。

66 《辞源》寅第 139 页,岳台字项。

67 《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第 116 页,吴山,第三种解说:“古代又名岳山。”《尔雅》释山:以为五岳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 年)

68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第 15—16 图,西汉《司隶部图》在今宝鸡市东南,有“岳山”。(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华地图学社出版,1975 年第一版)

69 参阅元陶宗仪《辍耕录》。

70 《新元史》卷四十六《地理志》(一)和宁路。(开明版第 6716 页)

71 《新元史》卷三,《太祖本纪》至元十四年己卯春。(开明版第 6608 页)

72 元常德《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73 见同注 61)。

74 蒙古语 Ordu,《元秘史》音译为斡儿朵,《元史》译为斡耳朵或斡鲁朵。《长春真人西游记》作兀里朵,此语起源于突厥语 Orda,其译意:曰:行宫、宫帐,宫殿或帐殿。参阅箭内互《元朝斡耳朵考》。(文载《蒙古史研究》)

75 《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元太祖有大斡耳朵、第二斡耳朵、第三斡耳朵、第四斡耳朵,共四大斡耳朵,有名号的皇后、妃子,共有三十七人。(开明版,第 6405 页)

76 Joachim Barkhausen: L'Empire Jaune de Genghis-Khan,《成吉思汗帝国史》,林孟工译,第 179 页,说:1229 年“在和林召集议次皇帝的大会”。第 205 页注三,说:“《元史》大会地点在怯绿连河阔迭额阿刺勒,即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

77 见同注 76)。

78 《新元史》卷四《太宗本纪》,说:“帝即位,亦居怯绿连河及卢朐河。”(开明版第 6610 页)

79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七年乙未春。(开明版第 6136 页)

80 和林城,原名 Ordu-balik,意曰宫城(应作行宫城),参阅《伊斯兰百科全书》(旧版)第二卷第 785 页 Karakorum 项目。(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 II, p.785, s. v. Kararkorum)

81 见 Voyages of Johannes de Plano Carpini。

82 金张德辉《塞北纪行》,(文载《承德县志》卷六十)。

83 W. W. Rockhill's Rubruck & Diary of a Journey, p.345—6 (柔克义《鲁卜鲁克及其旅行日记》,第 345—6 页),并见《新元史》卷四六《地理志》(一)和宁路,注引鲁卜鲁克《和林纪行》。(开明版,第 6716 页)

84 玉耳与高第《马可波罗游记》第一卷第 227 页注 1。

85 见《伊斯兰百科全书》(旧版)第二卷第 785 页。

86 《新元史》卷四《太宗本纪》七年乙未春。(开明版第 6610 页)



⑸ 《新元史》卷四六《地理志》(一)和宁路。

⑹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统和宁路总管府，“太宗乙未年(1232年)，城和林，作万安宫。丁酉(1237年)，治迦坚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开明版第6273页)《新元史》地理志同。(开明版第6716页)

⑺ 耶律铸是耶律楚材的次子，元太宗时，任中书左丞，著有《双溪醉隐集》，内有《取和林》一什，下有自注。本引文见其自注。

⑻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统和宁路总管府条。(开明版第6273页)

⑼ Yule & Cordier: *Travels of Marco Polo*, Vol. I, p.229 和林城及其周围的地图。

⑽ 关于和林山，详见下文。

⑾ 《元史》卷一二二，巴而木阿而忒的斤传。(开明版第6427页)

⑿ 王国维说：温昆(今鄂尔坤河)、仙娥(今色楞格河)二河均出杭爱山，唐人谓之乌德鞬山或郁督军山，和林山则以地名名之(见《观堂集林》卷二十)。夏德(F. Hirth)则以(唐)乌德鞬山即(元)和林山。(见F. Hirth: *Nachworte*, p.33)白乌库吉赞成此说。(见《东胡民族考》中译本，下编第6页)

Ⓚ 《水道提纲》卷二三。

Ⓛ Renc' Grousset: *Histoire de l' Extrême-Orient Epoque Mongole*, (Paris, 1929) 中译文见冯承钧译《蒙古史略》，第44页。

Ⓜ A. Herrmann: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Atlas of Chin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ambridge, Mass. 1935), p.49, *Beginnings of the Mongol Empire—Boundaries of 1234 A. D.* 该图在哈刺和林(Karakoron)西南，绘有昔刺·斡耳朵(Syra Orda)，其东为鄂尔坤河发源地，其南(稍为偏东)为淮河发源地，按照该图的经纬度，它的位置约在北纬46°、东经101°左右。

Ⓨ 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62-6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并参阅《隋书》卷八四《铁勒传》，《北周书》卷五十一《突厥传》。

Ⓩ 参阅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Vol. II, pp.25—34。

ⓐ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

ⓑ 《元史》卷一三〇《不忽本传》。

ⓓ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16页，Kanklis字项。(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1930年)

ⓔ 《元朝秘史》续集，卷一。(丛书集成本)

ⓕ 参阅同上注⑳。

ⓖ 参阅 *Voyages of Johannes de Plano Carpini*，并参阅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五册，第322-323页。(1930年辅仁大学出版)

ⓗ 参阅 W. W. Rockhill's *Rubruck & Diary of a Journey*, p.345-6

ⓘ 《元史》卷八四《天文志》(一)仰仪铭辞。(开明版第6238页)

ⓙ 《新唐书》卷二一七下《骨利干传》。

⑳ 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本，第71页。（商务，1934年）

㉑ 耶律楚材《西游录》，文载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一。

㉒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㉓ 《旧唐书》卷一九五《迴纥传》。

㉔ 《马可波罗游记》拉缪肖法文（地学会辑）本，《黑暗之地》说：“冬季月份的大部份，由于没有出太阳，天气是阴暗的，当你刚刚看到晨旦，立刻便又什么也看不到了。”在一般刊本上，有关“黑暗之国”的记载，是：“此国（指鞑靼的宽彻王所统治之国）境外偏北有一州，名称黑暗，盖其地终年阴黑，无日月星光，常年如是，与吾辈之黄昏同。”（见沙海昂注本《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本第三册第816页）玉耳译本《马可波罗游记》说：“从我上面所说的那个王国（指宽彻王之国）再往北走了很远的一段路，有一个地方，名叫黑暗，既不见日、月，又不见星辰，经常都是黑得象我们的昏后旦前那样地幽暗。”

㉕ 见 Masalak-al-Absar, 引自 Yule and Cordier: Travels of Marco Polo, Vol. II, p.485, n. 1. (London, 1926)

㉖ Yule and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V, p.7. (London, 1916)

㉗ Yule and Cordier: Travels of Marco Polo, Vol. I, p.227-228 n. 1 (London, 1926)

㉘ 可弗叉 (Kifcha) 即钦察 (Kipcha), 因为阿拉伯语没有 p, 以 f 代之。

㉙ 《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总序。（开明版第6237页）

一九七九年八月初稿

一九八〇年第二稿

# 石塘长沙资料辑录考释

林金枝

## 一

石塘(石堂、千里石塘或万里石塘)、长沙(千里长沙、万里长沙或万里长堤)是我国古籍记载南海诸岛常用的古地名。它始出于南宋,中经元、明,下迄清代,历七八百年,图籍记载繁多,各书叫法极不一致。

当前,越南当局为了推行民族扩张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的需要,公然宣称西、南沙群岛是“越南的领土”。为维护我国神圣领土——南海诸岛主权完整的重大斗争中,有必要对古籍记载的石塘长沙进行考证和科学地分析。本文辑录的资料定有遗漏之处,考释错误更是难免,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 二

在我国浩如瀚海的史籍中,记述南海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图籍,据不完全的资料,多达一百多种。综合各书对石塘、长沙之类名称,如以一种史籍作一个单位计算,至少有二十多种叫法,有的叫法一直为历代所沿用。计:宋代有七种图籍,五种叫法;元代有四种图籍,三种叫法;明代有廿二种图籍,八种叫法;清代有七十多种图籍,廿一种叫法。(详见文后附录《宋元明清石塘、长沙古今地名演变对照表》)

下面按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分别叙述各种图籍记载石塘、长沙之类占名的详况及其地名所指今天何地,进行辑录和考释。

### (一) 宋代的石塘长沙

我国史籍第一次记载南海诸岛的“石塘”,是《宋会要》。该书记载宋天禧二年(1078年)占城人来中国时说:“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至石堂,则累岁不达矣。”<sup>①</sup>“石堂”,《宋史》占城传作“石塘”<sup>②</sup>。

《宋会要》记载“真里富国”条说:“欲至中国者,自其国放洋,五日抵波斯兰,次昆仑洋,经真腊国,数日至宾达椰(榔)国,数日至占城,十日过洋,傍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覆溺者十七八,绝无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钦廉州。”<sup>③</sup>

我国史籍开始记载南海诸岛的“长沙”和“石塘”,要以南宋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公元1178年作)一书为最早。书中说:“传闻东大海洋,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sup>④</sup>在宋代,记述长沙、石塘的书籍,尚有:

王象之《舆地纪胜》一书云:“吉阳,地多高山……。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洲,而与占城相对。西则真腊交趾,南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舟舶往来,飞鸟附其颠颈而不惊。(原注:《琼管志》)”<sup>⑤</sup>

赵汝适《诸蕃志》则说:“吉阳,乃海之极,亡复陆涂。外有洲,……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sup>⑥</sup>

宋《诸蕃图》注云:“汝适被命来此,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sup>⑦</sup>

祝穆《方輿胜览》说:“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洲,南与占城相对云云。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sup>⑧</sup>

上述数条引文,虽有长砂、长沙、千里长沙和石塘、石堂、石床、

万里石床、万里石塘之别。从其内容看，实质上都是指我国南海诸岛中长沙和石塘两个地名的别称或异称。

长沙、长砂都是同音同义(或长砂系长沙之误)。石塘、石堂也是同音同义(或石堂系石塘同音之误)，石塘、石床音也相近，很可能是同名而异字。有的史籍在长沙、石塘前面加“数万里”、“千里”、“万里”，则是形容南海诸岛中岛屿、沙洲、暗沙、暗礁和暗滩之多，绵延之长和广阔，并非指长沙、石塘之长或阔有千里、万里或数万里。元人汪大渊说“万里石塘”的延袤之广，“以余推之，岂止万里已哉”<sup>⑨</sup>，也是这个意思。

既如上述，那么在十一、二、三世纪宋代所说的长沙、石塘是指今天我国南海诸岛那些岛群呢？如果单从《宋会要》或《宋史》记载“被风漂至石堂”(或石塘)这条资料看，石塘(或石堂)是指整个南海诸岛或其中的某个岛群还尚难确定。不过，上述资料所记自真里富国(可能是泰国的庄他武里)、昆仑洋(可能指今越南南部昆仑岛一带海面)、经真腊(今柬埔寨)、宾达椰(榔)(可能是今越南潘朗一带)至广东航线，大体上是沿越南东部海岸北上，要经过占城、交阯，才能抵达钦、廉州。而石塘是位于从柬埔寨、越南潘朗来广东航线的东南，这对了解石塘的位置是很有帮助的。再加上同《岭外代答》、《輿地纪胜》、《诸蕃志》以及《方輿胜览》等书联系看，它们都把长沙(或千里长沙)放在石塘(或万里石床、万里石塘)之前，根据从离大陆由近至远说法的传统以及离开中国的航路顺序看，就不难看出，宋代的“长沙”应指今天的西沙群岛，宋代的“石塘”应指今天的南沙群岛。

有人会问，在宋代，跟西沙群岛毗连的中沙群岛为什么没有给予专有的名称呢？是否当时还未发现中沙群岛呢？由于没有史籍记载，尚难确切说清楚这个问题。但是，宋代发明了罗盘针以后，航海技术已大大发展，远航海船川走中沙群岛附近海域那是完全

可能的。由于中沙群岛当时(现在也是)隐伏在水中,不像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险滩、险礁密布而视为航海的畏途。南宋《梦粱录》一书中的“去怕七洲,回怕昆仑”,就是对西沙南沙群岛航海“畏途”的具体写照。因此,宋代没有给中沙群岛命名是不足为奇的,但由于中沙群岛距西沙群岛较近,是否包括在史籍记载中的“长沙”之内,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 (二) 元代的石塘长沙

元代时间短,文献记载石塘、长沙的史料不算多。但叙述石塘、长沙的具体情况也较详尽,因此所指岛群也容易明确。

汪大渊《岛夷志略》一书,不记载长沙(或千里长沙),专叙万里石塘。书中说:“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邐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故原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者,其以是坎。夫观海洋,泛无涘涯,中匿石塘,熟得而明之,避之则吉,遇之则凶。”<sup>⑩</sup>

作者在这里已把万里石塘的起讫,讲得非常明白。日人藤田丰八认为《岛夷志略》中的万里石塘,是指今天的中沙群岛。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既然“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它又分布在从潮州南部海面,一直向西南伸延,分三支至爪哇(今印度尼西亚)至渤泥(今加里曼丹)、地里地闷(今帝汶岛)以及西洋遐昆仑之地(指今近加里曼丹的南沙群岛一带)延伸。这样,“万里石塘”不但把宋代的千里长沙包括在内,而且也包括了今天南海诸岛中的东沙、中沙、西沙和南沙群岛在内的,这是最清楚不过了。

《元史》记载元将史弼率领五千军队用兵爪哇时说:“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历交趾、占城界”。<sup>⑪</sup>史弼出兵爪哇,先经七洲洋,系指西沙群岛一带的海洋,再经万里石塘,然后才到交趾、占城界。

据考证,占城在今越南中部,因此,文中所指的万里石塘,则是指今天的西沙群岛,也可能包括今天的南沙群岛。

《琼海方輿志》一书,谈到海境时,有关石塘、长沙也作了如下的记述。“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密吉浪之洲,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东北远接广东、闽浙,近至欽、廉、高、化。”<sup>[3]</sup>《琼海方輿志》是元末明初的地方志,作者虽未注明上述资料引自何处,但就其所叙述内容,与宋《琼管志》的记载大体雷同。因此,书中所指的千里长沙,系指今天的西沙群岛,谈及的“万里石塘”,应指今天的南沙群岛。

### (三) 明代的石塘长沙

在明代,文献记载或绘图画出石塘、长沙的名称,比起宋元时代多得多了,计有二十多种图籍。石塘、长沙的叫法,也较宋元两代复什,计有七八种叫法。现逐一分述于下:

#### 1、关于石塘长沙说

明代史籍鲜见石塘、长沙名称的文字记载,但在地图中,却有七八种图籍标绘了长沙和石塘。

石塘、长沙在明代地图最先出现的,要算 1402 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以下简称《混一图》),该图在南海中绘有两个石塘和一个长沙<sup>[4]</sup>。画法的位置是由东北而西南,上一个石塘是在南海之东北,其西南为长沙,在长沙的西南又有一个石塘。

《混一图》所画的两个石塘,大概是表示石塘的上下(头、尾)或起止的东西方向。上(头)一个石塘,它起自南海东北角,自东北趋向西南,在长沙的东面有三屿、麻逸和艮里(均在菲律宾位置),下一个石塘(即石塘所止之处的正南面),有平高仑(即 Bunguran,今纳土纳岛),<sup>[5]</sup>渤泥(Brunai,今文莱)。从石塘起止及其上下左右交界的几个地名看,上一个石塘,应指今天的东沙群岛(即《岛夷志

略》所说的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中间所指的长沙，应指今天的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下一个石塘，不言而喻，就是指南沙群岛。

十六世纪中叶成书《广舆图》中的《东南海夷图》<sup>⑮</sup> 以及其后出版的《皇舆考》<sup>⑯</sup>、《古今图书编》<sup>⑰</sup>、《海防纂要》<sup>⑱</sup>、《东西洋考》<sup>⑲</sup>、《武备志》<sup>⑳</sup>、《今古舆地图》<sup>㉑</sup>、《地图综要》<sup>㉒</sup>、《阅史津逮》<sup>㉓</sup> 等书中的《东南海夷图》以及清代的许多地图<sup>㉔</sup>，基本上是沿袭了《混一图》的画法的。但有所不同，图中只画有一个石塘和长沙，即比《混一图》少了一个石塘。图中的画法是石塘在上（位于南海东北）、长沙在下（位于南海西南）。显然，图中的石塘、长沙所指的岛群与《混一图》有所不同。正好与宋代史籍所记的长沙、石塘方位相互倒置（即长沙在前、石塘在后）。因此，《广舆图》所指的石塘，应指西沙群岛（可能也包括中沙和东沙群岛），长沙应指南沙群岛。

其实，《广舆图》（1554—57年成书）画法倒置，可能是承袭比它早成书二十年左右的黄衷《海语》（1536年成书）的说法。《海语》不但第一次将长沙（或千里长沙）改称为万里长沙，而且更重要的指出了万里长沙的位置是“在万里石塘东南。”<sup>㉕</sup> 该书的“万里石塘”应指西沙群岛（可能也包括中沙群岛），因而，万里长沙就是指南沙群岛。虽然《广舆图》未指出其倒置原由，但《海语》一书未尝不是它的依据。

## 2、关于石塘、石星石塘和万生石塘屿说

《郑和航海图》和《武备秘书地利附图》两书附图都绘有“石塘”、“石星石塘”和“万生石塘屿”<sup>㉖</sup>。这些地名的叫法，与宋代不同，只称石塘，不见长沙。同时，首次指出了三种石塘的不同位置和名称。从图的方位和航海针路看，显然都是指南海诸岛的。不过，具体指的是什么岛群，则有待进一步考证。

大家知道，《郑和航海图》原见于明茅元仪编《武备志》卷二百四十的附图，图的原名是《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



蕃图》，过去使用此图的人嫌其名太长，省略为《郑和航海图》。《武备志》的《航海图》所表现的是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路线。图上的航程、地理，与祝允明《前闻记》所记宣德一次下西洋相符合。所以《武备志》的《航海图》，可以确定为十五世纪中叶传下来的。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就海图而言，可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古海图。

藤田丰八认为《郑和航海图》中的“万里石塘”，应指中沙群岛<sup>⑧</sup>。近代学者向达认为《航海图》中的“石塘”和“万里石塘屿”（即图中的万生石塘屿），都是指西沙群岛，“石星石塘”为东沙群岛<sup>⑨</sup>。我们认为向达将“石塘”理解为西沙群岛是有道理的。不论从图的方位看，“石塘”位于西部，与今天西沙群岛位于南海诸岛的西部相符合。同时，海南岛渔民至今还将西沙群岛的西部永乐群岛俗称为“石塘”。至于“石星石塘”，从图的方位看，位于“石塘”之东，我们认为不仅指东沙群岛，很可能包括中沙群岛，因为图上的画法表示范围较大，而且图上有小圈点和大圈点交错在一起。至于“万生石塘屿”（应为万里石塘屿之误）<sup>⑩</sup>，从图的方位看，它介于“石星石塘”和“石塘”之间，位于图之最南。因此，它不是指西沙群岛，而是似指南沙群岛。况且，万里石塘自宋代以来，也是指南沙群岛的。

《郑和航海图》中的“石塘”、“石星石塘”和“万生石塘屿”，所指岛群诚如上述，那么，仿效《郑和航海图》画法的《武备秘书地利附图》中有关石塘等图名所指的岛群，也自然相同了。

### 3、关于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说

明代著作继承宋元时代的说法把南海诸岛称为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只有唐胄的正德《琼台志》一书。

该书有两处提及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一处是在卷四引《琼莞古志》说：“外匝大海，接乌里苏密吉浪之洲，南则占城，西则真腊

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北至雷州、徐闻”。另一处是在卷六山川下说：“番夷诸国多在西南海中，逶迤而至崖南、占蜡、暹刺哇、佛泥诸蕃，而琼之东，则匝大海，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是即地所不满之处”。

琼州称琼莞(琼管)，是在北宋末宣和年间。所以《琼莞古志》一定是宋代的作品。查《宋史·艺文志》，宋代记载琼管的地方志只有义太初《琼管志》和赵汝厦《琼管图经》两种。而正德《琼台志》上述引文、与《舆地纪胜》的所引《琼管志》的内容有所不同。那么，正德《琼台志》所说的《琼莞古志》不是《琼管志》而是《琼管图经》了。

上述引文出处虽不同，但涉及内容大体相似。因此，正德《琼台志》所引《琼莞台志》的千里长沙应指西沙群岛，所说的万里石塘，是指南沙群岛。

正德《琼台志》在《海道》篇前言中说：“郡界海外接诸蕃，时有扬帆之警，我高皇帝所谓必加严备乃无警于民者也。今著为海道篇，使宋疆者知所慎”。从该书写《海道》篇的目的，联系到把南海诸岛列入当时海南岛的“海境”，可见当时已把西南沙群岛作为我国的海防区域了。

#### 4、关于千里石塘、万里长堤说

明代中叶以后，文献著作又有“千里石塘”和“万里长堤”的说法，以此来泛指南海诸岛。

“千里石塘”和“万里长堤”说法的代表作是《海槎余录》一书。书中说：“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传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舶必远避行之，一堕即不能出矣。万里长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迴溜中，未有能脱者。……又有鬼哭难”。

南宋以来，南海诸岛是归海南岛的万州管有的，所以“万州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sup>②</sup>到了明朝中叶，千里石塘改属海南岛的崖州管辖了，所以才说“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

作者既然指出“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以里距推之，千里石塘当指今天的中沙群岛。书中所说的“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是指隐伏在海水平面以下的珊瑚礁，今天的中沙群岛都没有一个岛屿和沙洲浮出水面，情况正与上述的地貌相吻合。有人认为千里石塘专指今天的西沙群岛，无论从里程看〔西沙群岛最东的西渡滩（位于东经112°53′），距崖州（位于东经109°15′）都是在七百里内，不会在七百里外〕，或者从地形地貌看（今天西沙群岛已有十五个岛屿浮出水面，同时，也有二十个暗滩仍在水下），不完全符合“千里石塘”的实际情况的。因此，千里石塘与其说是西沙群岛莫如说是中沙群岛同时也包括了西沙群岛在内来得确切些。

作者在书中所说的“万里长堤”疑是“万里长沙”之误或异称。既然千里石塘是指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那么“万里长堤出其南”（或万里长沙出其南），也就是说是在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南部，当然是指南沙群岛了。至于文中所说的“鬼哭滩”，虽有唯心色彩，但从书中所反映的现象看，似指南沙群岛中的危险地带。

继《海槎余录》之后，明黄佐的《广东通志》记载南海诸岛“千里石塘”和“万里长堤”<sup>〔31〕</sup>是引顾玠的《海槎余录》的，故其内容，则完全相同。

### 5、关于万里石塘、万里长沙说

明代中晚期《海语》、《东西洋考》和《顺风相送》等三部讲海道交通的专书，都提到了“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

黄衷的《海语》是把我国的南海诸岛分为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的。书中说：“万里石塘，在乌滹、独滹二洋之东……舵师脱小失势，误落石汉，数百躯皆鬼录矣。”<sup>〔32〕</sup>这里所指的乌滹应指乌滹山，即今广东台山县上川岛以东一带的海洋；独滹，应指独珠山或独滹山，即今海南岛万宁县外独珠山一带的海洋。而万里石塘既在上述乌滹山和独珠山以外一带海洋，又有石汉（指隐没在海水底下的

珊瑚礁)，因此，万里石塘当指西沙群岛（也可能包括中沙群岛）。《海语》又云：“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是也。弱水出其南，风沙猎猎，晴日望之为盛雪，舶误冲其际，即胶不可脱，必幸东南风劲，乃免陷溺。”<sup>⑳</sup> 诚如上述，万里石塘既是西沙群岛，那么，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之东南，不言而喻，当指今天的南沙群岛。书中描写的“舶误冲其际，即胶不可脱”，与今天南沙群岛众多礁滩的危险地带是极其相似的。

应该指出：《海语》一书不但第一次将宋元时代的长沙（或千里长沙）改称为万里长沙，而且更重要的是该书也首次将宋代所指西沙群岛的长沙（或千里长沙）改指南沙群岛，而将宋代所指南沙群岛的石塘（或万里石塘）改指西沙群岛，而成互为倒转。

清人著作中转引《海语》有关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的记述，如魏源的《海国图志》<sup>㉑</sup> 和周凯的《厦门志》<sup>㉒</sup> 等书的引文都相同，兹不赘引。

张燮的《东西洋考》对于万里石塘的记载，则较为详晰。书中说：“七州山，七州洋。《琼州府志》曰，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俗传古是七州，沉而成海，……舟过此极险，稍贪东，便是万里石塘，即琼志所谓万州东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脱者”。<sup>㉓</sup> 又云：“船到七州洋及外罗，若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万里石塘，内有一红石山不高。”<sup>㉔</sup>

这里所说的七州山，即指文昌县外的七州列岛，七州洋指西沙群岛一带的海洋，即《琼管志》所说的万州东石塘海是也。船到七洲洋，偏东七更路程，到万里石塘，就是指西沙群岛。“舟犯石塘希脱者”，意指船碰到了西沙群岛的珊瑚礁而逃脱不了。

清代文献引用《东西洋考》的上述引文的有：邓淳《岭南丛述》<sup>㉕</sup>、梁廷枏《粤海关志》<sup>㉖</sup>、阮元《广东通志》<sup>㉗</sup>、明谊《琼州府志》<sup>㉘</sup>、周凯《厦门志》<sup>㉙</sup> 以及魏源的《海国图志》<sup>㉚</sup> 等书，内容均大

同小异。

《顺风相送》一书既有同于《海语》有“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的记述，又有同于《东西洋考》有“万里石塘”的方位的描写。书中说：“船若近外罗，对开，贪东七更船，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船若回唐，贪东，海水白色，亦见百样禽鸟，乃见万里长沙”<sup>④</sup>，又云：“交趾洋……贪东七更船有万里石塘”。<sup>⑤</sup>

这里所指的“回唐”，是指从西洋航道来讲，即中国船只从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北返中国时的称呼。当时的“回唐”进入南海诸岛时，首先迂到的如果“贪东”便是“万里长沙”。可见“万里长沙”是指南沙群岛。船若近外罗，“贪东七更”是“万里石塘”。可见这里所指的“万里石塘”就是指西沙群岛，所述则与《东西洋考》相同。

清初的《指南正法》一书谈及的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引文与《顺风相送》所述大致雷同，所指今地自然也相同了。

## 6、关于万里石塘(山)说

明代中后期有几部史籍记载“万里石塘”(山)，从其内容叙述来看，它就不是指西沙群岛了，而是指整个南海诸岛。

《古今图书编》一书说：“由广东香山县登舟，用北风下，指南针向午，出大海，名七洲洋。十昼夜可抵安南海次，中有一山名外罗山，八昼夜可抵占城海次……若遇东风飘舟西行，即舟坏犹可登山。遇西风飘入东海中，有山名万里石塘，起自东海琉球国，直至南海龙牙山，潮至则没，潮退方现。飘舟至此，罕有存者。”<sup>⑥</sup>

文中的“七洲洋”，应即今西沙群岛一带的海洋，外罗山即今越南的 Kulao Rays，琉球国即今之冲绳岛，龙牙山应指今天新加坡及其附近的龙牙群岛（Lenga），史书中也称为龙牙门<sup>⑦</sup>。既然文中所说“万里石塘”(山)，上起自今天的冲绳岛，下迄至新加坡附近的岛屿，那么，它所指的范围是包括了南海海域中的东沙、中沙、

西沙和南沙群岛。也就是说,它包括了整个南海诸岛,这点史实是记载很清楚的。

清代《粤海关志》提到明代提督少卿萧某呈文谈及南海诸岛的“七洲洋”和“万里石塘”(山)的记载,则与《古今图书编》所述完全相同。明代《咸宾录》暹罗条,也与上述引文大体雷同,只是文字较简而已。文曰:“其国(指暹罗)由广东香山县登舟,顺风计约四十日可至,遇东风飘舟西行,即舟坏可登山。东有山名万里石塘,起至琉球国,(下恐有漏“直至南海龙牙山”等字)潮至则没,潮退方见。”<sup>④⑧</sup>可见,上面所指的“万里石塘”(山),都是泛指南海诸岛的。

## 7、附说

明代后期至鸦片战争前(即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一些外国地图(至少有十几种)在南海海域中,曾用“万里长沙”、“万里石塘”等中国名称并用中文书写来表达的<sup>④⑨</sup>,这些地名位于距离印度支那占婆海岸不到一度的海中,南北约自北纬 $10^{\circ}$ 、 $11^{\circ}$ 、 $12^{\circ}$ 至 $16^{\circ}$ 、 $17^{\circ}$ 之间,它既不是泛指我国的南海诸岛,也不是专指南海诸岛中西沙群岛或南沙群岛中的某一岛群。而是指“西沙群岛西南端以外并被认为南北走向的航海危险区”,即今天越南东部沿海一带的岛礁(北纬 $10^{\circ}$ — $17^{\circ}$ 之间),它与今天我国的西南沙群岛或南海诸岛毫无关系,二者泾渭至为分明,绝不能张冠李戴,互混不得。

### (四) 清代的石塘长沙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劳动人民和航海家在南海诸岛的生产 and 航行活动越来越频繁。因而,清代对南海诸岛的图籍记载也越来越多,且越来越详细,越具体。由于人们对南海诸岛的名称认识不一,对石塘、长沙之类名称的叫法,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的统计,

就有二十多种叫法，记述的图籍不下七八十种。现将主要者分类叙述：

### 1、关于石塘长沙说

清代文献中记载石塘、长沙，以表示南海诸岛的，大都见于地图或附图，罕见史籍记述。

清代地图中关于石塘、长沙的画法有《广舆图》、《四海总图》以及《皇朝内府舆地图》等三种系统，它们的石塘、长沙所包括的岛群也有差异。

#### (1)关于《广舆图》系统中的石塘、长沙(略)<sup>②</sup>

#### (2)关于《四海总图》系统中的石塘、长沙

《四海总图》系统地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图中标绘出南海诸岛的四个岛群，它开创了南海诸岛画法的新局面，这是以前中国古籍地图所没有的。

《四海总图》系清初陈伦炯所作，源见于《海国闻见录》一书。《四海总图》是该书的附图，图中在南海中标绘有“气”、“沙头”、“长沙”、“石塘”和“七洲洋”<sup>③</sup>。从图的方位看，“气”即“南澳气”，指东沙群岛；“沙头”即“万里长沙头”，指东沙群岛南续的沙垠；“长沙”指中沙群岛；“石塘”指南沙群岛；“七洲洋”指西沙群岛及其附近一带的海洋。

清代图籍仿效《四海总图》绘法的，则比比皆是。计有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七省沿海总图》中之《环海之图》、1798年《咸朝七省详图》等十二种书籍的地图或附图<sup>④</sup>。这些地图都在图中绘有“气”、“沙头”、“长沙”、“石塘”和“七洲洋”，分别指东沙、中沙、南沙和西沙群岛。

#### (3)《皇朝内府舆地图》系统中的石塘、长沙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清代《皇朝内府舆地图》系统的地图中，标绘出两个长沙和一个石塘，这是一种新的画法。

1831年《皇朝輿地图略》书后附图，有一幅六严德只作《皇朝内府輿地图》的圆图中，标绘出“气”、“沙头”、“长沙”、“长沙”、“石塘”和“七洲洋”<sup>⑤</sup>。从该图的方位看，“气”和“沙头”，应指东沙群岛及其南续的沙垠，“长沙”应指中沙群岛，“石塘”应指南沙群岛，“七洲洋”应指西沙群岛及其附近一带的海洋。该图的特点就是标绘了两个长沙，一上一下，上一个长沙画一个半弧形，下一个长沙，画有无数小点。为什么要绘两个“长沙”呢？是否都指中沙群岛，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

仿效《皇朝内府輿地图》画法的，尚有1890年《皇朝内府輿地图》（摹缩本）中之《环海全图》、1871年马征麟《历代地理沿革图》的《輿地图》、1884年《皇朝内府輿地图》中的《环海全图》以及1892年（佚名）《輿地图》中之《环海总图》等等，都绘有两个长沙和一个石塘。

## 2、关于石塘海长沙海说

清代官方修纂的广东地方志，自省志以至府志，都说万州（管）有石塘海、长沙海。并说万州石塘海有万里石塘，万州长沙海有千里长沙。这里所说的长沙海，应系专指今天南沙群岛的海洋，石塘海应系专指今天西沙群岛的海洋。

清代文献记述石塘海、长沙海的书籍，则以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为最早。书中说：长沙海“在（万）州东，古志云，千里长沙”。石塘海“在（万）州东，琼管志云：万里石塘。”<sup>⑥</sup>文中所说的“古志”，指宋《琼管志》，明人引用此书时称《琼管古志》，“古志”即《琼管古志》的简称。

清郝玉麟《广东通志》、胡端书《万州志》<sup>⑦</sup>和明谊《琼州志》<sup>⑧</sup>等书谈及长沙海、石塘海，其内容与上述引文相同，都是把它列入万州的山川形胜条，作为万州的山川胜水而载入史册的。

原来，宋代史籍记载的石塘（或万里石塘）是指今天的南沙群



岛,长沙(或千里长沙)是指今天的西沙群岛。元末明初的著作,如蔡徽《琼海方輿志》还是承袭这种说法的。到了明代中晚期,有些著作,首先是黄衷的《海语》,不久,罗洪先的《广輿图》以及以后摹仿《广輿图》画法的许多地图,都把宋元时代的长沙(或千里长沙)石塘(或万里石塘)相互倒转。就是说,宋元时代文献先谈长沙,后记石塘。而《海语》和《广輿图》等书先画石塘(或记万里石塘)在上,后画长沙(或万里长沙)在下。因此,清代的长沙海和石塘海和宋代所指的长沙石塘的名称刚好相反。换句话说,清代所指的石塘是指西沙群岛,石塘海,则指西沙群岛的海洋;长沙是指南沙群岛,长沙海则指南沙群岛的海洋。

### 3、关于千里石塘、万里长沙说

清代的史书和图籍记载千里石塘和万里长沙,以《海国闻见录》、《海录》和《厦门志》三书记述最详。

《海国闻见录》说:“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必经之所……独于七洲大洋、大洲头而外……对针亦必六七日,始能渡过,而见广南咕哔嘢,外洋之外罗山,方有淮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则恐溜入广南湾。”<sup>⑧</sup>

文中的七洲洋,既在万州(今万宁县)之东南,应指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洋。万里长沙和千里石塘在七洲洋之东,千里石塘又在万里长沙之南<sup>⑨</sup>,这样,万里长沙似指中沙群岛,千里石塘似指南沙群岛。

《厦门志》的记载,与上述的记载大体相同。说:“由厦门,过琼之大洲洋,七洲洋(原注:大洲洋而外,……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而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必经之所)。”<sup>⑩</sup>

《海录》曰:“噶喇叭,在南海中,……海舶由广东往者,走内沟,则出万山后,往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仑。又南行约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约四

五日过红毛浅，有沙坦在其中，约宽百余里。其极浅处止四丈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万里长沙在其西。沟之内，以沙分也。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sup>⑩</sup>

文中所指的噶喇叭，即今印尼的雅加达，万山即今广东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从叙述的方位和自然地貌看，红毛浅似应为中沙群岛。沙头在陵水县境，沙尾是草鞋石，似应指西沙群岛（俞昌会《防海辑要》卷首《海国图》绘有“草鞋石”）。从万里长沙的长数千里来看，万里长沙似乎包括了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这里所指的七洲洋，似应专指西沙群岛的海洋。千里石塘既在七洲洋之正南，应指南沙群岛。

清代魏源《海国图志》的《圆图》<sup>⑪</sup>和《沿革图》<sup>⑫</sup>中，绘有沙粒形状的“万里长沙”（在上面）和“千里石塘”（在下面）。从图的方位看，正好与明代《广舆图》的画法相倒置。《广舆图》绘石塘在上，长沙在下。因此，万里长沙应指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千里石塘应指南沙群岛。比《海国图志》稍后出版的《中外地舆图说集成》、《海国沿革图》中的《东海洋各国沿革图》<sup>⑬</sup>的画法，则与上书相同。

#### 4、关于万里长沙、万里石塘说

康熙年间成书的航海针经《指南正法》一书，先后在该书《序》、独漈山和南澳气处提到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sup>⑭</sup>，引文与《顺风相送》大体相同，文中所指万里石塘应指西沙群岛（也可能包括中沙群岛），万里长沙似指南沙群岛。

清代官方舆图画有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以表示我国南海诸岛者，计有康熙丙申（1709年）测绘《大清中外天下全图》、雍正二年（1724年）《清直省分图》中的《天下总舆图》以及乾隆二十年以前（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中《天下总舆图》等等，都在图中绘有

“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从图的方位看，万里长沙在上，应指西沙群岛（也可能包括中沙群岛），万里石塘在下，应指南沙群岛。

乾隆时代，对康熙年间实测绘成的中国地图作了一些补充。补充后的中国地图，对南海诸岛的绘法，明确地区分为四个群岛。即绘有“南澳气”、“七洲洋”（或洋），“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sup>⑤</sup>。从图的方位看，“南澳气”指东沙群岛，“七洲洋”指西沙群岛及附近洋面，“万里长沙”指中沙群岛，万里石塘指南沙群岛。

在清代晚期，有些地图将“万里石塘”作为府的建制而归入清朝政府的版图之内。如1904年吴长发《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把“万里石塘”作为清朝行政的一个府，并用双线方格形的府的行政图例来表明。该图除了“万里石塘”以外，还有“万里长沙”。从图中只绘有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的两个名称来看，则同于清代前期测绘的《大清中外天下全图》，因此“万里石塘”应指南沙群岛，“万里长沙”应指西沙群岛（也可能包括中沙群岛）。

### 5、关于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说

南宋开始直至元明，文献多次记载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清代记载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除方志外，史籍也只有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该书说：“万州城东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设以防炎海之溢者。”<sup>⑥</sup>书中未谈方位及其他情况，因此，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所指何地，须参照其他书籍才能确定。

宋元明各代的千里长沙指西沙群岛，万里石塘指南沙群岛。清承前说，因此，《广东新语》中的千里长沙应指西沙群岛，万里石塘就是指南沙群岛。

### 6、关于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说

诚如前述，元代《岛夷志略》和明代《古今图书编》中的“万里石塘”（或万里石塘山）都是泛指南海诸岛的。

清代文献记载万里石塘说指南海诸岛者，尚可见《南洋蠡测》

和《海国图志》两书。

《南洋蠡测》一书记载说：“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塘之北为七洲洋，夷人知七洲多暗石，……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名曰星忌利坡。”<sup>⑥7</sup>

从文中所说的方位和四周记载的情况，可以清楚看出，万里石塘是指整个南海诸岛，尤其是指南沙群岛，因塘之北为七洲洋，塘之西为新加坡海峡的白石口，而且是作为“华夷中外之界”。

魏源的《海国图志》有关“万里石塘”的记述<sup>⑥8</sup>，其内容则引自《南洋蠡测》一书，引文完全相同。

### 7、关于万里长沙说

清代的“万里长沙”所指的岛群比较复杂，包括了三种情况。

#### (1) 专指南沙群岛

清代文献将“万里长沙”专指南沙群岛，记载较详，首推《龙溪县志》和《漳州府志》两书。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成书的《龙溪县志》，曾记载福建龙溪侨居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的望加锡华侨余士前，在回国中遇风漂入万里长沙的情况。说：“余士前，父贾西洋……及父卒，士前携三弟归……海中有地名万里长沙，舟犯之辄碎，士前兄弟与同舟十七人得不死，匍匐海岛，渴甚……凡十八日。”<sup>⑥9</sup>《漳州府志》记载余士前带其幼弟乘船北返家乡途经南海时说：“海中有万里长沙，西洋绝险处也。船回遇台风，飘至其岛，冲石破碎，船中入数百溺焉。士前手挽三幼弟，板缘匍匐上海屿，仅存十七人……屿上巨鸟成群，张口欲吞入……水浅处多巨蚶，可数入鼻。”<sup>⑦0</sup>

从上述记载经过万里长沙的遇险境遇和万里长沙是“西洋绝

险处”等情况看，所述的万里长沙是指南沙群岛，遇险的具体地点应是南沙群岛危险区域中的某个岛屿。

### (2) 混指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

清代文献也有把“万里长沙”，包括了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郑光祖的《一斑录》就是这样记载的。

在《一斑录》卷一《中国外夷总图》中，绘有“落濠”、“东沙”、“西沙”和“石塘”等几个地名，并绘有从广东万山出发的三条海路航线，一条经长沙门至吕宋；一条经东沙、西沙，再经石塘东侧到文莱印尼等地；一条经万山经崖州到占城、柬埔寨等地。

郑光祖辑《舟车所至》中扬炳南笔授的《海录》一书，曾对东沙、西沙的位置作了注释。说：“出万山，西南过七洲洋，转南过昆仑地盆山（注：即茶盘），万里长沙在其东，若走外沟，则出万山，南过东沙、西沙（注：即万里长沙，中有路可通）。”<sup>①</sup>

综合上图的绘法和注释，便可看出：图中所指的“落濠”，系指今天的东沙群岛，图中的东沙、西沙统称为万里长沙，其中东沙绘在东部，应指中沙群岛，西沙绘在西部，应指西沙群岛，石塘在其南，应指南沙群岛。

### (3) 泛指整个南海诸岛

清代严如煜《洋防辑要》卷一中的《直省海洋总图》，在图中绘有一个万里长沙，并在万里长沙的下面注有一个沙字。从图的方位看，万里长沙的西部则为海南岛，北部为澳门、虎门，东部为荷兰红毛互市之地，南部为大海，未注有文字。因此，这里所指的万里长沙，似乎不是指南海诸岛中的一、二个岛群，而是包括了整个南海诸岛。

## 8、关于石塘说

宋代的石塘，一般指南沙。明代的石塘，一般指西沙。到了清代，石塘所包括的岛群也不是固定的，分别指西沙、南沙、东沙群岛

的都有。主要根据史籍记载的具体内容来确定。

诚如上述所说,郑光祖《一斑录》中的“石塘”,就是指南沙群岛的。清代沿袭明代《广舆图》画法的“石塘”,就是指西沙群岛(也可能包括中沙群岛)。海南岛渔民的《水路簿》所指的“石塘”,则是专指今天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sup>②</sup>

在清代,“石塘”也有专指东沙群岛的,称东沙群岛的礁滩为“石塘礁”。如《广东水道图》在一幅“广东、潮州海南、拔达司岛、石塘礁”的图上注有文字说:“拔达司岛石塘,系从香港至吕宋、马尼刺水道之险境……凡船来往,宜从石塘之南过”。拔达司岛即系外国人称东沙岛 Pratas 的中文音译,这里的“石塘”就是专指东沙群岛的。

### 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石塘、长沙自宋以来,系属中国领土。大量资料说明,我国古籍记载中的石塘、长沙及由此演变的千里长沙、万里长沙、千里石塘、万里石塘、万里长堤等等类似的古代名称,都是指我国的南海诸岛地名而言的。虽然叙述这些地名的角度有所不同,有的是从官方航海图或海道交通专书提及,有的则是封建政府行政隶属的角度来记述的,有的是从渔民的航海针经书的《水路簿》反映出来的……。但是,这种纯粹中国式对南海诸岛古代地名的命名,自南宋至今,一直为历代所沿用,时间达八百年之久,单从国际通行的惯例名从主人的原则而论,南海诸岛主权归属中国,历史悠久不说自明了。

第二,宋代以来,石塘、长沙名称或见记载,或见绘图,由于人们的实践不同,地理认识也不一致,同一时代对同一地名的地域概

念看法多有差异,所指今天岛群或明或暗,或广或狭,易名虽多,但其所指今天的南海诸岛不外三种。即泛指南海诸岛、混指南海诸岛中的某二三个岛群和专指南海诸岛中的某一岛群。主要应根据史籍的具体记载,地名在图中的方位以及四邻情况,才能确定石塘、长沙所指今地的范围和地点是指西沙、南沙、中沙、东沙或整个南海诸岛。

第三:石塘、长沙名称复杂主要在明代中期以后。自宋以来,石塘、长沙两地,时而指西沙(甚至包括中沙群岛),时而指南沙,时而指南海诸岛。总括来说,宋元时期,长沙(或千里长沙)一般是指西沙群岛,石塘(或万里石塘)一般是指南沙群岛。到了明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航海事业进一步发达,当时我国人民经过南海诸岛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更加频繁,因而,明代以后留下记载南海诸岛如石塘、长沙之类的古名更加复杂。尽管如此,基本上只有二大说,一说是继承宋元时代的说法,如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和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等书,就是把千里长沙仍然是指西沙群岛,把万里石塘(或千里石塘)指南沙群岛的。另一说则与宋元时代的说法互相倒置对换,它们把长沙(千里长沙、万里长沙、或万里长堤)指南沙群岛,把石塘(千里石塘、万里石塘)指西沙群岛(也可能包括中沙群岛),其代表作是以明代黄衷《海语》为开始的,以后为罗洪先《广舆图》所继承的一些图籍为主。至于清代石塘、长沙古地名的各种说法,都是这二说的沿袭和派生。

### 注释:

- ① 见《宋会要辑稿》第197册占城国条,1957年中华书局版第7784页。
- ② 见《宋史》卷489外国占城条,百衲本。
- ③ 见《宋会要辑稿》第197册,番夷四真里富国条,1957年中华书局版第7763页。
- ④ 见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地理门三合流条,第10页,丛书集成本。
- ⑤ 见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7广南西路吉阳军风俗形胜条。

⑥ 见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附载南海条,函海本。

⑦ 见赵汝适《诸蕃志序》,《载艺风藏书记》卷三。

⑧ 见祝穆《方輿胜览》卷43 古阳军,形胜卷下(注引《琼管志》)。

⑨ 见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 36 页,光绪十八年知服斋藏书本。

⑩ 见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第 36 页,光绪十八年知服斋藏书本。

⑪ 见宋濂《元史》卷 162 列传第 49《史弼传》。

⑫ 见蔡徽等著《琼海方輿志》,转见明唐肖《正德琼台志》卷 21 海道海境第 9 页,引《方輿志》。

⑬ 李荟·权近《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见织田武雄、室贺信夫、海野一隆合编《日本古地图大成世界图编解说》第 22—23 页,日本讲谈社 1976 年版。

⑭ 纳上纳岛(Natuna),印尼文作 Bunguran,此名系 Pingeran 之转,意曰“边界”,平高仑即其对音。

⑮ 罗洪先《广輿图》第 107 页《东南海夷图》,明嘉靖刻本。

⑯ 张天复《皇輿考》卷 10 四夷附《东南海夷图》。

⑰ 章潢《古今图书编》卷 59《东南海夷图》,明抄本。

⑱ 王在晋《海防纂要》卷首《东南海夷图》,明万历 41 年刻本。

⑲ 张燮《东西洋考》卷首《东西洋图考全图》中之《东西南海夷诸国总图》,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藏本。

⑳ 茅元仪《武备志》卷 233 第 14 页《东南海夷图》,日本宽文 4 年(1667 年)刻本。

㉑ 吴国辅《今古輿地图》上卷第 2 页《今古华夷区域总安图》,崇禎十一年刻本。

㉒ 吴学平、朱国达《地图综要》卷 4,第 188—189 页《东南海夷图》,崇禎十六年刻本。

㉓ 朱约淳《阅史津逮》中之《东南海夷图》,清初彩绘抄本。

㉔ (清初)佚名《輿图要览》卷下海夷第 57 页《东南海夷图》、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之《輿图要览》卷四海夷图十九第 33 页下《东南海夷图》,以及温汝能辑《方輿类纂》卷首輿图第 80 页下《东南海夷图》等等。

㉕ 黄衷《海语》卷上风俗暹罗条。

㉖ 茅元仪《武备志》卷 240,明天启辛酉刊本。转见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第 40—41 页,1961 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施永图辑《武备秘书地利附图》第七册《心略》地利卷四,第 47 页《通外国图》,二书画法相同。

㉗ 见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万里石塘条。

㉘ 见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所载《郑和航海图地名索引》页 15、38,向达认为“万生石塘屿”应作“万里石塘屿”。

㉙ 万生石塘屿应先为万星石塘屿之误,而万星石塘屿又为万里石塘屿之误。

㉚ 清金光祖《广东通志》卷 13 山川,万州引古志云。

㉛ 黄佐《广东通志》卷 70 杂事下琼州府。清代文献引《海槎余录》记载“千里石塘”、“万里长堤”和“鬼哭滩”者,尚可见金光祖《广东通志》卷三十杂记、阮元《广东通志》卷 344 杂录、明直《琼州府志》卷 44 杂志、钟元隶《崖州志》卷 3 杂志,以及顾祖禹



《读史方輿纪要》卷 105 琼州府崖州等书。

②⑨ 见黄衷《海语》卷下畏途,万里石塘条,见宝颜堂秘笈本第 1 页。

③⑩ 见黄衷《海语》卷下畏途,万里长沙条,见宝颜堂秘笈本,第 1 页。

④⑪ 见《海国图志》卷 17 东南洋海岛图五,附东南诸岛形势上第 24 页。

⑤⑫ 见周凯《厦门志》卷 8 番市略附海险第 37—38 页。

⑥⑬、⑦⑭ 见张燮《东西洋考》卷 9 舟师考西洋针路和水星水醒条。

⑧⑮ 邓淳《岭南丛述》道光庚寅(1830 年)序刊本卷九水道上第 8 页水醒水忌条。

⑨⑯ 梁廷柎《粤海关志》道光刊本卷三十杂识第 7 页引水醒水忌条。

⑩⑰ 阮元《广东通志》卷 124 海防略。

⑪⑱ 明谊《琼州府志》卷 18 下海黎志,水醒水忌。

⑫⑲ 周凯《厦门志》卷八番市略附海险第 37 页。

⑬⑳ 魏源《海国图志》卷十八附东南洋道路第 6 页。

⑭㉑ 明(佚名)《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定潮水消长时候,向达校注本第 27—28 页。

⑮㉒ 同上书第 33 页。

⑯㉓ 章潢《古今图书编》卷 59 古南海夷考略暹罗国,明抄本。

⑰㉔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第 48 页中,有龙牙门。

⑱㉕ 明罗口黎《咸宾录》(成书于隆庆六年——万历八年)卷六南夷暹罗,《豫章丛书》,1918 年南昌刊本。

⑲㉖ 详况参见韩振华《古“帕拉赛尔”考(其二)》一文列表所引外国地图名称。

⑳㉗ 参见本文明代石塘、长沙一节中关于石塘长沙说部份。

㉑㉘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下第 1—2 页《四海总图》,道光癸未重印乾隆刻本。

㉒㉙ 详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续编第二册)第 12—18 页。

㉓㉚ 见李兆洛辑《皇朝輿地地图略》附韵编卷末附图,道光 11 年辨志书塾刊本。

㉔㉛ 清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雍正三年(1726 年)成书,《方輿汇编·职方典》第 1374 册琼州府部汇考、琼州府山川考万州,1934 年 10 月,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本。

㉕㉜ 见胡端书《万州志》卷三,山川略,川、长沙海石塘海引。

㉖㉝ 见《琼州府志》卷四上輿地山川,万州,第 58 页,引萧志。萧志即萧应植续修《琼州府志》,撰于乾隆三十九年。

㉗㉞ 见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洋记》第 20 页,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㉘㉟ 见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卷上《南澳气》第 38 页,有“万里长沙之南有千里石塘”的记载。

㉙㊱ 见周凯《厦门志》卷八番市舶,越南。

㉚㊲ 见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受《海录》卷中噶喇叭条,第 44 页,冯承钧校注本,中华书局 1955 年 9 月版。

㉛㊳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圆图。

㉜㊴ 同上书,卷 3 沿革图第 4 页《东南洋各国沿革图》1842 年成书,同治七年据咸

中二年重刻本。

⑥③ 同康庐《中外地輿图说集成》，光绪二十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⑥④ 引文参见明代关于万里石塘万里长沙说中引《顺风相送》书

⑥⑤ 见清乾隆三十二年黄证孙《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朱锡龄《大清万年一统全图》、嘉庆五年晓峰重绘《清绘府州县厅总图》、嘉庆二十五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以及清光绪二十一年《古今地輿全图》等等。

⑥⑥ 见屈大均《广东新语》卷4水路第3页，康熙庚辰序刊本。

⑥⑦ 颜斯宗《南洋蕨测》，见《小方壶斋輿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

⑥⑧ 见魏源《海国图志》卷9东南洋海岸图五。

⑥⑨ 吴宜燮《龙溪县志》卷17《人物孝友传·余士前》，该书系乾隆壬午年编成。

⑦① 见李维钰修《漳州府志》卷41《人物志·国朝列传下·余士前传》，乾隆四十二年刻本。

⑦② 见郑光祖辑《舟车所至》本中的《海录》，道光二十三年版。

⑦③ 见海南岛琼海县渔民苏德柳抄本的《水路簿》。

附：宋元明清石塘长沙古今地名演变对照表

朝代	南海诸岛	东沙群岛	中沙群岛	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备注
宋					石 堂	《宋会要辑稿》197册蕃夷四 占城国条
					石塘(万里)	《宋会要辑稿》197册蕃夷四 真里富国条
			长砂(数万里)		石塘(数万里)	(1178年)周去非《岭外代笈》卷一三合流条
			长 沙		石 床	宋《诸蕃图》[见(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序] (1203—1208年)宋《琼管志》 (1225年)赵汝适《诸蕃志》附录南海条 (1227年)王象之《舆地纪胜》广南西路吉阳军条 (1239年)祝穆《方輿纪胜》吉阳军形势条
元	万里石塘	石塘之骨			万里石塘	(1305年)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
			万里石塘			宋濂《元史》史朝传
			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	(元末明初)蔡徵《琼海方輿志》
	万里石塘					越南诸国,引自《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
明		石 塘	长 沙		石 塘	(1402年)《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石星石塘	石 塘		万里石塘屿	《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 (即1430年《郑和航海图》)引自明茅元仪 《武备志》卷二百四十

			万里石塘	万里石塘 万里长沙	(1521年)唐肖《正德京台志》卷六山川下 (1536年)黄衷《海语》撰途万里长沙条 (1618年)张燮《东西洋考》卷九舟师考 (明)佚名《海道针经》(甲)《顺风相送》定潮水消 长时侯
			万里长堤	万里长堤	(1540年)顾玠《海槎余录》纪录汇编本卷161 (1560年)黄佐《广东通志》卷七十杂亭下
			长 沙	长 沙	(1554/7年)罗洪先《广舆图》东南海夷图 (1557年)张天复《皇舆考》东南海夷图 (1613年)王在晋《海防纂要》东南海夷图 (1618年)张燮《东西洋考》东西南海夷诸国总图 (1573—1620年)章潢《古今图书编》东南海夷图 (1638年)吴国辅《古今舆地图》中今古华夷区域 总要图
					(1643年)吴学俨《地图宗要》东南海夷图 (1644年前)朱约淳《闽史津逮》东南海夷图
					(1560年)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十六外志三、夷 情上海寇条说“石塘在崖州七百里外，下陷八 九尺也”。
			石 塘 海 (万里石塘)	石 塘 海 (万里石塘)	(1618年)张燮《东西洋考》舟师考水星水醒条

续表

朝代	南海诸岛	东沙群岛	中沙群岛	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备注
明	万里石塘(山)					(1573—1620年)黄潢《古今图书编》古南海夷考略 (1578年)提督少卿萧某呈(见梁廷枏《粤海关志》贡舶引)(明)罗日毅《咸宾录》卷六暹罗条
			千里之塘		万里之滩	(明)吴仕训《观海赋》(引自1762年周硕勳《潮州府志》艺文)
清				千里长沙	万里石塘	(1700年)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水路条 (1731年)郝玉麟《广东通志》卷四疆域琼州府
			石	增		(清初)佚名《舆图要览》一卷海夷《东南海夷图》 (1678年)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舆图要览》卷四中东南南海夷图
					长 沙	(1808年)温汝能辑《方輿类纂》卷首輿图《东南海夷图》 (1838年)严如煜《海防辑要》卷首輿图《东南海夷图》
				石 塘 海	长 沙 海	(1697年)金光祖《广东通志》山川万州条 (1726年)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万州条 (1731年)郝玉麟《广东通志》山川万州条 (1822年)阮元《广东通志》山川路万州条 (1828年)胡端书《万州志》山川略 (1841年)明谊《琼州府志》万州条

			千里石塘	(1887年)徐家干《洋防说略》卷上广东海道说万里长沙“自万州遮东直至南澳”，千里石塘“自万州遮南直至七洲洋”。
			石塘	(1831年)《皇朝舆地图略》 (1860年)《皇朝内府舆地图》(萃编本)环海全图 (1871年)马征麟《历代地理沿革图》舆地图 (1884年)《皇朝内府舆地图》环海全图 (1892年)《舆地图》环海全图
			千里石塘	(1730年)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南洋纪 (1820年)谢清高《海录》卷中噶喇吧条尖笔圈条小丘宋条 (1842年)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图 (1870~80年)姚文枬《江防海防志》
			千里石塘	(1868年)魏源《海国图志》卷三沿革图东南洋各国沿革图 (1894年)同康卢《中外地輿图说集成》海国沿革图 (1841年)明道《琼州府志》卷十八海黎志海防 (1908年)钟元棗《崖州志》卷十二海防志
			万里石塘	(1709年)康熙丙申《大清中外天下全图》 (1724年)雍正二年《清直省分图》 (1755年前)乾隆二十年《皇清各直省分图》
			万里长沙	
南澳气	长沙、长沙	七洲洋	千里石塘	
	万里长沙	七洲洋	千里石塘	
	万里长沙		千里石塘	
			万里石塘	

朝代	南海诸岛	东沙群岛	中沙群岛	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备注
清		南澳气	万里长沙	七洲洋(洋)	万里石塘	(1767年)黄证孙《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 (1767年后)朱锡爵《大清万年一统全图》 (1800年)晓峰《清绘府厅州县总图》 (1810年)佚名《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 (1817年)陶晋《大清一统天下全图》 (1839年)周凯《厦门志》卷八番市录、越南条卷四防海略
		南澳气	万里长沙	万里长沙	万里石塘	(1895年)佚名《古今地輿全图》
				万里长沙	万里石塘	(1904年)吴长发《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 (1905年)王兴顺重订《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
	万里长沙					(1838年)严如煜《洋防辑要》卷一《直省海洋总图》 (1842年)俞昌会《防海辑要》卷首《直省海洋总图》 (1866年)毛鸿宾《广东图志》卷六十七琼州府 (1899年)廖廷相《广东总图说》
			万里长沙			郑光祖辑《舟车所至》本中的《海录》

				万里长沙	(1762年) 吴宜燧《龙溪县志》卷十七孝友传余士前 (1777年) 李维钰修《漳州府志》卷四十一人物志 余士前传
	南澳气	长	沙	石塘	(1730年)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四海总图 (1790年) 《乾隆五十五年七省沿海图》环海总图 (1798年) 《咸朝七省洋图》环海总图 (1842年) 邵广文《七省沿海总图》环海总图 (1843年) 邵广文《七省沿海总图》环海全图 (1848年) 徐继畲《瀛寰志略》南洋各岛图 (1860年) 李兆洛辑《皇朝舆地图》环海全图 (1877年) 仓硕《环海全图》卷首之《圆图》 (1881年) 王之春《国朝柔远纪》环海全图 (1883年) 梁世勋《沿海疆域图》环海全图 (1894年) 同康卢《中外地舆图说集成》南洋各岛图 (清代)《海疆洋界形势全图》环海全图
万里石塘 (俗名万里长沙)					(1842年) 颜斯宗《南洋蠡测》 (1868年) 魏源《海国图志》卷九东南海洋图五 万里石塘

清



朝代	南海诸岛	东沙群岛	中沙群岛	西沙群岛	南沙群岛	备注
清				万里石塘		(1822年)阮元《广东通志》卷124海防略水醒水忌条 (1830年)邓焯《岭南丛述》卷九水醒水忌条 (道光刊本)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三十引水醒水忌条 (1841年)明谊《琼州府志》卷十八水醒水忌条 (1842年)魏源《海国图志》卷十八附东南洋道路
				千里石塘	万里长堤	(1678年)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〇五广东界琼州府崖州 (1697年)金光祖《广东通志》卷三十杂纪 (1808年)温汝能辑《方輿类纂》卷二十五广东 (1838年)严如煜《洋防辑要》卷八广东沿海舆地考 (1839年)周凯《厦门志》卷八番市略附海隘 (1822年)阮元《广东通志》卷三十三四杂录 (1841年)明谊《琼州府志》卷四十四杂志 (1908年)钟元康《崖州志》卷二十二杂志纪异
		气	猫士知	长	石	(1717年)觉罗满保《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
			无呢若		塘	(1721年)施世骥《东洋南洋海道图》
		落	东	西	石	(1842年)郑光祖《醒世一泉录》
			沙	沙	塘	

# 石塘长沙考

文焕然 钮仲勋

## 引言

“石塘”系指珊瑚礁。“长沙”或作“长砂”，系指珊瑚岛的周围由珊瑚碎屑构成的浅滩和由珊瑚碎屑构成的沙洲或暗沙等。至于“石塘”、“长沙”，有时加上“千里”或“万里”，系形容其岛、礁、洲、滩很多，分布辽阔之意。由于南海诸岛的南沙、东沙、西沙、中沙四个群岛的形成过程，都与珊瑚虫的活动有关，都有隐没于海水面下的滩、暗沙及礁，除中沙群岛外都有露出水面的岛屿和沙洲，因之，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之为“石塘”、“长沙”或“千里石塘”、“万里石塘”、“千里长沙”、“万里长沙”等。这些古地名有时是泛指南海诸岛，有时是专指南海诸岛中的一些群岛，或某一群岛；同一古地名，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古代文献中所指的地域有的又不相同，还要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判断。

## (一)

公元 225—230 年(三国吴黄武四年至黄龙二年)，吴主孙权派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归撰《扶南传》。该书称：“涨海中，倒(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sup>①</sup>“涨海”是古代对南海的另一种叫法，“珊瑚洲”即珊瑚岛与沙洲，也就是露出海水面之上，虽高潮亦不能淹没的，它们都是以珊瑚虫等活动为主的生物作用而造成的礁块；“洲底”的“盘石”，它是在火山锥或海中岩石的基

础上，也是以珊瑚虫等活动为主的生物作用发展而成的。和康泰大致同时的万震在《南州异物表》中记载从马来半岛的句稚国往中国大陆的航程时有“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sup>②</sup>上述“磁石”系指当时南海尚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船舶在航行时遇上，就搁浅遇难，象被“磁石”吸引，故称为“磁石”。综合上述两者记载，反映当时对于南海中珊瑚岛和沙洲的形态与成因已有所认识。到了宋代，由于航海事业的发达，对南海诸岛的地理认识有较大程度的发展，根据珊瑚礁和沙洲的形态，开始对南海诸岛进行命名，于是“石塘”、“长沙”之名遂在文献上开始出现。

十二世纪七十年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卷一《地理门·三合流》条称：“海南四郡之西南，其大海曰交趾洋，中有三合流，波头溃涌，而分流为三：其一南流，通道于诸蕃国之海也；其一北流，广东、福建、江浙之海也；其一东流，入于无际，所谓东大洋海也。南舶往来，必冲三流之中。得风一息可济。苟入险无风，舟不可出，必瓦解于三流之中。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至于东大海，尾闾之声，震淘无地，俄得大东风以免”（《丛书集成》本）。海南四郡指今海南岛，交趾洋指今海南岛西南及越南中部以东的海洋，从东大洋海在交趾洋之东的地理位置来判断，此“长砂、石塘”应指南海诸岛，“数万里”系形容其分布范围很广。南海诸岛星罗棋布在辽阔无垠的南海上，确实相当广阔，用“数万里”来形容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十三世纪初年编纂的《琼管志》记载：“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船舶往来，飞鸟附其颞颈而不惊。”<sup>③</sup>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127《吉阳军·风俗形胜》条转引上述记载。“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既在吉阳军（治所在今广东崖县）之东，从地理位置来判断，应指南海诸岛。南海诸岛的面积小而地势低平，例如南海诸岛最大的永兴岛，面积也不过1.851平方公里，海拔最高

的石岛，它的高度也只有 12 至 15 米。海上望之，千里外不得见，阴晦天尤难寻觅<sup>④</sup>，这是现代的情况。根据自然界珊瑚礁发展的特点来推测<sup>⑤</sup>，在宋代露出水面的岛屿和沙洲当较今为少，就是露出水面也较今为小且低，故称其“上下渺茫，千里一色”。这样地描述还是符合南海诸岛的地理特征的。

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赵汝适的《诸蕃志》自序称：“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sup>⑥</sup>“床”、“塘”音相近，“石床”即“石塘”<sup>⑦</sup>。《诸蕃志·志物》附载海南条称：“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冯承钧校注本）《诸蕃志》之记载与《琼管志》基本相同，惟字句稍有差异，仍是指南海诸岛。《诸蕃志》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床”一带的海域描写成航海的危险地区，要谨守罗针，才能幸免，实与南海诸岛暗礁、险滩较多有关。

汪大渊在元至正年间（1341—1367 年）曾随商船航海，游历南洋及印度洋沿岸各国，就其见闻，著《岛夷志略》一书，该书在万里石塘条记载：“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邐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故原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渤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sup>⑧</sup>汪大渊概念中的“万里石塘”不仅是泛指南海诸岛，而且从“地脉”的角度出发，认为它“迤邐如长蛇”，从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安县治）至爪哇（今印尼爪哇中部北岸一带）、至渤泥（今加里曼丹岛）及古里地闷（今帝汶岛），甚至远至昆仑（指印度以西到非洲东岸），故其云：“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sup>⑨</sup>汪大渊把“万里石塘”视为一个“迤邐如长蛇”的整体，这种认识对后代还有一定的影响。

十五世纪初期，明朝政府大力发展中国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著名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往返都曾经由南海。

《郑和航海图》是我国现在还保存的最早的海图，这部图所表现的大概是1430年（宣德五年）郑和最末一次下西洋的航程与地理情况。该图的第十一页绘有“石塘”、“万生石塘屿”、“石星石塘”，第十页下还绘有“石星石塘”，与第十一页的“石星石塘”连在一起<sup>⑩</sup>。“万生”应作“万里”。向达先生认为“石塘”和“万里石塘屿”都是指西沙群岛，“石星石塘”是指东沙群岛<sup>⑪</sup>。我们同意向达解释“石塘”是指西沙群岛，而“万里石塘屿”则应指南沙群岛，因为从图上可明确看出“万里石塘屿”的方位在“石塘”的东南。至于“石星石塘”，我们认为不仅指东沙群岛，更可能的是指中沙群岛，其理由：一是“石星石塘”在图上的标示范围较大，不象专指东沙；二是“石星石塘”同“石塘”及“万里石塘屿”标示形状有所不同，“石塘”与“万里石塘屿”均作岛礁状，而“石星石塘”以小圈与略大圈交错表示，很可能是反映水中的暗沙<sup>⑫</sup>。《郑和航海图》反映中国古代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地理认识，从泛称为“长砂、石塘数万里”，发展到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再进而发展到分别为“石塘”、“万里石塘屿”、“石星石塘”，这说明通过实践在地理认识上逐步有所提高。

十六世纪三十年代，黄衷的《海语》卷下《畏途·万里石塘》称：“万里石塘在乌漚、独漚二洋之东，……其产多玳瑁，……舵师脱小失势，误落石汉，数百躯皆鬼录矣。”（《学津讨原》本）乌漚洋指乌珠山或乌猪山一带海洋，即今广东上川岛东一带海洋；独漚洋指独珠山或独猪山一带海洋，即今广东万宁县南海中独珠山一带的海洋，“万里石塘”在乌漚、独漚二洋之东，应指西沙、中沙二群岛。“石汉”可能是指隐没在海平面下的珊瑚礁，因此，成为航海的“畏途”。同书卷下《畏途·万里长沙》称：“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风沙猎猎，晴日望之如盛雪，舶误冲其际，即胶不可脱，必幸东南劲风，乃免陷溺”。“万里长沙”既在“万里石塘”东南，应指南沙群岛。

南沙的礁滩众多,分布很广,故同样成为航海的“畏途”。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顾峴的《海槎余录》记载:“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之外,相传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舶必远避而行,一坠即不能出矣。万里长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回溜中,未有能脱者”(《纪录汇编》本)。“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以里距推之,应指中沙群岛。按中沙群岛全部是潜伏在水中的暗沙,《海槎余录》描叙“千里石塘”在水下,情况与中沙较为符合。“长堤”疑指珊瑚岛之崖壁。“万里长堤”在“千里石塘”之南,当指南沙群岛。

《海语》将“万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海槎余录》将“千里石塘”和“万里长堤”较为明确地区分开来,并指明其方位,描述其地形特征,在地理认识上不能不视为是一种进步,但在明代,对长沙、石塘持笼统地看法,仍然也还有的。如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成书的王佐《琼台外纪》仍记载:“(万)州东长沙、石塘。”<sup>⑬</sup>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章潢的《古今图书编》卷五十九在叙述从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至暹罗(今泰国)的航程时记载:“若遇东风飘舟西行,即舟坏犹可登山。遇西风飘入东海中,有山名万里石塘,起自东海琉球国,直至南海龙牙山。潮至则没,潮退方现。飘舟至此,罕有存者。”(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按当时琉球指台湾,龙牙山可能是指南沙群岛中的某岛。“万里石塘”既在由香山至暹罗的航线以东,当指南沙群岛,把它描述成从台湾延续到龙牙山,则显然受汪大渊《岛夷志略》的影响。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该书上卷《南澳气》称:“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磔古石。底生水草,长丈余。湾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阁不能返。……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

沙之南，又生礮古石至七州洋，名曰千里石塘”(乾隆刻本)。从上述记载，并结合该书所附《四海总图》来看，“南澳气”指东沙群岛，“万里长沙”指中沙群岛，“千里石塘”指南沙群岛，“万里长沙头”指从东沙群岛南续的沙垠。《海国闻见录》反映了当时在地理认识上较前又大大进了一步。但在清代如同在明代一样，将“万里长沙”和“千里石塘”明确区分者有之，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笼统称呼者也有。前者如 1887 年(光绪十三年)徐宗干《洋防说略》卷上《广东海道》：“又有万里长沙，自万州迤东直至南澳。又有曰千里石塘，自万州迤南直至七洲洋，粤海天堑最称险阻，是皆谈海防者所宜留意也。”(光绪十三年刻本)此处“万里长沙”应指中沙群岛，“千里石塘”应指西沙群岛。后者如 1700 年(康熙三十九年)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四《水语》：“万州城东外洋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盖天地所设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文汇堂藏板刻本)甚至有将“万里石塘”与“万里长沙”不分的，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颜斯综《南洋蠡测》：“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而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帙)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石塘”、“长沙”等地名是随着地理认识的提高，逐渐有所发展的。它的发展大势是：最先是“石塘”、“长沙”或“千里石塘”、“万里长沙”笼统地放在一起泛指南海诸岛，逐步发展到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明确区分开来指南海诸岛中某一个群岛或二个群岛，最后终于发展到将南海诸岛的四个群岛全部区分开并用上述地名专指某一群岛。总的发展大势是如此，但由于人们的实践不同，地理认识也不一致，同一时代对上述地名的地域概念看法多有差异，有些前代的看法在后代仍长期地保存下去。

## (二)

上节主要讨论了“石塘”、“长沙”等地名的起源及其发展，本节再进一步讨论这些地名在不同时代，不同文献中的地域概念问题。

“石塘”一名始见于《宋会要》<sup>⑭</sup>，在该处是指南沙群岛，但它在《岭外代答》中却同“长沙”在一起泛指南海诸岛，在宋代可以说是两种概念同时存在。后代，专指南沙群岛的较多，如《海国闻见录》附图、徐继畲《瀛寰志略》附图等；同“长沙”一起泛指南海诸岛的较少，如《琼台外纪》。此外，“石塘”也可以指西沙群岛，如《郑和航海图》。

“万里石塘”一名始见于《琼管志》，在该处是和“千里长沙”在一起泛指南海诸岛；稍后，又见于《宋会要》<sup>⑮</sup>，在该处是专指南沙群岛，在宋代也可以说是两种概念同时存在。后代，专指南沙群岛的较多。如《元史·史弼传》、《郑和航海图》、《南洋蠡测》等；泛指南海诸岛的较少，如《岛夷志略》。此外，“万里石塘”也有指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如《海语》。

“千里石塘”一名始见于《海槎余录》，这一地名的出现远较“石塘”、“万里石塘”为晚，在该处是指中沙群岛；但在他处大都是指南沙群岛，如《海国闻见录》、《海录》、《海国图志》附图。此外，也有指西沙群岛的，如《洋防说略》。

“石床”、“万里石床”仅见于《诸蕃志》，在该处是同“长沙”、“千里长沙”在一起泛指南海诸岛。“石栏”（“栏”与“塘”音相近）一名仅见于《顺风相送》，在该处指西沙和中沙群岛。

“长砂”一名始见于《岭外代答》，在该处是和“石塘”在一起泛指南海诸岛。后代，虽也有沿用这种概念的，如《琼台外记》；但较多的是指中沙群岛，如《海国闻见录》附图、《防海辑要》附图、《瀛寰



志略》附图等。

“千里长沙”一名始见于《琼管志》，在该处是和“万里石塘”在一起泛指南海诸岛，稍后，《诸蕃志》也是沿用这一概念。后代，这一地名比较少见，仅在有的地方志中引用古志时提到，如《万州志新稿》或《古宁野记》<sup>⑩</sup>。

“万里长沙”一名始见于《海语》，在该处是指南沙群岛。但也有指中沙群岛的，如《海国闻见录》、《海国图志》附图、《洋防说略》等。

“万里长堤”一名仅见于《海槎余录》，在该处是指南沙群岛。

总之，有关“石塘”、“长沙”这一类地名是很复杂的，一定要根据文献记载的方位、地理特征等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搞清楚。

### (三)

宋代，“石塘”及“万里石塘”之名也为外国人在航行南海时所用。《宋会要》记载：1018年（天禧二年）占城（在今越南南部）使臣罗皮帝加称其国人来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堂，则累年不达矣”<sup>⑪</sup>。“堂”应作“塘”，见《宋史·占城传》。“石塘”在该处应指南沙群岛，因南沙地处占城至广州的航线以东，海舶从占城出发，有被风飘至这一带的可能；南沙离广州较远，“累年不达”较为可能。《宋会要》又载：1216年（嘉定九年）真里富（可能在泰国庄他武里）使臣述其来华航程时云，在占城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复溺者十七八，绝无山岸。”<sup>⑫</sup>“有石塘，名曰万里”，即“万里石塘”，它在该处亦指南沙群岛，因其方位在占城东南。

十六世纪初期，葡萄牙人东来以后，在葡萄牙的地图上即出现“帕拉塞尔”这一地名<sup>⑬</sup>，葡文 Parcel，是“暗礁”或“礁石”的意思。在帕拉塞尔一名尚未出现以前，葡萄牙人曾用 barrairas 或 ya bastiga 来标示它<sup>⑭</sup>，葡文 barrairas 是“栏”或“石栏”的意思，葡

文 ya bastiga, 是“栏”、“栅”的意思, 亦即“石栏”、“石栅”。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 在一些日本地图上, 亦标示有“万里石塘”、“万里长沙”这一类的地名, 如日本江户时代手书彩绘革制本、手绘彩色屏风的《东亚航海图》及《世界图》绘有“万里石塘”及“万里长沙”者甚多。公元 1580 年(万历八年)西方天主教士利玛窦来华, 1584 年(万历十二年), 他在广东肇庆画世界地图, 以后又经过多次增订刊刻, 到 1602 年(万历三十年), 刻成《坤輿万国全图》, 在我国流传, 该图上亦标示有“万里长沙”。上述这些外国地图上的地名, 显然是受我国的“石塘”、“长沙”这一类地名的影响。至于这些地图上所绘“帕拉塞尔”或“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究指何地? 还要根据图上的地理位置, 如系绘有经纬度的地图, 还应根据经纬度, 来进行具体分析。近年已有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 兹不赘述。

#### (四)

上节我们讨论了外国人航行南海时或外国文献图籍上有关“石塘”、“长沙”这一类地名的问题, 本节我们专门来讨论越南史籍中有关“长沙”的问题。

据目前所知, 越南史籍中记载“长沙”这一地名始见于十一世纪中叶李太宗进攻占城之役。越南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记载: “甲辰, 发京师, 乙巳, 次大恶海口……抵麻姑山……过河脑湾……一日过大、小二长沙, 抵思容海口。”<sup>②1</sup> 越南潘清简《越史通鉴纲目》亦记载李太宗攻占城时, “越大、小二长沙, 直抵乌龙海口。”<sup>②2</sup> 其后, 1069 年李圣宗进攻占城时, “大长沙”这一地名再次出现, 《越史略》记载: “圣武元年, 春二月……乙丑, 使大僚班黄捷攻日丽海口, 克之, 己巳, 渡大长沙。庚午, 次思容海口。”<sup>②3</sup>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越南史籍对“大、小二长沙”地望的解释: 潘清简在《越史通鉴纲

目》注释“大、小长沙”引黎贵惇《抚边杂录》：沿海岸自日丽海门，南至明灵海门，号大长沙<sup>②4</sup>。越南潘辉注《皇越地輿志》记载：“自越海门至思容门乃大长沙，北海门为小长沙。”<sup>②5</sup>《大南一统志》卷七广治省“形势”记载：“……更有大长沙，遵海而南，俨然沙城拥护，实畿辅形胜之地也。”在“长沙”条下注：“自越安汛口，遵海而南，古号大长沙，延袤百余里，东接海滨，西连林木，民居重岫叠阜皆白沙，与承天府同为沙城延亘。”（昭和十六年版）综合上述的越南史籍的解释，大、小长沙就是今越南平治天省沿海岸的沙滩和岛屿。这样的解释从李太宗、李圣宗进攻占城的路线来看也是符合的，当时越南在北，占城在南，从海路进攻，沿海岸航行，最为捷径。再从李圣宗进军的日程上来看，己巳日渡大长沙，庚午日也就是次日抵思容海口，大长沙离思容海口甚近，仅一日程，这与黎圣宗（1470—1498年）时绘制的《洪德版图》标注的“长沙一日程”即长沙与陆地之间只有一天的航程是吻合的。

中国的史籍关于越南的“大、小长沙”的记载同越南史籍基本上是一致的。《宋史·占城传》记载：“舟师停南界海口，进占日丽海口，复占大小长沙，至尸利皮奈登陆”。明万历年间邓钟绘制的《明安南图》，把“大长沙海口”绘在“广南承政”的北面海口处，把“小长沙海口”绘在“顺天承政”的北面海口处<sup>②6</sup>。

此外，在《大南一统全图》<sup>②7</sup>也有“万里长沙”，这个“万里长沙”，我们只要看一看该图，就可以知道在哪里？该图从平治天省海云港口起，经广南，义平省直到富庆省沿海岸边，绘有一只脚形状的虚线，中为一系列的岛屿。在此群岛的北部标示为“黄沙”，南部为“万里长沙”，其地理位置明显在越南中南部沿海岸边，即今占婆岛、广东列岛等。

总之，越南史籍上的“大、小长沙”、“万里长沙”等大都指越南中南部沿海岸边的岛屿、沙滩，均与我国南海诸岛无关。

## 结语

“石塘”、“长沙”等这一类地名的起源是与南海珊瑚岛的形态与成因有关的。我国古代文献中这一类地名有时泛指南海诸岛，有时是专指南海诸岛中某一群岛或某一些群岛。同一地名在不同时代，不同文献中所指有时也有所不同。至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至十九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及日本图籍中的“帕拉塞尔”、“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显然是受我国的“石塘”、“长沙”这一类地名的影响，所指究系何地，亦应根据其地理位置进行具体分析。越南史籍中的“大、小长沙”、“万里长沙”等大都指越南中南部沿海岸的岛屿、沙滩，而非我南海诸岛。我们在研究南海诸岛的古地名时一定要分辨清楚。

### 注释：

- ① 《太平御览》卷 69 引。（中华书局 1960 年印本）
- ② 《太平御览》卷 790 引。
- ③ 《琼管志》一书久佚，兹据王象之《舆地纪胜》（粤雅堂刊本）卷 127《广南西路·吉阳军·风俗形胜》条转引。
- ④ 参看郑资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8—9 页，商务印书馆 1947 年出版。
- ⑤ 参看何纪生、钟晋梁《从考古发现看西沙群岛珊瑚礁的成长率》。（1979 年 8 月油印本）
- ⑥ 据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 1956 年 10 月出版）的赵汝适序，此序函海本及学津讨原本均无。
- ⑦ 参看日藤山丰八《岛夷志略校注》万里石塘条，文殿阁庄据国学丛刻本 1936 年重印本。
- ⑧ 同上。
- ⑨ 同上。
- ⑩ 该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见明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卷 240。该图原来是手卷式，收入《武备志》后改成书本式故有页数。
- ⑪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附载《地名索引》，中华书局 1961 年 9 月出版
- ⑫ 参看《郑和航海图》10—11 页。
- ⑬ 《琼台外纪》一书已佚，据道光《万州志》卷 3《舆地略·气候·潮汐附》转引。

- ⑭ 《宋会要辑稿》197册蕃夷古国条，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
- ⑮ 同上197册蕃夷真里富条。
- ⑯ 据道光《万州志》卷3《山川略·川·长沙海·石塘海》转引。
- ⑰ 同注⑭。
- ⑱ 同注⑮。
- ⑲ 《葡萄牙海外活动杰出地图集》，1960年里斯本出版，该图集有关帕拉塞尔的图幅甚多。
- ⑳ 《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发现中国和绘制罗盘航海地图》载《通报》第39卷增刊，1944年莱登出版。
- ㉑ 《大越史记全书》卷2，李纪1，太宗（明治十七年日本埴山堂重刻本）。
- ㉒ 《越史通鉴纲目》卷3，李太宗（1956年北京图书馆抄越原刻本）。
- ㉓ 《越史略》卷2，圣宗（《守山阁丛书》本）。
- ㉔ 同注㉓。
- ㉕ 《皇越地輿志》卷1（明命十四年佛山金玉楼藏本）。
- ㉖ 明清我国古地图中类似这种绘法的还有，兹不一一列举。
- ㉗ 见《黄沙和长沙特考》载西贡《史地》季刊1975年第29期。

# 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记载上有关西沙群岛归属中国的几条资料考订

韩振华

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记载上的“中国诸岛”(Ilhas da China)或“广东诸岛”(Ilhas da Cantao)是指包括我国西沙群岛在内的一群大大小小的岛屿,北至广东珠江口外的海上诸岛,南至西沙群岛的“二大巨石”——高尖石和石岛,都包括在葡人所说的“中国诸岛”或“广东诸岛”的范围内面。有时候,葡人亦称它为“中国岛”(I. Chiis)。十八世纪以来,在用中文翻译葡萄牙的《地图》中,位置在那相当于今天南海诸岛的范围内,写上作为归属标志的“干罩”或“干豆”二字,这就是移译葡文 Cantao 或 Canto 的音译,亦即“广东”,表示是归属于我国“广东”省的。由于这些葡文地名,只是在葡人东来后的初期著作中,才能见到,过去对它注意不够,或考订未详,甚至因缘附会,冒名顶替,也曾发生。为此,作考释如下。

## (一) 包括在“中国诸岛”或“广东诸岛”内面的海中“二大巨石”(高尖石与石岛)

1514年6月葡萄牙派阿耳瓦雷斯来中国,他是从马六甲乘搭中国式帆船即戎克船,直航至广东屯门。这是葡人东来后第一次和中国有直接往来的第一桩事件。接着,1516年巴罗士也乘搭中国帆船直航广东。下一年,1517年费尔诺·庇留士率领的一支由

八只船所组成的葡萄牙舰队,其中有四只船是中国帆船,但全部船只,都配备有中国人充当舵师<sup>①</sup>,他们向“中国诸岛”直航,并安全抵达广东<sup>②</sup>。可见葡萄牙人最早那几次由马六甲直航中国广东的航线,都是依靠中国帆船或中国人的舵师所行走的航线来航行,才能安全抵达“中国诸岛”的广东。既然,葡使之来中国,其所采取航线,是由马六甲直航中国广东,中间没有停留他国,这条航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外沟”航线,大体上,是利用西南季候风盛吹的季节,由马六甲启航,离开海峡,北行至地盘山(Pulo Tioman),然后东北行,从西沙群岛东面和中沙群岛西面之间的海面上,直穿过去,便可到达广东珠江口连接大海的各个岛屿和港口。这一条外沟航线,直至今天,还在使用,今天由新加坡直航香港的航线,基本上还是和从前的外沟航线差不多,都要从西沙群岛的东面海域通过去的<sup>③</sup>。

据葡人的记载,1514年阿耳瓦雷斯由马六甲乘中国式帆船直航,到广东屯门之前,先经过有“二大巨石”矗立海中的大海。这“二大巨石,其一为古老的小岛,另一为小小的小岛,中国人管它叫做后头门(Hou T'eu-men)或简称为后门(Hou-men)<sup>④</sup>。”这“二大巨石是包括在被称为中国诸岛(Ilhas da China)或广东诸岛(Ilhas da Cantao)之内<sup>⑤</sup>”。如果从当时中国帆船或中国舵师经常所采用的外沟航线来看,在到达中国广东屯门以前的大海中矗立着这“二大巨石”,只有在外沟航线通过西沙群岛东面海域之时,才有可能在茫茫大海之中,看见到突然矗立海中的这个“二大巨石”。我认为,这“二大巨石”,就是今天西沙群岛东七岛——即宣德群岛——当中的高尖石和石岛。石岛长380公尺,宽240公尺,面积0.08平方公里,它是由第四纪中期(距今5万至50万年)隆起的珊瑚礁所构成的。它是我国南海诸岛当中最高的一个岛,海拔15.9公尺。葡人所说的“二大巨石”之一是“古老的小岛”,显然这

是指石岛,从露出水面的西沙群岛的各个岛屿来讲,石岛确是一个最古老的小岛,据用同位素测定,石岛形成至今,已有 14000 年左右,而且以它的巨大岩石高矗海中而闻名,至今尚称为石岛。高尖石是西沙群岛唯一由火山碎屑岩所构成的小岛,高出海面 5.2 公尺,略呈三角形,近代外国人称它为金字塔石,并说它与同在这一海域内的其他礁石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那样巨大的、从水底下长出来的”<sup>⑥</sup>。中国人又称它为双帆石、石船、或尖石、高尖石,长 20 公尺,宽 15 公尺,四壁陡立,不易攀登,但它却是航海上的很突出的标志之一,船只从南洋直航广东,大海中一看到它,便可以知道到达靠近西沙群岛了,同时也可以利用它来校正帆船上所使用的罗盘方位,有利于下一段航行正确方位的取得。葡人所说的矗立海中“二大巨石”之一是“小小的小岛”,这种说法,对高尖石来讲,也是与它的地形地貌是很符合的。

上文矗立海中的“二大巨石”,据葡人说,被中国人管它叫做 Hou t'cou-men(后头门)或简称为 Hou-men(后门)。葡文记载上的 Hou t'cou-men 或 Hou-men,有人认为即中文“虎头门”或“虎门”的对音,但是广州虎头门或虎门要塞,它的位置是在葡人到达广东东莞屯门之后。当 1514 年阿耳瓦雷斯来中国时,他只到屯门为止,没有溯珠江口而上,那里抵达得了虎头门或虎门,这一点,外国诸考释家们,他们自己也是清楚的。于是他们转弯抹角,提出什么葡文记载中的 Hou t'cou-men 或 Hou-men,是一个冒名顶替的虎头门或虎门<sup>⑦</sup>。但是,早期葡文记载,都把广州虎门,管它叫“冒险乐园岛”(I. Ventura)<sup>⑧</sup>不叫虎门。然则这一个不是广州虎头门或虎门的葡文译音的 Hou t'cou-men 或 Hou-men,究竟位于到达屯门以前的大海中之何地。此则诸家缄口不言。我认为,葡文所记的中文译音 Hou t'cou-men 或 Hou-men,既然不可能把它还原为广州的虎头门或虎门,那么就应该干脆放弃把它还原为虎头门



或后门此说。葡文译音的 Hou t'eou-men 或 Hou-men, 与其把它还原为虎(Hu)头门或虎门,不如把它还原为“后(Hou)头门”或“后门”(Hou-men),在对音上,当更恰当。至于它们的位置,我认为即今高尖石与石岛,其说如下。

到达广东屯门之前,在大海中有“二大巨石”,矗立海中,名叫“后、头门”,我认为这也就是中国记载上所说的在万里长沙、千里石塘附近的“琼洋”(属于琼州府洋面)的前、后岭<sup>⑤</sup>。葡人所说的后头门,我认为应作“后、头门”,亦即后门、头门,后门即后岭,头门即前岭。闽粤一带方言,粤语曰前头,闽南语曰头前,其意皆曰前面。因此,“后、头门”即“前、后岭”,从地名的名字上和地理方位上,都是指西沙群岛的高尖石和石岛。高尖石在南面,故曰前岭或头门,石岛在北面,故曰后岭或后门。前南、后北,这也是中国人习俗上所惯用的地理方位的名称之一。前、后岭或后、头门(前、后门),常被作为航行在这一海域中的二大标志,尤其是石岛(后门、后岭)更是如此,所以后门就比较著名一些。如果说“后、头门”可以简称为“后门”,那也是只有在上述这种意义上,亦即“后、头门”当中以“后门”更为重要、更为著名,故以“后门”作为“后、头门”的总称或简称。

值得注意的,是:葡文所说的矗立海中二大巨石,即“小小的小岛”的“头门”(今高尖石)和“古老的小岛”的“后门”(今石岛),它们都是包括在“中国诸岛”或“广东诸岛”的范围之内,如果它们不是属于中国,或者不是属于广东省所管辖,当然也就不能包括在“中国诸岛”或“广东诸岛”的范围之内,这个道理是很显浅易懂的。如果认为葡人所说的“中国诸岛”之一的上川岛,是属于中国所管辖的北面“中国诸岛”之一<sup>⑥</sup>,为什么在南面“中国诸岛”,亦即同样属于“中国诸岛”之一的海中二大巨石的“后、头门”,就不是归属于中国,那也是没道理的。

上述葡人所说的，在海中矗立的“二大巨石”（今高尖石和石岛），也可以在其他早期葡萄牙的《地图》中看到，例如 1541 年<sup>⑪</sup>、1544 年<sup>⑫</sup>、和 1556 年<sup>⑬</sup> 葡萄牙人所绘的《地图》，在相当于今北部湾口对面的海中，有“二山”之门（海峡），和海中“二山”。这和上述葡人所说的矗立海中的“二大巨石”之门或“二大巨石”的小岛，是一样，尽管《地图》上没有标明“二山”之归属，但由上述“二大巨石”是包括在“中国诸岛”或“广东诸岛”范围之内<sup>⑭</sup>，故知“二山”也是同样地包括在“中国诸岛”或“广东诸岛”的范围内面，都是归属于中国的或广东省的。

## （二）“中国大海湾”内面的“中国岛”

在葡人东来后的早期葡萄牙的《地图》当中，其绘图水平相当差，几乎与十六世纪重绘的托勒密(Ptolemy)《地图》远东部分的轮廓差不多<sup>⑮</sup>，甚至把日本画在大海湾东面未知陆地的南部，原因在于当时尚未直航中国，故对中国大海湾内的一些岛屿（包括当中的中国岛），也是来自耳闻，没有可靠的具体方位可言。但是，随着葡人直航中国之事告成，葡人绘图学又在不断前进，并取得了在当代名列前茅之一。在上述早期的葡图中，有一幅 1519—1522 年《地图》，大约位于“中国大海湾”(golfus magnus chinnaurum)之中，绘有一系列的大小岛屿，其中有一个岛，名叫“中国 (Chiis) 岛”<sup>⑯</sup>，这里应指包括“二大巨石”或“二山”在内的“中国诸岛”（或“广东诸岛”），亦即当指包括今天我国西沙群岛在内的“中国诸岛”或“中国岛”。

另有一张 1522 年葡萄牙的《地图》<sup>⑰</sup>，在面对中国的“大湾”内面，有一个小岛，名叫中国 (Chiis) 岛，应亦如上所云，当指包括我国西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岛。

### (三) 葡图“巴屿港”有归属“中国的”标志

1541年<sup>⑱</sup>、1544年<sup>⑲</sup>、1553年<sup>⑳</sup>的葡萄牙《地图》，在相当于昔日“中国大海湾”内的“中国(Chiis)岛”位置上，有一个“港”，名叫“Paxo 港”，即中文巴峙港或巴屿港的对音。至今，海南岛渔民尚称西沙群岛首邑永兴岛叫做巴峙或巴屿(也有称巴岛)。海南岛方言，称树林为巴<sup>㉑</sup>，所以巴峙或巴屿，即林峙或林屿。葡图的Paxo，即巴屿、巴峙的对音，意即林屿、林峙<sup>㉒</sup>。1571年的葡图，在一只脚形状的航海危险区(指古帕拉塞尔)的东北角外面，有l. dos Boiças，意即林岛<sup>㉓</sup>。可见葡图对于永兴岛，从原先的中文译音Paxo(巴屿、巴峙)，改为中文译意的林屿(Boiças)。值得重视的，是1556年的葡图<sup>㉔</sup>，在与上述Paxo港完全相同的位置上，有“Papo 港”，下面写上Cham一字。Papo港即Paxo港(巴屿港)之误写。Cham即Chama的变格，作为形容词。有如葡文China或Chima，即中国，其变格Chim，意即中国的。Chama和Cham，也是这样的。早期葡文，对如何书写China(中国)一名，尚未定型，有不止一种写法，其中之一，就是Chama，例如把支那交趾拼写为Chamacochin<sup>㉕</sup>，可以佐证。Chama为书写文字的写法，读起来应为Chana。早期葡图当中，Chana与Chama是通用的<sup>㉖</sup>。Chim与Cham也是互通的，其意均为“中国的”。所以Chama(中国)的形容词为Cham(中国的)。在“巴屿港”(Papo>Paxo)的下面，写上“中国的”(Cham)这个字，就是表示该地是归属“中国的”(Cham)。今天地图，在岛名底下，注明国名，表示归属该国，也是同上面所说的同一样表示归属标注的一种表现方法。

巴屿港(林屿、林岛)为什么称“港”呢？这是由于它是西沙群岛各岛屿当中的最大、最优良的港口，可以停泊船只，对它才特地

称之为港。明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在海南岛文昌、万州对面的大海之中，绘有“港”“圣石甚险”<sup>⑳</sup>。“港”即巴屿港，“圣石甚险”即石塘。“港”是指西沙群岛唯一的良港——巴屿港，故不书其名，亦知此港仅有巴屿港（永兴岛港）才堪充当。又，巴屿（林屿）亦称“猫注”、“猫住”<sup>㉑</sup>，意即可以泊船下“猫”（锚）停“住”之意<sup>㉒</sup>，这也证明巴屿（永兴岛）确是一个可以下猫停住的港口<sup>㉓</sup>。“猫住”这个名称，在早期葡图中，也有表示出来，例如1561年雅各普·加士塔尔底《亚细亚地图》，在交趾支那与海南岛中间，绘有Pulo Mio，意即“猫叫岛”，这是误把中文的“猫住”岛，直译为猫叫，不知“猫住”的猫，还有下猫（锚）、抛猫（锚）的意思，意即该岛是可以“下猫（锚）停住”之港。总之，葡人初来中国，开始时都是跟着“非法”的中国走私贸易帆船川走外沟航道，因此，有不少地名、岛名，都是沿用中国人所惯用的名称，直接移译，变成葡文地名、岛名，巴屿（林屿）港之作Paxo或Boicas，以及猫住岛之作Pulo Mio，都是其例之一罢了。

### 附：干豆考

十八世纪中国翻译葡萄牙的《地图》中有万里长沙、万里石塘（泛指南海诸岛）并有归属于“干罩”或“干豆”（葡文Canto，广东）的标注。

十八世纪前期，中国人翻译当时西洋人的地图，在中国南海中，有“干罩”一名<sup>㉔</sup>，表明中国南海的石塘、长沙及其海面上的一些岛屿，是归属干罩的，干罩即葡文Cantao或Canto的对音，亦即中文广东的译音。由于译人不知Cantao或Canto即广东的葡语译音，反而按照原文又再音译为干罩，<sup>㉕</sup>（有如夫人一名，传到满族人那里，以后中国人又把它译音，成为中文之福晋，不知底细之人读了它，就有丈二金刚，摸不到顶之感，会弄不清楚的，干罩为广东二

字的中文译音，也是这样的。)上述这两张《地图》是十八世纪初清朝官方翻译欧人所绘《地图》，即(1717)年觉罗满保《西南各番针路方向图》和 1721 年施世驃《东洋南洋海道图》，图中有广东诸岛的“干豆”(音译外文 Cantao, Canto, 即广东)，作八个小岛形状，上一、中三、下四的排例，此指下八岛(今永乐群岛)<sup>⑳</sup>。在干豆诸岛(广东诸岛)的东面海上，靠近菲律宾的吕宋岛，有“猫士知无呢啫”，即葡文 Mar S. de Bolinao, 意即“无呢啫的南海”，指吕宋岛西北部在北纬 16° 余的“无呢啫岬”(Cap Bolinao)外面的海面。它的南面，有“猫士知马升愚洛”即葡文 Mar S. de Masingaru, 意即“大中国的南海”，指今黄岩岛(北纬 15°08′, 东经 117°45′)<sup>㉑</sup>。

十九世纪前期，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所绘的一些地图<sup>㉒</sup>，也有参考某些翻译过来的西洋人所作的地图，因此，在标志着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的归属之中，仍然按照葡文的广东二字译音——Cantao 或 Canto, 译为中文“干豆”<sup>㉓</sup>，表示我国南海诸岛的万里石塘、万里长沙是归属“广东”(干豆)的。至今，我国西沙群岛最北面的北礁，仍称为干豆，就是保留这种称谓的遗迹。有可能，我国海南岛渔民在西沙群岛海面上，进行捕捞作业时，遇到外国船或乘搭中国船的外国人向他们询问该处为何地、何属？他们答曰：广东。如果用洋泾浜葡语回答，就说成“干豆”(Cantao, Canto)了。干豆一名，沿用既久，本意渐失，至今许多到过西沙群岛的海南岛老渔民，只知干豆指北礁，不知干豆此名为何义<sup>㉔</sup>，原因恐亦在于海中久已不讲洋泾浜的葡语，有以致之。

直至清朝末年，仍然认为广东省沿岸所面对的大海，南至婆罗洲大岛为界，都是属于“(广东)省境”的“海”。据清廖廷相、杨士骧《广东全省海图总说》说：“广东全面濒海，东南值吕宋群岛(今菲律宾)，南对婆罗大洲(今加里曼丹大岛)，西南际越南东境，海面辽阔，总名南洋，属(广东)省境”<sup>㉕</sup>。因此，清代地图，把相当于上述属

广东省境的中国之南洋洋面，包括昔日的万里石塘、万里长沙在内，标注着“干豆”（即广东 Cantao、Canto）二字作为归属广东的标志，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弄清楚“干豆”是外文“广东”（Cantao、Canto）的中文译音，那就和上文所说的中国之南洋“属（广东）省境”是一样容易明白的。

### 注释：

① 以上参阅 Tien-tsê Chang: Sino-Portuguese Trade, p.35. Leyden, 1934. 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第 35 页，莱登 1934 年出版。Barros: Decada 第三卷第二册第六章第 178 页。（引自张天泽：同上书，第 37 页）并参阅张天泽：同上书，第 40 页，第 41 页和周景濂：《中葡外交史》第 10 页第 11 页。（商务版）

② 艾耳特不列兹：《东方海上势力的背景》第 137 页，墨尔本，1948 年。F. B. Eldbridge: The Back-ground of Eastern Sea Power, p.137. Melbourne, 1948.

③ 关于内、外沟航线，《中国海指南》有这样的记载：

“西南季候风，由新加坡到香港航线——当六月时，西南季候风正常来临，由新加坡到香港的航程是采用外沟航线（Outer Passage），亦即从草鞋石（Pulo Sapata）东面到中沙群岛（Macclesfield Bank）之间是很适合的（航线），在大海中是比靠近海岸更有经常固定的顺风可得。当四月初，季候风正当转换的季节，从暹罗湾有时会吹出一股西风，把船只直送到中沙群岛（Macclesfield Bank），然后再从那里顺着东风，驶向香港。

“这一条航线是有危险的，如果航行的船只没有在十月初抵达草鞋石（Pulo Sapata）的话，靠近该岛（P. Sapata）在该月（十月）中旬（或十月的正中）开始吹着一股微弱的北风，在那变化无常的天气，看来很平静，但却伴随着强劲的向南流向的海流，为此，很多船只就有好几天在这里迟滞不前，一点儿也不能向北前进，来自南面的好风，甚至迟至 11 月 1 日，有时也会遇到，但这种例子是极少极少的。

“有些船只采取外沟航线，用强烈的西南风南风（来驶船），另外，还有些船只，在同样的月分里采用内沟航线，用从东京湾吹出来的西北风与西风（来驶船），当在阴晦和下雨之日，就有被送到帕拉塞尔礁（Paracel reefs）的危险；如果船只是较为脆弱，还是选择在强劲西南风劲吹之际，采取内沟航线较为适当，也可以多得淡水，海面是那样平滑，靠近海岸又很近，如需下碇，随时可泊。从这个（东京）湾吹出来的风，并不经常如此。随时都可以看到大陆。

“内沟航线，从东西竺（Pulo Aor）启航，沿着海岸，到列当（Redang）群岛，然后横渡暹罗湾，再沿着柬埔寨与交趾支那的海岸，一直到土伦角（Cape Touron）。由此，航往海南岛的西南部，沿着该岛海岸，航至七洲列岛（Tayu Islands）；然后渡海到中国海岸，约在电白或海陵山之处。”

以上见 John W. King: *The China Sea Pilot*, 4th ed, (London 1861) p.384.

④ 见 Albert Kammerer: *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sup>ème</sup> Siè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 en T'oung Pao* 1944 Supplément au Vol XXXIX, p. 10. 阿耳伯特·甘马尔儿:《十六世纪葡萄牙发现中国与葡萄牙的航海地图》, 文载《通报》1944年第39卷增刊第10页, 系登1944年出版。

⑤ 见同上④。

⑥ 参阅 Capt. Arthur Cunynghame: *An Aide-de-Camp's Recollections of Service in China, a residence in Hongkong, And Visits to other Islands in the China Sea.* (London, 1844) p.80--81:“(1842年)5月27日, 经过安南巴斯(Anambas)群岛, 然后渡过暹罗湾, 再向婆罗礁(Bombay Shoal), 它是帕拉塞尔(Paracels)的一群礁石之一, 然后从它(Bombay Shoal)与中沙群岛(Maclesfield Bank)之中间经过。这些都是范围很广的珊瑚礁, 具有很大的危险性, 因为它们随时都在生长扩大, 所以很难固定它们确实在那里……它们都是在水底下生长, 但也有象高尖石(Pyramid)那样巨大的, 可能还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引者案: 高尖石不是由珊瑚礁石所组成的, 它是由火山碎屑岩所构成的, 外国人在上一世纪的上述记载, 调查不实。

⑦ 同注④。

⑧ 参阅注④, 附表, Ventura 字项。

⑨ 关于在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之中的“前、后岭”, 见(道光)《琼州府志》卷十八上, 第15页下, 海黎, 海防, 万州海防条。有关“琼洋”的前、后岭等五个岭, 另有详文考证。

⑩ 同注④的引书第15页。

⑪ 1541年尼古拉斯·地士林《世界地图》(引自汉兹与施密特《丹麦美洲亚洲澳洲和非洲地图集》莱比锡, 1923年。W. Hantzsch & L. Schmidt: *Kartographische Denkmäler zur Entdeckungsgeschichte von Amerika, Asien, Australien und Afrika, aus dem Besitz der K. Öffentl. Bibliothek zu Dresden, Leipzig 1923, Pl. II-IV*)。

⑫ 1544年底埃列雷·地色列尔《世界地图》, 见 A. 甘马尔儿《红海阿拉伯海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三卷第 CLXX 图。

⑬ 1556年黎·铁士托《地图》见 A. 甘马尔儿: 同上书, 第三卷, 第 CLXXVI 图。

⑭ 同注④。

⑮ 1561年威尼斯人罗斯散利在公元1561年复原的托勒密世界地图, (见鲁义特·勃朗《地图史》(波士顿1949年) L. Brown: *The Story of Maps*, (Boston, 1949), 在幸福岛的东经165°至175°之间, 有大湾(Magnus Sinus), 大湾东岸就是一大片未知名陆地, 山北而南, 超过赤道以南。这种古代的远东地理观, 亦在1519年罗普·霍曼《世界地图》远东部分, 重复出现。(见《葡萄牙海外活动地图集》第一卷第16图, 里斯本1960年出版)

⑱ 高勒尔《地图集》，巴黎 1519-1522 年（即洛普·霍曼《地图》）见 A. 甘马尔儿《红海、阿拉伯海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二卷，第 LXV 与 CXIX 图。

⑲ 佚名《地图》，慕尼黑 1522 年（即彼多岁·雷尼耳《地图》），见 A. 甘马尔儿《红海、阿拉伯海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二卷，第 CLXI 图。

⑳ 同注⑱。

㉑ 1544 年底埃尔里·地色利尔《哈尔连那世界地图》见 A. 甘马尔儿《红海阿拉伯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三卷第 CLXX 图。

㉒ 1553 年底埃尔里·地色利尔《世界地图》，见 A. 甘马尔儿《红海、阿拉伯海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三卷第 CLXXIV 图。

㉓ 巴岛为海南岛方言，意为树岛，据沈鹏飞：《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1928 年）第 66-67 页，说：“林岛与石岛 该岛之原名，据由琼东清澜港来（西沙群岛）之渔人所称，林岛为巴岛，石岛为小巴岛。考其‘巴’意，即林之意也。与西名之 Woody 同。”

㉔ Paxo 是海南俗名的巴峙、巴峙的译音，或海南俗名的巴峙、巴峙是从葡文的 Paxo 叫法转译过来呢？海南岛之人，叫树林为巴，巴峙即林岛，这是海南岛的方言，葡人译为 Paxo（巴峙），不能说海南岛人所说的巴峙译自葡文，因为葡文无 Paxo 此字，更无树林之意。

㉕ 1571 年费尔南·瓦兹·杜拉多《地图》。见《葡萄牙海外活动杰出地图集》第三卷第 285 图（里斯本，1960 年陆续出版）。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III, Pl. 285 (Lisbõa, 1960 年)

㉖ 1556 年黎·铁斯托《地图》。见 A. 甘马尔儿：《红海、阿拉伯海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三卷第 CLXXVI 图。

㉗ 1516 年魏特西穆勒尔《地图》。见 A. 甘马尔儿：《红海、阿拉伯海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二卷第 CLVIII 图。1516 年魏特西穆勒尔《地图》，有 Chamacochin，可见 China 一名，既可作 Chana，也可作 Chama。

㉘ 例如 1502 年地·康丁诺《世界地图》，有 China cochim，见 A. 甘马尔儿：同上书，第二卷第 CLIV 图。1505 年，1506 年加尼里奥《地图》则作 Chana cochim，见 A. 甘马尔儿，同上书，第二卷第 CLII 图。1511 年厄嘉顿《航海图》则作 Chana Cochim。

㉙ 明郑若曾《万里海防图》，嘉靖辛酉（1561 年）郑若曾摹绘。见《郑开阳杂著》卷八，第 2 页上（1932 年国学图书馆影印本）。此图并见明胡宗宪《筹海图编》等书。兹不一一赘引。

㉚ 关于猫仕或猫注（永兴岛），可参阅海南岛渔民苏德柳抄本《水路簿》。

㉛ 锚与猫，一般上，可以通用的，作为碇之解。

㉜ 宣统元年（1910 年）《东方杂志》有刊载《广东西沙群岛志》一文，就有提到林岛（活地岛 Woody I.）“岛西水深十三尺，可泊船”，又说：“海南之人，出海取鱼，常到此”。至于外国记载上，讲到林岛可泊船，可参 J. Horsburgh: Indian Sailing Direction (1841 ed) s. v. Paracel 等。

㉝ 关于“研覃”，在《地图》作八个小点，表示八个小岛，即下八岛，即今永乐群岛，



可参阅(1717年)觉罗满保《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和(1721年)施世驃《东洋南洋海道图》，其中，以施世驃所绘八个小岛的疍罩，较为清晰。

② 作者曾于1977年到过海南岛文昌、琼海等县，访问一些老渔民，包括当时(1977年)年龄已达92岁的老舵师、老渔民蒙全洲，都不知“干豆”一名为何义，只知西沙群岛北礁称干豆。可见“干豆”一名本义，早已不为海南渔民见知。

③ 下八岛，亦称西八岛，指今永乐群岛。可参阅郑资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鞠继武《祖国的南海诸岛》(第23页)等书，都有提到海南岛渔民俗称有上七(宣德群岛)、下八(永乐群岛)的叫法。

④ 参阅本书拙作《元代“四海测验”中的中国疆宇之南海》一文。

⑤ (1767年)黄证孙绘制《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图》(乾隆三十二年黄氏家刻本)，(1800年)厉下晓峰重绘黄证孙本的《清绘府州县总图》，都在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的海域当中，写上“干豆”二字，作为归属“广东”标志。

⑥ 1561年巴托罗缪·维尔荷《航海图》，把广东写作 Cantao，见 Armando Cortesão: Cartografia e Cartografos, 第二卷第 XXII 图。1561年拉塞罗·鲁易斯《地图》，把广东写作 Camtao，见 A. Cortesão 同上书，第一卷第 XXIII 图。1561年雅各普·牙斯塔底《亚洲地图》，把广东写作 Canto。1568年地亚哥·雷曼《地图》把广东写作 Canta，见 Hantzsch & Schmidt, Kartogr. Denkmäler。1573年多敏哥·德塞罗《地图》，把广东写作 Canto。1625年，约·卧埃拉特·地·底埃比《地图》，把广东写作 Cantao 与 Canta，见 A. 甘马尔儿《红海、阿拉伯海与阿比西尼亚海》第三卷，第 CXXXIX 图。可见广东一名，除了 Canton, Cantom, 等名，末音有鼻音作为收音之外，还有上述那些没有鼻音作收音的 Cantao, Canta, Canto, Camtao 等种写法，如把它译成中文文字的干罩或干豆，在对音方面，均无不是。

⑦ 见清廖廷楷、杨士驥《广东全省海图总说》第一册《广东总图说》，不分页次。(南州书楼精钞本)

一九七九年七月完稿

# 古“帕拉塞尔”考(其一)

##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国记载 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

韩 振 华

今天,帕拉塞尔(Pracel 或 Paracel)这个名称,是外国人用此名以称我国的西沙群岛,此乃尽人皆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以前,外国记载上的帕拉塞尔,却不是指我国的西沙群岛,当时有不少记载都曾提到在距离今天越南中部当时的交趾支那海岸不远并与海岸平行的海中,有著名的帕拉塞尔危险区,事实上危险区是不存在的,只有在它的头部(北部)和尾部(南部)有一些岛屿,但却不是足以构成一个航海危险区。一直到十九世纪一十年代末才揭开帕拉塞尔危险区这个谜。接着,又把这个原为想象中的帕拉塞尔此名,移花接木那样地移到我国的西沙群岛,原先外国人叫我国西沙群岛为眼镜(滩),此名自后不见,它被移花接木过来的帕拉塞尔所冒名顶替了。因此,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二百余年来,很多有关帕拉塞尔的事件(包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占领事件),一概与我国西沙群岛无关,绝不能再让它张冠李戴、李代桃僵了。

### 一、 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初的帕拉塞尔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以前,外国记载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有不少记载都曾经提到在距离当时交趾支那(今越南中部)海岸不远并与海岸平行的海中,有著名的帕拉塞尔危险

区。现在,把有关这方面的外国记载的资料,略举如下:

### (一)

1613年12月18日,约翰·沙利船长所驾驶的船,由北向南而行,并测得船只所在处的位置,在北纬15度43分,“当天下午五时,看到广东群岛(Pulo Kotan),它与船只的距离为5里格(约15海里。一里格约为三海里或5.55公里,以下同此)。此岛相当高峻,它是位于著名的名叫帕拉塞尔(Plaxel)岩石的西面20里格(约60海里)。此处大海,水深无底。第二天早晨,船已到达距离柬埔寨(Kambaya)海岸2里格(约6海里)之处,罗盘方位是南偏东,大陆上的陆地一直可以望见。当天中午,船已经驶到北纬13度31分的位置。”<sup>①</sup>有一张说明约翰·沙利船长航行于交趾支那的地图,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有关帕拉塞尔危险区及其群岛的地理位置,它和当时的眼镜(滩)(今我国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理区域。

上文所说的广东群岛在北纬15度22分、东经109度07分,帕拉塞尔岩石既与广东群岛的东西距离为20里格或60海里(约110公里),则其经度,约差1度。那么,帕拉塞尔岩石的西部,应在东经110度7分。它的南北位置,应在北纬15度22分至北纬13度31分或其以南。上述有关帕拉塞尔的经纬度,显然与今天西沙群岛的经纬度(北纬15度42分至17度8分、东经111度10分至112度55分),毫无相似之处。

### (二)

1634年有一只荷兰船沉没于帕拉塞尔,这一事件,在南越《白皮书》里面,被作为西沙群岛归属他们的所谓“外国资料中第一个证据”<sup>②</sup>。下面,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样讲的。他们说:

“按照 1634 年—1636 年<sup>③</sup>《巴达维亚日志》，来自巴达维亚（现为雅加达）的三艘荷兰船，‘维会曾号’、‘沙根号’和‘格鲁特布鲁克号’于 1634 年 7 月 20 日驶离土伦（现为岬港），前往台湾。21 日，这三艘船遇了台风，彼此失去联系。‘维会曾号’8 月 2 日到达台湾，‘沙根号’8 月 10 日到达（台湾）。但‘格鲁特布鲁克号’在 17 度以北、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搁浅。在估计价值 153,690 金币的货物中只有价值 82,995 金币的货物为幸存水手所寻获，其余都沉没海底了。船上人员有九人失踪了。”

“‘格鲁特布鲁克号’船长在作出一切安排，把剩下货物安置岛上，交给 50 名水手守卫之后，跟另外 12 名水手一起乘船出海，驶往越南海岸，在阮王领地内寻求援助。但是，这批人到达大陆时，被渔民监禁了，他们的金钱被没收了。这就引起同越南当局的争端。争端的结果是荷兰船只再次访问越南宫廷（并终于允许荷兰人享有自由贸易权和在越南设立以阿卜拉汉杜伊克尔为首的第一个荷兰行栈）。”<sup>④</sup>

南越《白皮书》引述上文之后说：“但是，对于我们，有意义的事实是：当‘格鲁特布鲁克号’船沉没时，水手们想去越南求援，而不是去中国，虽然中国比较近。这无疑是因为他们认为对失事地点行使管辖权的国家自然会提供救助并对他们的要求更会有反应。”<sup>⑤</sup>

这一艘荷兰船（大布鲁特号），是在北纬 17 度左右遭遇大风，它不能象同时航行的那艘荷兰船那样，沿着东北向的原来航向而抵达台湾，却是相反地，被大风吹向与原来航向相反方向，朝着越南海岸这方面倒退，结果当然漂流至越南海岸的荒沙小岛。这个被荷兰人埋下金银财宝的荒沙小岛，很可能就是越南人所说的大小长沙<sup>⑥</sup>，亦即包括于中国人在先前（十六世纪）所说的，靠近占毕罗岛的铁板沙之内<sup>⑦</sup>，或包括在以后（十七世纪后期）所说的靠近

占毕罗岛的万里长沙之内,指其最北而言<sup>⑧</sup>,它原来就是属于越南的,但与西沙群岛毫无关系,因为十六、七世纪的帕拉塞尔危险区和群岛,是指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一群小岛屿和岩石,起自北纬11或12度至16度或17度、东经109.2度<sup>⑨</sup>,它不是我国西沙群岛,这是很明显易见的。

### (三)

1650年荷兰人约翰·斯特鲁斯的记载,说:该年4月20日,他们启航前往台湾(Tojoven),“大约在帕拉塞尔<sup>⑩</sup>暗滩群附近,有条戎克船挂满风帆直向我们(荷船)驶来”,“它是一只载满非法货物的船,我们把它掳获过来,作为战利品”,“船中水手大部分为柬埔寨人或中国人。(荷船)船长法尔(Capt. Fayer)把他们放在一条小舢舨上,让他们逃生去,虽然这条小舢舨并没有漏水,但却不让他们携带帆和舵,所以肯定是会遭遇灭顶之祸,无论如何,到达海岸的距离尚有40里格(约120海里)。以后从来没再听过有关他们的消息了。”<sup>⑪</sup>

荷船既是由南而北航行,并在距离交趾支那南部海岸40里格(或经度2度)的帕拉塞尔暗滩群海面上行凶抢劫作案,那么在帕拉塞尔附近作案地点与海岸之间的距离,应为经度2度。当时帕拉塞尔的南端是在北纬12度4分、东经109.2度—110.2度<sup>⑫</sup>。荷兰船既在距离海岸40里格的帕拉塞尔东部的海面行凶抢劫,则其作案地点应在东经110.2度+1度(20里格)=111.2度。这个地点,正与交趾支那海岸(其最东部为109度左右),相距40里格(或经度2度)。

### (四)

谭彼儿于1688年前往中国,他说:航线以采用取道于昆仑岛

(Pulo Condore)最好,可以回避帕拉塞尔大暗沙。他又说:船向东京湾(今北部湾)的方向行驶,可以沿着海岸前进,亦即船“离开占婆岛之后,海岸仍在船的左舷,而帕拉塞尔的危险暗沙,约在距离船只的右舷有12或14里格(36或42海里)之处,我们就这样顺利地沿着海岸前进,并刚好在广东群岛(Pulo Canton)之处经过,该岛位于北纬15度<sup>⑬</sup>,经常有交趾支那人来到这里,他们的国家并以该岛作为与占婆王国的分界处。”<sup>⑭</sup>

这里说,帕拉塞尔的危险暗沙,是位于船只刚好从广东群岛(东经109.1度,北纬15.4度)及其以外的36海里或42海里的帕拉塞尔之间经过,亦即帕拉塞尔距离广东群岛的经度,约为0.6度或0.8度。然则帕拉塞尔的经度应在东经109.1度加0.6度则为109.7度,或东经109.1度加0.8则为109.9度,它大约是在东经109度余,这是指帕拉塞尔的西面。

### (五)

关于帕拉塞尔的南端和北端及其所处的位置,佛罗吉(F·Froger)记之最详。他说:1698年9月“25日的夜里至26日,我们的船只向北开行,引船员把我们引到帕拉塞尔的尾部。帕拉塞尔是由一群的石滩所组成的,南北约有100里格(约300海里),如果向北偏东北,再延伸着一天的航行,就可以到石滩。它的位置,是在北纬12度40分。海流流向,是向着东、东北方向。同在这一天,我们经过了若干危险区,那是在我的右舷之处。27日,遇上了好风,我们向北偏东北的方向前进,其高度是在(北纬)14度56分。”以后,遇到台风。“28日早晨,我们幸运地看到眼镜(滩)(Les Lunettes),在它东北3里格(9海里)之处。眼镜(滩)是由一些小小的暗沙群与暗石群所组成的,其形状有如一个大三角,距离帕拉塞尔头部的东面,有8—10里格(24至30海里)。我们估计它在北纬

15度35分之处。”<sup>⑭</sup>

上文所说的眼镜(滩),是指今天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北纬15度47分至17度7分,东经111度12分至112度5分)的南部。当时船只所看到的,是永乐群岛的西南端,很可能是指今天的中建岛(北纬15度47分,东经111度12分)。在与此处的东、西相距24至30海里(或者其经度相距0.4度至0.5度)的帕拉塞尔头部之东,估计当在北纬15度40分、东经110度48分或52分,它与西沙群岛,也是毫无相似之处。

## (六)

“1690年,有一只葡萄牙船,在帕拉塞尔(Paracels)群岛的极北部的一个地方,沉没下去,只有三、四个人幸存,游泳到海岸,其余的人全部死亡。有一些破船板,还夹杂着一些面粉之类的东西,也随在他们的后面而漂流到海岸上去,因此,他们才有了补给。”以后,他们盖了一个小屋,等待营救。终于有一条船,经过此处,才把他们带往澳门去。<sup>⑮</sup>

上述有关帕拉塞尔极北部危险区,就是指越南交趾支那的浛江以南海岸的大长沙、小长沙<sup>⑯</sup>。据1701年(见下文)的一项记载,就是说帕拉塞尔的北部是起自北纬17度的交趾支那海岸以南。由于帕拉塞尔北部,是那样地靠近交趾支那海岸,船沉之后,人们才有奋力游泳到达交趾支那海岸的可能,如果说,沉船是在西沙群岛,以西沙群岛的首邑永兴岛来说,它与交趾支那海岸距离最短的岬港,尚有450公里,任凭一个人游泳本领有多么高明,也不会在惊涛骇浪的大海游泳将近一千公里。遇难的葡萄牙人,最有可能的,是从出事地点的北纬17度的帕拉塞尔极北部,游泳到附近的交趾支那海岸,例如岬港以北的一些荒岛、沙洲,接着,等待过往的船只才把他们带往澳门去。

## (七)

1698年法国船海后号的《航行日记》说：(本船)满载500吨，三十门大炮，搭客150人。1698年3月6日，在德·拉·罗克(De La Rocque)骑士的指挥下，从拉·罗歇尔(La Rochelle)启航。当离开昆仑岛后，9月25日，船驶过普拉塞尔，由南而北，长约十里格(lieues)，测其纬度为12度4分；上方是眼镜(滩)(Lunettes)，为15度25分<sup>49</sup>。

又：法国对华垄断贸易公司的海后号船，1698年的《航行日记》说：当船驶过越南东海遇到一个他们称之为帕拉塞尔的暗礁地区时，船上有一个名叫杰拉狄尼(Ghirardini)的意大利画家曾记下了他那激动的心情<sup>50</sup>。

由昆仑岛(Pulo Condore，在北纬8度40分、东经106度35分)驶到帕拉塞尔，是由南而北的(偏东北)的航行。据上述《航行日记》，帕拉塞尔(尾部)在北纬12度4分，其长度约为10里格，或折合纬度半度。亦即帕拉塞尔尾部的长度，是在北纬12度4分至12度34分。帕拉塞尔尾部的对岸，就是交趾支那南部的芽庄，在北纬12度15分。它与芽庄是很靠近的。

又据上述《航行日记》，说：眼镜(滩)在帕拉塞尔的上方，纬度为15度25分。上方即北方，北上、南下，这也是中国人(包括航海者)一贯习惯的称谓。在其上方或北方的眼镜(滩)，即我国西沙群岛，谓其位于北纬15度25分，自无不是，今天我国西沙群岛最西南面的中建岛，在北纬15度47分、东经111度12分。它的纬度，与将近三百年前的法国船所测定的，其差错仅为0度22分，误差不算太大。从1698年法国船海后号的《航海日记》可以看到当时帕拉塞尔的纬度是自12度4分至15度25分以下，而眼镜(滩)即我国西沙群岛的西南端，是在北纬15度25分以下的上方(北方)，



虽然其中有误差 0 度 22 分，但对整个眼镜（滩）和帕拉塞尔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

圣芳济教会的弗罗吉教士曾经记载他们从中国回航的航程，说：1700 年 1 月 30 日，由海南岛驶向交趾支那海岸的广东群岛。大约在北纬 17 度 41 分之处，我们得了好风，那是来自北、北东和北、北西之风。30 日至 31 日，风力变小。我们按照原来的航向，向南偏西南航行。“我们很害怕会遇到帕拉塞尔。到了(31 日)早上 4 时，我们估计是在北纬 16 度 9 分之处。31 日这一天，我们抵达占毕罗岛，再过一小时，就抵达广东群岛，其西北西距离占毕罗岛，为 10 里格(30 海里)，抑或广东群岛是在占毕罗岛的南西南 8 里格(24 海里)。此岛(广东群岛)地势极其高峻，可以看到山岭延袤 25 里格。它是靠近于现今交趾支那王国与占婆王国的分界处；占婆以后成为交趾支那王国的朝贡国。”我们又航经广东群岛与海岸东面之间，“距离约 2 里格(6 海里)，然后，向南、南南西的方向，靠近大陆而航行，自此向下，垂直 80 里格(约 240 海里)，其水流的流速，为 1.5 里格(4.5 海里)至 2 里格(6 海里)，流向帕拉塞尔去”。羊屿(Pullo Gambir)距离海岸的经度为 1 里格(3 海里)，约在北纬 13 度 38 分。它有两个岛屿，一个靠近大陆，一个在海中。“在海中的羊屿，是与帕拉塞尔危险区的边缘几乎同在一个纬度之上；当天晴气朗时，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相距的阔度是多么地微小”。我们再向南、东南和东南偏南航行，约在北纬 10 度 20 分，见到二个岛，一个岛靠近海岸，亦即靠近西色尔岬，“其它一个岛，也就是帕拉塞尔尾部的一些岛屿，那是在航海图上被标注了可怖的记号，亦即可恶的荷兰人要么把它置于危险区，要么简直不把它当作一个点来看待”。事实上，我们既没有看到任何(危险)东西，也从来不去探测它的水深和(考察)水上有什么变化<sup>⑩</sup>。

从弗罗吉的记载，很清楚地获悉帕拉塞尔远离今天西沙群岛

之外，它与西沙群岛毫无关系，无论如何，扯不到一起，完全是两码事。对于荷兰人所流传下来的，那是：在越南中部海岸对面并与海岸平行的海中，有一个据说是很危险的航海危险区，名叫帕拉塞尔，它的头部，约在北纬 16 度余，它的尾部，约在北纬 10 度左右，但是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法国人航行至此，就对这个传说多么可怖的帕拉塞尔危险区，抱着怀疑态度。尽管如此，法国人还是小心谨慎地航行于介乎海岸并与海岸平行的帕拉塞尔之间的这条航线。

### (八)

法国船海后号在德·拉·里戈迪雷(De La Rigaudiere)骑士指挥下的第二次航行，于 1701 年 7 月 24 日抵达帕拉塞尔<sup>②③</sup>。

又上述那一位法国圣芳济会教士弗罗吉乘海后号第二次航海，于 1701 年，前来中国<sup>②④</sup>，他说：“帕拉塞尔是一个长约 100 多里格（约 300 余海里）的令人可怖的石滩，因为从古至今在这里经常发生沉船事件而使它具有恶名，它是沿着交趾支那海岸分布的。”<sup>②⑤</sup>这是讲帕拉塞尔是沿着北纬 16 度至北纬 11 度之间并与交趾支那海岸相平行的海中而分布的，帕拉塞尔的南北长度有 300 余海里，纬度约有 5 度。已知帕拉塞尔头部在北纬 16 度，则其尾部应在相距纬度 5 度的北纬 11 度。从以上所说的，起自北纬 16 度左右并沿着交趾支那海岸分布而一直向南到达北纬 11 度之间的帕拉塞尔，决非今天处在北纬 16 度—17 度之间的西沙群岛。

### (九)

1701 年乘海后号船第二次来中国旅行的传教士们的信件，说：“我们扬帆顺风而行，不多久就驶到与帕拉塞尔相平行的方位，帕拉塞尔是属于安南帝国的一组群岛。它是一个长约百余里格

(lieues, 约 300 余海里) 的令人可怕的石块, 因为从古至今在这里发生的沉船事件而具有恶名。它是沿交趾支那海岸分布的。海后号船在第一次到中国的旅行中, 险些儿在此丧生。”<sup>②</sup>

这里只讲帕拉塞尔是靠近交趾支那海岸、并与海岸同为南北走向而又相互平行的一组群岛, 长约 100 里格, 或 300 海里, 折合纬度为 5 度。尽管在这里没有讲到它是起自北纬多少度, 但从上述第九项的资料, 可以知悉它是起自北纬 16 度, 南北距离 5 度, 则帕拉塞尔长度应在北纬 16 度至 11 度, 它与我国西沙群岛(北纬 15 度 42 分—17 度 8 分) 当然是毫无关系。甚至说它是属当时安南帝国, 如果此言当真, 这也与我国西沙群岛, 毫无关系。

### (十)

十八世纪一十年代, 英国的汉弥尔敦船长, 对帕拉塞尔有颇为详赡的叙述, 他说: “在这个海岸(指交趾支那海岸), 有一些岛屿。越靠近海岸航行越没有危险。西色尔·地岛(Pullo Secca de Terra)是位于最向南和最靠近海岸的一个岛。这些都是没有人居的, 看起来, 象一包包烧焦了的礁石群, 一点草木也没有。我经过此处时, 距它在一英里之内, 距大陆海岸也是约一英里。西色尔·海岛(Pullo Secca de Mare)以及这一串串全部来自帕拉塞尔的危险滩, 与其说是群岛, 不如说是礁石群。羊屿(Pullo Gambir)是位于离海岸 15 里格(约 45 海里)并靠近于帕拉塞尔之处。尽管此岛颇大, 但仍然没有人居住。广东群岛(Pullo Canton)位于靠近海岸之处, 占毕罗(Champello)群岛也是这样, 但它们的外面, 却没有什麼危险。当东北季候风猛吹时, 海流向南劲奔, 这种情况, 使舵师们十分小心谨慎地把船驶向更加靠近交趾支那海岸, 因为担心会落入帕拉塞尔之缘故才这样干的。它(帕拉塞尔)是一串一串危险的礁石, 长约 130 里格(约 400 海里), 阔为 15 里格(约 45 海

里), 仅其两端才有一些岛屿。在那些礁石群之间, 是著名的危险区, 究竟具有多大的危险, 此则未详。但据我所知, 有一只英国船, 来自(印度的) 苏拉特(Surat) 曾从它们之间通过, 却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危险, 等到他们过去之后, 才出乎意外地看见了交趾支那的海岸。”<sup>29</sup>

上文所说的帕拉塞尔, 是包括与下面这些岛屿相平行的一个危险区, 即: 它的南部西色尔·地岛、西色尔·海岛等岛屿以及它的北部包括羊屿、广东列岛、占毕罗岛等岛屿, 它们是与帕拉塞尔相当靠近又相平行的, 显然是与我国西沙群岛无关的。

### (十一)

马兰主教(Marin) 于1715年5月31日致修道院诸董事们的信, 说:

“1714年10月, 满载贵重货物的不同的三艘荷兰帆船从日本启航, 当这些船航行经过帕拉塞尔的时候, 遭到了强台风而罹难。这阵台风来得如此迅猛, 以致水手们来不及下帆, 暴风便把三艘船当中一艘船的桅杆吹断(并把他们)打散了。水手们不能再驾驶这艘船, 风浪把它卷上沙滩, 在那里触礁粉碎了。船上十七人死难, 其余的八十七人有的游泳, 有的扶着船板游向帕拉塞尔石滩, 登上了只有干沙覆盖的高沙堆。

“这些人靠捕捉栖息于帕拉塞尔岛上一种鸟类的肉为食, 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由于这种鸟从未见过人, 所以水手们可以徒手捕获。这些荷兰人捕获的鸟相当多, 足以养活他们在这个沙滩上居住一个月。在此期间, 他们把打捞到的一些破船板拿来钉成小木排, 乘坐它驶往交趾支那并进入芽庄海口。芽庄(Nha Trang) 距芽鲁(Nha Ru) 约一日程, 在这里厄斯特(Heuste) 先生建立了一座相当大而对当地来说是相当漂亮的教堂。因为居住在当

地的中国人不懂得荷兰话，所以在 1715 年救世主显灵节那天，厄斯特先生被叫去当翻译。幸亏这些荷兰人中有些人的法语和拉丁语讲得还不错。此后，……于 1715 年 6 月 1 日，他们将要入朝了，厄斯特先生将和他们同行。从这里到朝廷要走 30 里格 (lieues) 路程，道路是可怕的，而且天气异常炎热。”<sup>②⑥</sup>

戈德弗鲁瓦(Godefroy)1715 年 7 月 4 日致泰西埃(Tessier)先生的信，说：

“又及：三艘从日本启航的荷兰帆船，在帕拉塞尔附近遇上了强台风。两艘脱险，另外一艘撞毁。但水手们已爬上沙滩，后来把几块木板拼起来，驶到交趾支那海岸。上岸时这些人就象快要死亡的人一样，因为他们断粮已很久了。在当地居住的厄斯特(Heuste)先生就给他们当翻译，并同他们一起入朝，觐见国王。国王想让他们搭一艘中国船去巴达维亚。”<sup>②⑦</sup>

拉贝主教 1718 年 10 月 16 日致修道院诸董事们的信，说：

“满载货物的一艘从日本返回巴达维亚的荷兰船，于 1714 年 11 月末在只距交趾支那海岸约十五至二十里格(lieues)的帕拉塞尔海域触礁沉没。除了船舱下面的十七个囚犯溺死而外，全部水手脱险。他们登上这个沙滩的最高处，然后用他们的沉船破片钉成一只大的无篷船；八十四个人乘搭此船，从远处尾随那些早晨出海捕完鱼归港的交趾支那渔民船，驶往交趾支那。

“这帮因饥渴而精疲力竭的可怜的荷兰人，已于 1715 年 1 月 6 日在厄斯特先生驻地，即我们建有一座大教堂的地方的一个海港(芽庄)登陆。”<sup>②⑧</sup>

荷兰人于 1714 年冬季由日本南航，在距离交趾支那沿岸 15—20 里格的帕拉塞尔，遇到台风而沉船，死里逃生的 87 人，游泳到帕拉塞尔石滩，居留一个月，收集破船板钉个大木排，驶往交趾支那的芽庄。帕拉塞尔的尾部，在北纬 12 度 4 分<sup>②⑨</sup>，芽庄在北

纬 12 度 15 分，二者所处的纬度，极为接近。帕拉塞尔的经度，据上面引文，知道它与交趾支那海岸，相距 15—20 里格，或 45—60 海里，折合经度为  $\frac{3}{8}$  度至半度，又已知荷船遇难后所抵达的交趾支那海岸的芽庄，在东经 109 度 10 分，然则帕拉塞尔的经度，当在  $109 \text{ 度 } 10 \text{ 分} + 22.5 \text{ 分} = 109 \text{ 度 } 32.5 \text{ 分}$ ，或  $109 \text{ 度 } 10 \text{ 分} + 30 \text{ 分} = 109 \text{ 度 } 40 \text{ 分}$ 。从上面所计算的结果，获悉荷船遇难于帕拉塞尔，该处的经纬度，约为东经 109 度 32.5 分至 109 度 40 分，北纬 12 度 4 分。此处的帕拉塞尔，与交趾支那海岸的芽庄（东经 109 度 10 分、北纬 12 度 15 分），极其靠近，遇难于帕拉塞尔的荷人，才能乘坐临时收集破船板钉造的小木排，尾随那些晨出暮归的交趾支那海岸的渔船一同回到海岸边的芽庄。

如果帕拉塞尔在我国西沙群岛（北纬 15 度 42 分至 17 度 8 分、东经 111 度 10 分至 112 度 55 分），自西沙群岛的首邑永兴岛至当时交趾支那的会安（今岷港），距离约为 450 公里，会安到芽庄，其直线距离亦在 500 余公里以上，合计自西沙群岛的永兴岛至芽庄，总计将近一千公里。象这种临时钉造的小木排，是经受不了这样长距离的海行，光是人们在小木排上的喝水就成问题。又况且他们是从帕拉塞尔驶着小木排，尾跟那些晨出暮归的交趾支那渔船，才平安抵达芽庄。渔民从交趾支那海岸的芽庄，出海捕鱼，晨出暮归，当天之内，就可以往返于交趾支那，这种渔船，是在当天之内跑不了从交趾支那到西沙群岛的往返各一次的航程（来回将近二三千公里）。很显然，只有在交趾支那芽庄附近的海面上的帕拉塞尔南部（北纬 12 度 4 分，东经 109 度 32 分至 109 度 40 分）才有可能使它与芽庄（北纬 12 度 15 分、东经 109 度 10 分）之间，在当天之内，渔船可以走个来回，而从帕拉塞尔驶出来的小木排才能尾跟渔船之后，一同驶回芽庄。

## (十二)

1749年印度本地治理(Pondicheri)的最高议会,在给奉命远游到交趾支那地区的拔福里(Poivre)先生的训令中写道:

“我们认为,船在(1749年)8月15日前,到昆仑岛,如果遇到好天气,可以探寻同狴地区的沿海,并在帕拉塞尔群岛内侧航行;若天气不好,看到有起台风的迹象,则最好是沿着帕拉塞尔群岛的东侧航行,确实能够躲避台风。”<sup>③</sup>

帕拉塞尔的南部,在北纬12度4分、东经109度32分—40分,也可以把它延伸到西色尔·海岛(北纬10度32分,东经108度57分)<sup>④</sup>。昆仑岛在北纬8度40分,东经106度35分。自昆仑岛北上的航行,要寻探同狴(Dông nai)地区(今越南边和省Biên hòa的一部分)的沿海情况,换句话说,要寻探头顿(北纬10度21分,东经106度12分)以东的沿海地区,它与西色尔海岛之间的航行情况,亦即在头顿以东的同狴地区与帕拉塞尔(尾部)之间的航行情况。一句话,自北纬8度40分的昆仑岛北上,如果遇到好天气,还可以在北纬10度21分以东的同狴地区沿海与北纬10度32分的帕拉塞尔尾部之间的“帕拉塞尔内侧”航行,顺便还可以探寻同狴地区沿海的水路情况。如果帕拉塞尔是指我国西沙群岛(北纬15度42分—17度8分,东经111度10分—112度55分),它与北纬10度21分、东经106度12分的同狴地区以东的沿海海岸,构成不了什么“帕拉塞尔内侧”航行,航海者们决不会把这种毫不相干的鬼话胡扯上去,说什么要从我国西沙群岛与印度支那南部大陆之间所构成的“内侧”,去探寻在印度支那南部的同狴地区的沿海航行情况。

## (十三)

1786年,骑士摩特德·索尔米尼阿克(Le Chevalier de la

Mothe de Solminihac)所拟有关了解交趾支那沿海地区尤其是沱灑地区的指示草稿,说:

“在从马来亚的马六甲(Malac)海峡至昆仑山的航海线上航行,到交趾支那沿岸时,应该注意避开为数甚多的各种暗礁,即避开帕拉塞尔地区。(自从西方航海家来到远东开辟经过马来亚到交趾支那、澳门、日本等地的航线以来,在帕拉塞尔地区已发生了许多起沉船事件)。”<sup>②</sup>

上文也是说自马来亚北上航行,到了北纬8度40分、东经106度35分的昆仑山,之后,就要注意如何避开帕拉塞尔危险区。它的尾部,在北纬12度4分、东经109度32分至40分,也可以延伸到北纬10度32分的西色尔海岛。它与西沙群岛的南部,在北纬16度左右,是毫不相干的。

#### (十四)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随同英使马戛尼来华朝见乾隆帝的英使随员斯同东,曾经对帕拉塞尔也有比较详瞻的记录。他说:

1773年5月22日,来华使臣船只经过广东群岛(Pulo Canton)之后,“有时候我们的船只的航程,是沿着与交趾支那王国平行而航行。其航道是介乎它(交趾支那)的海岸与名叫帕拉塞尔之间。帕拉塞尔是由一群一群从西北而南并由拖得很长的无数小岛和岩石所组成的,其南北约有400英里长(约344海里),它是有些危险的;航行时,要求十分小心谨慎,否则虽然风平浪静,却也会被向东流去的海流,冲向这些礁石”,抑或与此相反地,会被突然而至的台风之所袭击。不久,我们的船只就到达土伦(Turon,今岷港)湾,南面有一岛,名叫占咕喽(Cham Callao)或占毕罗(Campello)<sup>③</sup>。另据斯同东所刊登的地图,帕拉塞尔是在北纬12度至17度、东经110度至111.5度,并与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相平行,这显



然不是西沙群岛的经纬度；同此一图，在靠近帕拉塞尔之东北角，有一暗沙群和岩石群(Shoals and Rocks)，位置在北纬 17 度、东经 112 度，这才是指今天的西沙群岛<sup>④</sup>，亦即外国人另文所说的眼镜(滩)(参阅本文第一项资料)。

### (十五)

1805 年丁·约翰逊(英国皇家海军的外科医生)，曾对帕拉塞尔群岛(位于伐里拉岬之南)有所记载，他说：

“1805 年 1 月 5 日，我们的船只，经过澳门，8 日，到达交趾支那的伐里拉岬。以后，依据海图，我们采取朝向帕拉塞尔群岛的方向，帕拉塞尔群岛是在海南之南，但我们却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sup>⑤</sup>。”

案：伐里拉岬在北纬 12 度 53 分，东经 109 度 27 分，由伐里拉岬(向南)朝向帕拉塞尔群岛的方向航行，应指由北纬 12 度 53 分、东经 109 度 27 分向南的方向才是帕拉塞尔群岛，它与由伐里拉岬向北所朝向的今天西沙群岛无关，这是显而易见的。

## 二、1817 年以后的帕拉塞尔

### (十六)

1808 年、1815 年英国孟买海军的罗斯船长和穆罕船长和 1817 年英国孟买海军的罗斯船长对我国西沙群岛和海南岛进行非法的调查之后，才把从前被大家认为是极其可怖的帕拉塞尔，自北纬 12 度至 16.5 度或 17 度，移到北纬 16 度至 17 度，又自东经 109 度余—110 度或 110 度—111 度，移到 111 度—113 度，从此以后，这个在地图上一只脚(脚尖向南)形状的帕拉塞尔，渐被公认为虚构的危险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我国西沙群岛，却由此被外

国名称的帕拉塞尔之所冒名顶替。据拥有不少衔头的“英国的皇家学会会员、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员、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以及圣·彼得堡的帝国自然科学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与哥本哈根的北方考古皇家学会的委员，尊敬的东印度公司的水文学家詹姆斯·豪尔斯堡格(James Horsburgh)所主编的《豪尔斯堡格氏航海指南》”一书，1841年版和1852年版，都有这样的记载，说：“从前把帕拉塞尔(Paracels)的轮廓描绘成为一大串断断续续的石滩，中间介乎以一些大大小小的岛屿，南北延伸，自北纬15度至16.5度或17度，其中最狭窄之处，距离交趾支那海岸约在12至20里格之内(约45至60海里)，其他的暗沙群和岛屿<sup>⑥</sup>，名叫海后(Amphitrite)、林肯(Lincoln)等等，它们是位于它(指帕拉塞尔)的东面大约有3度以外，介乎上述这些岛屿和上述暗滩之间，有一个相当开阔的中间空隔之处；现在已经弄清楚，所有这些危险区，仅仅形成一个群岛，并由相互距离不远的暗沙群和低矮的小岛所组成的。这就是下面所要讲的，由罗斯船长(Capt. Ross)和穆罕船长(Capt. Maughan)率领孟买海军舰船所调查出来的。”<sup>⑦</sup>

由罗斯船长和穆罕船长等人于1817年<sup>⑧</sup>及其以前所调查的这些岛屿和暗沙等等，计有：

北暗沙：北纬17度6分、东经111度32.5分。它是帕拉塞尔西北端的危险区(今北礁，北纬17度7分、东经111度30分)。

莺非土来特列(海后)群岛(今宣德群岛)，分为二群，包括五个岛，最西部为树岛，在北纬16度59分、东经112度12分(今赵述岛，在北纬16度58分、东经112度13分)。还有林岛，在北纬16度50分、东经112度18分(今永兴岛，在北纬16度50分、东经112度20分)。石岛，在北纬16度52分、东经112度20分(今石岛在北纬16度50分、东经112度21分)。林肯岛，在北纬16度40分(今东岛，在北纬16度40分、东经112度44分)。金字塔岩

石,在北纬 16 度 36 分、东经 112 度 37 分(今高尖石,在北纬 16 度 34 分、东经 112 度 38 分)。孟买暗沙,在北纬 16 度 0 分—6 分、东经 112 度 26 分—38 分(今蓬勃礁,在北纬 16 度 1 分—5 分、东经 112 度 25 分—38 分)。由林肯岛至孟买暗沙,构成帕拉塞尔东面边缘的危险区,另外还有新月群岛(今永乐群岛),这是被罗斯船长称为金银、罗伯特、拔陶儿、杜罗门和邓肯总督诸岛,位于北纬 16 度 27 分至 16 分 32 分、东经 111 度 29 分至 111 度 44 分(以上即今:金银岛,北纬 16 度 27 分、东经 111 度 30 分。甘泉岛,在北纬 16 度 30 分、东经 111 度 34 分。晋卿岛,在北纬 16 度 28 分、东经 111 度 45 分。琛航岛,在北纬 16 度 27 分、东经 111 度 44 分)。此外还有:测量滩,在北纬 16 度 35 分、东经 111 度 40.5 分(今森屏滩,在北纬 16 度 35 分、东经 111 度 42 分)。符勒多儿暗沙,在北纬 16 度 18 分、东经 112 度 2 分(今玉琢礁,在北纬 16 度 19 分—22 分、东经 111 度 58 分—112 度 5 分)。巴苏奇,在北纬 16 度 2 分、东经 111 度 45 分(今盘石屿,在北纬 16 度 2—5 分、东经 111 度 44 分—52 分)。特里顿岛,在北纬 15 度 46 分、东经 111 度 11 分(今中建岛,在北纬 15 度 47 分、东经 111 度 12 分),此处被认为,是帕拉塞尔的最南端和最西端的危险区;由广东群岛的罗盘方位来看,它是在其东面偏北,距离有 122 英里。

上述罗斯船长等人于 1817 年对我国西沙群岛与海南岛非法进行最后的考察后,才又把从前的帕拉塞尔,向北拉长一度,亦即自原来北纬 11 度、12 度至 16 度,变成自北纬 12 度至 17 度,东经还是 109.2 度至 110.2 度<sup>⑧</sup>。从此,把帕拉塞尔的头部,自北纬 16 度,变成 17 度,亦即冒名顶替地移到现在的西沙群岛;但是,对于十九世纪以前的帕拉塞尔(北纬 11 度、12 度至 16 度),它的尾部在 12 度,仍旧有记载,还没有一笔勾消。只是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才把从前十九世纪初期所认为的帕拉塞尔(北纬 12 度至 17 度),已

经完全证实为不存在的和想象的东西,从此之后,才通行着原先由罗斯船长开始使用帕拉塞尔(仅指帕拉塞尔头部)这个冒名顶替之旧名以称西沙群岛,亦即帕拉塞尔既不是自北纬 11 度、12 度至 16 度,也不是自北纬 12 至 17 度,而是帕拉塞尔此名,从此才开始仅指北纬 16 度至 17 度的西沙群岛,一直沿用至今,尚为西方国家所使用。

### (十七)

1824 年,美国海军中尉约翰·怀特(J. White)刊行一本书名叫《交趾支那航行志》。他说:

1818 年 6 月 18 日至 24 日,我们决定远离帕拉塞尔群岛,那是个有一大堆岛屿的岩石群,我们想象穿过它就可以得到好风而直航以抵马尼拉。当我们在北纬 14 度,看到归仁(Quinhon)城时,我们就离开交趾支那海岸,直趋开往吕宋的方向。我们碰到良好的气候,同时还有来自海岸的陆风和海风,但有一股强烈的海流,把我们冲着流向西北去。

“上而刚刚讲过的帕拉塞尔群岛,从前它被航海者认为是极其可怖的,直至最近以前还是这样被认为的,它是包括一系列离开水面很低的群岛、珊瑚群礁石和沙滩群,其范围自北纬 12 度延伸至 17 度,方向是自北、北东至南、南西,其形状有如人体的一只脚(原注:脚指尖是在最南端),靠近交趾支那海岸大约在 16 里格(约 48 海里)之内,它的阔度,最阔之处是在北纬 16 度,约有 30 里格(约 90 海里)以上。这是一个群岛,有一度被认为是非常可怕的,那是把它想象得极其辽阔广大和极其危险可怖,可是现在可以肯定,它只不过是一群岛屿与岩石,它并不是那样地辽阔广大,它们当中,大多数是具有既优良又安全的航道,许多地方还有优良的泊碇处。它们的位置是在北纬 15 度 46 分至 17 度 6 分之间以及东经

111 度 1 分—2 分至 112 度 47 分之间。

“6 月 25 日清晨，我们经过了兰色的海洋，其深不可测，在旧的航海图里，标明了许许多多的乱石与暗沙。根据最近由孟买海军的罗斯(C. Ross)中尉与穆罕(Maugban)中尉驾驶发现号和调查号对这些海域所进行的调查和发现，才得出正确的航海图之绘法，并提出了对这段的航行并不是那么艰难险峻和不是极其危险的很有用处的报告。”<sup>⑩</sup>

上面怀特的报告，是把传统上对帕拉塞尔的看法——自北纬 11 度、12 度至 16 度，向北移动一度，即变成为自北纬 12 度至 17 度，形状有如一只脚，脚尖在其下端靠近大陆海岸一边，这是对当时经过罗斯中尉等人调查后对帕拉塞尔头部的看法——北纬 15 度 46 分至 17 度 6 分、东经 111 度 1 分—2 分至 112 度 42 分，即今天的西沙群岛，使帕拉塞尔这个整体，与仅指帕拉塞尔头部，二者既有区分，又有揉合。由此可见，出现另一个帕拉塞尔的，是在 1817 年罗斯中尉等最后调查西沙群岛和海南岛之后，才把传统上流传的帕拉塞尔，自北纬 11 度、12 度至 16 度，扩展至 17 度，尤其是它的头部，移至北纬 15 度 46 分至 17 度 6 分，并肯定了传统上那个传说的帕拉塞尔是不存在的，绝不是什么航海危险区。自此以后，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才开始把帕拉塞尔作为西沙群岛的外文名称，然而帕拉塞尔这个一只脚(脚尖朝西南)形状的传说上的危险区，短时间内，还是没有一下子就被废除掉，可以说，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出现了新旧二个帕拉塞尔的名称同时并存的情况，一直到了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还是这样的<sup>⑪</sup>。

## (十八)

让·巴蒂斯特·沙依诺 (Jean Baptiste Chaigneau, 1769—

1825)在他所著《交趾支那见闻录》一文说:

“(交趾支那)地势:交趾支那,其国王现称皇帝,包括交趾支那本部,东京、柬埔寨的一部分,几个距海岸不远的、并由有人居住的岛屿和由无人居住的许多小岛、浅滩、岩石所组成的帕拉塞尔群岛。只是到了1816年,当今皇帝(指越南嘉隆皇帝)才占有了这一群岛。”<sup>②</sup>

1816年嘉隆王所占领的帕拉塞尔,是占领帕拉塞尔群岛南端的一些荒凉岛屿,包括西色尔·地岛在内(参阅本文第二十二项的资料)。

### (十九)

1828年英国的约翰·柯罗福(J. Crawford)出版一本书,名叫《奉印度总督之命出使暹罗王廷和交趾支那王廷日志》。他说:

在中国海,属于交趾支那所有的全部岛屿,仅有昆仑岛、广东群岛、占婆岛而已,1816年才占领了帕拉塞尔荒岛。<sup>③</sup>

我们知道,1816年这一年,罗斯船长还没有全部完成他们对我国西沙群岛的非法调查,亦即从前的帕拉塞尔,还是指那个起自北纬11度、12度至16度,其形状有如一只脚形状那样的一连串的岛屿和岩石,要等到1816年的下一年,罗斯船长全部完成对我国西沙群岛的非法调查之后,才在1817年以后的几年,公开刊布这个新的帕拉塞尔头部是包括我国西沙群岛在内,它的尾部,还是位于北纬12度左右。因此,1816年交趾支那所占领的帕拉塞尔,还是指那些靠近交趾支那海岸与交趾支那平行的一只脚形状的帕拉塞尔危险区,它与以后被外国人借用帕拉塞尔这个旧名以称我国西沙群岛是完全不同的,从而,也谈不上什么交趾支那于1816年占领的帕拉塞尔就是指我国西沙群岛,他们占领的还是离开当时交趾支那海岸不远的帕拉塞尔,即原来的帕拉塞尔岛,自北纬

11 度、12 度至北纬 16 度。

## (二十)

关于帕拉塞尔的地理位置及其经纬度，地理学家马耳特一布伦讲得最清楚，帕拉塞尔在北纬 10 度余至 16 度余之间，东经 109.2 度，它与我国西沙群岛的经纬度（北纬 16 度至 17 度、东经 111 度余至将近 113 度），是完全不同的。

1829 年，地理学家马耳特一布伦，在布鲁塞尔出版《世界地理简志》一书，书中，对帕拉塞尔有专条叙述。他说：

“帕拉塞尔或普拉塞尔群岛是一群有如迷魂阵那样的小岛屿和岩石群，而它的底部，又是那样地高高突起，根据相当权威的地图所载，它的位置是一直延伸于交趾支那海岸的前面，介于北纬 10 度 45 分与北纬 16 度 30 分之间，它的经度是在巴黎东经 107 度（今东经 109.2 度。）但是，法国的航海者们曾经在这里的一部分地区航行，却没有遇到什么岩石群和高高的盘石底，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这是一群很少向外伸展的群岛，事实上，它还没有在地图上被覆核过。”<sup>④</sup>从地理学家马耳特一布伦所记载的帕拉塞尔的经纬度，它仍然和西沙群岛毫不相干。

## (二十一)

1832 年在欧仁·沙依诺(Eug. Chaigneau)写信给巴黎外交部的先生，信中说：

“我于 1829 年 12 月 8 日离开巴黎（前往印度）；同月 15 日，我搭上了‘圣·密歇尔号’（Saint Michel）离开法国的海岸了，……”

“我根据我的前任者的报告，知道这一条船是在 1830 年 8 月 9 日不幸失事于帕拉塞尔礁石群的暗滩，距离土伦(Tourane)港大约还有 24 里格（约 72 海里）<sup>⑤</sup>。这是一件怪事之类的事件，当时

船上所搭载的，又是那么轻，却又要在此以前费了五天六夜的时间，几乎全都用来跟它作生死的搏斗。……”<sup>⑤</sup>这是对这一条法国船，不应该在帕拉塞尔这一带失事，提出疑难之词。事实上，旧的帕拉塞尔（一只脚形状）已经不是什么危险区了，这是当时法国人也知道的事实，却偏偏又说是在距离土伦 72 海里的帕拉塞尔沉船失事，这件事，使欧仁·沙依诺认为是一件怪事之类的事件。由此可见，直至 1832 年法国人还在使用帕拉塞尔这个名称，照旧以称一只脚形状的帕拉塞尔，也就是，与交趾支那海岸平行的那个帕拉塞尔，它与西沙群岛仍是毫不相干。

## （二十二）

塔伯特主教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出版的《寰宇志，一切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的概况》一书，说：

“我们不欲一一列举那些属于交趾支那的主要岛屿。我们只提请注意的，是：早在 31 年前已被安南人管它叫做葛鑽（Catvong）或黄沙（Hoàngsa）（原注黄色的沙）的帕拉塞尔群岛，包括那些曾使航海者们非常害怕的、有如进入迷魂阵的许许多多小岛屿的岩石群和黄色沙子的暗滩群，都已被交趾支那所占领去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曾在那里设置了一个什么机构，但可以肯定的，是：嘉隆皇帝很重视在他的皇冠上增添了这一枝奇异独特的花朵，因为他曾经发表讲话表示要去占领它，连它的人民在内；于是在 1816 年，他就在那里庄严地升起了交趾支那的旗帜。”<sup>⑥</sup>

塔伯特主教在这里所讲的，与下述他在 1837 年所发表的论文，都是同样提醒大家注意嘉隆王于 1816 年已经占领了帕拉塞尔——即黄沙或金沙，它的位置，他自己已经明明白白讲出来，是在东经 109.2 度和纬度一直延伸到北纬 11 度，上述这个帕拉塞尔或黄沙的经纬度绝不是西沙群岛的经纬度，因此，嘉隆王于 1816



年占领的,是指在地图上绘了一只脚形状的帕拉塞尔,它与交趾支那海岸平行,靠近海岸不远。从他所提供的经纬度来看,这个被占领的帕拉塞尔群岛,既在东经 109.2 度和止于北纬 11 度左右,那么与这个地方较为接近的经纬度,有可能是指西色尔·地岛(Pulo Cecir de Terre)。西色尔·地岛是帕拉塞尔的尾部(参阅本文第七项资料),它的经纬度,是在北纬 11.2 度、东经 108.9 度,它的高度,有 27 公尺,距离海岸的罗汉(Lagan)岬,约在其东北 8 海里,几乎尽是岩石和不毛之地<sup>④</sup>。所以在 1816 年嘉隆王所占领的,就是包括北纬 11 度左右帕拉塞尔南端的西色尔·地岛(亦称平顺地岛)在内的一些岛屿。

### (二十三)

1837 年,当时的“伊索罗波里士教区的主教,交趾支那的使徒,(英国)亚细亚学会的名誉会员,让·路易·(塔伯尔特)”发表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印度支那地理记略》,刊登于《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孟加拉分会会刊》1837 年 9 月号,文章说:

“讲到交趾支那地理,有关这方面的名著,是以马尔特-布伦(Malte—Brun)先生的著作,最有价值……”“帕拉塞尔或普拉塞尔是一群有如迷魂阵那样的小岛屿,岩石和沙滩,看来它(自北纬 16 度半—原文漏掉这个数字,兹据马尔特—布伦之书,见本文第二十项,特为补上)一直延伸到北纬 11 度和由巴黎算起的东经 107 度。一些航海家们勇敢地横越这些沙洲的一部分,与其说是由于小心谨慎,毋宁说是侥幸成功,而另外有一些人的尝试却失败了,交趾支那人管它叫 Cótúáng。虽然这些群岛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岩石和深渊,除了造成不便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好处,然而嘉隆王却认为,获此增地虽小,但也算是扩大了他的领土。1816 年他庄严地在那里插上了他的旗帜,并领有这些岩石,大概任何人都不

会对他有争议。”<sup>④</sup>

虽然塔伯尔特在上述这篇文章里，没有提到帕拉塞尔是从北纬多少度开始才一直延伸到北纬 11 度，但在 1838 年塔伯尔特的另一本书的插图里，就有明确指出帕拉塞尔是自北纬 17 度开始，并且，还把帕拉塞尔置于东经 110 度余<sup>⑤</sup>。这样一来，塔伯尔特所说的，于 1816 年被嘉隆王占领的帕拉塞尔，其纬度是起自北纬 17 度，止至北纬 11 度，其经度是起自东经 109 度余，至 110 度余止(巴黎东经 107 度—108 度)，这个经纬度，与我国西沙群岛(北纬 15 度 42 分—17 度 8 分、东经 111 度 10 分—112 度 55 分)，是毫无相同之处，嘉隆王所占领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岂非昭然若揭！

#### (二十四)

1849 年，郭士立(C. Guzlaff)《交趾支那帝国地理》一文，说：“如果交趾支那王不对靠近安南海岸 15—20 里格处并延伸于北纬 15 度—17 度和东经 111 度—113 度之间的帕拉塞尔(葛鑽)群岛，以及对航海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些浅滩和小岛提出主权要求的话，我们本来是不会在这里谈及这些岛屿的问题的。究竟是由珊瑚虫抑或其他原因促使这些石滩逐渐增大起来，尚不得而知。但是人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小岛逐年在增高，其中有几个现今已有人永久居住，而仅在几年以前还是波涛汹涌的汪洋。假若这里的渔产不丰富和不能弥补冒险家们所经受的一切危险的话，这些岛屿本来是没有价值的。从远古以来，大部分来自海南(Haenan)的帆船，每年都来访问这些浮起的浅滩，甚至远航到婆罗洲海岸去。虽然每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船只遭到沉没灾祸，但捕获鱼类的数量是如此之大，不但弥补了一切损失，而且还能赚取很大的利润。安南政府意识到订立一种税制的好处，于是就在这个地方设置了

一个征收通行费的机构 and 一个小兵营，以便向一切外来人征收税金，兼保护本国的渔民。较大规模的交往逐渐确立了起来，并由于大量渔群到这些浅滩产卵而使它益趋重要起来。有几个岛上长着发育不良的矮小植物被，但缺少淡水，那些忘记贮备足够数量淡水的水手们，常常陷于极大困难的境地。”<sup>⑤</sup>

郭士立在这里所说的帕拉塞尔群岛，是糅合新、旧两个帕拉塞尔混淆在一起，既然，帕拉塞尔群岛是靠近安南海岸 15—20 里格，即 45—60 海里或 83.25—111 公里，折合经度，不过 0.8—1 度。当时的安南王国海岸，最东之处，在 109 度左右。距离安南王国海岸 15—20 里格的帕拉塞尔，充其量，不过在东经 109 度+1 度=110 度。历来著作都记载古帕拉塞尔距离交趾支那海岸 15—22 里格，并指明它的经、纬度，是在东经 109.2 度、北纬 11 度、12 度至 16 度或北纬 12 度至 17 度。古帕拉塞尔不是今帕拉塞尔，后者经纬度为东经 111 度 10 分至 112 度 55 分、北纬 15 度 42 分至 17 度 8 分。可是郭士立却把古帕拉塞尔的经纬度，不但弃掉不谈，甚至把塔伯特主教所说的 1816 年嘉隆王占领的帕拉塞尔，其纬度是在一直延伸到北纬 11 度，经度是在巴黎东经 107 度（今东经 109.2 度），亦一概扬弃，反而来个偷天换日，把近代的帕拉塞尔（即我国西沙群岛）的经纬度，煞有介事那样地移到嘉隆王所占领的帕拉塞尔，于是便出现嘉隆王所占领的并且属于越南的古帕拉塞尔的经纬度，说成是在北纬 15 度—17 度、东经 111 度—113 度，这个经纬度正是近代帕拉塞尔的经纬度，亦即我国西沙群岛的经纬度。接着，郭士立又把我国海南岛渔民与西沙群岛千百年间的亲密关系，套进古帕拉塞尔去。一会儿，又把越南政府对古帕拉塞尔的一些岛屿实行征税，乱套到今帕拉塞尔（我国西沙群岛）去，真是胡乱套到极点。要分清古、今帕拉塞尔是两个不同的地理概念，才能拆穿混淆古、今帕拉塞尔为一谈的阴谋。

\* \* \*

从上述这些外国记载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述:帕拉塞尔据说是由一群一群的小岛屿和岩石所组成的极其可怖的危险区,它的方向,由北向南延伸着,长度自北纬 11 度、12 度至 16 度或北纬 12 度至 17 度,阔度距离为经度 1 度,亦即东经 109.2 度至 110.2 度,它象一只脚形状,脚尖指向南偏西南延伸。它的尾部还可以自北纬 12 度延伸到北纬 10 度。它的头部、尾部才有岛屿。帕拉塞尔头部的岛屿,包括北纬 16 度以北不远的涠江海岸的一些岛屿(如虎岛,大,小长沙岛等),帕拉塞尔尾部的岛屿,包括西色尔·海岛、西色尔·地岛等。帕拉塞尔的中部,很接近于今天的广东群岛。以上就是这个传统上所说的帕拉塞尔危险区或帕拉塞尔群岛的范围。事实上,它是不存在的,也不是那么样可怖的危险区。外国船只就有穿过它而不发觉有任何危险的记述。

在帕拉塞尔头部(北纬 15 度 35 分)以东或东北的海中,有“眼镜(滩)”。位于帕拉塞尔头部以东的 24—30 海里的“眼镜(滩)”,此处,应指包括我国西沙群岛的中建岛(北纬 15 度 47 分、东经 112 度 5 分)。由此可见,帕拉塞尔与眼镜之间,尚有一个相当开阔的空间间隔,至少尚差经度半度(约 30 海里)。眼镜是指西沙群岛,其西南端,为中建岛,它与想象中的帕拉塞尔头部的东北端,尚差经度半度或大约东西相距 30 海里至 24 海里。《元史·天文志》说中国“南海”在北极出水 15 度(将近北纬 15 度)<sup>⑧</sup>,明末西洋人利玛窦说“大明声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而在 15 度以下的“万里长沙”(即帕拉塞尔)<sup>⑨</sup>显然不属“大明声名文物”所至之内,反而是外国记载上的眼镜(滩),位于帕拉塞尔头部之东,相距半度,才是属于十五度以上的“大明声名文物”范围之内。其他一些早期外国地图,也把北纬 15 度作为大明国南海西南面的起点<sup>⑩</sup>。总之,我国南海海域的西部之南,是以北纬 15 度为界,十五

度以下的一只脚形状的“万里长沙”(即帕拉塞尔),不是中国的,十五度以上的眼镜(滩)(即今西沙群岛),才是中国的。从我国南海的西面海域的南部来看,完全是这样的,所以历来中、外记载均以十五度作为我国南海的西面海域之南的起点<sup>④</sup>。作为中外、华夷之界限的“分水洋”,在北纬15度余、东经109度的外罗山(Coulo Ray 今广东群岛)的附近<sup>⑤</sup>,这也是以十五度为界。这些记载,皆足以证明中国的南海海域,其西部之南,是以北纬15度余的外罗山附近的分水洋作为界限,界限内是十五度以上的中国之境的西沙群岛,界限外是十五度以下的帕拉塞尔头部、中部和尾部,包括帕拉塞尔的尾部和西色尔·海岛和西色尔·地岛。至于古帕拉塞尔的经度,是在109度余至110度余,宽度约有经度1度,其与交趾支那海岸的距离,一般是在15至20里格(经度 $3/8$ 度至半度)之间。总之,于1816年才被越南嘉隆王占领去的古帕拉塞尔(一只脚形状的古帕拉塞尔),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毫无关系,绝不能张冠李戴硬要套在西沙群岛去,这样做,是站不住脚的。

### 注释:

① Voyage du Capitaine John Saris à La Mer Rouge, aux Moluques & au Japon, en 1611. (en De L'Histoire Générale Des Voyages, Tome II, p.172, (Paris 1746), 《约翰·沙利到红海、马六甲和日本的航海记》文载《航海史集》第二卷第一七二页(1746年巴黎出版)。

② 1975年南越西贡政权外交部《关于黄沙(帕拉塞尔)群岛和长沙(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白皮书》第一章《越南的早期历史权利》第三项《外国资料中的第一个证据》。

③ 原文应为“1631—1634年”,《白皮书》误为“1634—1636年”。

④ 参阅 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nno 1631—1634, Biz. 455—457 (s-Gravenhage, 1898), (柯伦勃兰达尔博士(Dr. H. T. Colenbrander)主编《巴达维亚日志》1631—1634年,第455页至第457页,1898年海牙出版。)

⑤ 同注②。

⑥ 关于越南人所说的火、小长沙岛是在交趾支那海岸顺化东南,岷港西北,参阅马司帛洛《占婆史》(马承钧译本)。

⑦ (1536年)黄衷《海语》卷三,畏途,铁板沙条,说: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往占

城的中国使臣之船，舟次交阯之占壁罗，“误触铁板沙，舶坏，二使溺焉，军民死者十九。”

⑧ (1694—5年)大汕广翁《海外记事》卷三，第九页(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

⑨ 参阅下文注④。

⑩ 有必要时，我们把 Pracel 译为帕拉塞尔，Paracel 译为普拉塞尔，以示稍有区别。

⑪ W.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1903. (甘为霖《荷兰人统治下的福摩萨》，1903年伦敦出版。)

⑫ 参阅注⑩、注④。

⑬ 原文作 13 度，应为 15 度之讹，因为广东群岛不在北纬 13 度，而是在北纬 15 度余，故改正之。

⑭ William Dampier: *Voyages And Discoveries*, p.12 (London, 1931). (谭彼儿《航海记与发现记》第十二页，1931年伦敦重版)

⑮ Francois Froger: *Relation du Premier Voyage des Francois a la Chine. Fact en 1698, 1699 et 1700 Sur le Vaissau l' Amphitrite*, p.50—51 (Leipzig, 1926). (圣芳济·弗罗格《乘海后号于 1698, 1699 和 1700 年第一次航海至中国记实》第 50—51 页，1926 年(德国)莱比锡出版)

⑯ Alexander Hamilton: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Edinburgh, 1727), in John Pinkerton (ed): *A General Collection of the b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Voyages and Travels in all Parts of the World*. Vol. VIII, p.482 (London, 1811). (亚历山大·汉弥尔敦：《东印度群岛新志》，文载：品克尔敦《航海游记大全》第八卷第 482 页，1811 年伦敦出版)。

⑰ 关于帕拉塞尔头部，包括北纬 16 度余的大、小长沙岛，参阅注⑥。

⑱ Claudius Madrolle: *Les Premiers Voyages Francois à la Chine; la Compagnie de la Chine, 1698—1719*. (Paris, 1901) p.16. (马洛尔：《圣芳济会对中国的头几次航行；中华商馆，1698—1719》，巴黎 1901 年出版第 16 页)

⑲ Claudius Madrolle: *Hainan et la Côte Continentale Voisine*, (Paris, 1900), p.21—23. (马洛尔：《海南岛和邻近大陆的海岸》，巴黎 1900 年出版，第 21—23 页)

(以上有关马洛尔的文章，转引自戴可来译《黄沙和长沙特考》，1978 年商务版)。

⑳ 见注⑮所引之书，第 148 页第 149—150 页。

㉑ 见注⑮，第 68 页。

㉒ 伯希和认为弗罗吉乘搭海后号第二次航行到中国去，是在 1701 年至 1703 年。见 Paul Pelliot: *Premier Voyage de l' «Amphitrite» en Chine*, p.56. (Paris 1930) 伯希和：《海后号第一次至中国的航海记》，第 56 页，巴黎 1930 年出版)

㉓ 转引自 J. Y. C: 《环状珊瑚岛的秘密，帕拉塞尔纪行》，文载《印度支那》周

刊,1941年7月3日、7月10日、7月17日。

⑭ 同上注⑬。

⑮ 同上注⑬。

⑯ Archiv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 Ar · M · E · Cochinchine, Vol. 729, pp.235—237, (《巴黎国外传教会档案·交趾支那部分》第729卷,第235—237页)。中文译文,参阅戴可来译《黄沙和长沙特考》。

⑰ 同上注⑯,第739卷,第213页。

⑱ 同上注⑯,第726卷,第524页至第525页。

⑲ 参阅第十项的资料。

⑳ Instruction du Conseil Supérieur de Pondichéry au Sr Poivre chargé de l'expédition pour la Cochinchine, 5 Juillet, 1749, en 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Archives Coloniales, Sérics Extrême Orient, Volume Cochine chine I, Vol. 101, pt. 2, p.13. (巴黎国家档案馆,殖民地档案,交趾支那部分,第101卷,第13页,《1749年7月5日本地治理最高议会给负责远游到交趾支那的波福里先生的训令》)以上,并见《通报》1906年。

㉑ 参见本文第十项和第十二项的资料。

㉒ 同注⑳,第101卷,第4分册,第37—38页,(并见《通报》1906年),《1786年骑士摩特德·索尔米尼阿克所拟有关了解交趾支那尤其是土伦地区的指示草稿》。以上有关殖民地档案和巴黎国外传教会档案,均转引自戴可来译《黄沙和长沙特考》,只是把个别地名和专门名词改用法文地名的译音和另译。

㉓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II, p.365—366 (London 1797)。(乔治·斯同东:《大不列颠王国使臣出使中华帝国记实》第二卷,第365—366页,1797年伦敦出版)

㉔ G · Staunton: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ire of China, Vol. I, p.112—113, A Map of China with the Track of the Lion & Route of the Embassy. (London,1797)

㉕ J. Johnson: The Orient Voyager or Descriptive Sketches and Curoory Remarks on A Voyage to India and China, in his Majesty's ship Caroline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03, —4, —5, —6, p.221(London, 1807)。(约翰逊:《东方航海者》,第221页,1807年伦敦出版)

㉖ 1852年第六版《豪斯堡格氏航海指南》第二卷第346页,没有“暗沙群”这个字。

㉗ Horsburgh's Sailing Directions, Vol.II. p. 357—359, London, 1841, (《豪斯堡格氏航海指南》第357—359页。1841年伦敦出版)

㉘ 同注㉖,(第253页,注③)并参阅 J. W. Reed and J. W. King: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p.85, and Introduction. (《中国海指南》第85页,与〈序文〉,1868年伦敦出版)

③⑩ 见注④。

④⑩ John White: *A Voyage to Cochin-China*, p. 95—96, London, 1824. (怀特《交趾支那航海记》,第95页至96页,1824年伦敦出版)

④⑪ 参阅注④。

④⑫ Jean Baptiste Chaigneau (1769—1825): *Memoire sur la Cochinchine, en Bulletin des Amis du Vieux Hue*, no. 2, Avril-Juin, 1923(让·巴蒂斯特·沙依诺《交趾支那见闻录》,文载《古顺化之友》杂志,1923年第二期4/6月。(见戴可来译《黄沙和长沙特考》1978年商务版)。

④⑬ John Crawfo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Governor-General of India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 China*, p.464, London, 1828. (约翰·柯罗福《奉印度总督之命出使暹罗王廷和交趾支那王廷日志》第464页,1828年伦敦出版)。

④⑭ Malte-Brun: *Précis de le Géographie Universelle, ou Description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Sur un Plan Nouveau, D'Après Les Grandes Divisions Naturelles du Globe; etc. Tome II*, p.345. A Bruxelles, 1829. (马尔特-布伦:《世界地理简志》第二卷第345页,1829年布鲁塞尔出版。书中把北纬11度、12度至16度的帕拉塞尔,开始向北移动一度,变成帕拉塞尔是自北纬12度至17度。)

④⑮ (南越)黄春瀚《黄沙群岛》一文(文载西贡《史地》杂志,1975年,见戴可来译《黄沙和长沙特考》1978年商务版),引欧仁·沙依诺之信件说:1830年8月9日失事的这条船,“大约距离沱灏(即土伦,今岷港)80哩(原注:约450公里。)(华案:应为150公里,黄春瀚在这里,有故意扩大和篡改帕拉塞尔与土伦之间的距离的破绽,因为西沙群岛的永兴岛至土伦的距离,才是450公里。)帕拉塞尔群岛的石滩上沉没了。”案:欧仁·沙依诺的信件原文(见下文注④⑯),仅作“24里格”,折合72海里(1里格折合3海里)或142公里(1海里折合1.85公里计算)。为了要把当时的帕拉塞尔,影合于今西沙群岛,黄春瀚就把24里格(142公里),故意换算错误,说是450公里,以便迎合西沙群岛至土伦的距离为450公里,这种错误和造假,显而易见。更加不对的,是把原文“24里格”,折为72海里,并以整数80海里言之,却又再把换算出来的整数80海里,作为原文原是“80里格”,折合450公里。这种公然篡改原文的盗窃行为,根本不足以谈如何尊重历史事实。

④⑯ M. Henri Cordier: *La Consulat de France a Huê, sous la Restauration*, no. I.XXIV, p.127, Paris, 1884. (亨利·高第亚(纂辑)《驻顺化法国领事馆文件集》第74件(第127页),1884年巴黎出版)

④⑰ Bishop Tabard: *El Univers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detous les peuples de leurs Religions, Moeurs et Coutumes*, Paris 1833. (塔伯特主教:《寰宇志·一切民族的历史以及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的概况》,1833年巴黎出版。)

④⑱ 参阅(日本)南洋经济研究所编,《大南洋地名词典》第四卷《泰国及佛领印度支那》第169页。1942年东京出版。



④② Jean Louis: Note in the Geography of Cochinchina. In JRAS, B. Sept. 1837, p.745 [让·路易·(塔伯特):《交趾支那地理志》,文载《(皇家)亚洲学会孟加拉(分会)会刊》1837年9月号第745页]。

④③ 1838年出版的塔伯特主教《拉丁文—安南文词典》卷后附地图一幅,长80.5厘米,宽44厘米,其标题用中文、安南文、拉丁文三种文字印刷,曰:

安南大国画图  
AN NAM DAI QUÔC HOA DÔ  
Seu

Tabula Geographica Imperii Anamitici Ab Auctore Dictionarii Latino-Anamitici Disposita  
1838

在此地图中,约于北纬17度至11度和东经109度至110度余的南海海中,有画着一些岛屿,并有这些岛名,曰:

普拉塞尔 (Paracel)  
即 (seu)  
葛嶺 (Cát Vàng)

其对岸的陆地有:

顺化 (Hue)  
翰海门即沱瀆海港 (Cửa Han seu Touron Portus)  
山茶岛(即沱瀆的山茶半岛) (Hòn Sơn Cha)  
大占海口 (Cua Dai Nai Cham)  
劬劳占 (Cù Lao Cham)  
沙圻 (Sa Ky)  
劬劳哩即广东群岛 (Cù Lao Rê seu Pulo Canton) (广东群岛即理山岛)。  
大广义海口 (Cua Dai Quang Ngai)  
广义营 (Dinh Quanh Ngai)

以上,见戴可来译《黄沙和长沙特考》第225页(1978年商务版)。越南作者把原欲刊登的上文此图,临时删掉,就是害怕把塔伯特对帕拉塞尔所标出的经纬度暴露出来。如今把塔伯特所标志的帕拉塞尔的经、纬度,重新补上。

④④ C. Gutzlaff: Geography of the Cochin China Empire, in Journal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J. R. G. S.) Vol. XIX, p. 93 (1849), (郭士立:《交趾支那帝国地理》,文载《伦敦地理学会会刊》第19卷(1849年)第93页)。

④⑤ 《元史》卷48《天文志》(一)。

④⑥ 参阅(1602年)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万历壬寅(1602年)钱塘张文焘过纸。所谓“大明声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这是指当时关内中国本部而言,至于关外中国之地,当时属于满、蒙、回各族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利玛窦的心眼中,是与关内本部“大明声名文物之盛”,有所差别。

④⑦ (1585) G. Mercator: Atlas, China (G. 麦加托《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图

幅，南起自北纬十五度。该图一部分，重刊于《半球月刊》第二十卷第二期第三十八页。(HEMISPHERE, an Asian-Australian Monthly, Vol. 20, no. 2, p.38, Feb, 1976)。

⑤ 关于历史上我国南海海域的界限，包括南海西面海域之南边界限和西北界限，以及南海南面海域和东面海域的界限，参阅拙作《我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一文(未刊稿)。

⑥ 关于外罗山的分水洋，见明黄衷《海语》，卷三，畏途，分水(洋)条。

一九七八年国庆前夕第一次稿

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第二次稿

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日第三次稿

## 古“帕拉塞尔”考(其二)




### ——十六、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外国地图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

韩振华

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外国地图上的帕拉塞尔，位于距离印度支那海岸(昔占婆海岸)不到1度的海中，南北约自北纬 $10^{\circ}$ 、 $11^{\circ}$ 、 $12^{\circ}$ 至 $16^{\circ}$ 、 $17^{\circ}$ ，它不是我国西沙群岛。下面，把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外国地图有关帕拉塞尔(想象中的航海危险区)与眼镜(今西沙群岛)的形状标志，及其大约的经、纬度，一一列表如下，足资证明当时外国地图上的靠近今天越南中部海岸而且南北走向的帕拉塞尔，完全不是外国地图上的眼镜(滩)——我国西沙群岛，二者泾渭分明，毋庸互混。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左右以后，尤其是四十年代以后，帕拉塞尔才完全被冒名顶替，专指今天西沙群岛。

外国地图上的帕拉塞尔形状和位置表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522	(葡萄牙)佚名 《世界地图》	长带形状的沙礁	barrairas (葡文， 意即栏或石栏)	①
1527	(葡萄牙)佚名 《世界地图》	一群小岛的形状的沙礁	(有文字，看不清)	②
1529	地亚哥·利伯罗 《世界地图》	长带形状的沙礁	ya bastiga (葡文 意即栏、明、 亦即石栏、石栅)	③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529	地亚哥·利伯罗 《世界地图》		分成二段的长带形, 北端偏西北, 南端偏西南	Pracel (字迹不太清楚) ④
1529	同上		一只脚形状	同上 ⑤
1535	(葡)佚名 《世界地图》		分成七段, 每段约为间隔纬度 1°, 最南一段, 由 13° 至 10°	无文字名称 ⑥
1540	(葡)佚名 《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三段, 北段在广东群岛之南, 南段超过柬埔寨角	无文字名称	⑦
1541	尼古拉·地士林 《世界地图》	长带形状的沙礁	P. de Pracel	⑧
1545	佚名《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二段	无文字名称	⑨
1546	佚名《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约自北纬 9°—13°, 经度相距约在 1° 左右)	有文字, 看不清	⑩
1550	庇埃列雷·地色利尔 《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P. du Pracel	⑪
1553	同上	一只脚形状	P. du Pcel	⑫
1554	洛波·霍曼 《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南、北两段	无文字名称	⑬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554	F. 柏尔特列《东印度群岛》一书的插图	一只脚形状	有文字名称, 字迹看不清	⑭
1558	地亚哥·霍曼《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无文字名称	⑮
1558	同上	一只脚形状, 分成三段, 南段由北纬 $10^{\circ}$ — $15^{\circ}$ , 中段 $15^{\circ}$ — $16^{\circ}$ , 北段 $16^{\circ}$ — $17^{\circ}$	无文字名称	⑯
1537—1538	(葡) 品陀《航海记》卷首插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circ}$ — $17^{\circ}$ )	Pracel	⑰
1560	(佚名绘) 巴托罗缪·维尔荷《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 宽约 $1^{\circ}$ , 长约自北纬 $10.5^{\circ}$ 至 $17^{\circ}$	I. do Pracel	⑱
1560	(佚名绘) 李弗罗·底·马林哈里亚《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二段, 北段由北纬 $17^{\circ}$ — $16^{\circ}$ , 南段由 $16^{\circ}$ — $10^{\circ}$	Ilhas do Pracell	⑲
1561	地亚哥·霍曼《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三段, 南段由北纬 $10^{\circ}$ — $15^{\circ}$ , 中段 $15^{\circ}$ — $16^{\circ}$ , 北段 $16^{\circ}$ — $17^{\circ}$	I. do Pracel	⑳
1561	巴托罗缪·维尔荷《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二段, 南段由北纬 $10^{\circ}$ — $16^{\circ}$ , 北段由 $16^{\circ}$ — $17^{\circ}$	无文字名称	㉑
1561	J. 伽斯塔耳底《亚洲地图》第三部分图	一只脚形状, 南端与柬埔寨角相对	无文字名称	㉒
1563	(佚名绘) 地亚哥·霍曼《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三段, 南段由北纬 $10^{\circ}$ — $15^{\circ}$ , 中段 $15^{\circ}$ — $16^{\circ}$ , 北段 $16^{\circ}$ — $17^{\circ}$	I. do Pracel	㉓
1565	(佚名绘) 地亚哥·霍曼《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二段	无文字名称	㉔
1565	(佚名绘) 邪巴斯吕·洛比斯《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二段, 南段由北纬 $10^{\circ}$ — $16^{\circ}$ , 北段 $16^{\circ}$ — $17^{\circ}$	无文字名称	㉕
1568	地亚哥·霍曼《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三段, 南段由北纬 $10^{\circ}$ — $15^{\circ}$ , 中段 $15^{\circ}$ — $16^{\circ}$ , 北段 $16^{\circ}$ — $17^{\circ}$	I. do Pracel	㉖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568	费尔南·瓦兹·杜拉多《地图》	一只脚形状, 西部自北纬 $12^{\circ}$ — $17^{\circ}$ , 东部 $13^{\circ}$ — $17^{\circ}$	I. do Pracell	②7
1570	同上图	形状同上, 但西部自北纬 $12^{\circ}$ 以下, 作连续点延伸至北纬 $10^{\circ}$	I. do Pracell	②8
1571	同上图	形状同上	I. do Pracell	②9
1571	同上图	形状同上	无文字名称, 但在其东北角以外, 有 I. dos boiças	③0
1573	多敏哥·德赛罗《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二段, 南段由北纬 $10^{\circ}$ — $16^{\circ}$ , 北段 $16^{\circ}$ — $17^{\circ}$	无文字名称	③1
1575	费尔南·瓦兹·杜拉多《地图》	一只脚形状, 东部自北纬 $13^{\circ}$ — $17^{\circ}$ , 西部自 $12^{\circ}$ — $17^{\circ}$ , 但自 $12^{\circ}$ 以下, 作连续点, 向西南弯曲, 止于 $10^{\circ}$ , 形状同上	I. do Pracell	③2
1575	同上图	形状同上	无文字名称	③3
1575	刘易斯·乔治·底·巴尔布达《地图》	一只脚形状, 东部自北纬 $13^{\circ}$ — $17^{\circ}$ , 西部自 $12^{\circ}$ — $17^{\circ}$ , 自 $12^{\circ}$ 以下, 有垂直的三个小岛, 止于 $11^{\circ}$	无文字名称	③4
1576	(佚名绘) 同上图	形状同上	I. do Pracell	③5
1576	(佚名绘) 同上图	形状同上, 但北面上于北纬 $16^{\circ}$	无文字名称	③6
1580	(荷) 奥尔特里乌斯《新亚细亚图》	其形状有如椭圆形的一群岛屿, 自北纬 $10^{\circ}$ 余至 $13^{\circ}$ 余	I. do Pracell	③7
1580	费尔南·瓦兹·杜拉多《地图》	一只脚形状。东面自北纬 $13^{\circ}$ — $17^{\circ}$ , 西面自 $12^{\circ}$ — $17^{\circ}$ , 但自 $12^{\circ}$ 以下, 作连续点向西南延伸, 止于 $10^{\circ}$	I. do Pracell	③8
1583	(佚名绘) 邪巴斯昌·洛比斯(?)《地图》	一只脚形状, 自北纬 $10^{\circ}$ 至 $17^{\circ}$	I. do Pracell	③9
1584	L. 乔治奥《中国地图》	一只脚形状, 宽度约为 $1^{\circ}$ , 长度约自北纬 $12^{\circ}$ — $17^{\circ}$	Pracell	④0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584	(西班牙) F·高耳《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宽度约为 $1^{\circ}$ , 长度约自北纬 $12^{\circ}$ — $17^{\circ}$	无文字名称	④①
1585	G·麦卡托《中国地图》	长方形, 自北纬 $15^{\circ}$ — $17^{\circ}$ (该图图幅, 止于 $15^{\circ}$ )	Pracel	④②
1589	(荷) 彼得·奥特里乌斯《太平洋(两岸)地图》	不规则的岛屿形状, 由北纬 $7^{\circ}$ 至 $14^{\circ}$ , 经度距离约为 $1^{\circ}$	Pracel	④③
1590	(荷) 巴尔托罗缪·拉梭《地图》	一只脚形状, 自北纬 $10.5^{\circ}$ 至 $17^{\circ}$ , 宽约 $1^{\circ}$ 左右	无文字名称	④④
1592	(荷) 彼得罗斯·普兰西乌斯《世界地图》	长方形	无文字名称	④⑤
1592—1594	(荷) 巴尔托罗缪·拉梭—彼得罗斯·普兰西乌斯《地图》	一只脚形状, 宽约 $1^{\circ}$ , 长度自北纬 $14^{\circ}$ — $17^{\circ}$ (东部); $12^{\circ}$ — $17^{\circ}$ (西部, 分成二段, 南段自北纬 $12^{\circ}$ — $14^{\circ}$ , 北段自北纬 $16^{\circ}$ — $17^{\circ}$ )	Pracel	④⑥
1594	(荷) 彼得罗斯·普兰西乌斯《世界地图》东半球图	一只脚形状	无文字名称	④⑦
1595	(荷) 奥尔蒂略《中国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成二段, 北段自北纬 $16^{\circ}$ — $17^{\circ}$ , 南段自 $10^{\circ}$ — $16^{\circ}$	Pracel ins.	④⑧
1595	(荷) 冯·朗格陵《东印度群岛地图》	一只脚形状	Ilhas do Pracel	④⑨
1596	巴尔托罗缪·拉梭—冯·郎格陵《地图》	一只脚形状, 分为二段, 北段自北纬 $16^{\circ}$ — $17^{\circ}$ , 南段西部自 $13^{\circ}$ — $16^{\circ}$ , 在 $13^{\circ}$ 以下, 作连续点, 止于 $10^{\circ}$ ; 南段东部, 自 $14^{\circ}$ — $16^{\circ}$	I. de Pracel	⑤⑩
1596	(荷) 林旭登《大航海地图》	一只脚形状, 自北纬 $12^{\circ}$ — $17^{\circ}$ , 经度距离约为 $1^{\circ}$	I. de Pracel	⑤⑪
1596	《东亚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 自北纬 $12^{\circ}$ — $17^{\circ}$ , 经度距离约为 $1^{\circ}$	ブラセル 万里石塘	⑤⑫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598	(荷人) 康奈利斯·杜尊《东南亚与东亚的罗盘方位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东西经度距离为 $1^{\circ}$	I. de Pracel	(58)
1590	《中国海岸地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东西经度距离为 $1^{\circ}$	I. de Pracel	(54)
十六世纪末(十八世纪重绘本)	《东亚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无文字名称	(65)
十六世纪末	塞巴斯相·亚弗兹《东亚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经度距离为 $1^{\circ}$	无文字名称	(66)
1600	《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无文字名称	(67)
1600年左右	(荷人)《印度洋与东亚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经度距离为 $1^{\circ}$	I. de Pracel	(59)
1602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	萝卜头形，北纬 $10^{\circ}$ 至 $14.5^{\circ}$ ，其经度距离为 $1^{\circ}$ ，或自 $121^{\circ}$ — $122^{\circ}$	万里长砂	(68)
1606	勃黎奥《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El Pracel	(69)
十七世纪初期	《世界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0^{\circ}$ — $16^{\circ}$	无文字名称	(70)
十七世纪初期	《航海古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无文字名称	(74)
十七世纪初期	《万国绘图》屏风	一只脚形状	无文字名称	(63)
十七世纪初期	《世界图》屏风	一只脚形状	有平假名(看不清)	(71)
十七世纪初期	《东亚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万里”	(55)
十七世纪初期	《东亚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フソセル (Pracel)	(64)
十七世纪初期	《东洋诸国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万里(字形似为中文草书“万里”)	(7)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十七世纪初期	《万国总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circ}$ — $17^{\circ}$	マソニ(万里)	⑥⑧
1597—1612	(佚名绘) 约翰·巴蒂斯塔·拉文哈与刘易斯·德塞罗《地图》	一只脚形状	无文字名称	⑥⑨
1613	《交趾支那海岸和东京海岸以及中国部分海岸图》	三角形  一只脚形状	Les Lunettes (眼镜“滩”) 北纬 $16^{\circ}$ 至 $17^{\circ}$ 东经 $129\frac{1}{2}^{\circ}$ 至 $130\frac{1}{2}^{\circ}$ le Pracel (北纬 $12\frac{1}{4}^{\circ}$ 至 $16\frac{3}{4}^{\circ}$ 东经 $128^{\circ}$ 至 $129^{\circ}$ )	⑦⑩
1628	(佚名绘) 约翰·德塞罗·阿耳培尔奈兹《地图》	一只脚形状, 东部自北纬 $12^{\circ}$ — $17^{\circ}$ , 西部自 $10^{\circ}$ — $17^{\circ}$	I. do Parcel	⑦⑪
1630	约翰·德塞罗一世《地图》	一只脚形状, 约自北纬 $10^{\circ}$ 至 $17^{\circ}$	无文字名称	⑦⑫
1640	(佚名绘) 约翰·德塞罗·阿耳培尔奈兹一世《地图》	一只脚形状, 约自北纬 $10^{\circ}$ 至 $17^{\circ}$	Pcel	⑦⑬
1643	约翰·德塞罗一世《世界图》	一只脚形状 (约自北纬 $10^{\circ}$ 至 $17^{\circ}$ )	I. do Parcel	⑦⑭
1645	《万国总图》	一只脚形状	万里长沙	⑦⑮
1649	约翰·德塞罗一世《地图》(手绘本)	一只脚形状, 东部约自北纬 $14.5^{\circ}$ 至 $17^{\circ}$ , 西部约自 $10^{\circ}$ 至 $17^{\circ}$	I. de Parcel	⑦⑯
1649	约翰·德塞罗一世《地图》(刻印本)	一只脚形状, 东部约自北纬 $12^{\circ}$ 至 $17^{\circ}$ , 西部自 $10^{\circ}$ 至 $17^{\circ}$	I. de Parcel	⑦⑰
1652	《世界地图》屏风画	一只脚形状	万里	⑦⑱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663	约翰·勃黎奥 《世界大地图》	长三角形, 约自北纬 $10.2^{\circ}$ — $16.3^{\circ}$ ; 经度, 西部为东经 $139.2^{\circ}$ — $139^{\circ}$ , 东部为 $139.2^{\circ}$ — $140.2^{\circ}$	Pracel	⑧③
1652	《世界地图》屏风	一只脚形状	万里	
1680	《东亚航海图》	萝卜头形状	无文字	⑧④
1673— 1681年	《东亚航海图》	萝卜头形状	万里长沙	⑧⑤
1694	(法文本) 费尔 《坤輿全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circ}$ — $17^{\circ}$ , 经度距离为 $1^{\circ}$ , 或东经 $130^{\circ}$ — $131^{\circ}$	Isle de Pracel	⑧⑥
1698	《世界图》屏风	一只脚形状。北纬 $11^{\circ}$ — $15^{\circ}$ , 东经的经度距离 $1^{\circ}$	万里长砂	⑧⑦
十七世纪	《世界图》屏风	萝卜头形状大约在北纬 $12^{\circ}$ — $17^{\circ}$	万里长沙	⑧⑧
十七世纪	《旧大陆图》屏风	一只脚形状 (北起自交趾、占婆交界处的海上, 南止于柬埔寨角的海上)	无文字	⑧⑨
十七世纪 末至十八 世纪初	《东南亚和东亚 航海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circ}$ — $17^{\circ}$	万里	⑧⑩
十七世纪 末或十八 世纪初	《坤輿全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circ}$ — $17^{\circ}$ , 东经 $127\frac{1}{2}^{\circ}$ — $128\frac{1}{2}^{\circ}$ 三角形: 北纬 $16^{\circ}$ — $17^{\circ}$ , 东经 $129\frac{1}{2}^{\circ}$ — $130\frac{1}{2}^{\circ}$	巴拉色尔诸岛 眼镜	⑧⑪
十八世 纪初期	《东洋南洋航海 古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circ}$ — $17^{\circ}$	万里长沙 プロヤリ	⑧⑫
1709	《坤輿万国全图》	一只脚形状	万里长砂	⑧⑬
1721	费尔《世界地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circ}$ — $17^{\circ}$	Isle de Pracel Banc et Rocker Four Casse de Pracel	⑧⑭
1725	净慧《地球之图》	一只脚形状, 约自北纬 $11^{\circ}$ — $15^{\circ}$ 或 $17^{\circ}$	万里	⑧⑮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720	原目贞清《舆地图》	一只脚形状(约自北纬10°至15°强之间)	万ラコロリ	⑧
1752	森幸安《亚细亚诸州天表地方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12°—17°	万里长砂	⑨
1759	沢田贞矩《地球仪》	一只脚形状(约自北纬15°—17°)	万里长砂	⑩
1783	《地球·览图》	长方形(约自北纬10°—17°)	万里长砂	⑪
1788	《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	一只脚形状(约自北纬12°—17°)	万里石塘	⑫
1792	《地球图》	长方形(不大明显),约自北纬12°—15°,子午线以东东经37°—38°	万里	⑬
1794	《地球全图》	椭圆形(约在北纬12°—16°) 三角形(约在北纬16°—17°)	无文字名称(指Pracels) 无文字名称(指眼镜滩)	⑭
1794	《亚细亚全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12°—16 $\frac{1}{2}$ ° 东经 127°—128° 三角形:  北纬16°—17° 东经 129°—130°	万里石塘 ブラセル  ルエナス (Lunettes) (眼镜滩)	⑮
1797	《英使朝华录》地图之一	一只脚形状北纬12°至17°,东经110°至111 $\frac{1}{2}$ ° 危险滩 石:  北纬 16 $\frac{1}{2}$ ° 至17°,东经 112°至113°	Pracels  Shoals & Rocks (暗沙与岩石)	⑯
1797	《英使朝华录》地图之二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 $\frac{1}{2}$ ° 至 17 $\frac{1}{2}$ ° 东经 109 $\frac{1}{2}$ ° 至 111 $\frac{1}{2}$ ° 三角形北纬 16 $\frac{1}{2}$ ° 至 17° 东经 112° 至 113°	Pracel  Spectacles (眼镜)	⑰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798	《中国海与鞑靼海探险图》	林肯岛(今东岛)北纬 $16\frac{3}{4}^{\circ}$ 法国巴黎东经 $110\frac{1}{2}^{\circ}$ (今东经 $112\frac{3}{4}^{\circ}$ )	林肯岛	㉒
十八世纪末	《世界四大洲图》	长方形,北纬 $12^{\circ}$ — $17^{\circ}$	万里长沙	㉓
1802	《坤舆全图》	萝卜头形状,北纬 $11^{\circ}$ — $15^{\circ}$	万里长沙	㉔
1803—1806	《东方航海家》一书插图	岛屿形状(北纬 $17^{\circ}$ 强,东经 $111^{\circ}$ 余)、三角形(北纬 $17^{\circ}$ 强,东经 $111\frac{1}{2}^{\circ}$ ) 小岛(北纬 $17^{\circ}$ 、东经 $112^{\circ}$ )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东经 $109\frac{1}{2}^{\circ}$ — $111^{\circ}$ 弱)	Amphitrite, Triangles, Lincoln Pracel	㉕
1808	《地球仪》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	万里石塘	㉖
1810	《新订万国全图》	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 — $17^{\circ}$ )	フラセル (Pracel)	㉗
1829	《闽浮提图》	椭圆形	长沙(字迹不清楚)	㉘
1830—1833	《中国及其邻国传教记》的附图	长方形(北纬 $12^{\circ}$ — $16^{\circ}$ ,东经 $110^{\circ}$ — $111^{\circ}$ )	无文字名称	㉙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	《大南一统全图》	 一只脚形状,分成二段,北段称“黄沙”,南段称“万里长沙”	黄沙(北段) 万里长沙(南段)	㉚
1847	《新制舆地全图》(东半球图)	萝卜头形(约在北纬 $12^{\circ}$ — $14^{\circ}$ )	フラセル (Pracel)	㉛
1850	《万国地球全图》	萝卜头形(约在北纬 $12^{\circ}$ — $14^{\circ}$ )	フラヤン (Pracel)	㉜

年 代	地图名及其作者	危险区的形状及其经纬度	危险区的名称	备注
1852	《地球仪》	小圆球形. 经度 $340^{\circ} - 342^{\circ} \pm$	フラセル (Pracel)	㉔
1852	《新订地球万国方图》	一只脚形状, 北纬 $12^{\circ} - 17^{\circ}$	万里长沙	㉕
1848— 1854	《万国地球丹形图》	一只脚形状	フラセル (Pracel)	㉖
1854	《大日本唐土輿地全图》	长方形	フラセル (Pracel)	㉗
1856	《亚细亚州之图》 (亚细亚其二)	一只脚形状 (约在北纬 $11^{\circ} - 15^{\circ}$ )	フラセル (Pracel)	㉘ *㉙

早期的帕拉塞尔, 头段是在北纬  $16^{\circ} - 17^{\circ}$ , 却又向西北靠近陆地方向倾斜(参阅注④)。后来, 有荷兰船在北纬  $17^{\circ}$  的帕拉塞尔遇难⑥。看来, 这里的帕拉塞尔是指岷港以北至顺化一带的近海沙洲、暗滩, 包括 Banc de Thuan An (顺安暗滩)。自北纬  $15.5^{\circ}$  以南, 直至北纬  $10^{\circ}$  以上的平顺海岛(Pulo Cecir de Mer), 是帕拉塞尔南段, 也是尾部, 它被利玛窦等外国地图称之为万里长砂或长沙。清代中国地图, 有横、竖二个长沙, 竖形的长沙, 就是帕拉塞尔; 直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越南官方地图, 仍旧把这种一只脚形状的帕拉塞尔称为万里长沙。以上这些万里长砂或长沙, 都是指北纬  $15.5^{\circ}$  以下, 至北纬  $12^{\circ} - 13^{\circ}$ , 并延伸至北纬  $10^{\circ}$  的帕拉塞尔。

至于帕拉塞尔(Pracel)一名的由来, 说者不一。或谓: Ilhas do Pracel, 应为葡文。葡文 Parcel, 意曰“暗礁”, 或“高底的盘石”, 如: 庇埃雷·伊夫·毛官(Pierre Yves Mauquin)教授, 在他所著《在越南和占婆沿岸的葡萄牙人》(Les Portugais Sur les Côtes du Vietnam et du Campa)一文, 就是这样主张的[文载《法国远东学校校刊》1972年第74页(B. E. F. E. O., 1972, p.74)]。法国《拉

鲁斯大辞典》，也认为 Pracel 或 Paracel，即“礁石”之义。在葡萄牙文字典上，确是把 Parcel 作为“礁石”之解。或谓：Parcel 此名，乃是由于十六世纪时有一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名叫 (Paracelsse 号)，触礁沉没于此，自后就用此沉船之名以称这一带的群岛。此说乃系布雷比翁教授(Prof. A. Brébion) 所主张的(参阅《法属印度支那古今传记书志词典》1935年巴黎出版。Dictionnaire de Bibliographie Général, Ancienne et moderne, de l' Indochine Française, s. v. Paracel, Paris 1935)。或谓：帕拉塞尔此名，首先见于1595年荷兰人弗莱列斯·冯·朗格棱所作《东印度群岛航海图》<sup>②</sup>，案：此说不确，从上表可以看到在朗格棱以前，便已有 Pracel 之名出现。


当帕拉塞尔(Pracel)一名尚未出现之前，葡萄牙人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对它最早的称谓，是叫做 barrairas，(参阅注<sup>①</sup>)，意即“栏”，亦即译自中国人的“石栏”，名见《海道针经》<sup>③</sup>；葡人又把它叫做 bastiga，(参阅备注<sup>④</sup>)，意即“栅”、“栏”，亦即中文“石栏”的另一种意译名字。)上述这两种意译的名称，很快地就消失不见了，接着，Pracel 此名才出现。葡文没有 Pracel 此字，只有 Parcel，意曰“暗礁、石礁”。整个十六世纪的葡文地图，都没有看到 Parcel 这种写法之名，我们所看到的，只有 Pracel 或 Pcel，一直到了十七世纪，才开始有 Parcel 这种写法之名出现。因此，也可以说，Parcel 是中文“石栏”的另外一种葡文的意译；Pracel 或 Pracell 是否可以被认为是 Parcel (暗礁、石礁)的另一种比较古老的拼写法。(Pcel 是否即为 Pracel 的一种不完全的拼写法)。总之，对于与占婆海岸相平行的这一段海中的航海危险区，葡文是按照中文“石栏”的字面意义，意译为 barrairas, bastiga, 或 Pracel (Parcel)，终于以 Pracel 或 Parcel 这一种意译名称，流传于世。

Pracel 虽然是中文“石栏”的意译，但是由于石栏所指之处，即

宋、元、明初的石塘、石堂、石床，它是万里石塘的尾部，于是日本的地图，除了把 Pracel 音译为 フラセル，此外，还把它意译为“万里石塘”。明清之际，在中国又把万里石塘改称为俗名万里长沙，因此，Pracel、フラセル 也改译为万里长沙<sup>④</sup>。

最早的 Pracel 危险区，是有分成七段或几段，亦即：在北纬 17° 至 10° 之间的 Pracel，自 17°—16° 为头段，16°—15° 为中段，15° 以下至 10° 为尾段，每隔一度，约为一段，共有七段。也有，自北纬 17°—16° 为头段，16°—15° 为二段，15°—14° 为三段，14°—13° 为四段，13° 以下至 10° 为尾段；还有，自北纬 17°—16° 为头段，自 16°—10° 为尾段。最后，才有把它作为一整段，北自北纬 17° 起，南至 10° 止，中间没有分段。有分段的，表示各段之间，可以通航过去。十六世纪的外国地图，常把占婆海与中国的分界作为是在北纬十五度以北之处，以此作为中国国境海界的开始<sup>⑤</sup>。亦即中国南海西部的海界，是从当时占婆的外罗山(北纬 15° 余)的“分水洋”开始，并认为它是“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sup>⑥</sup>。1529 年的葡文地图，把 Pracel 分成二段，头段始自北纬 17° 至 15.5° 左右的外罗山(北纬 15°22′、东经 109°07′)的“分水洋”，这正是昔日作为“天地设险，以域华夷”的界限。

十六世纪以来，外国地图对危险区的 Pracel 与我国西沙群岛，是有区别的。除了 Pracel 之外，在 Pracel 头段的东北方向的海中，有“眼镜”滩（参阅备注<sup>⑦</sup>、<sup>⑧</sup>、<sup>⑨</sup>，特别是备注<sup>⑩</sup>作菱镜或三菱镜形，形

状三角，于是，地图上乃有  三角形的画法，并称它为 Triangle (三角、三菱。)此外，地图上还对我国西沙群岛的某些重要岛屿或岛群，特别标出它的名称，例如 I.dos Boiças (意即“林岛”今永兴岛)，(参阅备注<sup>⑪</sup>)；Amphitrite 群岛(今宣德群岛)；Lincoln 岛(今东岛)(参阅备注<sup>⑫</sup>)，它们都是位置于 Pracel 以外的我国西沙

群岛,在同一张地图上,二者泾渭分清,毫无混淆,古 Pracel 不是我国西沙群岛,此乃显而易见。过去,无论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还是南越集团,想侵夺我国西沙群岛,总要抬出十九世纪初越南嘉隆王占领帕拉塞尔(Pracel)一事,作为唯一的所谓历史证据<sup>①</sup>,今天越南反动领导集团妄想继承占夺我国西沙群岛的衣钵,其所依恃的唯一“历史”证据,也是同上述一样。但是,历史上的帕拉塞尔,或者是西方人所记述的 Pracel,自十六世纪以来,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它所指的地区,在北纬 10°、11°、12° 至 16°—17°、东经 109° 余—110° 余,它不是我国西沙群岛,而是指:位于西沙群岛西南端以外并被认为是南北走向的航海危险区的帕拉塞尔(Pracel)。事实上,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它被确认为纯属虚构的海中危险区以后,并把它从地图上逐渐取消掉这种一只脚形的画法,此后,帕拉塞尔(Pracel)此名,才逐渐移称于我国西沙群岛,一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以后,帕拉塞尔(Pracel)此名,才专指我国西沙群岛,无数的史地资料,都证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左右的帕拉塞尔(Pracel),不是我国西沙群岛。当然,嘉隆王所占领的帕拉塞尔(Pracel),更不是我国西沙群岛,铁证如山,混淆、篡改不得。

### 注释:

① 见 Albert Kammerer: *La Decouverte De La Chine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eme Siecle Et La Cartographie Des Portulans, en T'oung Pao, Supplément au vol. XXXIX (1944)* [A. 甘弥儿《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发现中国和绘制罗盘航海地图》,文载《通报》第三十九卷增刊(1944年,莱登出版)。第260页附表]。

② 《葡萄牙海外活动杰出地图集》,以下简称《地图集》,1960年里斯本出版,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Lisboa 1960*), 第一卷,第38图。[该《地图集》有关十六世纪的帕拉塞尔(Pracel)的图幅甚多,此书现藏北京地理研究所,为国内仅见的珍本]。

③ 西班牙著名绘制地图家地亚哥·利伯罗(Diogo Ribeiro)的《世界地图》第三版:第二次绘本,1529年,由威玛(Weimar)公爵收藏。见 A·Kammerer 同上



书第 203 页与第 260 页附表。

④ 《地图集》 Vol. I, pl. 39. Diogo Ribeiro, 1529.

⑤ 《地图集》 Vol. I, pl. 40 Diogo Ribeiro, 1529.

⑥ 《地图集》 Vol. I, pl. 58. Anónimo, c. 1535.

⑦ 《地图集》 Vol. I, pl. 71. Anónimo, c. 1540, 在地图上的帕拉塞尔 (Pracel), 其标志有如人的一只脚, 脚指尖向南, 大拇指向西南, 最靠近今天越南中部海岸。由于(1824)约翰·怀特的《航海记》里面, 把它的形状, 描写成为有如“人的一只脚(原注: 脚指尖是在极南端)”, 因此, 本文也跟着这种历史记载, 把它称为“一只脚形状”。[参阅 John White: Voyage to Cochinchina, p.168 (London, 1824)].

⑧ Nicolas Desliens 的地图(1541年)。见 W. Hantzsch & L. Schmidt: Kartographische Denkmaler zur Entdeckungsgeschichte von Amerika, Asien, Australien und Afrika, Bibliothek zu Dresden, Leipzig 1923, 该图在此以前, 没有重版。见 A. Kammerer 同上书第 207 页注②与第 260 页附表。

⑨ 《地图集》 Vol. I, pl. 79. Anonimo, c. 1545.

⑩ Weimar 公爵所收藏的一张佚名葡萄牙人的罗盘航海图(此即 Lopo Homem 之图, 大约绘于 1546 年)。见 A. Kammerer 同上书第 208 页, 插图版第 23 图。

⑪、⑫ Pierre Desceliers, Cartographe Francais de Dieppe. 见 A. Kammerer 同上书第 205 页和第 260 页附表。

⑬ Lopo Homem, Planisphere d. 1554, 见《地图集》第二卷, 第 27 图。该图定为“1554年”制作。第二个 S 字, 原文此处破损。字迹模糊不清。1949 年伽拉苗作了一番考证, 才决定是 54 年的 S 字, 但还不能最后决定。(见《地图集》第二卷, 英文提要)。

⑭ F. Berteli: 《东印度群岛》(1565)一书的一张地图, 曾引用于 1554 年于威尼斯出版的 G. B. 罗穆萧《航海志》(G. B. Ramusio's Delle Navigazioni et Viaggi)。这张图的一部分, 重印于 HEMISPHERE, an Asian-Australian Monthly. 《半球月刊》第 20 卷第 2 期(1976 年 2 月)第 37 页。图的正面, 顶上朝北。在与交趾支那海岸和占婆海岸平行的海中, 有危险区的石滩, 虽有长方形并象一只脚形状标志, 却无文字, 但其经、纬度可以量出来。经度或东西之宽, 共有 1 度; 纬度或南北之长, 共有 5 度, 亦即自北纬 7°—12°。纬度是有偏低, 该图把昆仑岛 (Pulo Condor) 位于北纬 6° 强, 而今昆仑岛是在北纬 8°40', 相差将近 2° 半。诚如是, 以误差 2° 半计算之, 则该图所标志的危险区的南端, 应在今北纬 10° 半 (以误差 2° 半计算), 其北端应在今北纬 14° 半。

⑮ 《地图集》 Vol. 2, pl. 100. Diogo Homem 1558.

⑯ 《地图集》 Vol. 2, pl. 105. Diogo Homem 1558, 并见 Vol. 2, pl. 156.

⑰ Ferdinand Mendez Pinto: The Voyages and Adventures of Ferdinand Mendez Pinto, The Portuguese, During his Travels for the space of one and twenty years in The Kingdom of Ethiopia, China, Tartaria, Cauchinchina,

Calaminham, Siam, Pegu, Japan, and a great part of the East Indies (Eng. trans. by Henry Cogan,) London, 1891. p.2 插图(远印度群岛地图)。此图未知是否为品陀的原插图,抑或1663年H. C. Gent英译本的插图,或者是H. Cogan 1653年伦敦版英译本,1663,1692英译重版本,1891年英译摘译本的插图,现在,暂且把它当为与品陀同时代的地图来处理。

⑭ 《地图集》Vol. 2, pl. 234. Anônimo Bartolomeu Velho, c. 1560.

⑮ 《地图集》Vol. 2, pl. 95. Anônimo-Livro De Marinharia, c. 1560.

⑯ 《地图集》Vol. 2, pl. 124. Diogo Homem, 1561

⑰ 《地图集》Vol. 2, A. B. Velho, c. 1561.

⑱ 1561年意大利人J. Gastaldi: *Tertia pars Asiae* [《亚洲地图》该图一部分,重印于《半球月刊》第20卷第2期(1976年2月)第37页]。

⑲ 《地图集》Vol. 2, pl. 217. Anônimo-Diogo Homem, 1663.

⑳ 《地图集》Vol. 2, pl. 177. Anônimo-Diogo Homem, c.1565.

㉑ 《地图集》Vol. 4, pl. 401, Anônimo-Jebastiao Lopes, c. 1565.

㉒ 《地图集》Vol. 2, pl. 128 Diogo Homem, 1568.

㉓ 《地图集》Vol. 2, pl. 139. Diogo Homem, 1568.

㉔ 《地图集》Vol. 3, pl. 270 Fernão Vaz Dourado, 1570.

㉕ 《地图集》Vol. 3, pl. 284. Fernão Vaz Dourado, 1571.

㉖ 《地图集》Vol. 3, pl. 285. Fernão Vaz Dourado, 1571.

㉗ 《地图集》Vol. 3, pl. 238. Dominges Teixeira, 1573.

㉘ 《地图集》Vol. 3, pl. 306. Fernão Vaz Dourado, 1575.

㉙ 《地图集》Vol. 3, pl. 307. Fernão Vaz Dourado, 1575.

㉚ 《地图集》Vol. 2, pl. 239. Luis Jorge de Barbuda, c. 1575.

㉛ 《地图集》Vol. 3, pl. 340. Anônimo-Fernao Vaz Dourado, c. 1576.

㉜ 《地图集》Vol. 3, pl. 341. Anônimo-Fernao Vaz Dourado, c. 1576.

㉝ Ortelius: *Asiae Nova Descriptio* (1580年左右), (奥尔特里乌斯《新亚细亚地图》)。图中虽然绘有I. Pracel, 在北纬 $10^{\circ}$ 余至北纬 $13^{\circ}$ 余,但却偏近菲律宾群岛的海岸,远离交趾支那海岸,这可能是对这个传说中的航海危险区的帕拉塞尔,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才把它绘于偏向东面的菲律宾群岛。

㉞ 《地图集》Vol. 3, pl. 324. Fernao Vaz Dourado, 1580.

㉟ 《地图集》Vol. 4, pl. 408. Anônimo-Sebastiao Lopes(?) c. 1583.

㊱ Ludouico Gergio: *CHINAE, osim Sinarum regiois, noua descriptio*, 1584, 乔治奥《中国地图》, 1584年,“帕拉塞尔群岛”(Pracel ins.)的名字,和一只脚形状(脚尖向南),很明显地出现于地图上。帕拉塞尔群岛的南北长度为4度,亦即自北纬 $12^{\circ}$ 至北纬 $17^{\circ}$ ;东西阔度,约为经度1度。

㊲ 1584年西班牙人法兰西斯·高耳(Francis Gaulte)绘制的一张世界地图,重刊于R. Hakluyt: *Principal Navigations*, (1598), Vol. I. 末页插图。[哈克鲁义特《航海记大全》(1598年),格罗斯科1904年出版,第一卷,卷末插图]。

④② G. Mercator: Atlas, China (1585年)。(麦卡托《地图集·中国地图》幅,大约于1585年)。该图一部分,重刊于《半球月刊》第20卷第2期(1976年2月)第38页。由于《中国地图》的图幅,南止于北纬 $15^{\circ}$ ,所以 $15^{\circ}$ 以下的帕拉塞尔群岛,看不到。

④③ A. Ortelius: Genio Et Ingenio Nobili Du. Nicolao Roccoxio, Patricio Antverplensi, Eiusdemque Urbis Senatori, MARIS PACIFICI, 1589 (奥尔特里乌斯《太平洋地图》1589年。该图把帕拉塞尔岛,置于靠近菲律宾群岛,这是太偏于东面了。又:帕拉塞尔岛在北纬 $7^{\circ}$ ,这是太偏南了。如果该图经纬度的误差不是太大的话,那么,这个帕拉塞尔群岛,就与当时的帕拉塞尔群岛无关,亦即它不是一只脚形状(北纬 $12^{\circ}-17^{\circ}$ )的帕拉塞尔群岛,该图把帕拉塞尔岛(I. Pracel)仅作普通不规则的岛屿形状,而不作一只脚形状,也许这也是区别二者之间的不同。

④④ 《地图集》Vol. 3, pl. 375, Bartolomeu Lasso 1590.

④⑤ P. Plancius 《世界地图》1598年。日本江户时代手书彩绘的屏风,右面第二板的屏风,在靠近交趾支那海岸,有一块长方形的标志,很明显地可以看到,但无文字,因为该图全部只绘上了地形,均无书写任何地名文字。

④⑥ 《地图集》Vol. 3, pl. 383. Anônimo-Bartolomeu Lasso-Petrus Plancius 1592—1594。

④⑦ Map of the World by Peter Plancius, A. D. 1594, in Richard Hakluyt: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in 12 Vols), Vol. IX, 卷末插图。

④⑧ Da A. Ortelio: “La Cina”,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f, 106. 图见德礼贤译注《耶稣会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Il Mappamondo Cinese de P. Matteo Ricci, S. I., par M. D’Elia, S. I. (1938), fig. 4.

④⑨ Frères Van Langren: Carte de le Penninsula Indochinoise, 1595. 弗莱列斯·万·朗格梭《东印度群岛航海图》1595年。该图根据1497年华斯哥·达·伽马(Vasco da Gama)以后到达东方的葡萄牙人所提供的材料而绘出的。

⑤⑩ 《地图集》Vol. 3, pl. 385. Bartolomeu Lasso-Henricus Florentius Van Langren, 1595. in “Itinerio” de Linschoten.

⑤⑪ Ian Huygen Linschoten: Itinerario, Voyage afte Schipvaert Van Ian Huygen Linschoten naer Oost afte Portugaels Indien, Amsterdam 1596. 附图。

⑤⑫ 《东亚航海图》,此图曾于日本庆长初年(1596年)由平野乡上的末吉孙左卫门(1570—1617年)于1604年使用航行于吕宋与东京之间,原图有写上平假名的地名;但又用小长方形的纸条,写上汉文的地名,这是天明七年(1787年)书绘时所增入的。图上对于暗礁等,亦有标志出来,如安南近海一带,被航海者视为极其可怖并加以特别警惕的万里石塘(亦作万里长沙),就是这种标志之例。参阅:大坂府立图书馆编著《南方渡海古文献图录》,昭和十八年(1943年)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原文平假名的プラセル(Pracel),已被汉文字的纸条“万里石塘”所覆盖了。

⑤⑬ Cornelis Doetszoon, 1598年手绘《东南亚和东亚的罗盘航海图》。

⑤⑭ The true description of all the Coasts of China, Cauchinchina, Can-

boya, Syao. Malacca. Arraacan, and Pegu, together with all the Islands thereabouts, both great and small, With the Cliffes, Breaches, Sands, Droughts and shallowes, all perfectly drawne and examined with the most expert Cardes of the Portingales Pilots. Printed at London by John Wolfe, 1598. [Reprinted in Richard Hakluyt.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in XXII vols), Vol. IX, p.337, (Glasgow, 1904)]

⑤ 《东亚航海图》日本江户时代中期(18世纪)手绘彩色本。图上地名不多,有:葡萄牙文,汉文和平假名的地名。看来它是一张重绘十六世纪末的葡文地图。

⑥ Sebastiao Afcz 绘制的《东亚航海图》,这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系屋随右卫门(著名贸易商)所使用的一张图。据中村拓《御朱印船航海图》说,随右卫门于文禄元年(1592年)受朱印状,故主张该图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所使用的。但是冈本良知《十六世纪日本地图发达考》一文说,系屋随右卫门歿于庆安三年(1650年),行年65岁,在文禄元年时,他才7岁,不可能使用这张图。他主张《东亚航海图》这一类的图,起源于庆长初年(1596年)之前后。要之,这张图,制作于并用于十六世纪末。如今所见,这是天保四年(1833年)鹰见泉石摸写的彩绘本。

⑦ Map of the World, A. D. 1600. Called by Shakspeare "The New Map", with the augmentation of the Indies. [Reprinted in R. Hakluyt: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l. I, front page. (London, 1880).]

⑧ 1600年左右手绘彩色本《印度洋与东亚地图》。

⑨ 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钱塘张文杰过纸,万历壬寅(1602年)孟冬日。”

⑩ 1606年荷兰威廉·燕逊·勃黎奥(W. J. Blaeu)《世界地图》,比较罕见,现在从1635年版的W. J. 勃黎奥所作的《东印度古地图》,可以见到有 El Pracel (帕拉塞尔)位于今越南中部海岸之附近海面。又1646年版的W. J. 勃黎奥《世界地图》亦可见之。

⑪ 《世界图》Typvs Orbis Terrarum 江户时代初期手绘彩色六幅屏风的地图。

⑫ 《航海古图》,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手书彩绘革制本,图中的地名很少,有用葡萄牙文书写的国名,如 Pegu, Siao, 有用汉文书写的国名,如大明、吕宋。罗盘方位的航海方向,画得很仔细。经、纬度,画得很清楚。

⑬ 《万国绘图》,日本江户初期手绘彩色八幅屏风,画面上没有文字,仅在北美洲留下 America Septentrionalis 这个字。

⑭ 《世界图》,江户时代初期,手书彩色六幅屏风,图上有用平假名草书的地名。

⑮ 《东亚航海图》,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手书彩绘本。图上的地名,汉文与平假名,均有。

⑯ 《东亚航海图》,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手书彩绘革制本,图上的地名,都用平假名。

⑰ 《东洋诸国航海图》,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手书彩绘革制本,图上的地名,用平假名和汉文。

- ⑥⑧ 《万国总图》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绘，屋庄兵卫木板笔彩刊行。
- ⑥⑨ 《地图集》Vol. 4, pl. 426. Anonimo-goao Bastista Lavanho E Luis Teixeira 1597 E 1612.
- ⑦⑩ Cartes des Costes de Cochinchine Tunquin et Partie de celles de la Chine, en Histoire Generale des Voyages, Tome II p. 172 (Paris, 1746), 作为 John Saris (1613) 航海记的插图。(参阅本书插图)
- ⑦⑪ 《地图集》Vol. 4, pl 416 Anonimo-Joao Teixeira Albernaz I, C. 1628。
- ⑦⑫ 《地图集》Vol. 4, pl 464 Joao Teixeira I 1630。
- ⑦⑬ 《地图集》Vol. 4, pl 498 Anonimo-Joao Teixeira Albernaz I, C 1640。
- ⑦⑭ 《地图集》Vol. 4, pl 505 Joao Teixeira I, 1643。
- ⑦⑮ 正保丁酉《万国总图》，殆即正保乙酉(1645年)之误。
- ⑦⑯ 《地图集》Vol. 4, pl. 514. Joao Teixeira I. 1649.
- ⑦⑰ 《地图集》Vol. 4. pl. 516. Joao Teixeira, 1649.
- ⑦⑱ 《世界地图》屏风，彩色手绘本，1652年。
- ⑦⑲ Johan Blaeu: Le Grand Atlas ou Cosmographie Blavian (Amsterdam, 1663) up. 1674.
- ⑧① 《波丹人 (Batanjin Emaki) 绘卷》《东亚航海图》延宝八年 (1680年) 彩色绘本。
- ⑧② 日本延宝年间(1673—1681)《东亚航海图》，手绘本。
- ⑧③ N. de Fer, Geographe de monseigneur le Dauphin (1694); Marpe Monde ou Carte Generale de la Terra (Paris 1698)。该图中文译为《坤輿全图》。
- ⑧④ 《世界图》日本元禄十一年(1698年)涉川春海水绘彩色屏风。该图地名不多，但多用汉文地名，有不知道的汉文地名，才用日本的平假名拼写。
- ⑧⑤ 《世界图》，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手书彩绘屏风六幅，由右而左第二幅，靠近今越南中部海岸，有“万里长沙”四个字。该图地名，均用中文。
- ⑧⑥ 《旧大陆图》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手书屏风六幅，右边第二幅，在交趾、占婆(チニハ)、柬埔寨(カホシ)海岸的附近海中，有一只脚形状，南起自与柬埔寨角同一纬度，北止于与交趾占婆交界处同一纬度，没有书写汉文或平假名。
- ⑧⑦ 《东南亚和东亚航海图》，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小加吕多(Kokaruta)手绘彩色本。图上地名，有用汉文，也有用平假名。
- ⑧⑧ 《坤輿全图》，彩绘绢本，年代大约在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图上有“台湾府”，台湾设府在1684年以后，故其上限不能早于1684年。该图全部地名，皆用中名或外国名译成中文。
- ⑧⑨ 《东洋南洋航海古图》，江户时代中期(18世纪初)，卢草拙旧藏，手绘彩色本。
- ⑧⑩ 《坤輿万国全图》，日本宝永六年(1709年)彩色绘本。地名均用汉文。
- ⑧⑪ 费尔《世界地图》1721年刊印本(另有费尔《坤輿全图》，1698年刊印本)，该图有关南中国海和印度支那半岛这部分，重印发表于《半球月刊》第20卷第2期(1976年2月)第39页。

㉑ 日本《本朝天文图解》所载净慧《地球之图》，江户时代中期(约1725年)手绘彩色本。

㉒ 原目贞清《舆地图》日本享保五年(1720年)木板刊印本，在靠近占城、柬埔寨海岸的海中，有ろラロン，作一只脚形状。コロニ(马来语 Karang, 礁石)，全名似为“万里石塘”的日本译语和马来语的混合写法。

㉓ 森幸安《亚细亚诸州天录地方图》日本宝历二年(1752年)手书彩绘本。地名多用中文，也有用平假名。这是一种罗盘方位航海图。

㉔ 沢田员矩《地球分双卯酉五带之图》地球仪，日本宝历九年(1759年)手书彩绘，分成十一叶，右边第六叶，有“万里长砂”。

㉕ 三桥钓客(中根玄览)《地球一览图》，日本天明三年(1783年)木板彩色本。

㉖ 长久保赤水《地球万国山海輿地全图说》，日本天明八年左右(约1788年)本版彩色本。

㉗ 司马江汉《地球图》，日本宽政四年铜板彩色印本。

㉘ 桂川甫周《北槎闻略》附录《地球全图》，日本宽政六年(1794年)手绘彩色卷轴本，图额上有俄文 ИЗОБРАЖЕНИЕ ОБИХЪ ПОЛОВИИЪ ЗЕМ НАГОЩА-РА(《地球的半球图》)看来是根据俄文版的地图翻译过来的。该图地名，汉名与平假名均用。

㉙ 桂川甫周《北槎闻略·亚细亚全图》，日本宽政六年(1794年)手绘彩色本。

㉚ “A General Chart of Mercator’s Projection, to show the TRACK of the Lion and HINDOSTAN from ENGLAND to the Gulph of Pekin in China and of their return to England, with the statement of the Barometer and Thermometer containing also the limits or the CHINESE EMPIRE, as extended by the conquests of the Present Emperor CHENLUNG”, in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vol. I, front page, London 1797 (以下简称《英使朝华录》。)

㉛ 斯同东《随同出使中国的历史纪事》第一卷第112—113页插图，图名《表示狮子号船行程和大使行踪的中国地图》伦敦1797年九月刊行。(G. Staunton: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mbassy to the Empire of China, vol. I, p. 112—113, A map of China with the Track of the Lion, & Route of the Embassy)

㉜ Carte Generale des Decouvertes faites en 1787 dans les Mers de China et de Tartarie, par J. F. G. de la Perouse (德·拉·庇鲁士《中国海与鞑靼海探险图》，1798年，铜板印刷本。)

㉝ 《世界四大洲图》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约十八世纪末)，手书彩色六幅屏风，右边第二幅。地名均用中文。

㉞ 稻垣子戡(Kon-yo-Zenzu)《坤輿全图》享和二年(1802年)，木板彩色绘印。

㉞ J. Johnson: *The Oriental Voyager; or Descriptive Sketches and Curatory Remarks, on A Voyage to India and China in his Majesty's ship CAROLINE,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03, —4, —5, —6, (London, 1807), front page, A Chart.*

㉟ 堀田仁助《地球仪》，日本文化五年(1808)手绘彩色图。

㊱ 高桥景保《新订万国全图》，日本文化七年(1810)手绘彩色本。

㊲ 存统《闽浮提图》，日本文政末期(1829年)木板彩色本。

㊳ David Abee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uring Countries From 1830 to 1833*, 卷首地图。(London, 1835)。图中，在中国海的西北，靠近今越南中部海岸，有一系列由小岛屿形状所组成的长方形，由南而北，约自北纬 $12^{\circ}$ — $16^{\circ}$ ，东经 $110^{\circ}$ — $111^{\circ}$ ，但无书写地名。

㊴ 十九世纪越南阮朝国史馆刊行《大南一统全图》。(图见《黄沙和长沙特考》卷首插图。西贡,1975年)。山于“大南”之名，见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因此，把该图，亦置于三四十年代以后。

㊵ 算作省吾《新制輿地全图》，日本弘化四年(1847年)木版彩绘本。

㊶ 栗原信晁《万国地球全图》，日本嘉永年间(约在1852年)木刻彩色本。

㊷ 鲈重时《地球仪》，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手绘彩色本。子午线以日本东京为准。

㊸ 中岛彭《新订地球万国方图》，日本嘉永五年(1852年)木板彩色本，这是计里画方的一张世界地图。

㊹ 清原高保《万国地球丹形图》，日本嘉永后期(1854)。

㊺ 长山贯《大日本唐土輿地全图》，日本嘉永七年(1854年)木版彩色印本。在靠近安南、占城海岸的海中，和靠近海南岛西南端垂直线下，有长方形暗沙，旁边书写平假名フラセル(Pracel)

㊻ 近藤岬山《亚细亚州之图》(亚细亚其二)日本安政三年(1856年)木板彩色印本。

㊼ 本表资料来源，除了西方出版的古地图，各于备注栏内注明之外，有关日本出版的古地图，主要参阅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主编：《南方渡海古文献图录》，昭和十八(1942年)山林写真制板所出版部出版；织田武雄、室贺信夫、海野一隆合编：《日本古地图大成·世界图编》，1976年东京讲谈社出版；织田武雄、室贺信夫、海野一隆合编：《日本古地图大成の世界图编解说》，1976年东京讲谈社出版。

㊽ 参阅 *Dagh-Register gehauden int Casteel Batavia, Anno 1631—1634*, blz, 455—457。

㊾ 以上见《黄沙和长沙特考》，西贡1975年；并参阅戴可来的中文译本，第217页。

㊿ 《两种海道针径》向达校注本，第33页，说：“外罗山……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石栏即帕拉塞尔。

① 关于万里石塘与万里长沙所指位置的对调，及其与帕拉塞尔的关系，将有另

文考订。

① (1602)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在占婆海中,标注文字说明,说:“大名声名文物之盛,自十五度至四十二度皆是”。(1585年)麦加-尔(G. Mercator)《世界地图》的《中国图》,其图幅,南自北纬 $15^{\circ}$ 开始。

② 明黄衷《海语》卷三,分水洋条。

③ 参阅《黄沙和长沙特考》,西贡 1975 年。

一九七九年五月完稿



